思忆文丛

季羡林

六月雪

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牛汉 邓九平／主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思忆文丛

季羡林

六月雪

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牛汉 邓九平／主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

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牛汉 邓九平 主编

簡介

人类思想的先驱者，为了捍卫人类理性的尊严，高昂其头颅，在血泊中站立，他们的名子可能不闻于世，但他们的思想永存，他们用生命之光照亮后人前进的道路，让我闪牢记先驱者的精神遗训，人类思想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

[image]

目录

声明

目录

前言

斗争的经过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重逢胡风

重逢路翎

有感于胡风案件的平反

胡风的回答——1948年9月

《文艺报》与胡风冤案

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

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储安平与“党天下”（节录）

我的发言

在民建会、工商联党委联席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1]

在民建会、工商联常委联席会议上的第二次发言

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

我的检讨

章乃器在1957年

章乃器传（节录）——最后的历程

章乃器——中共的诤友

关于成立“政治设计院”的发言

越是崎岖越坦平

关于成立“平反委员会”的发言

加强党对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

政治与学术之间：罗隆基的命运

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

挽狂澜既倒的可能是除三害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关于科学体制问题座谈会的发言

言论摘要

把鸣放的重点放到基层上

王造时冤狱侧记

王造时传（节录）

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三大主义的根源

宪法有的被彻底破坏，有的有名无实

党不应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

重申赎买20年的主张

我们对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

我的看法
由“百花齐放”所想到的
解除文艺批评的百般顾虑
在1957年5月11日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在1957年6月5日中文系教职员第三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学者的风范
我心目中的药眠同志
破浪前进
“三条老虎”横冲直撞给教育事业带来损失
在教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为了完成高贵的共同事业
中共失策之一
在第一次领导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感到遗憾
1957年4月27日在座谈会上的讲话
谈高等学校中的党群关系
三个问题
改变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清华）
曲折的道路
蒲梢沧桑（节录）
我的思考

肃清官风，发扬学风
咏“臭老九”
封底

前言

我们祖国是古文明国家，历史悠久。有幸历史学源远流长；尤其奠定我国两大传统文化基石的思想家，老子出身于“周守藏室之史”，孔子更著有《春秋》。太史公司马迁忍受残酷阴狠的宫刑，苛全性命，只为“述往事，思来者”写完《史记》。

那“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觉悟，多么强烈，多么令人神往。“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入于《正气歌》；“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鉴败莫如亡国”，“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格言，比比皆是。这倒的确是我们中国固有的血脉。

面对新的世纪，我们编辑出版这套《思忆文丛》，献给曾经亲历和未亲历的读者，也是一片“以往鉴来”的心意。

对于收集的1957年的文章，作为“实录”，为了存真，我们基本不作文字修改（除错别字外），也不以我们的观点来取舍。我们期待的，是从这有骨有肉有血的思想资料，孕育出一大批更富创造性和智慧的俊才；为祖国二十一世纪的新发展做出知识分子应有的贡献。

1998.8

斗争的经过

胡风

1953年4月到1953年5月

一、　1952年2月，得到了暑假搬家的允许回上海。计划是，在上海参加一下工厂的民主改革（后来是参加了“三反”），整理一下自己和积存材料等，搬京后申请解决组织问题，参加工作或争取到朝鲜去一次。这时候就听到了传闻，说文艺上将有一次大论争，中央宣传部文艺处正在研究我的全部文章。当时觉得，研究我的文章，那是平常的事情，但对于所说的大论争不大明了，更没有意识到是对我的。

因为，由我看来，理论是为了服务于实践的；当时正发生了一些使作家苦恼的不能解决的问题，例如赶任务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怎样表现工人阶级的问题等，正在迫切要求得到理论上的解答，对一些作品的不同看法，引起了一片混乱，也正期待着研究和分析，怎么会丢开这些去争论过去的问题呢？

二、　4月初，看到了《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15号和16号）。检查以后，觉得问题不好处理，觉得用这样不妥当的做法会发生很大的困难的。当时给彭冰山同志看过，他看了说，内容说不上什么，并说周扬同志要路过上海，那时候谈一谈看。同时看到了《胡风文艺思想研究资料》的小册子。没有出版年月和出版处的。

三、在上海和我谈话中，周扬同志斥责我是“抽象地看党”，严厉地斥责我是个人英雄主义，说我把党员作家批评“尽”了，但又指责我和重庆的“才子集团”

（指乔冠华等同志）的亲密关系。不过，他的意思是说回北京商量一下，或者约我到北京谈一谈。同时，《文艺报》也准备对夏衍同志过去的作品作一总的批判，周扬同志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周扬同志走后，彭冰山同志觉得这样下去不好，提议叫我写信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告请示。我考虑了两天，虽然心里总感到不安，但觉得《文艺报》那种做法要引起浪费和混乱，就贸然地写了信。

四、同时，彭冰山同志要我写一篇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的文章，表示一下态度，借此把问题了结一下。本来，我早想从《讲话》中提出几个原则来从实践情况分析一下我的体会，但解放前没有可能做，解放后我没有写理论批评文字，而且，一涉及实践情况总有许多顾虑，所以只想等安定了以后再说。但想不到这成了一个表示态度的问题。

第一，在我的工作中，总是从党底政策和毛主席的文章寻求指引，对于具体环境下的实践角度和实践态度的指引， 从来没有从正面解释过党底政策的； 我是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成和毛主席思想整体相联的部分，不能教条式地去应用，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也引用过某些论点的。

第二，在读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我也曾就蒋管区的文艺实践与民主斗争的结合问题，从思想改造这个角度上作过考虑，把我的一点体会写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逆流的日子》，19——39页）。那文章里没有明提，是因为顾虑到审查关系；就是这样，那文章还被扣了一些时，后来被删去了那里面说到新文艺底战斗任务的几句。

第三，就我所知道的，当时从事理论批评工作的同志冯雪峰、邵荃麟、以群同志等，就没有写过文章。但虽然如此，我还是马上着手写了。当然是根据实践情况，尽我能有的理解写了的。这是我解放后第一次写的理论性文字。题为《学习，为了实践》。当时据我的估计，写了也不会发表，更不会了结问题的。我也把这意思告诉了彭冰山同志。

五、文章刚刚写完，正在斟酌中，就看到了《人民日报》加上按语转载了舒芜的文章。同时，《文艺报》在广泛地动员通讯员们检讨胡风理论，写文章，开座谈会等；读者同意的就奖励，不同意的就批评，以至取消通讯员资格（这做法一直继续到林默涵何其芳同志的文章发表了以后的相当的时间内）。我的《学习，为了实践》，由彭冰山同志送北京审阅。我附一短信给周扬同志，告诉了他我看了《人民日报》按语以后的惶惑情况。彭冰山同志也觉得《人民日报》按语不妥，是“不负责任的”。周扬同志回信，说我文章没有自我批评，不宜发表（后来在会上他说我不该“大骂”了一通公式主义），但叫我到北京来讨论文艺思想问题。我开始再检查我的几本小册了。

六、车票买好了，上车的当天看到了《文艺报》六十六期发表了两篇“读者中来”，是要求公开批评我的文艺思想的。因为《文艺报通讯员

内部通报》所发表的第一篇“来信”，我作了简单分析附在给周总理的信里，这次换了另一篇；但第二篇还是在《内部通报》发表过的第二篇，只改了几个字，是专门指出我对何其芳同志的“恶劣态度”的。既然我提出了问题，周扬同志又约定了我来北京大家讨论问题，但在我来北京之前赶着发表了这来信，这就造成了一种很急迫的不能平心静气地对待问题的情势。彭冰山同志觉得这就把问题弄得更困难了，但觉得还是来北京的好，我自己更觉得有到北京来了解党的要求和同志们的意见的必要。

七、到北京后到开会前，见到过周扬同志两次，每次大约十多分钟。他的态度很严厉。关于我本人的，主要思想有几点：（一）我反对了党员底意见，但党是代表群众的， 党内人底意见总要对些。又说社会民主党最危险，这是50年3月他向干部作的报告中已经提出过的。（二）舒芜是进步了（他说不是投机取巧），舒芜说的“几个人”，实际上是指我。（三）我说的话九十九句对，但如果有一句在致命的地方错了，那就全部皆推翻了。（四）他觉得过去的事不必谈，但还有几个人受我的影响，所以，要舒芜和受我影响的青年来出席，也要茅盾来出席，大会小会轮流地开。（五）要我主动地检讨，少说或不说优点，只说缺点。（六）要打掉我的架子。……我已是罪人的身份，什么都不能说了。这以后，他说工作忙，由林默涵同志多和我谈。

八、丁玲同志见面多些，但她说不搞理论，提不出意见，只问我和香港争些什么问题。又说《文艺报》收到了一百多封信。

九、我向其他同志征求对我的文字的意见，如何其芳林默涵冯雪峰等同志，但都说没有时间看我的文字，只说些一般性的意见。冯雪峰同志接触了一些有关的实际问题，有的提得很严重，但在我看来，有的与事实不符，有的是人事问题，已无法挽救，有的只能当作理论问题去检查。托林默涵同志请过胡绳同志提意见，但因为他忙没有机会。

十、周扬同志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说不要先存一个谁错谁对的定见，平心静气地好好地谈。林默涵同志也传达过周总理的指示和胡绳同志的意见，也是说不要先存一个谁对谁错的定见。周扬同志还要我自己在会上说话，说也许是别人误解了我。我当然是需要把过去彼此的意见加以分析研究的意思。但看一看气氛和同志们的态度，听一听同志们的意见，我觉得没有这个可能，所以决定了用“依靠组织，实事求是，尽其在我”的原则对待这个问题，专门检查自己的错误，不作任何申辩，尽可能快些做一个初步的结束，写出检查来，免得多费同志们的时间。就在

传达周总理的指示的时候，周扬同志依然用的是严厉的口气，现出了冷冰冰的不屑多谈的神气。

十一、但除开检查出来了对于五四当时领导思想的错误提法，违反了毛主席的分析和结论以外，在我的理解上，其余都是同志们对于一些文字上的误解或者我在文字上的缺点问题等。检查出来了这个原则错误，我就口头向林默涵同志汇报了。

其余的限于水平，实在找不出来，所以只好征求同志们的意见，希望提得具体些，给我帮助。例如同志们说《论现实主义的路》里有反马列主义的东西，但我自己在关于文艺的分析中找不出原则错误，只是耽心对于政治发展情况的叙述和社会内容的分析也许有不妥之处，和强调一点因而会引起片面印象之处。

十二、周扬同志交来了周总理的信，除文艺理论以外还提到应该检查“生活态度”。读过以后我反复地思索过，感动地发现了这是给我很大的帮助。以我这个追随党的事业的人说，首先应该澄清对于组织的错误态度，那以后，才能够顺利地检查理论问题。周总理是把我当作阶级事业的一个追随者看待，所以才指示了这一点的。冯雪峰同志还说这对我不一定有必要。但周总理指示我多和周扬、丁玲同志洽商，由于前面说过的情况（周扬同志说他忙，由林默涵同志和我接头；丁玲同志说不搞理论，没有具体意见，后来她又不在北京），没有可能做到。

十三、怀着感激和自愧的心情，写完了《对我的错误态度的检查》以后，我的情绪上得到了很大的澄清。 我是尽可能体会了周扬同志所说的“抽象地看党” 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意思写的。于是又重新检查我的几本小册子，一面尽可能征求各方面同志们的意见，并等待开会听意见。

十四、9月6日开第一次会。开会前一天，林默涵同志一定要我先说话，但我因为抓不住问题到底在哪里，觉得困难得很。得到林默涵同志底同意，就《文艺报》发表的“读者中来”所提的理论问题说明了一下，并且申明这是初步的检查，似乎得不出那里面所下的结论， 希望同志们帮助。 接着同志们发言，有的责备我不该“强辩”，主要发言人胡绳、何其芳、林默涵、冯雪峰、周扬等同志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问题和要求，有的同志口气非常严厉，有的同志口气充满了嘲笑，冯雪峰同志开始是带有讨论问题的口气，并说《文艺报》底按语不对，读者断章取义，但一听到周扬同志底严厉口气就又马上改成了完全不容讨论的口气。这样的情况是完全出乎我的想象的。但因为已经确定了“依靠组织”的原则，

我没有在情绪上受到一点影响。但最使我奇怪的是，主要发言人好像并没有看过我的文字，只是随便抓一两句来任意解释，有的还好像是临时从《胡风文艺思想研究资料》那小册子抓来的。

周扬同志是主持会的，他连后一句都没看就用前一句来斥骂了一阵。我已经是罪人的身份，当然什么都不能说。林默涵同志归纳，要我就“现实主义”，“生活”，“主观精神”，“民族形式”，“五四”五个内容进行检查。

十五、我详细慎重地考虑了同志们底发言内容，分门别类地进行了检查以后，感到困难得很。困难之一是，无法确定同志们底要求目标。例如冯雪峰同志在一次个别谈话中说过不是算旧账，但林默涵同志在一次个别谈话中又说“本来就是要算旧账”。于是一面再检查，一面等待同志们进一步提意见。因为周扬同志在会上又说过要大会小会轮流地开的。

十六＼9月25日，　《文艺报》发表了舒芜底《致路翎的公开信》，前面加上了“编者按”。这封信在开第一次会的前一天，我收到了打印本。看了以后，觉得意外，在我的理解上，他所说的理论问题不但混乱得很，而且也是和我连不上的。对路翎同志的批评，在我看也是和路知同志连不上的。路翎同志为了对党负责，他写了和舒芜的关系的报告，送呈中央宣传部文艺处。但舒芜底《公开信》还是公开发表了，只不过删去了几处太明显了是捏造的事实。

十七、就是《文艺报》出版的这一天下午，林默涵同志来我我，一道到中山公园谈了几小时的话。这是一次最长最亲切的谈话。除了一些政治情况，胡乔木因病休假和习仲勋同志来主持中央宣传部的事情以外，主要的内容有这些：（一）路翎提供关于舒芜的材料，他相信是真实的。（二）这以前对舒芜底情况不大了解，只听到他从刘邓大军占领过的家乡跑出来的事情，也对他有些揣测；广西也没有送来材料。大概舒芜没有政治问题，否则不会给他当中学校长。（三）路翎是有贡献的，舒芜一开始就犯错误。（四）路翎过去作品解放后都不能出版发行，那是下面不理解，过了这件事就会解决的；这件事过去了，路翎是可以作很多工作的。关于我的主要有两点：（一）有些文章提问题提得不够明确，容易生副作用；（二）其实现在大家忙，没有时间谈过去的问题。发表了舒芜文章的当天（舒芜十多天前到了北京），林默涵同志表示了这样的态度，当时使我很迷惑。他说过“就是要算旧账”，现在又说没有时间谈过去的问题，那现在这样大张旗鼓底目的到底在哪里？想

问他这个问题应该怎样结束但又觉得不能由我提这样的问题。我曾经当林默涵同志提到胡乔木同志的时候，两次提出过想和胡乔木同志谈一谈，得到指示，后来在北京剧场偶然见到胡乔木同志的时候，也当面提出过，但都没有得到回答。现在看到林默涵同志似乎谈得诚恳，我又提出希望看一看胡乔木同志底病。林默涵同志后来一直没有回答，我就完全找不出把问题放到正常道路上的努力方法了。

十八、因为同志们一再提到“小集团”，我有责任交待，我写了《关于〈希望〉的简单报告》，把我所知道的党员与非党员投稿者列出名字来，便于组织上检查。

因为同志们一再追究和舒芜的理论关联，舒芜又坚持说他的理论是完全依从我的，我有责任交待，写了《关于舒芜和〈论主观〉的报告》。我只简单地说明直接和我有关的事实作了自我批判，对解放后我所了解的舒芜底情况不加叙述和判断，免得同志们误会我是想封他的口的。

十九、在这期间，除了《文艺报》在继续加紧动员读者批判胡风及其“小集团”

以外，《人民日报》“文艺组”也向全国通讯员发出了《积极参加文艺界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人民日报通讯》，第二十八期，十月一日）。

二十、这中间，我一面检查自己，一面等待开会。但这时候从其他工作岗位的同志得到了暗示：这情况不是僵持起来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外。还传来了这样的意见：别人提意见也提不出什么的，开会不过是形式，不要以为意见提得那样严重就真是那样，还是就可以检讨的检讨；党是爱护我的，检讨了不会对我苛求，但不检讨我就决不能解决组织问题，除非从此搁笔；不检讨，我自己无所谓，但和我有关系的青年就要吃苦了……。我这才领悟到：并不是现在要把理论问题弄清楚，主要地是要我通过理论问题在群众面前表明对党和党员同志们的态度。

这时候记起了丁玲、冯雪峰同志都提过“他们希望你写一篇文章”的话。

二十一、但在我看来，在理论上表明态度，那当然也不能离开“实事求是，尽其在我”的原则。如果抱“过关”思想，离开了实际的感受，把自

己没有真正理解到的问题用一些概念说法给自己戴几顶帽子，那固然省事，但那一定要产生有害的效果的。党不会要我这样，同志们也应该是不希望我这样的。抱着这样的心情，我向林默涵同志征求同意：不等再开会，就动手写一篇，但有的问题要解释一下。关于民族形式问题，因为近年来实践情况我不大了解，检查起来需得参考许多材料，暂时不触及，以后再专门去整理。林默涵同志同意了。关于需要解释的意思，也向冯雪峰同志谈过， 他也同意了。 他还笑着说，“不能屈打成招的！”这就写成了《一段时间，几点回忆》。现在我一再从回忆中检查当时的心情，我是尽可能有的理解诚恳地写了的，我是用对党说话的心情写了的。是当做党给我任务做的。如果有错误或有不充分之处，那是由于自己的理解力无法达到的缘故。我是希望同志们当作一个我是在尽可能有的限度上做的一个努力结果看的。11月18日送呈。后来夏衍同志说：不发表我的检讨而发表了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底批评，是因为我不该在文章里做了解释。但实际上我是事先得到批准的。

二十二、11月26日，开第二次会，人数扩大了，其中有路翎和舒芜。事先，林默涵同志要我把《一段时间，几点回忆》底内容口头上再报告一次。我觉得写出了用不着再报告，但他说大家忙，无时间详看，还是报告的好。在会上我作了简单说明。舒芜也把他的文章作了报告，那是说他的思想是完全由于我的影响，完全是演绎我的理论的。

二十三、 12月1日，周扬、林默涵、严文井三同志来，谈了相当长的闲天。中间谈到搬家和工作问题，周扬同志问我参加工作还是到生活里去，说参加工作和一些群众在一起，有受到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好处，不过，周总理说也可以到朝鲜去。

本来，我没有在北京参加工作（1950年在上海我是打算好好担负上海文联”工人文艺委员会”的工作的），是一个被责难的焦点；前几天冯雪峰同志又叫我向林默涵同志提工作，说林默涵同志会向胡乔木同志报告决定的；当时周扬同志又提到了我一向不赞成不把创作当做工作的看法；所以当时觉得也许周扬同志底两可提法是因为耽心我不愿意参加工作的缘故。因为这，我回答说：以我的情况看，也许参加工作的好，但同志们都了解我的情况，请由组织上决定。这还是从我确定了的“依靠组织”的原则这样说的，

二十四、12月11日，开第三次会，16日开第四次会。完全是同志们对我提意见。

主要发言人的口气更严厉，有的同志，如何其芳同志，用他的意思解释了我的几处文字，把问题提到了我是存心反对党的严重程度。同志们没有提过《一段时间，几点回忆》有什么原则错误，另外又提出了许多问题。但使我奇怪的是，主要发言人如周扬、胡绳、何其芳、林默涵、冯雪峰等同志，好像还是没有认真检查过我的文字，只是抓出一两句来照自己的意思随便解释。林默涵同志甚至把我自己检查出来的关于五四当时领导思想的错误提法也当作他自己的意见再说一次。周扬同志底发言更是随便从我的文字抽出几句来斥骂了一阵。其余几位发言较少的同志只是一个不得不表示态度的意思。因为确定了“依靠组织”的原则，我在情绪上没有受一点影响。最后，周扬同志严厉地斥责了我，说我在文艺理论上是反党的“路线”；说政治态度上无问题，但问题不决定于政治态度，而是决定于文艺理论；说我要在文艺理论上“脱裤子”，承认是反党的“路线”……。斥责了以后，归结到：结论要由我自己做。时间太晚了，我要求简单说明我的态度，但还只说了几句，有的同志就大声说明天还有工作，会应该散了。我当时向同志们说明的主要点是：经过这一次，同志们坦白地说出了对我的意见，我感到愉快，但当然还要继续检查，作出结论，在工作上去认识并改正错误，请同志们相信我。说我感到了党是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20多年的工作，党没有不注意的道理；谈出来了，党明白了，我自己也安了心。如果有些问题我不能理解，不能一时解决，那也不要紧，一步一步做去就是。

同志们不要耽心意见提得太尖锐，那不要紧，那是为了帮助我猛省的。我自己更加强了求真的精神，要努力再学习，争取做得好一点，在斗争中受到锻炼。……我争取做毛主席底一个小学生。懂得了团结是在党底领导和教育下面工作的问题，要从过去朴素的想法和心情更进一步，争取了十多分钟把这点意思说完了，这是为了希望同志们相信我是要尽可能在党底庄严的斗争要求下面，在党性要求下面对待问题，对待自己，也对待同志们的。

二十五、会后，我照同志们提的意见作过认真的检查，但发现了问题更困难。

在我的理解上，稍一不慎就要犯原则性的错误，会引起有害的结果。这中间，向林默涵同志和周扬同志再提了工作问题和搬家问题。他们没有提过关于理论的问题。

周扬同志两次问到参加什么工作好，我说听组织决定。我说参加《文艺报》也可以，那是为了从前没有接受这个工作，现在表示愿参加

是承认错误的意思。周扬同志听了有些意外的表情，他改提了《人民文学》，我当时说，那也好。他还提到参加他有权决定的青年剧院的工作。我说这是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怕有些困难，但还是申明了听组织决定。

二十六、但虽然周扬、林默涵同志对我再不提起理论问题，使我相信了周扬同志在“讨论会”上所宣布的、结论要我自己做的决定，实际上他们却在进行着紧张的准备，准备一个对于我的全国性的公开斗争，由文艺思想推进成一个政治问题。

首先，在北京召开了党内领导岗位上的文艺干部们开会学习，传阅了和我有关的“材料”，连续地举行了好几次的报告和讨论会。在会上，有的同志说我是思想问题，有的同志说我是唯心论，有的同志终于甚至提出了我是托派。这样，在北京，党内的群众基础已经打下了。除了林默涵、何其芳同志的文章以外，还准备把舒芜“揭发”我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但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完全相信了周扬同志在“讨论会”上所宣布的决定，一面感觉到非常困难，一面在沉重地研究问题，考虑问题。

二十七、　1953年1月27日得林默涵同志信，说他的文章已经写好了，并希望我也快些写出来。

二十八、1月28日，到中南海访邵荃麟同志，说了我的意见，也问了他的意见。

（一）林默涵同志的文章要发表，我当然没有意见，不过，我觉得现在就发表了恐怕要产生一些我的力量无法解决的困难。关于这，他问我由我自己写，什么时候可以写出来；我回答他，搬了家以后大约两个月内。他说，他去商量一下看；并且说，要发表，也应该先给我看一看。（二）我向他提出申请解决组织问题。我不提出能够通得过的检讨就不能解决组织问题，早已有同志告诉过我了；还有同志忠告过我，现在提组织问题一定被拒绝，等检讨了自然会有人找我谈的。现在向邵荃麟同志提出，是经过了慎重考虑，以为非提出不可的。这是为了表明：理论问题只有在党底原则下才能解决，希望同志们相信我是要尽可能在党底庄严的斗争要求下面，在党性底要求下面对待问题，对待自己，也对待同志们的。关于这，他的回答是，理论上不先求得一致，怕困难，但要问一问看。这是我意料中的回答。我只希望他把我的申请转达。这两个问题以后邵荃麟同志都没有谈起过。

二十九、1月298，由全国文协在文化部小礼堂召集了全北京的有群众影响的作家们，严文井同志主持，林默涵同志作了关于检讨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最后说明，只准检讨，不能解释或讨论（我是辗转听来的）。我当时寄住在文化部里面，没有通知我参加。当时林默涵、严文井同志在全国文协都没有工作名义，所以，虽然用的是全国文协名义召集的，但实际的效果等于是中央宣传部文艺处直接召集的。这是企图在党外作家中打下基础的。

三十、　1月30日出版的《文艺报》发表了林默涵同志的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加上"编者按"转载了。2月15日出版的《文艺报》发表了何其芳同志的文章。

发表以后，中央宣传部文艺处紧张地从各方面收集反映。

三十一、　　2月21日，林默涵同志和我谈话，意思是希望我表示态度，甚至说，写一封简单的信发表一下也好。不用说，他是要我表示基本上同意他的理论的，一封简短的信当然是最方便最省事的解决办法。从他的地位说，这意思当然就是命令；但看了他和何其芳同志底批评以后，我不能不考虑到个人问题以外的问题，应当采取进一步对党负责的态度，所以告诉他说，我要认真地进行检查，现在写一封简单的信是很困难的。林默涵同志还说我基本上不同意也可以说明的，我马上觉得这是不诚恳的做法；他在群众面前宣布了只准检讨，连解释都不准，如果我说不同意，他就能够进一步给我加上一个"抗拒改造"的结论的。

我被推到了绝路上

读了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底批评，我马上根据我原来的文字和半年来几次检查过的札记逐条逐项地做过详细的检查。从处理态度上有几个问题。第一，我尽了能尽的努力写了书面检讨，但林默涵同志只说"胡风虽然开始在个别问题上作了一些检讨"，何其芳同志说"对胡风同志在会上的检讨，我是不满意的"；这是故意在群众面前隐瞒我写了书面检讨的事实，一方面使群众觉得我顽梗不化，一方面使群众摸不清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我已经写成了文字一定要我在会上口头做一次不能如书面详尽的报告，我怀疑就是为了便于不提我的书面检讨的。第二，对五四当时领导思想的错误提法，是我自己检查出来作了检讨的，但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在文章里提都不提一句。第三，周扬同志在会上声明了结论要我自己做，那离林默涵同志写成文章只有四十天，而涉及的问题又是那么重要的原则问题和复杂的理论问题，况且发表前几天我还特地

托邵荃麟同志转达我的态度，但林默涵同志却说我“直到今天还没有什么动静”。我觉得这是故意使群众觉得我是没有用何其芳同志所说的“严肃的诚恳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甚至是取了抗拒的态度的。这样的做法使我感觉到：周扬林默涵何其芳同志早已决定了不能由我自己检讨将问题结束，就是我有能力再检查出几个错误来，他们也会压下我的检讨不发表，并且提也不提，只是把我检查出来的问题归纳到他们的文章里去，把我的自我批评作为他们自己的批评的。否则周扬同志为什么告都不告诉我一声就取消了他在会上所宣布的决定，这是使我不能理解的。

其次，从理论上看，我觉得在我现有的水平上是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同意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底意见的。一方面，我感到一个沉重的负担从我的身上卸下了；如果我曾引起了像林默涵何其芳同志所肯定的有害的影响，现在他们下了这样严重的批评，那些影响就解消了，剩下的就只有我个人的责任问题而已了。但另一方面，从我的理解看，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底理论，要在已经陷入困难情况的文艺实践上产生严重的后果，这又使我感到了对于历史要求对于党的沉重的负债责任。这更是完全超出了个人问题的性质。但在林默涵同志从他的工作地位所表示的只准检讨的原则之下，再加上《人民日报》底按语，这就完全超出我的能力以外，把我推到绝路上了。

概括的说明

在这一般过程里面，由于当时用党底名义加到我身上的那一种庞大的客观压力，也由于我自己应当向党交待问题的诚意，我无法不把问题缩小到了只专门检查我个人过去的错误；我是付出了能够有的真诚，尽了能够尽的努力，虚心地倾听了同志们底意见，做了详细的检查，写成了书面检讨的。我是把这当做党交给我的一个任务做了的。我以为，我努力做到的这个初步的结果，应该是打下了解决问题的基础，可以用我对党对同志们表示的态度做保证，其余的问题应该在以后的实践中一步一步去解决的。但问题还是扩大起来更发展了。我面对着那一种压力，没有勇气争取正面地讨论问题，没有勇气坚持甚至提出应该遵照周总理所指示的，不先存谁对谁错的定见，大家好好讨论的原则，只图在不违背实际的限度上检讨了事。这固然是因为向我传达了周总理底指示的周扬同志是负责人，他主持讨论，不但不提这个指示，他自己的发言就取的是连解释都绝对不准我解释的态度，表示了和周总理底指示同样意见的胡绳同志自己发言也取的是不容许讨论的态度，成了不是讨论会而是严重的审判会；但我自己一面清楚地知道这个做法不对，但却把这看成了没有一点克服的可能性，因而没有做积极争取的努力。我自己清楚地

知道，从问题底实际上说，这是开始而不是结束，非等条件成熟，党中央有可能来检查整个实践情况，我这个从整个客观情况所产生的严重问题之一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但我却完全被周扬、胡绳、林默涵、何其芳、冯雪峰等同志，尤其是周扬同志底完全是代表党中央的态度、做法和口气所压服，总把工作繁重的党中央来检查文艺实践情况的可能时机放在几年以后，因而只是想通过同志们向党交待应该交待的我自己的问题，由这初步地满足周扬同志等底要求，希望同志们允许我参加工作，恢复我的能够从事文字劳动的条件。今天检查起来，在全部经过中间，我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错误，但我没有勇气提出以至坚持周总理底指示，没有坚决地依靠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这个思想斗争的原则，没有能够为党中央有可能来检查文艺实践情况争取一点任何正面的条件，这是我深深感到内疚的。

到林默涵同志底批评发表止（53年2月），从《文艺报》正式地全面地发动群众检讨我的时候（52年3月）算起，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从我到文化部寄住的时候（52年7月初）算起，有七个多月的时间。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内，我把精力完全放在检查我的过去上面。一方面感情被拖回到了旧中国的历史环境，摆脱不开那一种沉重而痛苦的气氛，另一方面，愈检查，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和我个人的问题所感到了的对时代要求、对党的负债心情又愈是压迫着我。尤其是寄住到文化部以后，免得产生误会，不愿去接触人，成了几乎没有社会生活的状态。这就弄得身体逐渐疲乏了下来。我自己明明自信没有任何理由这样想，但既然被当作了文艺发展底唯一的罪人或敌人，被期待着伏罪，周围的冷眼和白眼还是给了我一种压力。有一次在街上遇见了一个过去在商界做职业，解放后转入出版机构工作的社会朋友，他惊惶地低声问我、“你还能够自由么？”我吃了一大惊，警觉到了社会影响底严重，叹息我无力扫除这个有害的阴影，同时也无法不惭愧地看到我已经被社会上当作一个非法人的身份了。

在后一段时间内，我经常是在痔疮、支气管炎、肠胃不调的状态里面。冬天冷水洗脸，晚上无热水洗脚，慢性湿气病的足趾经常是腐烂状态。但我一直没有向同志们透露过。我唯一的目的是从我自己的文字检查出错误来，做好检讨，澄清我自己，通过同志们向党交待问题，也初步地使同志们满意，好给我一个工作机会，至少也恢复我能够从事文字劳动的条件。但虽然如此，在北京文艺界还有一种传闻：说因为我“拂袖而去”，林默涵何其芳同志这才发表了他们的批评的。

到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底批评发表了，因为问题也告一段落，我又

疲乏到了看书都看不进去的地步，我才向林默涵同志提到了我的身体情况，意思是希望负责同志们给我一个改变环境、恢复健康的允许。但林默涵同志听了什么也没有表示。例如，公家买飞机票让沙汀同志回四川过春节，我连提出自己买车票回上海一次的勇气都没有。一直到五三年五月，周总理指名我参加了到东北访问直接遣返的战俘，我才算脱离了这样的处境和环境。

如果负责同志们不是把我当做文艺发展底唯一的罪人或敌人，当会对我采取灵活一些的处理办法的。这和解放以来周扬同志对我的态度相一致，和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底批评态度相一致，也是和下面叙述到的这几个月我感觉到的又恶化了的情况相一致的。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贾植芳

时势变迁，胡风这个名字，对现在的读者来说似乎是相当陌生的；本传记前面几章所描写的有关中国大革命的历史，有关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内部纠葛，以及抗战中知识分子在各种政治压力下从事进步的文学活动，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恐怕也是难以理解的，就仿佛是有人在说一段古老的神话传说，让人似信非信，疑疑惑惑，甚至觉得不知所云。不过不要紧，只要读者耐心地读下去，慢慢地，一些令人感动的东西就逐渐清晰地显现出来——它就是历史，一部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通过胡风这么一个现在似乎陌生的名字而得以流传。

从50年代开始，胡风的名字在中国就成了不祥的象征，一个知识分子罪恶的代表。但从本传记可以看到，胡风一生所追求的，恰恰是与历史所加在他身上的罪名相反，他虔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在五十年代初，他还欢欣鼓舞地写了长诗《时间开始了》来歌颂毛泽东。可奇怪的是，他所有的追求、赤诚和歌颂都未能取信于当局，反而被视为异端，一再遭到不应有的批判、否定和怀疑，就像历史上的屈原，“信而被谤，忠而见疑”。由于对建国以来文艺实践状况十分忧虑，而自己坚持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又遭到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歪曲和批判，便向最高当局上书“三十万言”，直陈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希望领导能过问一下文艺这领域。他万万没想到，这样做的结果却是，不但自己身陷囹圄，而且株连了家人和一大批知识分子，成了50年代我国许多文化灾难中的第一件大冤案。这个“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故事竟会发生在人类已经进化到现代社会的20世纪，实在是令人太遗憾了，因而也实在是令人大心酸了！

本书写到胡风在1955年因“反革命”罪被逮捕以后，在监狱里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空中悉索听归鸟，眼里朦胧望圣旗”。这就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他的心态。可惜的是，这面“圣旗”，直到他生命的最后，还是在那儿“朦胧”着。传记里写到， 历史像变戏法似地在那儿变着， 可是胡风的遭遇却始终让人扼腕叹息：1966年，胡风的对手周扬一伙被打倒了，胡风并没有按照监狱当局的要求，对周扬他们落井下石，反过来“揭发批判”一通，因此，他的命运不但没有改变，反而罪加一等，由已到期的有期徒刑改判为无期徒刑。1976年，“四人帮”倒台了，胡风却因新出

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有毛批胡风的“按语”，又被与“四人帮”

挂起钩来批判，而且似乎比“四人帮”还要可恶，起码是罪行不下于“四人帮”；“拨乱反正”以后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一般文艺界的冤假错案都得到了平反，而胡风却仍然不能出席，直到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不得不被平反时，还对他的“政治历史”的问题和文艺思想问题留下了“尾巴”，甚至在他死后，一篇小小的悼词， 还闹了许多的风波，以至在去世7个月后，追悼会才得以开成！这么一件明摆着的政治迫害事件，却要平反三次，可以说是极耐人寻味。尽管有些当初迫害胡风的人后来自己也受到了迫害，可在这些人眼里，他们的受迫害是真正的冤案，而胡风却是活该！这种政治上被视为异己的滋味，在今天政治观念普遍冷漠的读者看来，似乎很难体会，但对胡风来说，这精神上的打击却是致命的，正应了前几年流传着的一句民谣：道路曲折走不完，前途光明看不见。于是，胡风从期望到绝望，从自信到幻灭，以至精神分裂，在幻觉中不断感到有人在迫害他，摧残他。但即使病到了这个地步，他心中真正期望的还是这面朦胧的“圣旗”，这面他至死也没有真正望到的心中的“圣旗”。在这个意义上，当我读到传记最后，胡风夫人梅志将胡风死后三年才给以彻底平反的一纸通知送到老胡灵前那段时，我的眼睛不觉模糊起来了。

我说这本传记越写到后来越精彩，还有另一个意思。作者晓风是胡风的女儿。

她也是个命运坎坷的人，生于战乱的逃难途中，书中写到四川的老鼠将婴儿鼻子咬破一节，这婴儿就是晓风。长于患难之中，才念中学，就逢1955年的大难，可以说是家破人亡（梅志的老母亲死于忧患中），没能受到高等教育，不得不在农场劳动了20年。苦难伴随了她的大半生。直到冤案逐渐平反，政策逐渐落实，她才调到胡风身边，担任胡风的秘书，帮父亲整理著作，编出了好几本有历史价值的书籍。这次写《胡风传》是她第一次执笔写长篇著作。看得出，前半部分的材料主要得之于她父母的文字材料，写起来多少有点距离，但写到后来，逐渐地把她自己所经历的一些感情放进去了，特别是最后几章，如胡风在监狱里的一些情况和出狱后的遭遇，可以说是用血写出来的文字，都很值得细读。记得抗战胜利后我来到上海，住在诗人覃子豪亲戚的洋房里，胡风带孩子来玩，走时将晓风留下陪我们。这时姑娘又瘦又小，病快快的，当晚就生起病发起烧来，我们夫妇没有带过孩子，急得不知所措，整个晚上就坐在她身边护理她；惟恐她病得太厉害。今天我读着晓风写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著作时，我眼前不断出现那晚上她烧得通红的小

脸。这人世间许多不可捉摸的命运真是令人感慨不已。

1995年11月在上海寓所

重逢胡风

牛汉

一

写下题目已有两天，左思右想真不知如何下笔，洁白的稿纸放在面前，字格就像雷达密密的网眼逼视我，等着捕捉我起伏不定的思绪。心情着实地有些惶惑和沮丧。已经撕了四五张无辜的稿纸，仍开不好头，总觉得写到纸上的字句近乎那种睽别不久令人憎恶的交代体。直到一分钟前，才从困恼中挣扎出来，并且得以顿悟：有些重逢如实记述，其实跟交代并无差别；就拿我此刻的心境来说，的确是怀着向历史作交代的庄严心情，在交代中不应有虚构的情节，更不能以超然物外的技艺去描绘，只能存留历史的印痕，如若把它当作一般奇文佚事去阅读，那是要失望的，因为其中绝对找不到赏心悦目的词藻和谐趣。

1980年春末，胡风悄然来到北京，几年之后才晓得他刚到不久就住进了医院。

当时传说他的精神又分裂了，这就是说这许多年里他的精神出现过多次濒临崩溃的危机。我总是不大相信，胡风的精神以及神经还会断裂？记得50年代初，他也曾有过巨大的苦恼， 我不止一次看到过他不停地在屋子里急速走动。 有一回我问他："胡先生，你的神经不会绷断吧？"他异常自信地说："哪里会脆弱到那种地步，我的神经有缆绳那么粗，多大风暴也不能奈他何。"（原话已记不得，但意思和比喻是不错的）在我的心里，胡风不论处在何种境况，都不大可能丧失思考人生和文学的本能。

1980年夏，胡风暂时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有关部门跟在京的一些"分子"

打招呼，可以去看望胡风。这考虑是很对的，人既然恢复了自由，过去的朋友为什么不能相会？特别是他的精神陷于病痛中，旧雨相逢，或可滋润他的心灵。这样我才去看望了他。悠悠然阔别了1／4世纪，终于又能坐在一起晤谈，重逢的情景是一生难以忘怀的。但是，记述这次重逢之前，我必须先得交代（我又习惯地使用了这个词）十几年前的一次"重逢"。在25年的分隔期间，我和胡风并不是一回都没有碰到过，说

的不是幻梦，我真的曾与他见过面，但那是一次更使人难忘的不同寻常的“重逢”。

二

1965年冬，为了给我提供一个改造的机会，让我去河南林县参加四清运动。临行之前， 接到通知， 我须参加审判胡风的会，还指定包括我在内的在京津的几位“分子”到会上发言，其实当时心里很明白，我们几个实际上是充当陪斗的角色，会场设在天安门附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个大厅，四周是高高的层．层坐席，中间的空旷地，很像一个室内篮球场，大小也相近。我们几个是个别地被传呼进去的，由一位法警领着，发完言就退出法庭。那天，我穿了仅有的一身深蓝色哔叽衣裳，领导告诉我，应当穿得整洁点。后来我意识到这是很有必要的，我们的形象与胡风应当有所区别。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了法庭，四周是大海怒涛般的眼睛，似乎要淹没了我，我自然不敢东张西望。迎面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孤零零站立的人，这只能是胡风，他面朝着审判席，我向他认真地望了一下，比起10年之前人明显地消瘦了，但面孔并不苍白，还是赭红色的，只是略有点发暗而已，与湖北长江沿岸胡风家乡的地脉的色泽十分相近，记得胡风穿的是一件棕色的中式棉袄，出奇地肥大，几乎长及膝部，他的两只手一直不自然地拢在袖口内，过去可从来没有见过他有这个闲散人的袖手习惯。他的整个形象使我感到很陌生，陌生这词不太恰当，或许用“异样”

二字较为贴切。胡风侧过脸向我这里望了一眼，我们有一瞬间的对视，他神情的冷漠并不使我感到惊愕，我完全能理解，因为这种冷漠，我从冯雪峰那些年的神情里早已经熟悉了。冷漠的内涵是强烈的自尊，还有些难以察觉的轻蔑。1982年，有一次（只有这么一次），我谨慎地跟胡风谈到这次法庭判决的情景，我对他说某某当时看到文艺界几位领导端坐在看席上，胡风蹙蹙眉头，不愿意谈这个话题，记得他只说了一句：“你们的发言我当时听清楚了，现在全忘记了。”没有再说第二句。

法庭最后宣布判决词，我们几个鱼贯进入大厅，被允许坐在一张长椅上，胡风仍一个人站立在原处，双手袖着，微微闭着双眼，认真地在聆听着判决词，记得他并没说话。随即法警把胡风带了出去。散会后，我们几个“分子”一起走出了法院的大门，难得有这次久别重逢，不知由谁倡议，我们到前门西侧一家饭馆每人吃了一碗肉丝汤面，分手时并没有说“再见”。我们每个人都非常了解再见这个词的分量。

那天芦甸非场钉动，两眼总是泪汪汪的，不知道他当时心里翻腾着什么，我一生记着那一双泪汪汪的想吐诉心思的眼睛，可是从此就与他诀别了。我当时肯定也想了许多事，而且我们几个绝不会一句话不交谈，但是现在全已迷迷茫茫等于忘却了。

三

现在还不能接着写1980年夏天我与胡风重逢的事。还必须记述1979年下半年我与胡风通信的情况，胡风当时在成都。在我看，通信是心灵的重逢，但我是怎么与胡风通起信来的呢？

1978年夏天，为《新文学史料》组稿我走访过萧军许多次，这位赫赫有名的文坛的强者， 在人世间默默无闻几十年之久了。“四人帮”覆灭后，我和黄沫同志（他当时是编辑组长）是北京报刊和出版社首次叩访萧军并向他约稿的编辑。说来惶愧，当时我还没有平反哩。但我心里确信萧军会记得我，并且不会把我们拒之门外，向他约稿就是我的倡议，我相信萧军是经得住久久深埋、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的人。多年睽别，他的体魄仍然是虎背熊腰、面孔红润、目光锐利，几乎看不出有因久久埋没而出现的苦相或麻木的神态。也许因我与他有过些老交情以及相近的命运，他热诚地接待了我们并答应写稿，从《新文学史料》第二期起连载了萧军和萧红的信简以及萧军撰写的详细注释。以后我多次独自走访萧军，已不全是向他组稿，有时完全是个人之间的访谈，每当我踏上萧军灰暗的严重磨损的木楼梯，脚下带出咯吱咯吱的悲抑声，总是小心翼翼，心里禁不住涌动着温泉般的情思，觉得那污渍斑斑相当陡的楼梯，似乎能通往一个永远读不完的幽深的故事。果然，有一次他用欢快的声调告诉我胡风在成都的通讯处，说：“牛汉，应当写信去、坦坦荡荡，有什么怕的？《新文学史料》应当给他寄去看看。”

我好多年没有跟朋友们通过信。当时不论写信给谁，对我来说都不可随随便便，何况给胡风写信或寄刊物，但当时的形势毕竟已好转，人世间的生活与友情都渐渐解冻，又经萧军这么一说，我次日就给胡风寄了一本《新文学史料》的第二期，但没有另外写信，我只在封皮上写下我的详细的通讯地址。刊物寄出去之后，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下来，似乎不是一本普通的刊物，而是一件可接通友情的信物。内心的激动比我几十年前作为一个练习写诗的青年，从苍凉的伏牛山区寄诗给《希望》主编胡风时还要惶惶不安，期待的心情也是相同的。

很快就收到了胡风8月16日寄自成都的信， 署名是H·F。看到阔别多

年一点没有变化的字迹，热泪止不住地泫然而下。胡风的信密密地写了一页，说收到了我寄他的刊物，“冯文有几处不符实际，在那种时候，他能这样写，已是难能可贵了。”

雪峰那篇文字是写于“四人帮”时期的真正的交代，有些明知是虚假的套话还是不能不写。如果雪峰能多活一年，他会重新回忆“左联”和有关的人和事的。胡风在信中还说，在“井中观天”时，曾写过些赠友的“韵语杂文”，可惜被抄走，以后再抄寄给我们，“以博诸兄一笑”。

从信的流利而刚健的字迹以及用语特点来看，我断定胡风写信当时人的体魄和情绪还是好的。（可悲的是一年之后，胡风精神上遭到病痛的折磨，写字仿佛失去了主宰，大大改变了他原有的字迹，连签名都似出自陌生之手。）这封信，我让全家人都看过。因为胡风这个“灾星”，20多年来跟我和我的全体亲人有着深深的牵连。但现在那种深重的基本上已成过去的灾难，最终并未摧毁我们之间内心的友情，灾难反而使纯净的友情更添加了一层庄严而凝重的内涵。梅志同志后来告诉我，胡风收到刊物，激动了很久，他从通讯处断定是我寄给他的。

我的回信除了简略谈到我当时略有改变的境况外，特意写了长长的一段有关路翎的近况，我还有意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一番。我深深了解，多年来，胡风不管处境何等困厄，路翎肯定是他最为惦念和担忧的一个朋友。形象的真实可使胡风获得有血肉的路翎，胡风对形象有着特别的敏感。我信中说，路翎几乎像一块岩石，没有任何表情，他的生命经熊熊大火之后留下了一片灰烬，冷冷的，很难再爆出熠熠的火星。我说路翎一家人困窘的生活最近有了些改善，他挂名在剧协，每月可领到80多元的生活费，自此路翎一家人早晨有钱买油饼吃了。我还在信中说路翎为剧协一个刊物看稿子，写不少意见。我没告诉胡风路翎当时诚惶诚恐写的审稿意见，看了委实令人难过，因为与世隔绝多年的路翎，诚实地努力地运用阶级观点分析评论他看的文稿，就像他在狱中服劳役时写思想汇报的文字，从他当时的身心来说，短时期绝对不适于从事编辑工作。首先需要把他的被几乎摧毁了的精神恢复过来，把他失落多年的美好而智慧的灵魂呼唤回来，信寄走之后，我又后悔不该写关于路翎那些惨痛的情况让胡风知道。我当时为什么竟那么粗心，没有想到他们两人都是被精神的病痛折磨过多少年的人。

收到我的信，胡风回信中，万分感慨地说：“真有死人复活之慨，在这四分之一世纪里，别的都能过眼烟云，但一念及因我而受累以至受害致废的心灵劳动的有生力量，总不胜万憾。”他看到我写的路翎近况后，

震动极大，使他“大出意外”，“多年来我总以为会给他以应有的维护和劳动条件，使他出世时带着难于估计的精神财富与人民相见。”他在信中还提到路翎在创作中“充满了对贫苦农民的感情”，说路翎的《王兴发夫妇》、《王炳泉的道路》、《蜗牛在尽冬上》等小说，“即使到1955年为止，路翎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作家”。胡风对他几十年来为之献身的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矢志不渝，他的热情还是非常饱满而热烈的。我受到了深深的感动。

胡风又说：“原来，我只想在余年里依然作一个普通劳动者，但也许要改变主意了，只要给我起码的条件，我要为四个冤案用去生命：曹雪芹、鲁迅、路翎、柳青。”

“心有余力，我也要论一论郭沫若、茅盾、田汉。”看到这里，我仿佛又看到当年在屋内急步走动、目光炯炯的那个浑身冒火的胡风，几十年的禁锢，并没有把他的从青年时期就形成的气质改变一丝一毫，看不出一点消沉情绪。当他回到人间，他不是在避开生活激流停船靠岸，而是准备迎着风浪张帆远航。他要“用去生命”为中国几百年来四个优秀的作家在历史的广场上树立高大的丰碑，他提到的前三位是大家可以想到的，胡风如此器重柳青，如没有经过多年认真的思考，他不会轻易写上的。我只记得50年代胡风以肯定的语气谈过柳青的《种谷记》，说是一部艺术气质纯正的作品，很可能后来又读了《创业史》受到了感动，引起许多艺术上的思考，他从文学发展和艺术审美的高度，热情地肯定了这位在“文革”中冤死的作家。

胡风还要论一论郭沫若、茅盾、田汉这几位文坛巨擘，他将从历史广阔的背景深入地评论他们，并通过这些作家的创作历程探讨中国新文学的得失。经过20多年“井中观天”，非但看不出他有消沉倦怠的情绪；经过沉淀、磨炼，他的生命变得更加清明起来。

四五天后，又收到胡风一封信，主要谈的是路翎，是前一封信的补充。他日夜思念路翎，信中说：“这两天，加深了一个想法：他是否对访者能发生信任的感情。

他和你们不同，是在井中坐了20多年的。以他的情况，对任何人都是不容易产生信任感的。所以，去看他，不是听他说话（他太难说话了）。说真话，不能有一点失真的表面话。”这段沉痛的话，与其说是他对路翎的深挚的关怀和理解，还不如说是他本人的内心的独白。他比路翎坐在井中的时间更长，再强悍刚正的生命，如磐的屈辱、孤独、悲

抑、渴望也会隐隐地侵蚀着他的心肌，眼神里不可避免地会流露出冷峻而空漠的光。（这种眼神，我可以从一千人之中一下子认出来。）20多年，难于望到几只信任的眼睛，听到几句真诚的实话。胡风的身心经受过几次毁灭性的冲击之后，严重的幻听使他一刻不得安宁，日夜都得听震耳欲聋的斥责声　　　　陡年之后，我问到他：“幻听是不是有中断的时刻？”他摇摇头说：“没有，连梦里都能听到。”令人感动的是，胡风1979年下半年写给我的几封信，没有一句谈到他的病痛和寂寞的心境，当时他没有对人生和世界完全失去信任感。只有绝望之后的冷漠才使人的灵魂颤栗。胡风从来没有绝望过。这封信里，胡风关切地谈到鲁藜和绿原。

我告诉他绿原在写诗，他感到振奋。他告诫我们：“应该不是写‘原理’，是写出我们这时代一些诗人的心灵。”这警辟的话，是他一向的主张，诗绝不能从理念产生，诗只能是与时代脉搏相一致的诗人心灵的律动。胡风最憎恶无动于衷的形式主义的东西。而形式主义的制作又常常在外表上具有精致而炫目的效果。因此更须对它警诫。

1979年10月之后，再没有收到胡风来信，不久之后，听说他住院作前列腺手术治疗，直到翌年春天他到京之前的五个月，我们没有通过信。当时，文艺界盛传胡风要来参加第四次文代会，胡风的许多好友都确信无疑，从当时的形势看，他应参加这个重要的会。可是由于种种原由，胡风没能参加。他在给我信中谈到文代会之前，他要诚恳而坦率地向党中央呈送长达几万字的材料，心情是很开朗的。未能参加第四次文代会这件事，给他刚刚平复的体魄以极大的打击，不久，精神又陷于深度的病痛之中。此后，他的这种精神上的病痛经过多方医疗，虽然有了些转机，但再没有恢复到1979年的健康水平。

四

前面已说过，胡风于1980年春来到北京，暂时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当知道了我可以去看望胡风时，便先用电话和梅志同志联系，约定好去探望的日子。我是上午去的，骑车转来转去，费了好大周折才找到第二招待所。到门口已是上午10时光景了。梅志同志出来迎我，她对我说：“胡先生两次到门外去等候你来。”梅志同志领我到他们的住处，胡风已立在门内，我们紧紧地握手，他的手还是有力的。

我止不住涌出了热泪。坐定之后，我看清了睽别多年的胡风，他的容颜和体态较之我在那次法庭上望到的样子，又有了很大的变化，他真

正衰老了：背部明显的驼了，手臂枯瘦了，赭色的面部出了许多灰斑，但是凝重的眼神里却多了些慈祥和温厚的光泽。胡风穿的一条化纤的半旧裤子，皱皱巴巴，它显然伴着它的主人经历了不少个艰难的岁月（几年前，聂绀弩从晋南出狱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去看望，过去总是衣冠楚楚裤线如刃的小生型的杂文家，也是穿着一身灰乌乌的皱皱巴巴的布衣裳。

大概多年呆在牢里的人，容颜与衣服都会被时光老人涂抹成这个样子。关于与老聂的重逢，我将专文记述）。我的变化想来也是很大的，1955年我刚刚过而立之年，现在是六十好几的人了。胡风凝望着我，一定有很深的感触。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对我一家人因受他的牵连而经受的苦难感到深深的愧疚。这许多年，他常常怀念朋友们，说怀念也会给他以力量。他问到我全家人的近况，问得很具体，我老伴的名字和孩子的乳名都还没有忘记。我对他说，国家的形势逐渐好起来，文艺界也一定会有转变的。我告诉他，王元化、曾卓和我已分别恢复了党籍。

他说："你们这些为党工作了多少年的人，情况本来清清楚楚，早该解决。"我说不但几个人能平反，整个案子也将能得到全面的了结。从他的神情感到他对形势和我谈的问题都并不乐观，他缓缓地摇了两次头。我说的全是真话，表面的安慰性的套话，我决不说一句。胡风说他刚刚写完一份向中央呈送的材料，是有关部门要他写的。这个迹象当然是好的，中央已在认真解决这个案子了。回忆起来，当时胡风的头脑并没有失去思维的能力，他话不多（我以为这不属于病态），思路总是清楚的，别人向他讲这讲那，他只说几个字，但这几个字的词意是准确而有分量的。我想这是他多年来回答话难时被迫养成的一种习惯，他没有提幻听的事，大概发病时才出现这个症候吧。至于衰老瘦弱和对许多事情你认为毫无问题，他却表现得疑虑重重，对胡风来说，这都是正常的。所有这些，我是很容易就能理解的。考虑到胡风的身体，我坐了约有一个钟头就告辞出来。过了一些时候，我又去看望他一次。

不久胡风住进了医院。

自此，他的精神就一直没有能再完全恢复过来 陡个月后，全案得到了平反，他的神情和心境仍然显得那么沉郁与冷漠，很少主动讲话。但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的思维还是清楚的。这时我才相信，他过去说的话，他的神经的确是粗壮如缆绳，并与真实的人生和他在半个多世纪追求并为之献出生命的理想世界紧紧相维系着。

胡风已成为古人，不会再跟他重逢了。但是总觉得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他或许比某些生者距我们还要近些。

1987年10月中旬

重逢路翎

牛汉

小引

早想写几篇有关重逢的纪实性文字，一直没有动笔，因为若不从告别说起，情绪总转不过来，但是告别怎么写呢？

近二三十年来，我没有写过一回告别。就说那一年，顿时失去了所有的亲友，我并没有跟谁告别过，包括我的妻子儿女在内。前几年，有一位年轻记者希望我写一写当年告别的情景；他想象中的那种古典悲剧式的告别一定是哭天抢地的。我对他说无法写，“哪里有什么告别呀！”他听了之后，神情很滑稽，一边摇头，一边大笑起来，还用洞察一切的眼睛审视着我，他以为我心有余悸，不说实倩。其实我说的真是实情。没有告别，哪里会有什么可以绘声绘色去描写的令人断肠的情景？

真的，有许多往事，在我的心灵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一切部是迷迷茫茫的，有点像我去年去喀什见过的戈壁滩。然而，当时（准确地说是最初的一段时间）确有过极不适的异常心态，人整个地变得恍惚不宁起来，北京话里有个词儿叫“懵了”，有点近似我那时的情状。可怕的是我这恍惚感，到现在也没有消失。

几十年恍恍惚惚地过去了。没有告别的告别，竟想不到地引来了十次百次的重逢（有些亲友是永远不能重逢的了）。有了这些实实在在的重逢，才感到了当年由于没有告别隐隐凝聚在深心的一种沉重的内涵。我不叫它内伤，因为它并没有留下伤痕。

重逢都是有难忘的细节的。六七年来，我一直没有触动这个难题。我没有力气撼动这些因久久郁积而石化了的人生体验；它们成块成块地堆在心灵里，构成了坟的形状。必须先得融解了它们，才能把它们从心灵里倾吐出来。但我深知自己的生命里已没有多少炽热的火，因此，能融解能倾吐的只能是一小部分了。

善良的读者，宽恕我吧。

※ ※ ※ ※ ※“文革”期间，路翎一家人住在朝阳门外芳草地，我是知道的。芳草地有全国文联的一片宿舍，50年代后期我去那里，参加过一个

好朋友的婚礼。我不是行典礼的那天去的，那天人太多，朋友让我躲过那天再单独去。因此我不是匆匆去匆匆离开，我在芳草地停了几个钟头。芳草地离人民文学出版社并不远，我有两年常去朝阳门外劳动，但没有一次碰到路翎。“四人帮”垮台前夕，有人见路翎在芳草地扫街，这位熟人起早练拳，几乎天天在纡曲而朦胧的小巷里看见他的身影。说他戴着大口罩，脸色黝黑，扫了一条街，又扫一条街，跟谁都不打招呼。我听了以后，心里倒有几分踏实，第一，路翎还健在，且能干活；第二，他起那么早，又戴大口罩，说明他还知道人的尊严。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他精神失常，成天在家里大喊大叫，用头颅撞墙壁和门窗。路翎本是一个爽朗的人，我相信他绝不会自我毁灭。

记得我是1978年的初冬去看他的。我打听到了他的住址，独自骑着自行车找他。

到了芳草地，我凭着那一次模糊的印象，很快就找到属于文联的好一片宿舍。小巷很泥泞，不高的院墙倒塌得不成样子。在一个街口，我询问一位老大娘：“请问余明英家住在哪里？”余明英是路翎的妻子。老大娘很热诚地说：“余明英吗，在我们街道麻袋厂干活，我跟她挺熟，我把她叫来吧。几步路的事。”我说：“不用，她男人在家吗？”老大娘说：“我看见他刚刚回家，老头儿天天出去晒太阳。”老大娘指给我路翎家住的那个院门。我径直地走向那里。是个长条院子，只有简陋的正房，房子的格局一样。我立在院当中转圈儿看了看，路翎住在哪一间呢？我发现一排正房中间，有一间玻璃都是破的。我敏感地想到，这是路翎的家，那玻璃多半就是路翎用拳头砸碎的。

我在他的门口站了一会儿。破玻璃窗原来是外屋的，相当于堆杂物的檐厦，里面有一间住房，家门紧紧闭着。我跨进了两步，从窗户向里瞧，黑洞洞的。那天是阴天。我想路翎一定在家。就轻轻敲了两下门，没有动静。我再敲两下，敲得重些，还是没什么反应。“他又出去了。”我想。我透过窗玻璃朝里仔细望望，屋里地下站着一个人，背对着门，一动不动，背有点驼，我清楚地看见他向前伸的脖颈，有一道道深深的皱褶，我也有，那是汗水的渠道。我断定这多半就是20多年没见面的路翎了。我喊了几声“路翎，路翎……”我的嗓门很大，可是那黑幢幢的站立的人，并不应声转过身来。于是我只好推门进去，慢步转到他的面前。我隐隐绰绰看见了他的面孔。他戴着有沿的帽子，家里虽然暗，我还是从他的面孔的轮廓认出了这就是路翎。近几年来，我已经很会识别故人了，即使他们有的已经面目全非，我还是能凭感觉一下子认出来。 你绝不能只想他过去年轻的面孔与神情， 你得学会想象“老化”人的

面孔与神情的本领。比如眼睛大的人，衰老之后，眼眶常常变得像深井。面前这个人的眼眶就是又深又暗的。年轻时路翎有大而亮的眼睛。我几乎哭喊地叫起来：“路翎，你怎么不答应我？”同时伸手环抱他的肩头。想不到路翎异常平静地对我说：“你是牛汉吗？我从第一声就听出是你的声音。”哦，我的好朋友，你还没有忘记我的声音。“那你为什么不答应呢？”他说：“余明英叫我买两毛钱的肉，我把它忘了。”答得莫名其妙。他刚才呆呆地立在那里，原来是想着忘了买两毛钱的肉的事。我的心酸痛起来……我拉着他的手到床边坐下。

这时，我看到了他家的情景：正面是一张大床，旁边靠墙是一张小床，小床的一半伸进一张方桌的下面，睡在这张床上的人（就是路翎）得把腿伸到桌子下面。

地当中有一个煤炉，一大堆煤灰，靠另一边墙有一堆白薯，还有两个粮食口袋。屋子里高高横着几根铁丝，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家里没有衣柜，没有凳子，也没有皮箱之类，有几个衣包摞在大床的墙角。我和路翎坐在小床的床沿上。大床、小床的边上都搁着几张干干净净的麻袋片，想来是怕把床单弄脏。

我紧握路翎的手，并肩坐着。我看着他，他并不看我。我说：“身体还好吗？”

“还好。”他的嘴撅得很高不住地蠕动着。牙齿一定已七零八落了，面颊陷落很深。

曾经在朋友中最有魅力的大眼睛，如今就像湖北省咸宁那个干涸了的向阳湖。沉默了半天，他从床上拿起一个装旱烟的柳条笸箩，用一小块报纸卷了个大炮，抽起来了。

路翎的帽檐压到眉头，看不见他的眼睛。我伸手把他的帽子摘下来。他由着我，只顾有滋有味地抽他的烟。他的头发已经半白，有些稀疏，如秋天枯败了的草。廿多年前，他的头发又黑又浓，讲话时头发有如奔驰的骏马一甩一甩的。

路翎对我说，他要把余明英喊回来。他习惯地又把帽子戴在头上，慢慢地走出家门。不一会工夫，余明英和他一块回来了。余明英变化比路翎小，一眼还能认出来。她赶忙用一个粗瓷饭碗给我倒开水，一边倒，一边抱歉地说：“家里有好多年没有茶杯了。”她把带来的一个小纸

包搁在方桌上，打开，里面是些糖块，“牛汉，吃糖。”我没有说话，也没有吃糖。沉默一会之后，我问她家孩子们的情况，她长长的喟叹一声，说：“都耽误了。二女儿现在和我们住在一块。”我也把我们家这些年来的状况略略说了。两家情况没有什么区别。我跟余明英说话时，路翎一个人咯嘣咯嘣地吃起糖块来，他一口气把十几块糖几乎吃光了。余明英摇摇头，笑着对路翎说：“路翎，你吃光了，牛汉吃什么？”路翎好像没听见似的一句话没说，他的面孔毫无表情。连我都想象不出来。路翎这许多年来是怎么活过来的。他的性子比我还暴烈，因此，比我经受的苦难要多。现在他全靠街道每户一毛钱的清洁费维持生计。

因此，这时，我突然觉出，路翎家里看不到一本书。我就问路翎：“书呢？”

余明英代他回答：“早没了，一本书不剩了。”我又问：“他自己的作品也一本没有了吗？”还是余明英回答：“一本书也没了。”她没有作任何解释。我对他们说，我家还有一些路翎的书（我老伴千辛万苦保存下不少书），下次来时把它们都带来。

路翎仍安静地坐着，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些年来，路翎不但跟文学界没有什么联系，跟书也不发生关系了。这不止令人感伤，简直是想象不到的事情。过去朋友们在一起时，路翎的话最多，也最吸引人，谈他的作品，谈他遇到的有趣的事。他是个讲故事的能手。眼前的这个路翎是一座冷却已久的火山。过去我们口里常常说“绝望”，此刻才晓得。那不是绝望，只不过是一般的失望而已。

告别时，路翎和余明英送我到大门口。我们紧紧地握了手。

两三天后，我把家里找到的路翎的作品送给他，其中有《在铁链中》、《朱桂花的故事》、《求爱》等五六本。我写过一首诗《你打开了自己的书》，收在拙著《温泉》中，记下路翎当时抚摸自己的书，全身颤抖的情景。我还写了一首诗，题目已忘了，是写路翎回家那几年，他固执而焦渴地到阳光下面行走的姿态，现在只记得其中的八行，记在下面，留作纪念：三伏天的晌午

路翎独自在阳光里行走

他避开所有的阴影

连草帽都不戴

他不认路早已忘记了路

只认得记忆中的阳光

他的女儿

远远地跟在他的身后

过了两年，路翎的身体健康恢复一些，他勉强会笑了（但跟20多年前的笑还是不能相比的），而且写了一些小诗寄给我。又过了两年，他的妻儿才让他一个人出去走访朋友，之前他上街常常找不到家门。他的眼睛也显得大点亮点。

哦，祖国，你的苦难的儿子路翎，40年代写过几百万字的路翎，终于慢慢地清醒过来了。现在，他不但写诗，还写长篇小说。

1987年7月5日

有感于胡风案件的平反

邵燕祥

一

继1980年、　1985年从政治、历史方面为胡风平反之后，1988年6月，有关部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几个问题进行复查后，又进一步予以平反。至此，如报纸标题所说，33年前的一大错案得到彻底纠正。

旧的冤假错案解决了，还会不会出现新的冤假错案呢？

我以为现在会有，将来还会有。

这样说，是否意味着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投不信任票呢？

不。这样的认识恰恰符合三中全会以来恢复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这样认识，才能使我们自觉地实事求是地去纠正晚近发生的错误，并且尽量避免犯更多的新错误。

毛泽东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就说过不但在错误的路线下，而且在正确的路线下也会发生对人的错误处理这种情况。他着重指出其认识论上的根源。

此外还有实践上的根源：法制还不健全；法律以外的权威有可能干预法律的执行，乃至取代法律；以及旧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体制没有经过根本改革；等等。

关于领导体制和领导方法，胡风曾经说某些文艺工作干部的领导权只是建立在“内部文件”的基础上，实际是批评从决策到执行过程中不必要地造成的某种神秘性；正如不久前一位政治学家指出的目前依然严重存在的“简报政治”现象一样，这都使领导部门不能全面地客观地了解实际，也不能全面地客观地体察群众的意愿和情绪，不但来自基层群众的呼声和不同意见无由上达，而且即使领导层内有对错误决策的不同意见也不起作用。这就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循环受到破坏。

这就是错误决策和对错误决策的执行的由来，也是相当一部分冤假错案的由来。

自然，一切历史遗留的错案终归都要平反的；但是动辄三五十年，损失实在太大。

二

我认为，胡风是一位长期不被承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被诬指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党外马克思主义者；胡风早在30年代提出的若干文艺观点属于左翼文艺活动内部的不同意见；后来，他的文艺思想进一步形成自己的体系。

胡风案件的彻底平反是向科学和民主的回归：我们可以依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并且承认认识伴随着一个实践过程了。

这个历史事件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内部可以有不同的学派，而且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学派。

只有积极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克服外部大量存在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包括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才能克服内部的教条主义表现，以及其他形形色色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恩格斯1891年5月1、 2日致倍倍尔的信中说：“（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在德国党和德国社会主义科学之间哪怕是有一点不协调，都是莫大的不幸和耻辱”。

一旦马克思主义者得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自由，那是党和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莫大的不幸和耻辱”啊：

而如果没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必要的学术自由和批评自由，不能形成鼓励而不是压制一切科学探索的气氛和环境，则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值得怀疑的——借助于恩格斯所批评的“普鲁士作风”和强制手段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是虚假的权威。

没有良好的文化气氛和民主的舆论环境，也就没有我们日夜期望的真正的团结——党与学术界、思想文化界的团结，学术界、思想文化界人们之间的团结。

这不是已被历史多次证明了的吗？！

三

我们要重新认识、提倡并且认真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所以长期不振，是因为我们自50年代中后期起从整体上败坏了它的名声：我们声言批评和自我批评，但在许多情况下，却是只许我批评你，不许你批评我；只要别人作自我批评，自己从来不作自我批评；少数人是专事批评——批判以至整人的，多数人是专事“自我批评”，凡此种种，过来人都很熟悉。胡风就是以批评建议始，以被迫“自我批评”直至受到惩罚终，大家对此也记忆犹新。

可以说，三十多年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变质，就标志着党风不正的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拨乱反正中清理、反思历史旧案，纠正错误，是自觉恢复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也是端正党风的努力；目前党内不正之风的猖獗，一方面由于法制不健全，党组织不纯，另一方面也由于在政治上、道德上没有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原则贯彻到底，许多地方和部门整党走了过场，党员素质降低，不少党员不是在干好事而是在干坏事上起了“带头作用”。

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万灵药方，但它表示一个郑重的党的自信和有力，有助于联系人民群众，加强内外团结，改善政治形象和恢复政治信用。

四

胡风错案的彻底纠正，再一次证明党能够自己改正错误，这当然包括了能够认真听取党外的批评，也能够克服自己内部的错误意见。

但是，胡风错案经过35年并经过三步才得彻底平反，也证明对“党能够自己改正错误”应有必要的信心，但不应持绝对化的态度，导致狭隘的理解；如果早有更健全的社会舆论机制，法律机制，群众民主监督机制，也许能更及时地彻底改正错误，或防止错误于未然了。1957年鸣放中不是就有从法制和民主的角度对胡风问题的不同意见吗？结果这些鸣放者通通被划为右派了。

我们为违反法制、违反民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仅仅经过“开庭

审理”等法律程序并不意味着依法办事，正如仅仅实行划圈投票并不意味着民主一样，——即使不把从胡风到共和国主席在内的个人代价计算在内，单是迟滞了国家发展、窒息了社会生机的后果已是惨痛的了，尚堪告慰的是我们终于由此认识到历史上的错误并且加以改正。

对目前的以至将来的工作，如何吸引和依靠人民群众，建立社会监督，随时检查、甄别，及时纠正在各项工作中已经出现的或刚刚冒头的错误，不使它扩大和恶性发展呢？

谁该享有民主，谁该受到专政；保护什么人，打击什么人：这个敌我友的界线，万万不可混淆，不可颠倒。

法制与民主，这是关系到党与人民的关系，因而是关系到人心向背的大事，是关系到人民的命运，并且也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

五

从胡风案件可以接受的另一个教训，就是需要在改革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法的同时，改善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干部的素质。

参与对胡风案件错误处理的干部，大概无一例外的都是“知识化”、“专业化”

的（“革命化”当然更无可置疑），这没能改变胡风案件反文明、反文化的性质，整个案件的过程表现了深度的野蛮和蒙昧，并示范鼓励了后来的野蛮和蒙昧。

由此可见，干部知识化、专业化，不能代替干部文化化或文明化。

我们对普通公民提出的“四有”要求之一是“有文化”，我们对干部提出“文化化”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求市民订出公约来做“文明市民”，难道不应该首先要求市长做“文明市长”吗？

广义的文化不仅包括知识和专业，而且包括理想和道德，更重要的是包括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

因此，干部文化化必然包括：一、决策和执行科学化——科学而不蒙昧，保持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实事求是；二、决策和执行的民主化——民主而不专制，不搞个人专断、长官意志，集思广益，

接受监督。

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精神文明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支柱。没有科学和民主，越是“革命化”越有损害人民利益、损害革命事业的危险。

过去对干部的文化要求，通常是从识字到有一定学历的文凭而已，这如同谈到党风的关键是官风，从而强调“不贪污不受贿”一样，只能说是对干部的最低要求。

然而，对于领导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精神文明建设的干部，以至一切工作的干部的素质，今天是提出文化化的要求的时候了。不然，我们虽有逐步健全的法制与民主的制约，也将无法杜绝中世纪野蛮、蒙昧的悲剧的的重演。

1988年7月8日

胡风的回答——1948年9月

钱理群

1948年9月17日午夜3时，近三个月来一直在赶写《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的胡风，终于写完了最后一个字。——即使在这一刻，他也没有想到今夕正是中秋之夜。

他停笔默想了一会儿，又在书稿的扉叶上，写下了两段题辞：谁知道哪一方面有较平坦的山坡，可以不用双翼而攀登上去么？

我跑到一个沼泽里面，芦苇和污泥绊住我，我跌倒了，我看见我的血在地上流成了一个湖。

——但丁：《净界》

（以后，《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初版时，胡风又选一幅墨西哥版画《背菜的人》作封面。）

除注明他是写在“上海蚓楼”里，胡风再没有多写一个字。

但在两个多月以后， 当胡风即将离开上海去香港， 为这几年所写的杂文结成《为了明天》一书写“前记”时，却谈到了这些年他时有“走在无物之阵里面”的感觉，时有要“摆脱出来”、“突围出去”的冲动；但他“毫无怨言”，因为“并没有忘记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的古训” ，如果真没遭到反感与反对，他还会觉得“空虚”[1] 。文章谈到了他的“自慰式的信仰”：他甚至感受到那“明天的太阳已经火球一样地，放出万道的彩色光带高高地升到了地平线上面，连这个只能算是‘泥沼’的阴暗的角落都沐着了光照”，而他（及他的若干读者和朋友）正是要在“泥沼”里面“一颠一扑地向这就要成为今天了的明天走去”。他们想：“大海不择细流”，“明天”该是属于自己的吧。——但那“我的血在地上流成了一个湖”

的意象会不会又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呢？

[1] （为了明天·前记），收《胡风杂文集》，三联书店1987年版，282 - 283页，285—286页。

这一年，胡风的心绪显得格外的焦躁。作为敏感而热情的诗人，他

整个的心为日益临近的“明天”所吸引，一股大气磅礴的诗情奔突着，激荡着，几欲冲决而出——直到新中国成立，写出了《时间开始了》一组长诗，才算是得到了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淋漓尽致的发泄。而此刻——生活在1948年的现实时空中，胡风却处处感到有一种他所不能把握的无形、有形的力量纠缠，阻挡着他（及整个民族）通往“明天”之路。这自然只能唤起他的搏战的激情：他决心要“为了明天”而拼一死战，即使血流成湖也在所不惜！——1948年中秋之夜，支配着他的，恐怕就是这样一种历史的悲壮感。

这一年年初，胡风（和他的年轻朋友们）曾有过一次巨大的欢乐：因为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下册几经曲折而终于出版。胡风早在该书上册出版时即已预言：“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

——胡风至死也没有改变他的这一论断，他坚持说：“即使到1955年为止，路翎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作家”，风烛残年的胡风甚至表示，“只要给我起码的条件，我要为四个冤案用去生命”，曹雪芹、鲁迅之外就是路翎[2]　。对于胡风，路翎以及他的《财主底儿女们》不仅仅是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而是他作为一个理论家的追求、或者说是他对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理解、把握的一种共同实践，从而构成了他自己的文学生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胡风曾这样对他的朋友们说：“别人都说路翎的文艺创作，受我的文艺理论的影响，岂不知我的文艺理论，正有不少地方受路翎文艺创作的影响呢，正是从他的创作中，形成了我的一些理论观点。”[3]　据路翎回忆，　胡风也对他说过类似的话：　他认为，我赞成他的理论；而他，在遇到我（而我一直在努力从事创作）之后，就找到了创作实践上的依据，我也支持了他。”

[4]　而支持他们（胡风与路翎）共同创造的，正是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路翎在创作《财主底儿女们》第一稿（当时尚取名为《财主底儿子》）时，即在给胡风的信中表示支持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的观点，认为“对于五四传统和现实主义的肯定，对于民间形式的拜物情绪的批判，这是绝对需要的”[5]　。胡风在与路翎讨论《财主底儿女们》等创作时，也多次谈到“五四以来，左联以来，现实主义传统的新文学历经沧桑”，是到了应该结出更多的果实来的时候了”[6]　。在胡风看来，《财主底儿女们》就是这期待已久、终于结出的“果实”；而对于胡风，五四早已成为他的生命的一个基本“情结”，这样，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的出版，引起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应，就是不难理解的了。而胡风对《财主底儿女们》的评价，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他对五四新文学传统及今天

应有的发展的一种理解与追求。人们于是注意到胡风强调了《财主底儿女们》彻底的反封建的主题；强调了路翎小说体现的鲁迅所开创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以及路翎“学习世界文学的战斗经验”的自觉性。所着意突出的正是路翎创作所体现的五四新文学对于传统文学所进行的变革，由此产生的文学的新质（特异性）。而在私下的谈话中，胡风则对这部极富创造性的小说的命运，表示了极大的忧虑。据路翎回忆，他最初看到这部作品时，“带着沉重的缓慢，忧愁似的沉默了一下”，一两个月以后，才说道：“这是一场沉重的战争，意识形态的和文学形象的战争。”以后，他又这样解释说：这部小说提出了“美学上的新课题”，“提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内容与精神动向问题。对于一般读者以及习惯于比较简单地看事物的人们，会认为是描写复杂了”，甚至是对中国民族精神的挑战。胡风警告说，我们民族过于“崇尚理智、冷静”，“不重视这种心理描写与内心剧烈纠葛的揭露，不重视这种狂热热情”的描写，会“说你买大饼给老虎吃，扰乱了民族精神”，“人是不可以做特异的行动的”[7] 。胡风说这番话时，大概是想起了当年鲁迅笔下的狂人的，但他也正是从这里看到了鲁迅“改造国民性”（也即向传统大胆挑战）的精神得到了历史的传承，而感到欣慰的吧[8]。

[2] 牛汉：《重逢》，收（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626页，627页。

[3] 李离：《五十年代初期的胡风》，收《我与胡风》，803页。

[4][6][7] 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与导师——我与胡风》，收（我和胡风》，481页，483页、482页，478－480页，492－493页。

[5] 《致胡风》 （1941年2月27日），收《胡风路翎文学书简》，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9页。在这封信里，路翎还谈到了一个问题：“中国底民族战争是资产阶级的，它的本质是不是正在改变或是将要改变呢？在这一变质过程里，是不是对五四传统底蜕变呢？（这就是：在民族战争这一范围内的变化，它底变质是否将突破民族战争这一形态？）。”

[8] 路翎小说的“异质性”与“挑战性”是十分突出的。在胡风与路翎的谈话与通信中，还谈到这样一些问题：“文句上的毛病，那起源是由于对熟悉的字句的暖昧的反感：常场孵得它们不适合国情”（（胡风路翎文学书简》，68页）；“叙述底摒弃等等，则生根于近来的某些倾向里：以为要尊重读者底想象力，以为作者不需多说话，以为作者要宽大，使读者

自己去明白那些未显露的内容，等等。现在想了一想，觉得这也是偏颇的；精神深邃高远的人当不会意识这些问题”（同上，68－69页），等等。coc1

还应该谈及的是，小说出版的当时——在1948年的中国读书界所引起的反响。

1981年《读书》 发表了一篇读者来稿， 对路翎这位“熟悉的陌生人”致以迟来的“问候”。文章回忆说，1948年的上海，“一部分青年沉溺于‘百乐门’的舞曲，流连在徐讦、无名氏的小说情节，热衷于《晶报》、《罗宾汉》等黄色小报”，但也还有相当一部分青年不甘沦落， 处于“迷茫、 烦恼而有所冀求”的饥渴之中，“我们读到了两本书：一部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部就是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我们几乎是怀着圣徒般的虔诚，一下子拜倒在约翰·克利斯朵夫和蒋纯祖这两个光辉形象的脚下”。蒋纯祖“以其更加具体、亲切而毫不矫情的音容笑貌，唤醒我们的自觉，使我们引为知已。他那坎坷的道路、痛苦的异化过程、对于庸俗市侩主义的鄙弃和不屈于邪恶势力迫害的正直与坚毅，在那个时候，具有特别的昭示作用，使我们敢于否定自己而求取新的精神的解脱”，我们几十个同学先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确定了我们此后一生的新起点”[9] 。尽管这是事后的追忆，却也反映了路翎小说在国统区的巨大影响；但对路翎本人，却是祸福难定：他至少因此而难逃“争夺青年”的罪名。

[9] 野艾：《对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的问候——向路翎致敬》 ，原载《读书》1981年2期，收《路翎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1月版，144页。

于是，路翎的小说被批判，就这样因为它的异质性、挑战性，因为它的影响巨大，而在1948年的中国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宿命”。，应该说路翎本人，以及胡风，都是有思想准备的[10]。但由权威理论家出面，在《大众文艺丛刊》上的“批判”仍引起了愤怒。胡风当然明白，批判路翎只是一个由头，矛头是对着自己来的，他也因此而感到痛苦：即使有“罪”也应一人承担，为什么总要连累这些很有才华的、急需保护的年轻人呢？他决定自己出面答辩（在此之前，路翎已在《泥土》上以“余林”的笔名写了反驳文章），有些话也可以说得更清楚些，以免发生误会。

——他竭力想使自己平和些：他实在不愿意在“明天”即将来临之

际，和这些“朋友”论战。但一提起笔，胡风就立刻进入“状态”，他强烈地感到自己的“异端”

性，处于“四面包围”之中，——朋友们至今还记得当年那“在屋内急步走动、目光炯炯的、浑身冒火的胡风”[11]，他说他“时常有一种冲锋的感情”，于是，他的湖北口音很响地在他家楼上滚动了：“冲击……我们是他们的异端，要从这开辟革命文学的道路，从尽冬中踏过去！”[12]……正像诗人绿原所说的那样，“那时濒于崩溃而趋于疯狂的国统区，真不啻一座失火的森林：济慈的夜莺和雪莱的云雀早已飞走了，也见不到布莱克的虎和里乐克的豹，只剩下‘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嚎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13][10] 路翎多次对胡风谈到他与“别人” 的不同，认为他的写法，“教条家不会愿意这样的——我准备挨打”，见《胡风路翎文学书简》，62页。

[11] 牛汉：《重逢》，收（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626页，627页。

[12] 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与导师——我与胡风》，收（我和胡风》，481页，483页、482页，478－480页，492－493页。

[13] 绿原：《胡风和我》，收《我与胡风》，518页，536页。

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突围”，而且又是“四面出击”：在第一章“从实际出发”即对抗战十年文艺思想发展道路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中，胡风明确指出，以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为标志的“含有伟大的革命意义的思想再出发运动”，要求展开全面的思想斗争。这首先是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法西斯文艺”的斗争，其在文学上的表现包括宣扬“忠君爱国的封建道德” 、 “间谍加色情的堕落趣味”，“利用社会关系的日常生活化这个特点，完全离开了战争，鼓励那些从腐烂的社会生活产生的封建的抒情主义”和“有毒的人情主义”，等等。其次是要反对“带着进步的色彩但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文艺现象”，例如“有的对黑暗现实不满，却顾影自怜地摸抚这自己的忧郁；有的讽刺丑恶的社会，但却发出了轻松的笑声”；“最走红的是那些既不脱离战争而又迷人的、在风沙的战场上的桃色新闻”，等等，在胡风看来，这都是“客观上却又客串地替法西斯文艺底政治目的服了务”。其三，必须对“现实主义自己阵营里面的两个坚强的偏向”即“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

展开无情的批判，“这个批判正是文艺思想斗争的主要环节”，它

们“在本质上”

也是“反现实主义”的。如果说胡风这里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概括，在他的一些年轻朋友主持下的刊物上，这种对形形色色的“反现实主义”的“反动”文艺的批判，就进行得如火如荼、极有声势。在1946年创刊的《呼吸》里，年轻的编者即已宣告，他们所要进行的是“无情的文化批判”，据说“一个军队是不但要不断地去打击他当面的敌人”，而且要“清算似是而非的参谋部，清算似己而敌的战列部队、战斗人员，清算自己一次，再清算自己一次”；他们并不讳言“偏激”，甚至以此为豪，自认为是一群“定了方向，醉于理想，紧抱集体，热爱智慧与真理底光辉的人；偏激，不过是爱得过分，爱得认真”。他们也正是以这种认真、偏激的态度，猛烈批评了以沙汀《困兽记》为代表的“客观主义”与以臧克家《感情的野马》为代表的“所谓‘革命浪漫主义’”[14]。1947年创刊的《泥土》更是展开了全方位的出击，其锋芒所及，计有：被称为“文艺骗子”的沈从文和他的“小喽罗”袁可嘉、郑敏“之流”；被斥为“穿厌了都市底舶来底各种浓装艳服的小市民，换上乡村底土头土脑的装束”的马凡陀（袁水拍）；被看作是“傀儡戏和春宫图的展览”的陈白尘的《升官图》；被视为“一条毒蛇，一只骚狐，加一只癞皮狗”的姚雪垠；以及具有“市侩主义作风”的李健吾、“才子神童”吴祖光等等[15]。也许是为了激怒对手，或者为了表示鄙视，每写一文，必着意选用大量粗俗、粗暴的骂语。比较注重理论上的驳难的是创刊于1948年的《蚂蚁小集》，先后发表了《对于大众化的理解》（冰菱即路翎作，2期）、《略论普及与提高》（怀潮，3期）、《论艺术与政治》（怀潮，　4期）等文，对（大众文艺丛刊》的文章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战（路翎还以余林的笔名在《泥土》上发表了《论文艺创作的几个基本问题》）。《蚂蚁》还载文批评茅盾的《腐蚀》，指其“创作方法的血肉的存在上，却仍然负担着资产阶级没落文学的陈腐的包袱”[16]，言词也十分尖锐。《呼吸》、《泥土》、《蚂蚁》的上述文章，都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 [17] ，一些文艺领导者也著文指责其不利于“统一战线”的建立，表示“断然不能容许把思想斗争引导到无原则的喧骂上去”

[18]，郭沫若甚至将其打入“托派的文艺”批评，宣布“应予消灭”[19]。这又反过来使那些本来就在四处“寻仇”、以“敢于承认我们是他们的敌人”自诩的年轻人[20]更加兴奋，也更加激烈。他们尤其不能容忍对方动辄指责自己在“拉宗派”，但人们仍然把一些与胡风有来往的年轻作者在其他报刊上发表批评文章（例如耿庸对唐弢、日木对巴金的言词激烈的批评）也都看作是“胡风”派所为，这又引发出更为强烈的反应

与冲突[21]。但“胡风派（小集团）的恶谥却就此而紧紧追随着胡风和他的朋友，直到最后被“一网打尽”。胡风晚年谈到这些争论时，曾以总结经验的口气，谈到年轻人的“过激文字，往往产生了不利于团结的影响”，“这些过激的情绪也表露在私人的信件中，到了1955年，一起拿了出来，就成了激起群众愤怒的材料”[22]。

[14] 《本期小结》，载《呼吸》创刊号。

[15] 参看初犊：《文艺骗子沈从文和他的集团》（《泥土》3），吉文：《马凡陀山歌》（《泥土》4辑），杜吉仇：《堕落的戏，堕落的人》（《泥土》4辑），阿城：《从‘飞蝶’说到姚雪垠的歇斯底里》（《泥土》4辑）。

[16] 嘉木：《评茅盾的〈腐蚀〉兼论其创作道路》，载《蚂蚁小集》5辑。

[17] 《泥土》 第5辑的《编后记》里谈到4辑的批判文章发表后引起的种种反响：“首先是马彦祥主编的《新民报》的“天桥”上，一连登了五六天骂街的文字，编者还跳了出来，说那两位作者心理变态，完全不懂戏剧。……旋即就看到了臧克家主编的《诗创造》里面的‘怀着伤蔑的暗箭’的《后记》，不久就有了陈白尘劝《泥土》改请叶青题字的建议，同时著名的吹捧批评家许杰便大叫‘批评的混乱’。

那位惯于依老卖老的才子、流氓、玄学家三位一体的无条件反映论者，还下结论说《泥土》是托派刊物。”

[18] [49][53][54] 邵荃麟：《论主观问题》，收《荃麟评论选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208页，207－208页，231页，229页。

[19] 郭沫若： 《一年来中国文艺运动及其趋向》，收《迎接新中国》，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编（内部发行），10页。

[20] 《蚂蚁小集之一·许多都城震动了》，《前记》。

[21] 据说耿庸等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 郭沫若写了《想起了砍樱桃树的故事》企图平息冲突，另一位与胡风有联系的青年冀汸又写信给郭沫若“轰他一通”，引起了郭沫若极大不快。 参看耿庸：《枝蔓丛丛的回忆》，收《我与胡风》，599页。

[22] 《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392页，337页。

今天人们反观40年代末的这些“混战”，确实会有很多感慨。说“混战”并非否认论战的意义（我们将在下文作详尽讨论），其中确实有许多真知灼见；但人们却注意到当年（1948年）所不可能认识的另一面：论战双方在“势不两立”的同时，存在着也许是更为根本的一致与相通。例如，将“开展无情的思想斗争”作为发展文艺的中心环节的战略选择，把“斗争”绝对化、以至神圣化的概念，将复杂的文艺问题、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问题，简化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如“人民” 与“反人民” ，“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直线化思维方式，以及“四面是敌”的“被围”心态[23]，对于“论战（批判）”的偏嗜，“八方出击”

的迎战冲动，将“矛盾、冲突”的审美化倾向，以至对“战争”语汇（自然地连同着战争思维）、强暴的语言方式的醉心[24]，等等，都是惊人的相似，并构成了形成于那个激烈搏斗的战争年代的“革命话语”的基本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论战双方都自命为“革命作家”与革命者”，这都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们之间的论战也就带有极大的“内部”性质，尽管最后的解决方式是“非内部”的。而对胡风来说，这样的以“斗争”为中心的革命话语是五四激进主义话语的一个自然发展，或者说，他所坚持并保卫的五四话语还带有浓厚的激进主义色彩，与前述朱自清们的带有更多的自由主义色彩的五四话语虽也有相通之处，但差别更是明显的[25]。

[23] 毛泽东有个著名的论断：“‘围剿’和反‘围剿’是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长期处于被“围剿”的状态，使中国的革命者很容易产生一种“被围”心态。

[24] 据路翎回忆， 胡风曾指着他家门口的平原说：“这门前的平原有点像战场。现在民主意识深一步进一步地前进，但还没形成很大的阵势。我常盼望现实主义的文学在其中发生作用，参加这场斗争，希望在对国民党文艺和各种黄色灰色书刊已形成的一定的阵势之外，再形成扩大深入的阵势。”收《我与胡风》，486页。

[25] 有趣的是，《大众文艺丛刊》的批判者一面批评胡风和他的朋友四面出击，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扩大，但他们自己又步胡风们的后尘，继续批判沈从文、臧克家、姚雪垠等人。

而胡风和他的年轻朋友们现在所要自觉捍卫的，正是五四传统。胡风在《论现实主义的路》里即非常明确地把问题归结为“对于国际文艺传统（高尔基的道路）和中国革命文艺传统（鲁迅的道路）的坚持和号召”[26]；路翎在反驳《大众文艺丛刊》的“批判”时，也是尖锐地指责对方“取消了五四以来的斗争传统”[27]。

而他们所急于捍卫的五四传统，又是有着具体的历史内容的。这首先是五四“反封建”的传统。针对在民族斗争中以民族解放的要求代替与取消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的倾向，胡风强调，“并不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现在仅剩下反帝，而是以反帝来规定并保证反封建”，因此，他一再提醒人们要警惕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掩盖着的封建主义的阴魂[28]，这警告自然是十分重要的。而在1948年的这场论争中，“个性解放”的问题也许是更加引人注目的。争论的焦点是，在当时及以后的中国，五四所提出的“个性解放”问题还有没有意义与价值？胡风和他的朋友们认为，如果因为资产阶级主张个性解放，就自动放弃了这一口号，那就会导致对实际存在的封建主义的投降；因此他们提出：要“把反封建的任务从资产阶级底手中夺取过来而完成它”，更高地张扬起“人民解放，土地解放，个性解放”的旗帜[29]。在他们看来，“群众底存在，个人底觉醒，两者并非宿命地违反的敌对的”，“人必须理解自己的‘价值’，发挥自己的‘力量’，从而服从群众的利益，坚定群众的立场”

[30]；“集体的英雄主义”不仅要“尊重着大众底利益，服从着集体底命令，更要保留了自己底能动作用，和必须掌握着自己底战斗性能”[31]。胡风和他的朋友并不反对、毋宁说是拥护“战斗的集体主义”的，他们只有一点保留：不能把其理解为个体对群体的无条件地服从与绝对的牺牲。他们敏锐地从这样的要求中嗅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气息。因此，他们提出了要与“无形的封建的中国斗争”的命题[32]，并坚持：只有与“封建主义底各种各样的根须肉搏接战”，才能真正通向“明天”

[33]。——“与无形的封建的中国斗争”的命题是有待展开的；在其现实的历史的充分展现之前，胡风和他的朋友即已敏锐地抓住并提出，这是令人赞叹的，而他们自己却要为这样的“超前”付出代价。

[26]　　[28][33]　　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评论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285页，273页，283页，292页，361页，349页，353页，322页，324页。

[27][32]　余林（路翎）：《论文艺创作的几个基本问题》，载《泥土》6辑（1948年7月）。

[29][30] 怀潮：（论艺术与政治》，载（蚂蚁小集》4辑。

[31]　阿垅：《〈预言〉片论》，收《人·诗·现实》，三联书店1986年版，277页，286 - 287页。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最为注重的自然是五四启蒙主义传统。胡风有过一个很好的概括：五四“以意识斗争为先锋的社会斗争，那基本的内容就是使人民底创作历史的解放要求从‘自在的’状态进到‘自为的’状态，也就是从一层又一层的沉重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下面突围出来，解放出来，挣扎出来，向前发展，变成物质的力量”

[34]。而现在，这样的启蒙传统却遭到了两个方面挑战。首先是否认“精神的奴役创伤”的存在，将人民（农民）纯化（理想化）的民粹主义倾向。胡风一语道破实质：“如果封建主义没有活在人民身上，那怎么成其为封建主义呢？”[35]他指出，那种“只要‘优美的’人民而不要带着精神奴役创伤的人民”的理想，固然纯粹而美好，但“世界上没有只有阳面没有阴面的事物，抛弃了阴面，阳面也一定要成为乌有，即所谓‘观念化了的’东西”[36]。而将人民抽象化则是危险的：它容易为所谓“人民的代言人”（类似于上帝的代言人）提供机会，将“人民崇拜”变为“人民的代言人崇拜”，在“人民的统治”的名目下实行“代言人专政”。因此，胡风及其友人一再强调，一定要使人民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而不能“被动地”等待“人民代言人”来解放[37]，这里显然是隐含着某种忧虑的。而当有人试图将“人民”与“知识分子”对立起来，总要引起胡风们特别强烈的反应。胡风针锋相对地指出，“知识分子也是人民”，而且是“人民底先进”部分[38]，他们掌握着体现了历史要求的时代先进思想，不但是新思想的创造者，而且也是传播者。

路翎因此而尖锐地指出，“抹杀”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及前锋价值”，也就是在实质上“否认理论”（也即时代先进思想）“以及世界性的先进经验底领导”[39]，这就必然影响中国思想文化，以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他们之所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绝不让步，原因大概也正在于此。——直到晚年，胡风与绿原谈起《论现实主义的路》，他还这样说：“我不过是为知识分子多说了几句话。真不知道十多年来为什么要那样轻视知识分子， 不知为什么离开五四精神越来越远”

[40]。这“不知道为什么”里，又包含了多少历史的辛酸！

[34][35][36][38]　　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评论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285页，273页，283页，292页，361页，349页，353页，322页，324页。

[37]　阿垅：《〈预言〉片论》，收《人·诗·现实》，三联书店1986年版，277页，286－287页。

[39]　余林（路翎）：《论文艺创作的几个基本问题》，载《泥土》6辑（1948年7月）。

[40] 绿原：《胡风和我》，收《我与胡风》，518页，536页。

正是出于对五四启蒙主义的自觉坚持，胡风和他的年轻朋友在文艺上也特意强调五四新文艺的“新”质：它与世界进步文艺的联系，由此形成的它的“世界性”；它对传统文学的变革，由此形成的它的“异质性”。在他们看来，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五四新文学的基本立足点，必须坚持而不容有任何动摇与让步。因此，他们明确地表示反对“文化上的文艺上的农民主义”，他们并不反对文艺以农民为反映与接受对象，但坚持要保持文艺本身的进步性，而不能迁就农民的落后性[41]。他们也反对将民间形式（与旧形式）美化（理想化），强调“必须如实地理解民间形式所有的本质，凡是旧有的形式，都是昨日的文化，那是因袭的东西，新的东西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活在那里面，它也或多或少地限制了新生的东西的占领”。他们并不一般地反对对旧形式的利用，但警告说，如果把“利用”变成“袭用”，“无条件地保留”旧形式，那就等于“无条件投降”，而在他们看来，“有条件的投降也是投降”，都是不能允许的[42]。胡风们的这些观点也许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但如果注意到在当时确实存在着将民间形式绝对化的倾向，比如有人在评论绿原的诗歌时，就指责他的诗老百姓“看不懂”，是“走错了路”，似乎“唯有走民歌才是正路”

[43]；而在以后这一倾向还有近一步的发展，那么，胡风及其朋友的这些意见仍是有预见性的。

[41] 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收《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254页。

[42] 怀潮：《略论普及与提高》，载《蚂蚁小集》3辑。

[43] 《内战窒息了新文学的发展，回顾歉收的一年间——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座谈会》，收《绿原研究资料》，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86页。参看洁泯：《为人民的方向》，收同书，174页。

今天重读当年的论战文章，仍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胡风和他的年轻伙伴在捍卫五四传统时，所表现出的虎虎生气和锋芒。但终不难发现，在整个论战过程中，他们（特别是胡风本人）始终也存在着几个“盲点”，或者说，对论战对方明确发出的一些信号，胡风始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结果自然是悲剧性的。其实，警告早已发出，据胡风自己回忆，在1945年第一次公开批评胡风时，周恩来即已对胡风有两点相告：“一是，理论问题只有毛主席的教导才是正确的；二是，要改变对党的态度。话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可惜胡风只注意到周对他所提出的“客观主义”一语表示“理解”（其实，这也是胡风自己一厢情愿的解释，是否真是如此也还待考证），而根本不去注意也许是更带实质性的“忠告”[44]，胡风这里所犯的“主观主义”的“错误”对于他几乎是致命的。据楼适夷回忆，邵荃麟曾告诉他，这回香港之所以发起批判，原因是“全国快要解放了，今天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十分重要，可胡风还搞自己一套”[45]，可见问题还是“对党的态度”，也即是否服从党的领导；邵荃麟们正是作为党的代表来批评、引导他们的。其实，胡风的朋友中，也有人看到了这一点；据贾植芳先生回忆，他就曾这样提醒过：“解放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党的文化界本应该配合战争加强与国民党的斗争，现在忽然办了一件好像专门是冲着胡风来的刊物，批判的火力也非场动中，这不会是几个文人的偶然冲动。”[46]但胡风却自传“抗战八年一直跟着共产党走”，深信党始终相信自己，而把香港方面的批判看作是纯粹个别人的宗派主义的情绪，甚至是一种误会。应该说并不是胡风一个人犯过这样的“错误”，正像后来周扬批判胡风时所说，包括胡风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抽象地看党”[47]，不知道拥护党必须具体落实到尊重与服从党员个人，党的领导权威是建立在层层党组织党员个人权威基础之上一中国的知识分子恐怕要到“反右”之后，才普遍认识到这一点，但付出的“学费”却太多、太重了。

[44] 《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392页，337页。

[45] 楼适夷：《记胡风》，收《我与胡风》，7－8页。

[46] 贾植芳：《在复杂的世界里》，《新文学史料》1992年1期。

[47] 转引自戴光中：《胡风传》，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283页，159－160页。

对另一个警告的漠视，胡风也许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据何其芳说，早在1945年第一次批判胡风时，批判者即已断定，胡风问题的要害是“对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抗拒”[48]。而这次《大众文艺丛刊》发动的批判，一开始即旗帜鲜明地亮出“底牌”：“他们（按：即批判者所说的“主观论者”，又称“胡风小集团”）处处以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者自居”，实际上是在“曲解”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因此，“我们不能不予以纠正”[49]。这就挑明了这场论战的实质，是要争夺对“革命话语”的最高形态“毛泽东话语”的权威解释权。而在胡风看来，批判者只说对了一半；他确实是“以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者自居”，因为这是他的信仰所在；至于说到“曲解”，那这一说法本身即是一种“曲解”，不仅是对他本人，更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曲解”。胡风深信，他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至毛泽东本人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血肉般的联系，这是神圣的，不容曲解与亵渎的。 那是铭刻在胡风心灵深处的永恒的记忆： 1940年，正在编辑《七月》的胡风收到了一位署名“大漠”的读者寄来的一份毛泽东在陕北公大所作的关于鲁迅的演讲记录稿。正是在这次演讲中，毛泽东把鲁迅与孔子并列，赞其为“现代中国圣人”，并将“鲁迅精神”概括为“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毛泽东的评价给胡风以巨大的心灵的震撼；他后来对别人说：“想不到毛主席对鲁迅有这样恳切的同志感情和这样高的评价”，“我喜出望外，解除了多年以来心头的重压，极其高兴地发表了”[50]。这就是载于《七月》第10期的《毛泽东论鲁迅》一文，文章第一次在国统区报刊上公开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对鲁迅的评价，这对增进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而一直把继承与发展鲁迅的事业视为责任与生命，并因此而不断承受各种压力的胡风，更是对毛泽东本人产生一种知己感。这种“知己感”也许还有着更深刻的内容：胡风与毛泽东之间，其实是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相通的，如前文所述，胡风对“斗争哲学”的信奉，那永不安宁的灵魂，内在的“迎战”冲动，对战争思维、语言的迷恋，等等，也都是属于毛泽东的。甚至胡风一再提及的他年轻时的诗句：“我从田间来”，也容易使人联想起毛泽东与土地、农民的深刻联系。因此，新中国成立后，胡风在《时间开始了》那一组长诗里，高声歌唱毛泽东是“中国大地上最无畏的战士，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51]时，他是唱出了自己的心声的。而在文艺思想上，胡风也因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充分肯定 （而在此之前， 包括瞿秋白在内的许多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是把五四视为“资

产阶级文艺运动”而予以严厉批评的），明确以“鲁迅的方向”为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而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尽管他不同意不考虑具体时、 空条件， 机械搬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尽管他在个别问题上与《讲话》可能有不同看法，他也认为这是同志之间的正常分歧；就总体而言，胡风无疑是赞同毛泽东的《讲话》，并努力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加以阐发的。他的《论现实主义的路》 以“从实际出发” 开题，这本身即是表明，他是在响应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原则：“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在他看来，他的批判者正是违背了毛泽东的“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从而在根本上背离毛泽东思想（包括文艺思想）的。在这样的“捍卫”心态下，胡风对说他“曲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责，置之不理，甚至不屑一顾，是可以想见的。

[48] 何其芳：《关于现实主义·序》。

[49] 邵荃麟：《论主观问题》，收《荃麟评论选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208页，207 - 208页，231页，229页。

[50] 转引自戴光中：《胡风传》，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283页，159 - 160页。

[51] 《胡风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95页。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看似奇特、却发人深思的现象；论战双方——不论是批判者还是被批判的胡风（及其朋友），都不无真诚地相信并坚持自己是在“捍卫”毛泽东文艺思想与路线，他们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作出了不同的阐释，而都以己方为“正确”，指对方为“曲解”。问题是谁的阐释更符合毛泽东的本意？我们不妨看一个实例。“知识分子的改造”是毛泽东思想（包括文艺思想）的一个核心命题；论战双方自然都表示支持，但却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胡风强调这种“改造”的必要性来自他所说的知识分子的“两重人格”，即知识分子一方面具有“革命性”，但同时又有“游离性”的一面，“这种游离性使得他们底思想立场停留在概念里面或飘浮在现实表面”，因此，必须通过“和人民底内容深刻地结合，把握它，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使思想要求（按：也即前述知识分子的“革命性”要求）经过人民性底内容的考验以后，成为更是人民底也更是自己的东西，使思想要求和人民底内容对立而又统一形成血肉的‘感性的活动”[52]。显然，在胡风的理解里，知识分子的“改造”既要从人民中吸取，又要保持、发展“自己”，即便是“人民底

内容”也最终要变成“自己的东西（感性活动）”。因此，“他一方面要求作家深入人民，同时又警告作家不要被人民的海洋所淹没”[53]。而《大众文艺丛刊》的批判者对“改造”的理解就要明快得多；邵荃麟在《论主观》一文中直截了当地说，所谓“思想改造”就是“一种意识上的阶级斗争”，“小产阶级意识必须向无产阶级‘无条件的’投降”，“摧毁其原来阶级的思想感情，进而取得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它不是对等的斗争，而是从一个阶级走向一个阶级的过程”[54]。 经过这几十年的“改造”实践， 今天我们来看当年的这两种阐释， 大概无须论证， 即可断定：符合（或接近）毛泽东本意的，是批判者（邵荃麟们），而绝非胡风和他的朋友们。这就意味着，胡风们当年所批判（反对）的不仅仅是几个批判者，而是批判者所基本正确的把握了的毛泽东的思想与路线。

在这一点上，当年的批判者是不幸而言中了的：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实质上是在与毛泽东本人“对抗”。但他们却少说了一点：这种“对抗”不仅是不自觉的，而且对抗者在主观上还是真诚地要拥护（甚至捍卫）毛泽东的。这种从“支持（拥护）”

出发的“对抗”，不仅充分显示了本书所要着重讨论的“共和国文化”的复杂性，而且本身即具有极大的悲剧性。胡风（及其友人）就这样在违背自己主观意愿的情况下，以这么一种特殊的方式（心态，语言，等等），扮演了一个公开在理论上与毛泽东相对抗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却也因此而在共和国思想文化史上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地位与价值；而且，也同样不以他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由于胡风本人的巨大的人格力量，他对周围的年轻人所形成的凝聚力，使得他们的这种对抗，不同于在此之前的王实味、萧军等人，多少具有了某种“集团”的性质，也就具有了更大的危险性。这就导致了最后的结局：由毛泽东本人，以那样一种方式来“解决”胡风问题。当胡风和他的年轻友人终于发现自己是在与谁对抗时（恐怕有的人至死也没能正视这一点），一切都已经晚了。

[52] 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评论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285页，273页，283页，292页，361页，349页，353页，322页，324页。

[53][54] 邵荃麟：《论主观问题》，收《荃麟评论选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208页，207－208页，231页，229页。

但1948年仍在胡风和他的年轻的朋友中留下了几乎是最后一个美好

的记忆：这年10月，胡风夫妇和路翎夫妇曾专程到杭州，与聚集在方然主持的安徽中学的冀访、罗洛、朱怀谷等人一起畅游西湖。随后赶到的，还有刚刚出狱的贾植芳和他的夫人。

他们在苏堤、白堤上散步，在三潭印月饮茶。岳王坟、秋瑾墓、灵隐寺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在灵隐寺的大佛像前，他们曾合影留念。照片上一个个是那样的英俊，年轻，洒脱……

《文艺报》与胡风冤案

康濯

一

这是1955年5月13日早晨，快八点钟了。刚要上班去，就接到了《人民日报》。

我知道今天这张报纸十分重要。发表了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和《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这一《材料》是胡风写给舒芜的一批私人信件，按性质分类编列，并附有注释。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则在文前加有“《人民日报》编者按”。这是一篇八百字的按语，是毛泽东同志亲笔所写，报上排出的字体也比正文字体大一号。

我翻到报纸二、三版所载这些文稿，立即把按语和《自我批判》看了一遍。按语看得仔细，《自我批判》则只浏览了一番。

不，《自我批判》浏览到近一半，我就再也不能容许自己粗略地匆匆而读了。

自己作为当时《文艺报》的主要负责人，对胡风同志这篇检讨早已相当熟悉。正如编者按开头的介绍， 胡风此文是“在今年一月写好、 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就是说此文先后已有过一稿、二稿、三稿。发表的当然是三稿。然而我浏览了一阵就感到似有不对，便找出家中留有的二稿、三稿的打印件，再对照往下读 陡经反复查对，终于发现《人民日报》排错了胡风的文章。

我曾在华北农村生活了多年， 潜意识里早有个民间习俗中不祥的日子，即5月13日是关老爷磨刀的凶日。尽管这指的是农历，而34年前我面对的这一天是公历，但在我发现胡风的文章正是这天被错排之后，心里实在难过得不知所措，满脑子浮现的只是“凶日”和“不祥”。

这时来了电话。我拿起话筒，听出是周扬同志，他焦急而又意外严厉地责问我道：

“康濯，你怎么搞的？为什么把胡风的检讨登错了？”

“不是我错了！”我已经胸有成竹，便尽量从容地给周扬同志答话，“我已经查对过，是《人民日报》排错了。”

“《人民日报》？那怎么回事？”周扬仍然焦急而严厉，“刚才胡风从电话上报告了周总理，总理马上就打电话责问我哩！”

“你可不能反转来又打电话责问我哇！”我如实汇报了错排的具体情况，“刚刚查对过，我们《文艺报》送《人民日报》的胡风检讨是最后定稿，第三稿。可人家排的却是检讨第二稿再加三稿后面的《附记》。为什么会搞成这样？那只有问袁水拍了。”

袁水拍是当时《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他手上有胡风检讨的二稿和三稿，是我们编辑部先后交给的。

。九下电话我就去上班。到了编辑部，侯金镜也正在读当天《人民日报》的二、二版。他抬眼看看我说：“怎么搞的？《人民日报》登了个二稿加三稿附记！”我说：“是啊，我也查对了。”然后我就告诉了他周扬同志来电话的情况。他听到这件事周总理已经过问，便眉心打皱，苦着脸说了一句：“怎么办呐！”

当时《文艺报》具体负责编辑工作的，是我、侯金镜和秦兆阳三个常务编委，而秦兆阳正请假在写作。我和侯金镜已在前两天商量好，今天拿到《人民日报》以后开编辑部全体会议，现在当然按计划办事。关于《人民日报》登错了胡风的检讨，以及胡风向周总理反映后总理已向周扬提出责问的事，我们只给编辑部主任唐因、杨犁以及几位编辑组长唐达成、刘剑青等同志讲了一下，而没向编辑部全体宣布。

我们向编辑部宣布的主要是说，现在胡风的问题已经成了“反党集团”，性质变了。

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材料本来是由我们先发表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也早已排出了清样，但是现在已由毛主席另写了按语并决定改由《人民日报》先发表了。而我们这一期出版的日期是在后天，即5月15日，现在已赶不上再转载胡风检讨和好芜材料，因此决定这一期不出了， 而和下一期出合刊，时间仍在下一期5月30日出版。现在离发稿也只有几天，原来我们准备的批判胡风的稿件当中部没有提到“反党集团”

性质的，因此现在我们必须紧急动员，全体出动组稿，主要是请党内外知名人士、包括政治方面的以及文化、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写对胡

风反党集团表态的短文章。

要注意找一些比较熟悉胡风的同志，请他们写写在胡风过去的言行中某些可以揭发的问题，要实事求是。总之，表态的文章不要都是干巴巴抽象地骂几句。组稿名单由编辑部拟出后，再同侯金镜同志商量决定，但是要快，今天上午就要外出，两天内希望能拿几十篇稿件回来。

我讲了这些，下面就由侯金镜同志主持会议，进行讨论并具体地落实，后来又有电话找我，于是我先离开了会场。

这一次来电话的，是《人民日报》社长邓拓同志。他在战争中的晋察冀解放区时是我的老上级，建国后也常见面。他在电话上对我说："你看我们把胡风的检讨登错了，现在周总理要我们为这件事发表一篇检讨，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看看这个检讨怎么写呀？"我考虑了一下，答复道："《人民日报》作为中央的党报，发检讨好吗？登错了文章，责任是在你们文艺部，却要整个党报来出面检讨，只怕不大合适吧。"他说："那还有什么别的方式没有啊？"我说："是不是可以由你们发表一启事，说明胡风的检讨你们登错了，责任主要是在文艺部，报社也有工作上的责任，这也就是检讨了嘛！启事最后还可说明，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以今年《文艺报》第九十期合刊的发表稿为准。"我请邓拓同志考虑我的意见，他说："可以研究。"

。九下电话，金镜同志又同我商量了一下组稿的名单。我知道编辑部的同志们也已经分了工，马上就要出发组稿了，便一面催大家赶快行动，同时又赶着去接另一个电话。这次电话又是周扬同志来的，他告诉我：默涵、水拍二同志已在他那里，叫我赶快去共同商量一件事。这时还不到上午10点。

二

周扬同志在这个时候找林默涵、袁水拍同志和我商量的事，我估计一定是关于胡风《我的自我批判》一文应该如何处理。当时周扬同志是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林默涵同志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艺报》的工作，特别是当时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工作就是周扬、默涵代表中宣部具体指导的。

《文艺报》这一段集中力量批胡风，是从1954年秋、冬批评胡风在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开始的。1954

年刊物22期发表了胡风的发言和个别对他提出批评的文章，二十三四期合刊以及1955年一二期合刊和二月的第三期，则有多篇文章对他的发言进行了比较集中的批判。而比较全面地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从1955年一、二期合刊附发《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开始。这份《意见》即1954年胡风向党中央三十万言上书中最主要的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另一部分是《作为参考建议》。从第三期开始，每期都以好几篇文章重点批判胡风《意见》中的文艺思想，到四月底为止，已经批判了六期。而胡风本人也早已开始写关于他的文艺思想的检讨，并于1955年一月交给了我们《我的自我批判》，以后我们都称他一月交来的这篇为检讨一稿。对这一稿，我们编委会和编辑部以及周扬、林默涵、作家协会党组的同志和文艺界一些领导同志茅盾、夏衍、冯雪峰等都认为不行，认识的错误不多，解释、辩护不少，于是把稿子退给了胡风， 诚恳地向他提了意见。2月胡风改写出了《我的自我批判》的二稿，这一次我们看了以后觉得进步不小，就由编辑部打印分发给了茅盾、夏衍等同志以及《人民日报》文艺部等有关单位，说明我们认为他这份检讨基本上可以接受了，但是也还想请胡风改得更好一些，并要求接到这份打印稿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然后我们又综合了大家的意见，转告了胡风同志，希望他能再修改一下，并尽快交我们发表。 于是胡风又在3月交来了他的最后定稿，也就是第三稿。这一稿我记得是以二稿为主，前面若干段几乎没有任何修改，后面修改了一些文字，更主要地是也修改了若干实质性的内容，同时并在文后加了一个附记。现在我已记不清楚，三稿到底具体修改了二稿的哪些地方；但有一点是印象深刻而明确的，就是三稿后半部确有不止一个地方改得比二稿肯定是有重要的进步。我们决定全文发表他这一《我的自我批判》三稿。

大概在同年的二、三月，《人民日报》的一位女编辑去约舒芜同志写批判胡风的文章。这位编辑同舒芜的夫人是同学，因此互相间也较容易谈得深一点，而舒芜也就这样交给了这位女编辑一批胡风过去给他的私人信件。《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同志看了这批信件都大吃一惊，认为这些信太重要了，就和舒芜商量如何处理。舒芜便拿了这批信件亲自交给了林默涵同志。默涵、周扬和文艺界的领导同志看了以后，感到信件确实很重要，但有一些隐语和暗号不容易看懂，于是又由默涵交给舒芜，请他分类编辑和注释。舒芜这批材料编写好以后，默涵又交给了我们，我们同样大吃一惊，但也认为材料很好。于是经过商量，决定将舒芜的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 同时在《文艺报》5月份的第九期发表。中宣部并决定《文艺报》发表这两篇文章后，由《人民日报》立

即转载。

经过这样一系列的酝酿和准备，《文艺报》编辑部于5月初发稿。当时我们的打算是发了舒芜材料和胡风检讨以后，再搞一两期发几篇对胡风检讨提意见的文章，然后结束这场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这个意见并已得周扬同志同意。因此，在发这两篇文章的同时，我们还特别发了许广平同志一篇驳斥胡风的文章，同时并约夏衍同志写了一篇对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再加批判的文章。夏衍同志这篇文章在胡风检讨发表前就已写好寄来，有八千字，我们并已打印、分送党内外有关负责同志征求意见。

《文艺报》发表舒芜的材料，用的题目是《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并在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的前面加了一个编者按。这个编者按是我写的，事先征求了周杨、默涵等同志的意见。现在已找不到这个编者按的稿样了，这些材料已在“文革”中和《文艺报》其他重要档案一起丢失，再三查找也没找到。根据记忆，我在编者按中写了这样几点是可以肯定的：一，胡风的问题按语中仍然认为是文艺思想和思想作风问题，就是说还是人民内部问题。二，按语中肯定了胡风自我批判中的进步。三，认为胡风的检讨仍然不够，有一些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实质问题还没有接触到。四，宗派小集团的问题严重，这只要对比舒芜的材料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可惜这一重要问题胡风认识很不够，而这当然极大地限制了他认识文艺思想的错误。五，希望胡风继续听取批评意见，并检查改正。我这一编者按大约四、五百字。

《文艺报》这一期排好的清样，于5月8日上午送给周扬同志。按照我们编务工作的程序是，周扬应于5月9日晚上退回清样，10日由我们修改后交工厂付印。13日就要装订好出厂，14日送到书店，15日期刊就已按时出版、发行、零售了。当时这是最快速度，是为了批判胡风的这一重要任务，经邓拓同志同意，刊物交由《人民日报》印刷厂印的。

但是这一期清样周扬同志9日晚并没及时退回。我在编辑部等到快半夜，就打电话催问。周扬同志答复我说，清样他已看过，认为我在胡风检讨前加的编者按弱了一点，是不是还有点右？我说：“我是征求了你的意见的，你可以修改嘛。”周扬说：“我是改了两个字。”我很唐突地冲口而出：“改一两个字就不右了吗？”

周扬同志很了解我的坏脾气，没有理会我的唐突，他说：“问题不在这里，我考虑批判胡风是毛主席交下来的任务，因此我想，胡风的检讨

和舒芜的材料还是要送主席看一看才好。”我忙说：“那当然太好了，但是那就要快！要争取主席明天晚上把清样退回。否则，我们刊物就要脱期了。”周扬同志最后说：“我马上就送去。”

过了一天，10日半夜，主席还没有退回清样。到了11日的一点多钟了，我再一次打电话催问周扬同志，得到的答复是：“主席看过了，也退回中宣部了，恐怕变动很大，天明以后上班时，默涵会带原件去找你，你在编辑部等他好了。”

我心绪不宁地睡了一觉，天明上班后早早就和侯金镜一起坐在了办公室。大约八点半钟，默涵来了。他拿出原件，我首先看到的第一页，是周扬同志写给主席的这样一封信：

“主席：

胡风的自我检讨和舒芜的揭露材料拟在下期文艺报（即本月十五日出版的）一同发表，胡风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语，我送上清样，请你审阅。

同期文艺报还有一篇许广平驳斥胡风的文章。附告。 此致敬礼！

周扬五月九日”

在周扬同志这同一页信上，有毛主席看过清样以后的回信：“周扬同志：

按语不好，改写了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

毛泽东 五月十一日”

回信还有两段话，一段是：

“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

再有一段：

“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

这是主席退回的原件第一页，第二页就是主席另外写的那个八百字的编者按。

再后面是胡风《我的自我批判》，文前我那个按语，主席画了个框框，中间打了个大叉。最后是舒芜的材料，毛主席把这个材料的题目改了，原题《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改成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我还发现，主席看清样是很费力的，我们排的新五号字，很小、很密，主席一边看，一边拿了一支铅笔，每一行每隔三、五个字都要旁边画一点，一直画了两万多字。

这就是前天、11日上午默涵带来的材料。我们抄下材料上主席新写的按语，并和默涵商量了《文艺报》应该采取的措施以后，默涵就带着材料去了《人民日报》。

当时中宣部已同《人民日报》商定，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材料13日发表。

默涵走后，我和侯金镜有一段谈话。开始我们两人都有些发懵，因为我们经手了将近半年的批判胡风文艺思想这件事，突然变成了揭发反党集团的斗争，难免一下接受不了；同时问题的性质一变，我们刊物的工作自然也就必须有根本性的变化。

过去我们准备的批判稿件恐怕都不能用了，而最近这个第九期也无法出版了。因为我们的清样已不能用，况且批判稿也要改，这是两天时间无论如何也赶不出来的。

于是我们商量以后决定，已经排了的第九期刊物不要了，干脆编一本九、十期合刊，晚半个月出版。并在后天《人民日报》发表主席的《按语》和《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以后，立即动员编辑部同志组织一批揭发胡风反党集团和表态的短文，在九、十期合刊上发表。

接着，我打电话给周扬同志，汇报了《文艺报》改出两期合刊和组织新的稿件的措施，得到他的同意。然后，我向他表示，主席的按语把胡风问题的性质变了，变成反党、也就是敌人了；并说：“我一时还接受不了，侯金镜同志也和我差不多。”

周扬说：“不应该接受不了，而应该努力认识主席的指示。”又说，

他也没有想到主席会这样改变性质。我说：“主席提得太高了。”他说：“不是主席提得高，而是我们的思想同主席的思想距离太远、太大，我们应该努力提高自己，尽量缩短同主席思想的距离。”

这就是《人民日报》发表胡风检讨和胡风反党集团材料的前夕发生的情况。也是我今天、 5月13日上午，应周扬同志电话之邀去他家开会之前，脑子里又回忆一遍的情况。

当时周扬同志住在东四头条老文化部的西院，我到他家的时候已过了十点钟，到后就开会。周扬同志让袁水拍先讲，水拍说：“康濯同志是讲得对的，我们《人民日报》排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是没有按《文艺报》清样上的胡风三稿、也就是最后定稿去排，而的确是排的胡风二稿加三稿的附记。”

下面，水拍讲了他们错排的经过。他精神负担很重，情绪很低。讲话声音都很小。他说，一两个月以前，他接到《文艺报》寄去的胡风检讨二稿以后，又听到我告诉他胡风这一稿基本上差不多了，这样，他就把胡风二稿早已送工厂排出了小样，这个二稿的清样并经过他们文艺部好几个同志仔细校对，他也亲自校对过；这一次，昨天晚上发稿，他的错误是没有亲自主持此事，只把原来排好的二稿清样和《文艺报》最后的清样交给文艺部几个同志，要他们再好好校一遍，然后发稿。谁知道他们并没有校对完， 他们并不知道胡风还有个检讨的三稿， 便只是把二稿的清样和《文艺报》的清样对照着校了一部分，结果发现每一段每一个字都相同，他们就以为《文艺报》的和他们二稿的校样是一个稿子，而他们的二稿又是校对过多少遍，没有错误的。偏偏不知道胡风的三稿是在二稿的后半部还有不少改动，于是便没再校对下去。 他们只是翻到《文艺报》 校样的最后，发现还有一个附记，于是便把《文艺报》三稿的附记加在了他们二稿的后面，就这样发了稿。

水拍讲完以后，周扬同志问我和默涵有什么意见。默涵说：“这件事的具体责任还是在水拍，这是个政治责任心的问题嘛。”我说：“这么大的事，水拍你怎么能不自己亲自参加，到晚上交给部里就撒手不管了呢？太不应该了。”

水拍说：“我接受同志们的批评，这的确是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刚才报社开编委会议，叫我参加，在会上，有的编委质问我：‘这是搞的什么政治阴谋……’”

他说不下去了。

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后来默涵说："水拍错误是严重、阴谋倒不是嘛。"

周扬同志表示同意，并说："不谈这些了，商量一下《人民日报》的检讨怎么写吧！发表检讨是总理的指示，报社又叫水拍起草，我们来帮帮水拍的忙，给他提点意见。"

大家谈了一些各式各样的意见，后来我也讲了邓拓同志给我打电话征求意见时我所表示的不用检讨形式，而用启事，在启事中做几句检讨，再说明胡风《我的自我批判》一稿以（文艺报》九、十期合刊的发表稿为准，就这样也可以了。

我这个意见都认为也可以考虑，但发表正式检讨却是总理的指示……因而最后没有任何一个意见大家一致同意的。这样直商量到快十一点半钟，周扬同志最后才说：

"我看，稿件清样既然经过了主席，现在的处理最好还是再问一下主席。我现在就去问一问，你们等一等，我回来以后再谈。"

周扬同志然后起身，马上去找毛主席。我们三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出去吃一顿饭再来。往外走时水拍说：

"事情是我搞起来了，这顿饭应该是我请客。"

我表示不反对。默涵也说："可以吧！"由于东四附近只有一些小吃。默涵提出到东华门大街一家西餐馆去吃西餐，就是从王府井往西拐弯，路北不远的一家。

今年五月我同默涵谈起当年的事，他还记得那家西餐馆。

吃完饭回到周扬同志家，已经下午一点多了。周扬同志不久也回来了，他告诉我们：

"主席说，什么二稿三稿，胡风都成了反革命了，就以《人民日报》的稿样为准，要《文艺报》按《人民日报》的重排。"

这又是一个预料不到的决定，我听了脑袋又一懵，默涵、水拍也半天没讲话，周扬说："主席定了，就这么做吧！"

后来我们当然这样做了。以至于现在不能不又留下一个历史的空白，就是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的三稿、也即最后定稿，终于也和我写的那个编者按一样，现在找不到了。当时《文艺报》排出的三稿清样，本来和胡风的原稿一起还存在编辑部的档案里， 但是“文革” 当中丢失，至今再三寻找，也无着落。由林默涵转交给《人民日报》文艺部的那一份《文艺报》清样，《人民日报》也没有找到。胡风本人原也留了一份底稿。但在逮捕他以后抄家时也弄丢了。现在留给历史的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就是他那个二稿加三稿的附记，这么一个不三不四和稿子。这使我们很对不起胡风同志，对不起文艺界，对不起历史。

当时在周扬同志家，听他传达了对胡风检讨稿的最后处理决定后，我们正要走，周扬同志又把我叫住了。他说：“主席讲，胡风是要逮捕的，不过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必须经过人大常委会批准以后才能逮捕，这件事已经同少奇同志和总理商量了。

还得要几天才能办妥。”少奇同志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下面周扬又说：“因此，主席认为：这几天还要派人去看看胡风，稳定他一下。”然后，周扬要我今天晚上就去看一看。我当即表示不愿意去，并说：“他的检讨文章是交给我的，现在的发表稿登错了，我们又不改正，那我去了怎么对他讲呢？”周扬说：“还是你去合适，水拍、默涵都不好去，这又是主席交下的任务；你不去叫谁去呢？至于胡风的检讨稿，你当然只能说没登错了。”默涵也认为我去比较合适。我还是不同意，最后提出实在要去，就再找一位同志和我一起去。周扬同志让我提名，我提了严文井同志，他当时和我同是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还是《人民文学》的主编，而胡风则是《人民文学》编委。周扬同志表示同意，并马上打电话告知了严文井。这样我们才回去。

四

我回来后稍微休息了一阵，下午三四点钟才到办公室。随即向侯金镜传达了主席关于胡风检讨文章处理的决定，他听了也默默无言，和我一样感到不知说什么才好。过了一阵，我说：

“当然，已经给胡风定了性，他的检讨更正不更正，是不可能改变性质的了。

因而从对敌斗争的需要和大局看，主席这一有胆量的决定也是可以的。不过，是不是有点儿过分？”

“总理原来是主张更正胡风检讨稿，还要《人民日报》做检讨的。”侯金镜想了一阵才这样说，“而且主席在决定反党集团这么一件大事情上，事先好像也很可能并没征求总理和少奇同志的意见。”

“现在要抓人了，主席已经同少奇同志和总理商量了。”我介绍了刚才周扬同志讲到的情况。

这时编辑部几个同志来汇报，他们谈到三个情况。一个是出去组稿的同志回来反映，文化、文艺界的知名人士看了主席的按语和舒芜的材料，几乎都一致感到很气愤，胡风在给舒芜的信中，对党外文艺家的态度，实在极不友好，极尽讽刺、挖苦、打击、嘲笑，有时甚至是敌视。再经过主席按语的分析和揭露，自然更会引人愤慨。组稿的同志讲，约了稿的几乎都答应写，并将很快交来。

再一情况是大家谈到反胡风的形势，认为从文艺思想批判发展到政治批判，很快会急转直下。有一批原来准备发表的稿件，比如巴金同志批判胡风的文章，刚收到不久，当然应该发表；但现在问题性质变了，巴金同志文章中的口气也就非修改不可了。而退回去请作者本人修改也来不及，恐怕只好我们代为修改，同时向作者写信表示歉意了。

另一情况是，主席的按语发表以后，中央和北京市的各单位已经开始向同胡风关系密切的一些人搜集信件，并听说文化部系统已经从路翎那里搜出了大量胡风给他的信，从这些信中发现了更多比致舒芜的信还重要的内容。此外，当时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同志正在武汉出差，头一天晚上我已同他通过长途电话，告诉了他主席写的编者按，特别强调了编者按中主席几句话：“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和销毁更好些。”刘白羽同志听到这些话以后，我相信武汉同胡风有关系的一些人，大概也不得不交出密信了吧！

这一天和以后一阵胡风和他一批朋友的具体情况， 我们了解不多。去年江西《百花洲》第四期发表了李辉同志一篇近三十万字的长文：《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其中详细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至于1955年5月13日，我在晚上找严文井同志商量了看望胡风的事，决定他当红脸我当黑脸，后来我们就一起到了胡风的家里。《文坛悲歌》中所记胡风当天的日记：“《自我批判》在人民日报上加上按语发表，同时发表了舒芜底《材料》。”最后还有一句：“康濯和严文井来。”

就是记的这件事。

文井当时见了胡风，一直笑嘻嘻地问他最近身体怎么样，饭量好不好，酒还喝得多不多。可是胡风不大理他，而是死死抓住我问：为什么把他的《自我批判》登错了。我只好板着个脸生硬地答复他："没有错！没有错！交给《人民日报》的稿子是我再三校对了的，怎么会错呢？"我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心里很不是味道，但又不得不如此。幸亏严文井在当中调和、打岔，这样空气才稍缓和了一点，我也才有点空隙抽烟、喝水。胡风则是一直狠狠地抽烟，情绪十分暴躁。他这种心情当然应该得到理解，但是那时候谁又能向他公开表示理解呢？

这一次我们去看望胡风，感到他还在为自己的问题力争，认为他有错误，但是并没有严重到那种程度。我们也就放心了一点儿，觉得他还并没感到自己会被捕，当然更没有自杀一类的迹象。按当时的话说，他是还在顽抗；其实这也有个理由，因为他从电话中向周总理报告检讨登错了以后，总理曾认为《人民日报》不对，此点他当然会有感觉。不过从历史过程来看，他显然是比较坚强的。当时我们谈了一个多钟头，走时他还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外。

接着几天的情况是胡风和所谓"胡风分子"们陆续地或被捕、或被隔离审查、反省、停职反省。文艺界召开各种会议，揭发、批判、声讨胡风。从党内文艺方面的负责同志到知名的作家、艺术家以及大多数中、青年文艺工作者，对胡风都表示愤怒和激动，在一些会议上提出撤销胡风的一切职务，开除作家协会会籍等等。唯一的例外是，一次会上被认为同胡风很接近的吕荧居然上台发言，说"胡风同志不是政治问题"，替胡风讲好话，当然他很快就被大家哄下台去了。对于这个吕荧，很多同志都以为他会要被逮捕。但结果是只受到报刊批判而没被捕。这使大家很感奇怪。据我所知，是由于党的宣传部门一位很负责的同志讲了话，保护了吕荧。说吕荧是个有成就的翻译家和美学家，和胡风的关系只是认识问题，要给予帮助。另外，吕荧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又主要是在家中从事翻译和写作，很少上班，也很少参加文艺界的活动，同大家接触少，出版社社长冯雪峰同也就保护了他。

当时党的负责同志还实事求是地很早就主动保护过其他的作家。大家知道艾青和田间都是同胡风来往比较多的，但他们只是文艺上的关系和一般的朋友关系。揭发胡风的反革命面目以后，也有人提到过艾青和田间同志。当然胡风被捕的抄家当中也查到过他们给胡风的信，他们手上也有胡风的信。在那种政治运动的高潮中，他们被牵连上虽也不难理

解，但其实显然是完全不应该的。因而周扬同志很早就主动站出来，在一次会上讲过："艾青和田间是我们党的两位诗人。"还讲过："反胡风也要实事求是，不要搞得打击面很大，不要把不该牵连的同志牵连上。"这就保护了一些同志。

不过当时整个反胡风的斗争来势迅猛，打击面还是很大的，几乎所有同胡风有过一些接触的同志，至少都在内部受了批判、作了检查。关系比较多的绝大部分都曾被捕、被拘留或被停职反省。湖南的"七月派"诗人彭燕郊同志同胡风关系并不密切，被所在单位也报了"胡风分子"并开除公职，在街上劳动了许多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时才查清，他这"胡风分子"的帽子并没被公安厅批准，竟冤枉戴帽25年。还有一位老诗人天蓝同志，他抗日战争初期就在延安，是我在鲁艺的同学，和胡风主要只有过投稿和通信的关系。1955年他在中央党校当教员时，不仅同胡风已没有什么来往，而且还在当年第三期《文艺报》上发表文章批评了胡风。

但是到了五六月揭发胡风的反革命面目，天蓝竟也受到严厉的批判，后来虽没划成"胡风分子"，但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时候，由于天蓝对把他牵连到胡风身上进行严厉批判这件事提了一些意见，再加上其他的事，就给打成了右派分子。可见当时反胡风打击面的确是比较大的。

至于揭发胡风的反革命面目以后《文艺报》的编辑工作，当然也立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人民日报》相继又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第三批材料》，更揭发了胡风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攻击，对周恩来同志也有攻击，这就使他的民愤更大，《文艺报》的编辑工作也就更需要改变。过去留下的谈文艺理论和学术思想的文章几乎都不能用了。夏衍同志早已写起的批评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的那篇八千字文章，在揭发胡风反党反革命面目以后，他又改了一下寄给我，问我是不是还可以用一用；经过我们研究，并得周扬同志同意，还是没有用。这以后，我们主要只组织发表了三类文章。一是政治揭露和批判的，主要带有表态性质。这些文章有的也写得不错，有的还揭发了一些胡风的材料，不过这些材料最多也就是对党和党的个别负责同志不满，讲的话很难听，但总谈不上反革命性质。于是这类文章就只好骂胡风恶毒、凶狠、疯狂、阴险等等，以致弄得编辑部的同志都纷纷诉苦，甚至侯金镜同志也向我诉起苦来了。我对他说："你还可以用狠毒啊毒辣呀猖狂啊这些词儿嘛。"其实当时我也在修改这一类文章，也感到很难办。因此，这一类文章我们虽然发了六、

七十篇，从郭沫若、茅盾、楚图南、钱伟长、沈兹九、曹孟君、梅兰芳直到刘绍棠、李学鳌以及少数民族作家和一读者都发了，并转给了因来不及而没组织到更多稿件的《人民日报》几十篇以及《人民文学》几篇这类稿件，但我们自己也只发了四期，到十三期就打止了。

再一类文章是揭发胡风集团的一些人在各个单位和各种工作岗位上的反革命活动的，这些文章发的不少，直至十九期为止。不过今天看来，这都主要是若干宗派性质的活动，反映了一些同志对组织、对领导和对文艺界的不满，对个别党的领导同志的不满，乃至于对党的某些不满。这类问题有的确实比较严重，但是问题的出现也有领导的原因，况且不管怎样，说到底也还绝不是反革命性质。

还有一类文章是分析批判胡风的思想发展和哲学根源的，这一类文章发到本年第二十期为止。其中有的称胡风思想为反动思想或反革命思想，乃至国民党的法西斯哲学。还有的系统揭露、批判了胡风反革命理论的前前后后。这类文章不管根据是否充分，倒总还讲了一点道理。我自己也在这时写了一篇《路翎的反革命的小说创作》发表，这是在不去深想只按个人崇拜习惯相信路翎是反革命之后，把我认为他作品中的缺点、不足和值得研究之处统统上升为“反革命”的挖空心思之作。尽管此文也同样讲了点道理，不过很明显，这一类文章终归也都无法联系到反革命的问题上去。

五

《文艺报》这一段批判胡的工作。如前所述，是从1954年11月底的第二十二期刊物开始的。1954年，毛泽东同志作了一次专门的指示，指出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以及《文艺报》对待《红楼梦研究》和其他问题上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严重错误。《文艺报》从当年第二十期起，即开始按照毛主席指示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10月、11月间，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了多次联席扩大会议，讨论、批评《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的错误。胡风在其中的两次会议上做了长篇发言，发言稿随即在《文艺报》发表。从当时来看，他的发言有正确的部分，但在以下几方面则表现了明显的不足和缺点错误。

一是对《红楼梦》，认为主要是写妇女解放，而抹杀了其重大的更为深广的意义。

二是对虽在学术上犯了胡适派唯心论错误、但在政治上仍要求进步的俞平伯同志，以及过去的政治情况人所共知、但解放后不论政治上、学术上都要求进步的朱光潜同志，不是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态度，而是似乎不屑一顾地近于蔑视。

三是对于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胡风虽也承认毛泽东所指《文艺报》打击李希凡、蓝翎，但他话锋很快转到不仅《文艺报》，而且是文艺界党内外主要领导和《人民日报》都打击、压制了他的好友和志同道合者阿垅、路翎。同时路翎也在大会上做了四万字的长篇发言，全面批驳了过去对他作品的所有批判。阿垅也从天津赶来参加了大会，发言重提了过去《人民日报》对他的批评并进行了反驳。

大会上，对胡风两次发言，有一个同志公开表示了“基本同意”。对路翎的发言也有认为部分正确的。不过不少同志却对胡风的发言提出了批评，有些同志甚至认为他是转移目标，趁火打劫。他的发言在《文艺报》发表后，刊物又连着六期陆续发表了一批批评他发言的文章。路翎的发言则于1955年一至四期发表。这期间，党中央、毛主席于1954年12月交下了胡风在当年夏天向党中央的三十万言上书，即《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并指示《文艺报》发表其中主要论述文艺思想和文艺建设的两部分，同时组织讨论、批判。《文艺报》便在1955年第一、第二期合刊以附册形式发表了他这个上书中的主要两部分，同时就开始了对胡风同志文艺思想的讨论和批判。

对于半年来的批判所集中的胡风文艺思想，周扬同志在批判之前口头传达过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说，胡风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又说，胡风的文章很不好看，大概是由于他的观点有很多矛盾，他标榜的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又是宣传唯心主义，这就不能不把文章写得隐晦难懂。不过，周扬同志又一再强调说，胡风的上书和论文中，也的确抓了我们一些辫子，他批评我们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批评我们简单化，我们也的确有这些毛病。周扬同志以及丁玲同志都在闲谈时向我说过，胡风总还是比较懂得创作的。因此周扬曾不厌其烦地向《文艺报》指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一定要避免简单化和庸俗社会学，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抓他的根本问题、大问题，不要纠缠鸡毛蒜皮。

当时由我来主持《文艺报》的工作是有很多困难的。我主要搞创作，理论懂得很少，组织上决定了要我负责，我也只好干。我们三个常务编委分工，由侯金镜主要抓日常编辑工作，秦兆阳首先被分配写了一篇批判胡风思想的文章，后来在1955年第四期刊物上发表了。我则除了

主持《文艺报》的整个工作，参加作协、文联的有关会议以及有时也列席中宣部、文化部的有关会议外，就日以继夜地看了胡风过去几乎所有出版的著作和全部“三十万言上书”，也看了过去一些批评他的文章以及有关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哲学著作。原来我对胡风的文艺观点当然也有一些印象，经过这一段的阅读和研究，也就比较明确地感到，他的文艺思想应该说是还有一些正确的东西。但是他又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走过了头，或是走偏了，这样便又时时陷入了矛盾。根据我这样的一个印象，也就感到批评他并不太容易。何况从今天来看，我们当时又带着“左”的影响，这样以“左”的思想去批判右的过偏过头的观点，显然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事实上，当时发表的一些批判胡风的文章，我们也的确较少满意。当时比较好的文章，主要是黄药眠、张光年、杨献珍、秦兆阳、陈涌等同志的，尽管这些文章我们也感到都有不够之处，却总还颇为满意。而周扬同志则几乎对这几篇文章都不太满意。前八期批判胡风的文章，周扬同志几乎每一篇都看过。我们是在同作者商量、修改，有的还是经编辑部再三修改后，才送给周扬同志看的。我和侯金镜在修改过程中总一再强调不要有简单化和庸俗社会学，但是每一次周扬同志看了我们送去的稿件后，几乎总还要说文章仍然有简单化，甚至还有庸俗社会学。因此，有的文章他总要我们拿回来再改，有的甚至是他自己动手修改的。

以上情况说明，尽管当时从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想上批判胡风的文章，在今天看来比较正确的、得以留下来的恐怕可能是极少的了，但从当时来看，我们的批判总还并不是主观上简单地打棍子，而是至少态度上是比较严肃的。至于为什么这样严肃的态度而没有能够写出多少可以留下来的文章，在我来说，除了当时“左”的思想影响外，主要是水平不够。至于周扬同志，他在理论上当然也有局限，但主要恐怕还是“左”的思想的影响，态度上应该说他还是尽可能在作到严肃和实事求是的。

六

到了发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以后，要我们从以上思想批判的态度，不搞简单化和庸俗社会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马上转到政治揭发和声讨反革命的态度，这当然是一个极大的转变，这个弯自然也是很不好转的。那么我们当时到底是怎样转这个思想弯子的呢？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是怎样终于把胡风和他那批人在思想上当成反革命的；或者说，我们到底是怎样认识毛泽东同志为什么会把胡风打成反革命，然后我们又紧跟的呢？

第一，这些年来常听到有同志说，胡风是因为向党中央递交了三十万言上书，因而被打成了反革命。这种说法当然不对，这是由于很不了解情况。毛泽东交下胡风的“三十万言上书”，让《文艺报》发表并组织讲座和批判，定的性质只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这是周扬同志明确向我们传达过的。现在我们还知道， 在“三十万言上书”即将发表之前，胡风已感到事情不妙，曾于1955年1月14日找到周扬同志，要求不要发表他这一“上书”。此事过程，周扬曾很快写信向中央汇报：

定一同志转呈

主席：

昨晚胡风来谈话，表示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致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思想对抗。他说他现在从根本上认识了问题，故感觉很“轻松”，他说他从来都是“乐观主义”的。他再三询问我对他现在这个认识及对他个人的看法。我说他对自己的错误思想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好的，但认识和批判自己的错误，并不是很容易的，是要经过痛苦过程的，他应当准备听取别人对他的更多的批评。至于为人，各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个性，但做人总以光明磊落为好，不要存阴暗心理。他又称赞我政治上很强，我说并不如此，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的错误思想我都没有及时地进行斗争，就是证据。我的话说得比较婉转，以避免给他任何压力的印象。

这些话不过是开场白。他最后向我提出希望不要发表他给中央的报告，如一定要发表，他希望作些修改，他说有些话不是事实。我说发表出来公开讨论有好处，你如对自己的观点和所举的事实有修正，可以再写文章，我们也可以发表。他说他的检讨已写好，并在下星期三可以交来，希望能连同报告同时发表，我说恐怕来不及，可以下期发。他说如果这样，希望在卷首附一声明，随即将他的书面声明交我，我说我们可以考虑他的意见。

很显然，他要发表这个声明的目的，是想藉此来在读者群众中造成一个他已承认错误的印象，可缓和与麻痹群众的情绪，模糊他们的认识，抵制他们的批评。我们觉得发表这个声明，是于我们不利的，拟以书已印好，无法补上这样的理由回绝他。并只可以告他，他的声明既没有具体说明错误究竟在哪里，他所举的事实究竟有哪些不确实，这样笼统的声明，对于读者没有好处。

以上是否妥当，请即指示。附上胡风的声明抄件，请阅。

此致

敬礼

周扬 一、十五

陆定一同志当天在信上的批语是：“建议将胡风声明送作协主席团传阅，同主席团决定给口头答复，’即：内容太不具体，决定不登载。只要文章写得有内容，不论反驳别人，或自己承认错误，在讨论的时期里都可以登载的。陆15／1”

毛主席也在当天批示：

（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毛泽东 一月十五日

现在知道，当时也曾有个别负责同志表示是否可同意胡风要求，返回“上书”

交他修改后再发；这当然未得同意。刘少奇同志当时也曾就此说过，胡风的“上书”

是维吾尔姑娘的辫子，我们不正好抓住么，怎么还能再退给他呢！

不过尽管如此，当时毛泽东的指示、陆定一的意见、刘少奇的话以及周扬的信，都并没正式传达过。我只听周扬同志讲过主席曾说“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但并没研究过应如何具体贯彻这一批示，因而在前八期刊物的批判文章中没明确出现过“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这一帽子。

并且不管怎么说，即使有这里所引的批示，当时对胡风最高也就是个反动的文艺思想吧，而绝没因“上书”便提到反党集团的性质上去过。

第二，还有同志说，党中央、毛主席反胡风，是从批判《红楼梦研究》开始搞的阳谋。这就是认为毛泽东部署批判《红楼梦研究》和胡适

思想，并批评《文艺报》，是在看了胡风“三十万言上书”之后，将这两件事做通盘考虑的。也就是“吴三桂借兵”，先借胡风之力批（文艺报》；同时又对胡风“引蛇出洞”，在文联、作协批评《红楼梦研究》的会议上让胡风发言，然后把批判的矛头转到胡风身上，再进一步批判胡风“三十万言上书”，最后更进而定为反革命，这样一步一步给胡风设的陷阶，搞的阳谋。这种说法我也以为并不确切。毛泽东同志提出批判《红楼梦研究》　，同时批评《文艺报》，这是在1954年9月，同胡风并无关系。毛泽东当时对《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的错误十分气愤，把这样一个学术上的错误批给了党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讨论，可见对此的确非常重视。也正因为这样，批判《红楼梦研究》就成为建国初期继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文艺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又一重大的批判运动，这两次同随之而起的批判胡风因之也成为有名的三大运动。从以下事实，更足以看到当时党中央对这一批判的重视和这一批判的规模，及其同批判胡风并无联系。

一是当时批判《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并不止召开了上述文联、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这一有郭沫若、茅盾、周扬、老舍、丁玲、冯雪峰、邵荃麟、胡风、黄药眠、钟敬之、刘白羽以及老中青作家、评论家、研究家二百来人参加的大规模重要会议，而是同时召开了三个会议。另一会议是中宣部召集的部务会扩大会议，文联、作协、文化部许多党员负责干部参加，陆定一同志主持，开了多次，主要批评了《文艺报》负责人冯雪峰、陈企霞以及前期负责人丁玲，周扬同志也受了批评，他们并都做了检讨。再一会议是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支部大会，当时全作协统编了一个大支部，我是支部书记，主持了这次也连续开了几个晚上的会议；这一会议主要批评了陈企霞同志，也涉及了丁玲、冯雪峰等同志，他们同样做了检讨。至于前两个会议我也都曾以支部书记和党员作家身份到席，并都曾发言。现在依稀记忆中想到的，一方面是这三个会议，特别是中宣部和作协支部两个会议矛头都主要直指《文艺报》，火力之盛是我所未曾料到；再一方面是即使两主席团会议上在胡风发言之后，矛头也仍未马上转移。我是在胡风发言之后才发言的，发言稿也于同期《文艺报》刊登在胡风发言稿之后，但我就全部是批评《文艺报》，没有一个字涉及胡风同志。记得发言之前的会议休息时，周扬同志曾随便问我：“你要发言了吧？你涉不涉及胡风的发言？”我说：“不涉及，我对他的发言没研究，我也认为现在会议重点还不应转移。”周扬同志点头同意。可见当时三个会议批评《文艺报》，并没有、也并不需要借用胡风之力；　同时批《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更没有“引蛇出洞”即诱胡风登台这类阴谋。批判胡风发言是在两主席团会议

的后期，在他的发言希图转移会议目标而这一点又被不少与会者发觉之后。

二是当时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展开学术批判的规模同样很可观。文艺界共召开了大大小小几十次不同的讨论、批判会。《文艺报》是从1954年第20期开始发文批判， 到1955年第6期打止，总共11期中发表50来篇批判文章，集中批判虽是在1954年，　但1955年仍有多篇内容充实的重点文章发表，并于1955年第5期发了俞平伯同志的检讨。再看批评《文艺报》，也是从1954年第20期到1955年第4期，共9期中发了20来篇文章以及数10位读者的批评意见，并在1955年第3期《编者的话》中作了刊物的检查报告。也正是这样大的规模才形成了一个永载文学史的运动，而这一切当然都同胡风无关。

三是当时一件具体事也可说明问题，即《文艺报》新的编委中有王瑶同志。本来北大中文系教授王瑶同文学界联系较少，参加活动不多。提名并决定他参加编委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他发表的一篇批判《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唯心论思想的文章受到了毛泽东的表场，而在一次重大运动中受到领袖表扬自当很快成了盛传一时的大事，于是不大知名的立即知名了，按照当时的习惯自己也有幸参加《文艺报》编委了。记得名单决定后是邵荃麟同志和我去找王瑶同志通知了此事。他问知我当时34岁以后说："你身体不好，我40岁，也还年青，又身体好，看稿、跑腿的事我可以多干。"以后除了参加编委会，他和另一编委黄药眠同志确实都做了不少看稿、改稿和退稿回信工作；而黄老家我倒去过几次，王瑶同志家后来便没再去过，也确实他跑腿来编辑部多一些。至于他的进编委当然同胡风无关，只证明批《红楼梦研究》运动在当时确是文艺界压倒一切的大事。

四是当时毛泽东对《文艺报》很不满意，但并不等于对《文艺报》负责人都很不满。我就从丁玲同志处听说过，毛泽东曾对冯雪峰编剧的电影《上饶集中营》表示好感，要他身边的警卫人员都好好看看。丁玲同志大约是1953年前后还在担任中宣部文艺处长，时常出入中南海的情况下，了解到这一情况的。至于雪峰同志原任《文艺报》主编，那其实是兼职，他主要是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党的关系也不在作协。《文艺报》受批评后他也认为自己实在无法再兼职负责下去了，这才在改组编委会时免去了他的职务，但仍任编委，参加活动仍多。这就是说，批评《文艺报》并非是要一棍子打死所有负责人，更不需要借助胡风之力。

五是胡风“三十万言上书”乃1954年夏天交上，是他亲自交给当时中宣部长习仲勋同志的。不久，习仲勋离开中宣部到国务院文教办，陆定一同志仍任中宣部长份我的记忆，　这份“三十万言书”交上不久，周扬、默涵同志即在作协党组内提起过此事。大概材料先后经过了文艺处、周扬以及习仲勋、陆定一、胡乔木等同志，送到主席手上，或许按胡风交毛、刘、周的要求再经过少奇、恩来同志，那就显然不可能很快。我记得是在1954年11月，文联、作协主席团会议结束前后，大约是我列席作协党组会讨论周扬同志在两主席团会议最后的讲话稿时，听周扬同志谈到，胡风的两次发言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他还具体了解了此事， 并由此而注意到了“三十万言上书”，已经开始在看胡风的上书了　洞毛泽东是1954年11月开始阅读胡风上书，并于12月批示发表、讨论、批判。这就合情合理，同批《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显然没有联系。

第三，还有同志谈到，毛主席把胡风定为反革命，是因为胡风集团在他们的密信当中，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骂成是“屠杀生灵”的“图腾”。这当然是一种推测，　不过我以为这种推测并没有多少根据。首先，毛泽东是5月11日凌晨对胡风的第一批材料写按语定为反党、反革命性质；而公布胡风集团把《讲话》污蔑成“屠杀生灵”　的“图腾”这些密信，在5月11日之前谁都还没有看到，这些信是毛泽东在第一批材料的按语中指出胡风集团的人要交信件后才陆续得到并发现，又直到6月10日的第三批材料中才发表。　毛泽东怎么会在没有看到这类信件的情况下，就根据不了解的情况来定性呢？其次，毛泽东一、二、三批材料中都写了不少按语，但是对于诬蔑“屠杀生灵”的“图腾”这几封信却恰恰没有写按语。有一封信为此写了按语，但又并非毛泽东所写，而是周扬和默涵同志商量写的，只不过他们写了以后经毛泽东看过，自然表示了同意，不过这也根本不能看作是把胡定为反革命的根据。再次，我们现在已知由于梁漱溟先生在一次会议上公开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以至和毛泽东发生了尖锐冲突，可以说是很激烈地吵了架。而梁漱溟以后又一直不肯认错，因此那一次以后，毛泽东再也不同他来往了，他们几十年的老交情也就这样断了。但即使如此，毛泽东也并没有把梁漱溟定为反革命。毛泽东同志尽管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然而到底仍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不排除他对胡风污蔑《讲话》确有不满，但也是丝毫不足以据此便认为是这样把胡风打成了反革命的。

七

那末，毛泽东究竟是根据什么把胡风定为反革命的呢？我认为这主要还是因为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造成的。党中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个人的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这段话指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的十年，即1956年到1966年这一期间，但是问题在1955年前后显然也已开始出现。这一时期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制定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出了当时国内主要矛盾已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1954年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1955年批判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脚女人"，以及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和随后的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显然就都是当时阶级斗争实践的表现。其中反对高、饶的斗争是正确的，反对"小脚女人"就不那么正确，反对胡风则是搞错了。不过当时我们并没有这种认识，而是个人崇拜的思想严重，开始对毛泽东把胡风定为反革命还接受不了，但因为把主席所有指示都看成是英明正确，所以后来就努力不断地提高认识，使自己逐步接受毛泽东的思想，也逐步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接受了胡风是反革命的结论。这又可以从政治上、组织上和客观反映上三个方面来加以阐述。至于思想上——文艺思想在1955年至少还保持了不会上升为反革命的命运，而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就连这种命运都难以为继了。

现在先从第一个方面即从政治上、首先是政治面目上看，当时的材料使我们确实惊心动魄地看到，胡风和胡风集团当中的不少人原来政治历史问题非常严重，政治面目十分丑恶。这就是第三批材料中未经严格查证而抛出来的情况，说阿垅是国民党"反动军官"，绿原是"中美合作所特务"；胡风本人既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又同国民党"特务有不少联系"，等等。其实这些情况后来证明都系虚构。况且这个第三批材料中的揭发，是在第一、二批材料已把胡风定为反革命之后。因而自然可以想象，第三批材料很可能就是按第一、二批材料定的调子，挖空心思去找的所谓根据，甚至为此不惜捕风捉影，能够找到任何一点反革命根据的踪肌吠赶快肯定。

阶级斗争的理论和个人崇拜的影响到了这种地步，哪里还管什么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和反复查证呢？但是这样一来，《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大家当然相信，包括我们在内尤其会相信，试问当时又有几个人会不相信，或者敢不相信呢？

同当时胡风政治面目有关的还有个情况，这就是：由于胡风参加过共青团，据他自己说还曾一度参加过党，30年代以来，他又一直在左联和革命文艺界从事活动，和他关系密切的同志当中也就有很多共产党

员。胡风和这些党员同志之间的关系有一些当然是正常的和比较正常的，但也有不正常的。其表现是有的党员把一些只属于党内的意见给胡风讲，甚至把对党的不满和牢骚也向胡风发泄，这当中有的虽然问题不能算很大，但有一些就确实是问题。特别严重地是有的党员还把党内的机密透露给胡风，甚至把党的机密文件也偷偷拿给胡风看。这些情况在1955年批判胡风时确是不断有所发现。还记得1955年时一次陈毅同志从批判胡风事问及和提到一个有关胡风的机密情况，而很快胡风便知道了此事，并找有关方面做了解释。以上这种种迹象当然要引起党的警惕。特别在胡风被捕以后，很快就从他的日记上发现，1954年上半年，党中央刚刚在很小的范围内传达了高岗、饶漱石问题；党内很多高级干部还不知道，胡风却很快就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呢？这自然也不能不成为当时必须深究的一个问题。

原来情况是党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部分高级干部会议传达高、饶问题时，那两年正在中宣部工作、和胡风很接近的绿原同志办公室就在怀仁堂隔壁的庆云堂内。据说绿原发现那天晚上怀仁堂外边小汽车很多，而且戒备森严，连他们中南海里面的干部也不能随便行动，便预感到党内可能出了什么大事。于是他很快就打电话告诉了胡风。这以后没两天，胡风的老朋友聂绀弩同志去看望他，胡风突然问道：“绀弩，前两天你在怀仁堂听了什么重要报告？”这当然是胡风懵他喽！因为绀弩是二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负责干部，胡风估计他可能听了那个报告，事实上绀弩也确实听了那个报告。经不住胡风三问两问，绀弩就把高、饶问题告诉了胡风。这件事在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问题，胡风一直同党很接近，又是绀弩的老朋友，按照今天党总是同党外知名人士及时通报重要情况的制度，党内发生了重要问题也是会向胡风这样的同志正式通告的。但是当时党的情况以及党同党外的关系还远没有发展到今天这一步。聂绀弩同志向胡风透露那样机密的重要情况，当然是严重问题了。

因此党发现以后，就拘留了聂绀弩同志进行审查。当然不久就释放了他。但是这件事当时一方面总是聂绀弩的严重错误；另一方面，由此而把胡风至少当作反革命嫌疑加以审查，以便搞清楚他究竟是个什么人，在当时阶级斗争的“左”的空气下不也是颇为自然的吗？

类似的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党的一位老文艺理论家刘雪苇同志，同胡风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他1955年春天从上海调到北京文化部系统工作，当时他也对批判胡风搞不通，因此到北京后不久，党内就开小会对他进行了批评帮助，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是会才开了两次，还没开完，刘雪苇就被拘留了。原因是当时党内正在开展审查干部的工

作，发现刘雪苇解放以前被国民党拘捕过，大概是有叛变的嫌疑吧，就把他抓了。后来证明他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当时所谓“阶级斗争尖锐化”

的情况下，像刘雪苇这样同胡风关系密切，观点又比较一致，而又被怀疑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同志不止一个，这就不仅是这些同志要受到审查，而且自然也会要怀疑胡风为什么偏偏同这些党内有严重问题的高级干部关系密切，会要怀疑胡风到底是什么人。这样的怀疑对于当时把胡风定为反革命，或许也可能会有影响。

八

由于1955年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而把胡风定为反革命，从当时《文艺报》所见的另一方面是在组织上，即胡风同他接近的同志之间的确可以看成是有个小集团；当然他们这个小集团并没什么政治纲领和组织机构，这主要怕也同当时“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左”的空气下往往不适当而又司空见惯地所定的各种“小集团”略无二致。固然也有不同之处，这就是胡风等同志主要是在文艺、学术上主张和爱好相近的一伙，他们接触和往来多一点，甚至形成了一个有核心、有书刊出版活动并有着流派、社团一类无形的组织；而这样的情况显然并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在于胡风等同志形成的小集团却又是宗派性质比较明显的，这里不妨略提一二事实。

有些问题上他们就往往表现为当面和背后的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他们也表示拥护党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拥护党的领导，但在他们的往来信件中又把毛泽东的《讲话》 说成是“屠杀生灵” 的“图腾”，甚至还把党中央称呼为“董事会” 。 把党在文艺界的一些领导同志以及一些党员作家、艺术家，称呼为“马褂”、“市侩”、“帮闲”等等。就是对于一些党外著名文艺家，像鲁迅、郭沫若、茅盾、闻一多、巴金、老舍、曹禺、黄药眠、杨晦等，往往都加以轻蔑和反对。对于一些优秀的作品，像赵树理的小说、老舍的剧本等等，都一概瞧不起。而在他们互相接近的同志、朋友之间，却又往往互相吹捧，互相发泄种种不满，如果他们的文章受到‘点批评，那就要跳起来叫骂。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不论他们在哪一个部门、哪一个单位工作，大多要另搞一套，同领导的关系总搞不大好，他们总要力图实现他们自己的一套主张，既有文艺观点、文艺理论方面的主张，也有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上的主张，他们把党在文艺界的领导，看成是长期的“教条主义统治”，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这个“教条主义统治”，要由他们、或者至少由他们成为

主要参与者来领导文艺。以上这种种情况，今天看来说到底也仍然不是反革命，何况他们理论上和组织上的有些主张还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至于他们这些方面的确有着很明显的宗派小集团错误，但即使这一错误十分严重，也还并非反革命吧。然而在当时“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思想指导下，在给他们当中有些同志戴上了政治历史问题的种种大帽子之后，这样打成反革命在当时也就并不奇怪，而是相当合理的了。

还可以提到我们亲自所见的一些事实。我个人同胡风同志是1949年春天北平解放不久之后认识，以后有点工作往来和私人接触，互相间的关系属于一般性质，至今我仍认为双方的交往都是没带任何个人的感情色彩的。1949年春天筹备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时我是文件起草委员会秘书，国统区报告由茅盾同志作，并成立了个起草小组，胡风是成员之一。然而第一次起草小组会上胡风就生了气，会后向我表示再也不参加小组了。我莫名其妙，根据党的指示几次去北京饭店他的住址拜访，请他一定继续参加。有一次还碰见党的老一代文艺家、胡风的老友冯乃超同志也去动员胡风继续参加报告起草的讨论，但他始终不同意。不过冯乃超同志在场时我总算搞清楚了胡风一怒而坚决拒绝再与会的理由所在，是由于第一次会上茅盾同志发言中讲过一句，说是可惜邵荃麟、林默涵等同志还在香港而没到北京，不然这个报告的起草当会更顺利一些这样的话。这个话我记得，但却不懂，冯乃超同志向我解释，说因为邵、林等同志在香港批评过胡风，所以胡风一听茅公提到此话，就以为是指如果邵、林来了，报告中就能更顺利地批评他胡风了。后来我曾委婉地向茅公转述胡风意见和顾虑，茅公说他不是那个意思，而主要是说邵、林对国统区桂林和重庆时代的文艺情况还熟悉，并说只要胡风来参加起草小组会，他可解释说明。然而胡风的态度始终不变。这不能不使我感到他确有点长期形成的宗派情绪。于是我只好表示，他即使不参加起草小组会议，以后报告稿出来我一定送他审阅。但由于定稿出来时已是大会开幕的头一天，匆匆交印刷厂印出后已是大会开幕之后了，因此起草小组成员都没来得及再看。而胡风终于还一直记着这件事，在1954年“三十万言上书”中并以之作为党排斥他的事例之一顺便提到，可见成见之深——这当然不是对我个人的了。

胡风同志1953年从上海全家迁京，住到地安门内太平街以后，我曾以中国作协机关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去看望过他。同他是老熟人，同夫人梅志同志是初见。落座后梅志泡茶去了，胡风递烟后又把烟收回去说：“等等，我还有两盒好烟。”便也起身进屋去找。这时他们一位六七岁的男孩走进客厅，闪着眼站住看了看我，忽然问道：“你是胡风派，还

是周扬派？”胡风夫妇听后赶快惊呼笑嚷着跑来把孩子打发走，这时我正拉着孩子的手回答他：“我是共产党一派，你知道不？”这是一个小插曲，但总也是可引起一点思索的。

在1955年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时，《文艺报》曾约请若干同胡风关系密切的作家写批判稿件，并很快收到了一些稿件，其中鲁藜同志的一篇当即发表了，也还有两篇准备陆续发。但不久以后从收到的密信等材料中发现，鲁藜等写文章原来是胡风他们共同研究后的部署。他们之间进退一致，甚至写什么和怎样写都有默契，而鲁藜同胡风关系的不太一般由此也可见。

当晚鲁藜的表现自然只是一件具体事，更主要地是后来我们就已知道，最近李辉的《文坛悲歌》尤其详尽记载着，胡风的“三十万言上书”乃是他们全国各地几乎所有志同道合者十分机密地共同搜集材料、共同研究、共同准备而写成的，并经过向各方征求意见，才最后于当年七月下旬交上去。接着就静等喜讯。果然十月公布了毛泽东批示批判《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胡风同志等过分天真地以为喜讯果然来到，以为这是毛泽东看了“上书”并同意了他的意见，开始采取措施从批《文艺报》打开缺口，来击败文艺界党内多年以周扬为首的主要领导者，并从而解决胡风多年攻击的所谓“教条主义统治”问题。特别是随后文联、作协两主席团会议上他和路翎作了长篇发言，看到两个发言都在《文艺报》先后发表，又听说“三十万言上书”也将发表，胡风和他的战友简直惊喜交加，兴奋不止，各地奔走相告，以为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而几乎要感激涕零于胜利在望了。然而不久他就受到强烈反击，而他还曾以为这是有人妄图改变毛泽东的部署，曾想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但终于很快就一步步看到自己错了，于是又各地联络，承认“被乐观估计所蔽”，并决定退却。他清楚了解自己并不怕与周扬等对峙，但同毛泽东冲突可就不敢为、不敢想了。因而这时虽然有些朋友反对他写检讨，他仍主张写，加之另一些朋友同意，最后决定咬牙反省，并由路翎执笔，绿原、欧阳庄等帮助抄写，于1954年11月11日即写出一万多字的《我的自我批判》草稿。然后将检讨要点分达各地征求意见，到1955年1月才修改并交上《我的自我批判》 的一稿。这时“三十万言上书”即将发表，胡风在交上检讨一稿之前，如上所述，还曾找周扬同志当面承认错误，希望不发表他的“上书”，或让他修改后再发，如非发而不同意修改，则希望在“上书”

前面登一份他当即交上的“声明”。这显然是希图不受批判或减轻批判分量，同他交去“上书”一样都是煞费心计的。

由此可见，胡风和他的朋友们之间一切进退、取舍，确都是有目的、有计划的，甚至他们在对外保密上还颇有纪律。而胡风也确有一套长期坚持的、有自己特色的观点、主张和理论，为了贯彻他的一套而几十年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从来都没有过任何自我批评；但是在一旦形势对己不利时，却又可以不计一贯坚持的观点，而俨然很快就有认识似的写出检讨，粗看时检讨还写得不错！由此难道不足以说明，在当时“阶级斗争尖锐化”和“左”的思想影响下，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在组织上不确是很充分地至少具备了被扩大化到打成宗派小集团乃至反党集团的性质和条件了吗？

至于以上这些事实当时大会汇报给毛泽东同志，怕是肯定无疑的。就象胡风的小儿子问我是胡风派还是周扬派这句话，我向周扬同志汇报后，随之便听到党和文艺界一些主要负责同志提起过。还记得周扬同志在三批材料发表后和一次小会上讲过，说主席听了胡风集团一些人的情况后曾问到，鲁藜发表过批胡风的文章，他有没有事？周扬答以鲁藜怕不行了，主席啊了一声，没再说话。大家知道，鲁藜当时同毛泽东是很近的亲戚关系。这里既说明毛泽东不管对鲁藜的亲或对胡风的恨都并没影响他个人的好恶，他认为对谁该定什么性就定什么性，而一般地并不掺杂感情成分；此外这也说明了上面的种种事实对毛泽东把胡风集团定为反革命性质显然会是深有影响的。

这里也应联系提一提，在谈到胡风等同志所谓宗派的同时，如前所述胡风等对文艺界党内外一些负责同志和重要作家是从30年代开始就有了宗派情绪的，以后直到建国初期这种情绪显然越来越有所发展。不过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文艺界有的党内外负责同志和重要作家对胡风他们恐怕也不能说没有一点感情用事、个人意气和宗派情绪。据我的理解，这种情绪恐怕是互相的，而不只是胡风一方面的；不然的话，如“二十万言上书”中所说的事实，胡风在建国后一再要求党在宣传、文艺界的负责同志同他谈话，为什么这样的谈话就很难实现，而且即使谈了一下吧，也总表现为简单、生硬，不欢而散？为什么领导同志不能同胡风同志更加开诚布公、虚怀若谷、坦诚相见地好好谈几次呢？当然要跟胡风同志真正谈得找到共同语言，也的确不容易，这我有过前面曾经提到的实际经验；何况双方在理论观点上又确有很大差距，并且双方的观点又都由于各自主观的以及各自所受或“左”或有的影响而难免各自都有矛盾，因此也就必然更难谈得拢。不过，“三十万言上书”中胡风不是也谈到，1952年林默涵曾在中山公园同他有过一次最长最亲切的谈话吗？更不必说从“三十万言上书”中看到周恩来同志是怎样不厌其烦地许多次关

心胡风，不必说当时曾给胡风三个工作而他竟一个也未能挑上并认真干下去。试想想，如果我们能够更加虚心、诚恳地承认胡风、路翎等的成绩并听取意见，谈谈看法，那就即使胡风态度再不好，群众也将会并不同情于他了。而现在给人的印象则是胡风多次要求谈话，领导同志不是不谈，就是谈而不耐烦，以致使人感到至少是双方都不好，也使人感到胡风虽然宗派情绪很严重，我们党内有的同志对胡风只怕或多或少也总有一点个人意气、成见，或是有意无意的宗派情绪了。

胡风同志的宗派情绪，以及我们有的同志也可能存在的意气、成见或宗派，其来源自很复杂，起源于30年代某些观点和看法上的分歧和争论，包括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这两个口号的分歧和争论，典型问题的争论。以后战争时期大家分处解放区和国统区，环境的极大不同，地区的完全阻隔，往来的几乎断绝，这就使得大家互相更不了解，以至于因为种种确切的、不大确切的和完全不正确的信息与传言而造成的误解和成见，显然都很难避免。这当中又经过关于民族形式问题、关于主观的问题以及关于胡风整个文艺思想问题在重庆、在解放区和在香港的讨论批判；再经过建国后1952年北京小会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讨论批判，其后又公开发表了林默涵、何其芳二同志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两篇文章；这样一系列的理论、观点论争再加上人事关系和工作关系等等很长时间的复杂历史情况，产生一些意气、宗派和成见，也是很难责怪的。前不久我和默涵同志谈起这一问题，他也同意我的看法，认为由于历史的积淀，我们有的同志恐怕也不能说对胡风就完全没有宗派情绪。不过这一问题今天来看虽然不难理解，在1955年所谓"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就不好掌握了。当时的阶级斗争不仅“尖锐"到批评了胡风同志，而且也批评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评了胡适思想，还批评了梁漱溟先生和梁思成同志，这些批评《文艺报》全都发表了文章。因此不难想象，我们的同志对胡风当时哪怕有一点不完全实事求是的成见和偏激的、 宗派的意气和情绪， 那就很难说对于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高潮和热点上，当这些情况通过种种渠道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以后，会对把胡风定为反革命这件事没有丝毫影响了。

九

在1955年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把胡风定为反革命，从当时《文艺报》所见的再一方面是在客观反映上。这首先是我们编辑部曾碰到许多意外情况。

一个情况是1955年初批判开始不久，编辑部的夜间值班室就连着许

多个夜晚，半夜总要不断接到一个人的电话。由于我们是几个女同志轮流值夜班，打电话的总是骂一些脏得很难听的话，女同志实在不愿意接，但有时半夜难免会有周扬、林默涵同志的电话，有时也有工厂的电话，以及外地的长途，不接又不行。这件事直到我们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公安部门才在那个人正打电话骂我们时当场把他抓获。原来那是一个书店夜班守仓库的人，他的父亲在我们镇压反革命当中被杀，这样他就有了仇恨。他自己供认，他是看了胡风的有些文章感觉到出了一口气，因而对批判胡风很不满意，于是就打电话骂（文艺报》。这件事今天看来当然要做分析，要区别那个人的父亲到底是不是该杀，该杀或冤案当然不一样；不过即使这个人称得上反革命分子，恐怕也不能说胡风他们的言论就是同反革命一鼻孔出气的，而只会是他借用胡风的不满和牢骚，加以适应、补充从而发泄自己反革命的嚣张气焰。但在当时的气氛中把这件事作为反革命事件，并看成是批判胡风所引起的阶级斗争的反映，不是很自然的吗？

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编辑部经常收到一些匿名的和化名的文章和信件，为胡风讲话，而对《文艺报》和文艺界批判胡风表示很不满意甚至坚决反对。这些文字有的还讲一点道理、谈一点理论，有的则干脆是谩骂。记得还有一封署名为“几个三八式”干部写的信，也就是一批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干部写的信，说他们都不是文艺工作者，但都认为批判胡风是错误的，而且还一条一条讲了许多道理，甚至引用了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上的话。这些文章和信件有的还写得很有杂文笔法，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我们的编辑看了很激愤、很生气，以至于不得不分配两位水平高的同志专门处理这些文章和信件。这两位同志写的复信和退稿信往往也写得很精彩，有时在编辑部朗诵，总受到大家的鼓掌称赞。大家都认为这也是在批判胡风中的阶级斗争，这样的认识在当时不也是合理的吗？

上面这些打电话和写信骂我们的情况，我们都曾向默涵、周扬和中宣部汇报，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同志还曾把那几个三八式干部的来信说成是“三八式纲领”，他在一次我列席参加了的部务会议上说：“文艺工作上党和毛主席有一个纲领，胡风有一个纲领，现在又出了个‘三八式纲领’。这个‘三八式纲领’我看也可以公开发表，进行讨论和批判。”后来为了不分散精力，没有发表这封信并进行批判，而只在复信中驳斥了他们。不过这些情况当时自然是通过中宣部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了的，而这一类当时的所谓阶级斗争反映，我估计对毛泽东把胡风定为反革命可能也会有影响。

客观反映上的另一个情况是，胡风的三批材料公开揭出来后，在文艺界和广大群众当中引起的激动和愤怒确实很大。当时由于党和毛主席在广大群众中有极大的威信，因此《人民日报》揭发的胡风反革命面目，读者们大多是坚信不疑的。这里我只举两件事实，一是曹禺同志在当年《文艺报》九、十期合刊上发表了一篇《胡风是走的那一条路》这样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他看到胡风的第一批材料之前所写。

他在文章中说："有一个时期我很迷惑，胡风究竟是怎样一种人？他是拥护为工农兵的方向，还是一个口是心非的、别有用心的'批评家'呢？他是如他一再声明的拥护党的领导和党的文艺政策的，还是一个日夜梦想着占据山头、另树旗帜的人呢？

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工作者，还是一个隐藏在马克思主义文艺阵容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代理人呢？"在这篇文章写完以后，曹禺同志又写了《后记》，这恰好是发表第一批材料的五月十三日。后记里说："今晨刚刚写完这篇文章，就看见《人民日报》上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两篇文章，从舒芜先生揭露的胡风给他的密信里，我才更看出胡风的恶毒、阴险的面目。原来一个人是可以伪善到如此地步的，我们还是太天真了。这样的反党集团真是无法容忍的，这样对党对人民的仇恨，是必须揭发，必须加以彻底的清算的。 ……把党的文艺工作中的负责同志们称作'官方'、'权贵'、'老爷'、'钦差'，把党和非党的进步文艺工作者指为'豪绅'、'马褂'、'市侩'、'蛆虫'，并且说要'警戒'党员作家们和党领导的进步文化工作者们。读了胡风给舒芜先生的密信，再看另一页上胡风满篇虚伪的《我的自我批判》，我简直无法再看下去。"从曹禺同志所说这些话，可以看到胡风给舒芜的信的确是使人气愤的，当时曹禺同志不完全是讲的真话吗？

这里显然涉及一个私人之间的信件可不可以公开，并以之提到政治上来判断其性质的问题。本来私人之间、好朋友之间背后说一些私房话，发点牢骚，表现一些不满，也是常有的事。正因为是私房话和私人信件，往往就不会说得很全面。写了对某人某事不满，很可能只是一面，而另一面、也许还是主要的一面对某人某事又是赞扬的，或许这不满的一面又只是一时一地的看法。因此，把私人信件所写都提到政治上来作结论，显然不妥。这就还有个私人信件该不该发表的问题了。今天来看自是不宜发表，否则将是违背宪法所规定的通信自由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考虑问题：如果某些人已是证据确凿的特务、内奸、反革命，而他们私人通信中又进一步提供了反革命罪证，则必要时完全可以发表其

私信。但是如果并非证据确凿，而仅仅要公开发表私信中一些不确切的或至多只是思想反动的言论以之来定性为反革命，这怕就处置不当了。况且即使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扩大化到发表私人信件中只属于思想反动的言论以定为右派， 但那也一般并不同于逮捕、 判刑的反革命。然而在1955年当时的思想指导下发表了胡风他们的私人信件，而且在以上种种阶级斗争和个人崇拜的气氛中又从这些私人信件作出反革命的结论，这对我们当时确实一步步而至迟在看了第三批材料上那些“特务”、“反动军官”之后是不再有怀疑的。至于由此而像曹禺等同志写的批判文章，当时自然也就更是完全正常的了。如果说当时确有个别同志表示发表私人信件是否妥当，而今天来看确也并不妥当，特别是胡风问题已彻底平反；那末根据私人信件而写这些文章的责任也就不在曹禺同志等作者了。

另外一件是巴金同志的事。巴金同志近年间的名著《随想录》最后一篇文章是《怀念胡风》，此文的最后一节谈到，反对胡风集团的斗争中，他写过三篇文章。

其中第三篇批评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的，巴金同志在文章里说：“稿子写成寄给《人民文学》，我自己感到一点轻松。形势在变化，运动在发展，我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了，似乎面目全非，我看到一些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政治术语，更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权力随意给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看得出有些句是临时匆匆忙忙地加上去的。总之，读头一遍我很不满意，可是过了一晚，一个朋友来找我，谈起这篇文章，我就心平气和无话可说了。我写的是思想批判的文章，现在却是声讨‘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倘使不加增改就把文章照原样发表，我便会成为批判的对象，说是有意为‘反革命分子’开脱。《人民文学》编者对我文章的增改倒给我帮了大忙， 否则我会遇到不小的麻烦。 ”巴金同志在文章中又说：“用全国的力量对付‘一小撮’文人，究竟是为了什么？那么这个‘集团’真有什么不能见人的阴谋吧。

不管怎样，我只有一条路走了，能推就推，不能推就应付一下，反正我有一个借口：‘天王圣明’。当时我的确还背着个人崇拜的包袱，我想不通，就不多想，我也没有时间苦思苦想。”

巴金同志的确是十分真诚的。只是这里讲的有一点有出入，就是他这篇文章原来是寄给我们《文艺报》的，当时由于批判胡风的主要责任在《文艺报》，因此我们组织的文章也比较多，后来第一批材料发表以后，《人民日报》来不及组织多少表态文章，我们曾经给了《人民日报》一批知名人士的稿件，同时也给了《人民文学》几篇稿子，巴金同

志这篇文章就是我们转给《人民文学》的。转去以前，的确由我们改了一下，并由我写了一封信向巴金同志说明和表示歉意。巴金同志还回了信。在“文革”中我大批信件丢失的情况下，巴金同志这封信倒是意外幸运地留下了。信是这样写的：

“康濯同志：

六月一日来信收到。文章迟发表，没有关系。我当初想用这篇文章参战，后来出国开会，拖了将近三个月，刚写好，情况已大变，文章也失去作用了。你们删改，这是对读者负责的表示，我当然同意，请不必客气。

此致

敬礼

巴金 6月8日。”

30多年前的这封信和三十多年以后的《怀念胡风》一文，思想感情完全一样，巴金同志真诚的自责十分严格，很值得我们学习。其实他文章中所表露的“天王圣明”、“想不通就不多想”这种个人崇拜的心理，我们当时也都有过，甚至还要严重，而这“天王圣明”的一点，不也正好反映了当时把胡风定为“反革命”的一定的客观基础，正好反映了当时文艺界对于把胡风定为“反革命”因而大多也就并不怀疑、完全相信的情况了吗？

十

对于胡风和胡风集团这一建国以来文艺界最大冤案，颠倒了敌我，株连到一大批优秀作家和文化人，时间又长达二十四五年的大冤案，在作了以上有关情况的回述以后，或许还有必要略加若干概括。

第一，关于胡风的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即使在1955年“左”的思想影响和我个人又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如前所述，我内心里也并没有认为他是完全错误，倒觉得在一系列问题上他还有些道理；当然即使在那时我也仍然“左”得把他的主要方面看成是错误的。今天冷静回思，虽然我没有再去翻读胡风的著作，但内心中却不能不认为胡风的文艺理论在我国新文学运动史上，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能够比较系统地提出并不断充实这样一整套观点，尽管他的理论中还存在不少矛盾并有着一些不足

和缺点错误，然而总也实在仍是很不容易，很值得珍视的。

胡风在理论上显然是曾经追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立场，追求人民大众的“爱爱仇仇”与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追求通过作家和文学作品的“主观战斗精神”，帮助人民去掉旧社会加给他们精神上封建的、历史的负担，这就是胡风说的去掉人民身上“精神奴役的创伤”这种负担。胡风提倡“到处有生活”，谈到客观对象时又强调“日常生活”；然而他自己一到解放区就忙着访问英雄模范，访问工厂、农村的先进人物，访问战斗英雄和后来的志愿军英雄。胡风不主张提重大题材，然而他自己解放后下笔就是英雄模范和开国大典。可见他也仍然并不是反对先进的斗争生活和题材应有主流的。特别在艺术上他提倡作家的主体性即他的“主观战斗精神”，比较深刻地指出了作家创作过程中应努力追求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并提倡学习世界上先进的文学思潮、文学经验和文学形式，这怕都是应予肯定的难得的方面。也正因为这样，前面提到周扬、丁玲都讲过胡风是比较懂得创作的。

当然他的有些观点也有混乱、矛盾和不足。他的现实主义主要只强调真实性而比较轻视世界观、党性、倾向性和民族形式，甚至把民族形式只当成五、七字句和简单、落后的旧形式；他的“主观战斗精神”又要求在创实践中“自我扩张”思想改造，从而忽视了斗争生活的实践和革命的倾向性；他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则过分强调了人民群众的自发性、疯狂性而比较轻视人民勇敢、勤劳、智慧这主要的一面。但是不管怎样，革命民主主义的文艺观、美学观和他在理论实践上的真知灼见恐怕还是值得称道，如果付诸实践，或将很可能会推动我国创作和理论批评较好一些地发展的。即使退一万步说他的观点基本上都不正确的话，也是学术问题，可以批评讨论。然而当时却完全不是这样，而是批得一无是处，一棍子打死。这里还可以讲一点我当时的内心活动，批判胡风开始，我曾想大概批他几个月结束以后，总还是可以大家都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同胡风团结，让胡风在工作中发挥他的作用，也让他的理论和创作发挥作用的。谁知不久以后我就感到自己错了，对胡风的理论恐怕是会要一棍子打死了的。怎么办？正如上面所引以巴金的话那样，我当时确实是只好想不下去就不想算了。

第二，在学术和理论的斗争当中，最后搬出私人之间的信件作为反革命政治定性的根据，如前所述，这在今天看来显然可以肯定是不妥的，这正如不能把私人之间聊天谈话中随便讲的一些话都当作每个同志政治表现的根据那样。当然胡风他们的私人信件确实特殊到有一些攻击党的文艺方针路线和党内外文艺家，以及议论和商量他们应该如何对付

文艺界领导之处；他们私人信件中有些话孤立来看，也的确可以称得上恶毒。但是不管怎样，到底也只是私人通信，即便对于这些特殊信件应该认真对待，那末为什么不能也采取特殊方式在内部来讨论、批评和处理呢？现在看来，当时的方式恐怕只能说成是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特殊条件下，为了特殊的政治需要而采取的，不计后果和并不妥当的措施了。

第三，关于胡风集团作为一个文学上并无固定机构、固定组织的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志，这种集团对文艺学术的发展一般地说怕还是有好处的。至于胡风集团之间经常研究文艺问题，直到写三十万言上书和《我的自我批判》，都是十分机密地集体搜集材料、征求意见，这一些本来也未尝不可。问题是他们的确有着程度不同的宗派情绪，有时对党的文艺方针和党内外文艺界领导同志与各方面的工作，也确实有一些完全不应有的谩骂和攻击，偏激的乃至不问是非的看法，以及对待策略上的背后商议；并且有时也确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有的共产党员可以泄露党的机密而却为他们保密，这却显然都是不足为法的。而且这样一来，难免就连那些本来不是问题的事也变成问题了，乃至把这个小集团完全当成宗派集团了，把他们说成是有纲领、有目的、有计划的进攻了。而没有考虑到要说宗派情绪，对立的方面也并非完全没有，这正如1988年6月，党中央为胡风彻底平反的补充通知所说：文艺界的宗派问题，历史情况的极为复杂，涉及面广；牵涉人员也多，不宜简单下结论。从胡风的一生总体来看，在政治上他是拥护党中央的，本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精神，这一指责也予以撤消。

这也就是说，1955年由我主持的《文艺报》把胡风定为宗派小集团，从今天来看也是并不妥当的了。

第四，当时的三批材料是在把胡风定为反党、反革命集团以后，又挖空心思地找他们的政治背景，以至于捕风捉影，把他们搞成同国民党及其特务组织有联系，有的人甚至干脆被搞成本身就是特务；而当时这样作的第二、三批材料，又是在公安部的参与下编写，这就当然更是严重错误和严重教训。当时还由于这样而把同胡风有过长期的朋友往来的几个党内老同志，也仅凭这一点就予以拘留审查，甚至打成反革命。并且又反过来由于这些党内老同志同胡风的关系，而把胡风的问题看得更加严重，这自然也同样是极其错误的历史教训。

第五，批判胡风时社会上的反映，在当时阶级关系还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当然会是各式各样的，其中难免也会有个别坏人对被批判者表同

情，为被批判者说话，这都并不奇怪；但是当时把这些都以为阶级斗争的反映，又由此而把胡风的问题看得更严重，甚至还给问题升级，显然这也是深刻的教训。

第六，《人民日报》把胡风《我的自我批判》一稿登错，对此周恩来本是主张改正的，以后却由于更大的政治需要而决定不予改正。这从特殊的政治利益考虑，或许也未尝不可；但从长远的历史来说，则显然是应予提出、澄清和纠正的。

我这里所谈的不少问题，都还只是提纲性质，只是想扼要介绍一下《文艺报》和胡风冤案大致的关系，其中有些情况可能还将另文论述。最后还想提到一九八八年六月，中央为胡风彻底平反的《补充通知》中的一句话，就是上面引述的“从胡风的一生总体来看，在政治上他是拥护党中央的”。我要补充的是，1936年丁玲同志逃出南京国民党的监视以后，跑到上海，代表党去接丁玲的就是胡风。此后抗日战争中胡风在重庆，也为丁玲同湖南老家她母亲的往来做过联系。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胡风还曾为党秘密传递过一份极端重要而机密的情报并受到我党中央军委的来电奖励。对此，我引用当事人张执一同志1981年发表的一段回忆录。张在五、六十年代是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地下党工作。这段回忆录是从荒煤同志1987年发表的《告慰丽尼》一文中转引的：“文学家丽尼（郭安仁）在解放战争期间曾在国民党军委首脑机关任英文翻译，乘机弄到一份蒋军整个作战计划，找不上党的关系，只好到上海找到作家胡风，胡风找到在宋庆龄先生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廖梦醒同志，廖再设法转交给我，上海局密电报给了中央军委，军委曾来电奖励，认为对我军作战有很大的帮助。”

对于这样重要的贡献，“文革”中含冤逝世的丽尼同志从没公开过。这是怎样一种高尚的品质啊！

我是直到1985的的元旦这一天，在作协四次代表大会休会期间，才约好了上胡风同志家去看望了他，这是整整30年之后，我第一次同他单独会见，这之前只通过信和在作协四大会上见过。他给我的信写得还很好，思想仍然相当敏锐；另外我也知道他谈起他的文艺理论时曾经讲过“借用张志新烈士的—句话，‘观点不变’”。

但是这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却大吃一惊，我告诉了他，1955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他那篇《我的自我批判》，确是把稿子登错了，并讲了发生那一错误的经过。当时他的夫人梅志同志听了很激动、很难

过。我对胡风同志说：“发表文章的那天晚上我去看你，你很严厉地责问我，责问是完全对的。我当时说文章没有登错，那是讲的假话。”向他表示了检讨。可是他却木然地、呆呆地说：“那时候，我还敢，敢有意见吗？我不敢哪！”这已经完全不是原来的胡风了。正如巴金同志《怀念胡风》一文所说：“一个有说有笑、精力充沛的诗人，变成了神经木然，生气毫无的病夫，他受了多大的迫害的折磨！”当年为登错了他文章，即使已被打成反党集团，也还要不断尖锐地责问我；现在却说是“当时我哪里还敢，敢有意见哪！”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把一位杰出的理论家和诗人，生生变成了似乎是一个呆子，一个完全听话的工具，这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过去的事难道仅仅说一句历史的大悲剧就可以结束吗？历史还在往下写，不论是谁，不是都有责任尽自己的力量把历史写得好一点吗？

1987年6月19日初稿，7月7日修改，10月5日再改于北京。

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

李慎之

孔子：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被称为中国的大逆转，但是这个“逆转”的转折点到底在哪里呢？

从表面上看，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日，毛主席在共产党内部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使一场开始了才一个多月的“鸣放”顿时夭折。紧接着，讨伐右派分子的运动就一步紧似一步地展开，运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到1956年底才算基本结束，到1958年底才最后封刀。真是“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6月8日可以算是转折点了。对这一点，史家是不会有异议的。但是，引人寻思的是，毛主席在上半年一而再，再而三，可以说是几十上百次地号召人家鸣放，鼓励人家鸣放，而且一再批评党内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思想不通，为什么会一下子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呢？这是简在帝心、乾纲独断的事情，除他本人以外，也许不会有第二个人能确切地知道这个最高机密。　当代史家对此多有探讨，甚至有人说，这是毛主席4月30日请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以后，　没有料到鸣放如此放肆，忍无可忍，才在5月15日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通讯，这才是形势真正的转折点。然而这些同志也未免太低估毛主席了。毛主席是何等样人物！平生军事的、政治的，大战场、小战场经历过不知其数。就以我所知的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单是从《内部参考》和《参考资料》上能看到的而且必然看到的国内外批判共产党的话就不知有多少，他怎么能为罗隆基的一句“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就沉不住气而龙颜大怒呢？毋宁说为大鱼游入网内而高兴的可能还更大些。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正如陈毅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的诗里所说“从来能兵观远略，于今筹划赖雄才，”他就是这样一位罕见的善于筹划远略的雄才。

一

《人民日报》的六八社论和中共中央的六八指示都是执行了毛主席将近半年以前的既定决策。这个决策才是从鸣放到反右真正的转折点，才是中国命运的大逆转的转折点。

这里指的是1957年1月毛主席《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18日、27日两次讲话，合共两万字，可以说已经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他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如何对付的理论了。这两万字中，可圈可点可摘的东西实在太多。但是至少下面这一段比较最充分地说明了鸣放的意图以及它与以后的反右派斗争的关系：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5页）

就在这篇讲话的上下文，毛主席还说："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都隐藏着。"

"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不是已经把引蛇出洞的战略部署说得清清楚楚了吗？难道还有什么地方不明白，还有什么疑问吗？

大概就是由于这一点，毛主席自称："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

当然，"有人"又会说，"你那是在内部会议上讲的呀？"但是，毛主席在6月8日以前近半年时间里，每次讲话的时候，确实都没有忘了说"毒草锄了可以当肥料"

这样的话，你没有参透其中奥妙，你只好自认晦气。

看了这些话，对于《事情正在起变化》、《这是为什么？》、《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本来是不应该惊讶的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绝大多数的人都感到始料不及（其中也有一些人是大感痛快与解

气的）。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一次会议是党内高干会议，与早两个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那一次是引蛇出洞的方针初见端倪而尚未最后决策的会议）相同，传达的范围有限，就我本人来说，就因为随周恩来总理出访亚欧11国，两次传达都没有听到（前一次略知一二）　。第二个重要得多的原因是，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次大会上，赫鲁晓夫揭发了斯大林的错误，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震动极大。在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都引起了一种社会主义、共产党必须改弦更张，更加宽容、民主的印象。毛主席本人以及中国共产党全党在1956年全年都有这方面的言论。毛主席引蛇出洞的决策，应该是在10月份的波、匈事件以后开始考虑的，而一旦形成，他就亲自执行，全力以赴地做“引”　的工作。其第一个标志就是一个月以后，也就是1957年2月27日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以极其开放的口吻，至少是建国八年来到那时为止没有听说过的开放的口吻，甚至极有风趣的口吻，鼓励大家鸣放。接着，他又在3月12日邀请许多党外人士参加的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内容更加开放，提出“不要围剿王蒙”、“中央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吗？”“鲁迅不但反右而且也反左”。“现在不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　　。3天以后，他老人家又风尘仆仆一路南下。3月16日起程，3月18日在天津，　3月19日在南京，3月20日在上海，4月份又到杭州，自己说自己“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南京讲话），游说大家鸣放，这样一直到4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恳切地请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毛主席不但是一位运筹帷幄的最高统帅，也是一位制敌机先的前线总指挥。5月1日整风正式开始。因此《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作为一种不和谐音夹在中间不但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好像连后来成为反右积极分子的党员干部也没有怎么注意。所以毛主席才一再说党内干部有百分之九十想不通他号召鸣放的主张。

关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报告既然是秘密报告，中共当然也不会公开宣传，但是事实上中国人知道的范围很广。因为中央决定把朱德从莫斯科带回来的译文印成小三十六开的小册子，封面上题目都没有，只印有“内部材料·注意保存”八个字，随《参考资料》发放。《参考资料》虽然只发到高级干部，但是并不算是机密刊物，也只是在刊头上印有“内部刊物，注意保存”两行字。因此这个报告的内容实际上传播极广。另外外文书店还发售美共的《工人日报》，上面也载有报告的英译文全文，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竟相购买，竟致把《工人日报》买光。尤其是毛主席当时一再发出要打防疫针，种牛痘的主张，《参考消息》由于他的旨意而由2000份扩大发行到40万份，每个大学生都可以订阅。看来

他并不反对让这个报告的内容从各种渠道泄漏出去。因此，这个报告已算不得什么秘密了。按《参考消息》不能登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但是可以登各国的反应。

不过，有一点不能不说的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即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公开发表时已在6月19日，反右派斗争已经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了，而且其中删掉了许多开明的话，却增加了本来没有的六条政治标准。至于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发表时已到1964年，不但上面提到的话完全不见，而且只剩下强调敌我矛盾的话，在文化大革的大批判中大起作用。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怎么也不能信服这是“阳谋”。

二

对于毛主席来说，虽然前面已经说过，他身经百战，经历过无数的挫折与屈辱，但是苏共二十大给他的刺激也许是最大的刺激。因为这是他已经达到权力颠峰后的刺激。这个刺激看来支配了他晚年整整20年的生命。

1956年本来是毛主席认为“大胜利” 的一年。这一年开头就让他高兴。1月15日，北京公私合营的工人、店员、资本家、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还有农民和各界人士共20万人集合在天安门广场上，锣鼓喧天，鞭炮震耳。毛主席在城楼上接受了北京市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喜报。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用毛主席后来的话说，“自1840年以来116年”的奋斗目标已经达到了。

毛主席是永远的革命家，他的思想是决不肯到此止步的。一个目标的完成在他只是第二个目标的开始，这年刚开始，他就指示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话只有一句，新华社的同志因为参不透他老人家的心思因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违抗毛主席指示”的批判，但是深信毛主席又要有一番新的宏图大略则是没有疑问的。

一月份，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宣布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 在会议的最后一年，即1月20日，毛主席讲了话，他一方面说到中国在各方面还落后，一方面提出中国“要在一二十年内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最多一百年……应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发达的国家”，并且一再提出共产党就是“社会主义促进会”。可以看出，毛主席的心气有

多么高，也可以看出，后来的大跃进的思想已经开始在他脑子里酝酿了。

但是，照毛主席自己的说法，1956年又是“多事之秋”，大大扫了他快快建设社会主义的兴头。 他在1958年3月19日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的说明中说：

“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部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26页。）毛主席说的国际方面的风浪就是指那年春天2月14日至25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实际上是闭幕以后）赫鲁晓夫发表的揭露斯大林的问题以及由此在东欧以至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他说的国内方面的事情是指1956年元月20日《人民日报》根据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意图起草的反冒进的社论，据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中说：毛主席在社论最后送他审阅的时候，只是在自己的名字上划了圈， 并且写了“我不看了”这四个字。到1958年1月他在专门为此召开的南宁会议上说：“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这件事他隐忍了整整一年半，在反右派斗争大获全胜以后，才找到机会出了这口气。

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凡听到或看到的无不毛骨悚然。连毛主席也第一次发明了一个词，说这是社会主义的“阴暗面”。但是毛主席是以中国的斯大林自居的人物，要他承认他以为“无比美妙”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能有这样的阴暗面无疑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他对赫鲁晓夫的报告作了两点评价：“揭了盖子，捅了漏子”，当时，今春以84岁高龄逝世的新华社原副社长陈适五就跟我说：“毛主席此刻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说毛主席“一则以喜”，是指斯大林的错误公开了，中共与苏共历史上争论的是非也可以公开了。中共受苏共的委屈也可以一舒愤懑了。现在世界上再没有人可以压在中共头上指手划脚、说三道四了。毛主席现在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了。

说毛主席“一则以惧”，是指过去历来被认为完全正确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竟是如此阴森可怖。中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不是也会受到同样的怀疑与指责呢？

可以说， 从此以后毛主席心里就形成了一个“二十大情结” ，赫鲁晓夫成了“万恶之源”。这块心病越往后越清楚。

毛主席对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是力主对斯大林要“三七开”，即三分错误，七分成绩，并且以此思想指导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写作。同时，看来也确实在探索一条比苏联较为宽松的道路。

这一点， 其实在苏共二十大开始以前就着手了。毛主席在1956年1月初召集了34个部门的负责人汇报情况研究问题， 最后在4月2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按当时人们的“觉悟”来看，可以说是充满了新意， 可是并未公开发表。现在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发表的是1975年7月邓小平为了要纠正文革中左的错误而由众位秀才根据1965年底的整理稿再作修正后，请毛主席审阅批示“同意”后的定稿，然而邓小平随即下台，讲话竟延至1976年12月26日才得以发表， 其时距毛主席逝世已3个多月了。当时的政治气氛与二十年前可称截然相反，因此文字也已与当初大不相同。不过仍然可以看得出许多十分宽松的提法：例如“你对发展重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这样的话，现在的正式文本上还保存得有一些。我自己手头还有一个听了第一次传达的记录，里面很有一些在反右以后绝对听不到的话，抄不胜抄，就举几条作为例子吧：

“也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甚至的是反革命的力量。”

“人要有统一性，也耍有独立性；要有纪律性，也要有无纪律；要有集体主义，也要有自由主义。”

“中央成立一个体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划分权力。”

“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以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反对它的帝国主义。”

“苏联只有一个党，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

对犯错误的人要看他是否改。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不要学斯大林，斯大林对犯错误的人不让改正，这是不好的。

类似这样的许多话再加上一个多月以后（5月26日）　通过宣传部长陆定一之口发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都可以使人认为毛主席在1956年上半年的思想主要是在研究如何在中国走出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路来。如果要根据事实说话，要奉行“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原则，我们只能这样说，除非以后有新的材料发现。至于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虽然还不大敢想，更不大敢说，但是在外力的影响下，在领袖的启发下，脑筋也已经开始在“动”了，或者用当时苏联流行的话说，开始“解冻”了。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传出不久，就听到胡乔木讲述毛主席的心情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这话，我们听了都很感动，看来情况大致也确实是如此。

1956年9月5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这是七大以后11年才开的大会。中间经过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又碰上苏共二十大这样的懊恼事，全党与全国人民理所当然地希望听到毛主席的声音，但是他却并没有做什么大报告，只致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辞，据说还是田家英起草的，其中的两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一直是耐人寻味而又捉摸不透的。

但是，大致可以肯定，毛主席对八大是不会高兴的，当时国际舆论的大背景是反对个人崇拜。不论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实际思想如何，也都不能不反对个人崇拜，不能不把在七大提出的与马列主义并列的“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删除。对此，重视权位的毛主席看来是难以满意的，却又处于完全无法反对的状态。此中滋味，外人无法妄测，但是有一点却可以看出来，即对于从法理上说是八大最权威、最重要的文件的大会决议，他不甚关心，更不赞成。对于其中最重要的结论：“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句话，竟视而不见，要到一年多以后才提出异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5页）四

这年十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波、匈事件。其中波兰因为党的第一把手奥哈布自动让位而完成了和平过渡。匈牙利则酿成了武力改变政权的暴乱。

据每天列席中央常委会会议的吴冷西回忆，为对付波匈事件而讨论如何写《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时候，毛主席又发展出了赫鲁晓夫“丢了两把刀子”

的思想，说得最完全的还是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了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规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21——322页）匈牙利事件对毛主席的震惊之大是可以想见的。推原其始，他不能不归罪于赫鲁晓夫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也及于列宁这把刀子。他当然会考虑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作为一个63岁的老人，也应该会考虑到自己身后的遭遇。也许可以想像，10年之后林彪说的“毛主席百年后，谁要发表赫鲁晓夫那样的报告，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计之”的思想也已开始在他脑海里浮现。但是现在，他日思夜想的是：中国决不能出匈牙利问题，决不能出赫鲁晓夫。他开始为“打防疫针”而运筹了。这就是后来说的“引蛇出洞”，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事情还在起变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5页。他在经过半年的部署以后，发出总攻击令的时候说：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

（1957年6月8日《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3页。）

就在波、匈事件紧张的时候，毛主席派林克来征求王飞和我对于波匈事件的看法。我竟不识相地提出了实行“大民主”的建议，殊不知却正好给了他老人家一个得心应手的武器（当然，以毛主席超速运转的脑袋也并不难创造出别的一个名词来）。

他在几天以后（11月15日）就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批判了我的“大民主”。但是又告诉吴冷西说：“回去不要批评他们，他们是好同志”，又说“这不是几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思潮”。我当时浑浑噩噩，不以为意，后来当了右派再回想起来，却觉得其中大有文章。大家现在都已知道，整风和反右实际上是一回事，毛主席决定在1957年整风，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宣布的，并且说“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6、328页）这些，都别有深意。所以我的体会和判断是：毛主席引蛇出洞的战略部署起意于八届二中全会而决策于省市委书记会议。前后过了一个年关，跨度近两个月。这也符合毛主席历来作重大决策的习惯，所谓“草鞋没样，边打边像”。

在此以后到6月8日近5个月干的事就是“安排香饵钓金鳌”了。

其实，毛主席自己倒也并不讳言这一点，他在反右大体告一段落以后在1957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就说：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所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么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5——476页）。

说实在的，最早提醒我这一点的是王飞。他在和我一起受到批评后，就一再对我说：“我们闯祸了，犯错误了”，叫我少说话，多注意，无奈我冥顽不灵，觉悟太低。现在王飞已是82岁的老人，患老年痴呆症有年，写好此文，再要向他请教也已不可能了。

五

1957年6月8日一声令下，全国形势就一变而为到处抓右派。毛主席一改三个月以前的到处游说，而以统帅的身份坐镇中央，指挥若定。

《人民日报》社论与党内指示一篇接一篇，要求深挖党内右派、文艺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司法界的右派……。有人比作"十二道金牌"，有人比作"五日一小批，十日一大批"，战斗一年，挖出了55万右派分子，比毛主席最初估计的4000人多了百倍还不止。许多运动初期的积极分子，到后来竟也一样成为右派分子。毛主席真是铁面无私。

其实，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就可以说是是大获全胜。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说"基本群众在我们手里，军队在我们手里"，几个知识分子岂止不是对手，而且一上来就只有求饶的份儿。可是毛主席不依不饶，非要他们"缴械投降"不可。可怜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械"又如何"缴"，只好搜索枯肠，挖自己的反动思想，这就是聂绀弩的名句"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椎心坦白难"的由来。许多自杀的右派分子就大多是实在熬不过这一番折磨而不得不"自绝于人民"的。我在自己成为右派以前还听到传达说，章伯钧"叩头如捣蒜"。其实，章伯钧的头脑要比许多人清醒得多，他在储安平被批斗以后，还说过"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无奈他是处在一个完全封闭的体系之中，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除非自杀，也只好"缴械投降"了。毛主席的江山真是铁打的江山。

反右斗争开始不到两个月，毛主席就给它做了结论：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可能有领导权，因为他是敌人……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在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61——462页）。

瓮中捉鳖，虽胜不武！但是毛主席不管这一套，他的自我感觉又回复到两年以前了。党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在反右运动中不知是由于谁的发明创造，又加上了"绝对"两个字。"绝对领导"的说法从此风行了二十多年。他现在又是无可争议的、万众膜拜的伟大领袖了。年初是他自己宣布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结束"，到年中他就发动了一场规模更大，程度更激烈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一切都按他的

神机妙算进行。他的一个信念是：阶级斗争的胜利还可以大大促进人民战天斗地的积极性，后来的“抓革命，促生产”就是从此来的。他现在可以来对付一年半以前针对他本人的、反“冒进”的倾向了。1958年元旦刚过就发出通知， 1月11日就开始在南宁开会， 着重批判1956年6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毛主席说它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吴冷西《忆毛主席》第49页）有了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打底，南宁会议当然是势如破竹。毛主席批评“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被批评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主要是周恩来）连检讨都不知道该怎么做。真是好一派“一鞭在手矜天下，万众归心吻地皮”的气象。

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提高了毛主席的雄心壮志，直接孕育了大跃进。以后就是农业大放卫星，工业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红遍全国。大跃进的失败给毛主席平添了猜疑恐惧，不但直接导致了反右倾的斗争，而且促使他到处搜索“躺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终于在1966年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过这些都是中国历史的下一章了。

总之，从1957年的反右派开始，中国开始了20年的极左路线。一直到毛主席在1976年逝世才大体结束。

大跃进的出现是同反右派斗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毛主席到底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增加了什么东西呢？ 恐怕还是只有“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个新名词，所以林彪才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称作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

六

被毛主席认为“一万年都会有” 的“人民内部矛盾” 曾经牵动过许多人的心（其中不少人后来“堕落”为右派分子），甚至许多外国人的心。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对抗性的阶级斗争过去了，在马列主义哲学中永远不会消失的社会矛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变成了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也有了必要与可能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新质的矛盾了。就因为这个命题的提出，毛主席的威望提高到了空前的程度。所谓“两党制”、“两院制”、“文官制度”、“同人办报”、“司法独立”、“无罪推定论”……这些“最臭的臭屁”、“最毒的毒草”，实际上都是在对毛主席无限

信任的前提下放出来的。中国人民中最有头脑、最有理想的一部分，也就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志士仁人”，内心想的是，革命政权可以改变为法治政权了，中国从此可以走上民主化、现代化的长治久安的道路了。其中有的人甚至天真到希望毛主席可以利用他的威望与经验带领赫鲁晓夫、铁托、哥穆尔卡……走上一条正常化、民主化的道路、使马克思的理想进一步实现。

但是这些人实在是大错而特错了。毛主席在1957年7月1日给《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得明明白白：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6页）反右斗争是怎么一回事，已载入历史。但是“人民内部矛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第三个里程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增加了哪些新东西呢？

“人民内部矛盾”并没有摆脱阶级斗争，毋宁说是强化了阶级斗争。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以后，人们的普遍慨叹是“过了一关又一关，关外还是山连山。”

唯一有点新意的是，通过提出“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发明了不以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划阶级，而以思想划阶级的理论。到后来实际上就是以附和还是不附和毛泽东思想作划分阶级的标准，前者就是无产阶级，后者就是资产阶级。这就是文革中出现许多“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的原因，虽然真正敢于“反对”的人是几乎没有的。这一点可以算是毛主席区别于“斯大林的教条主义”的地方。

原来，自从苏联在30年代初在城市消灭资本主义，在农村实现集体化以后，社会上就又有工人阶级、集体农庄庄员和劳动知识分子三个社会集团，在理论上已不能再说还有阶级斗争了。但是对斯大林的反对还是层出不穷（作为中国人，我们实在无法判断是真的“反对”还是只是斯大林自以为的“反对”）。因此，斯大林只能把这些“敌人”一概定为外国间谍或其同谋。一旦定罪，往往处以极刑。毛主席则别立新义，认为知识分子在世界观上是资产阶级的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对立的，因此可以成为敌对分子。当然批判、斗争都是必要的，但是他一再声明这些人“不是特务”，因此“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些就是我们经历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实践的人唯一能捉摸出来的特点了。然而这一点，照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里说，起源于延安时代，也算不得有多么新鲜。

基于这样的理论，右派分子虽然是人民的敌人，戴上帽子即成为不可接触的贱民（或者如毛主席所说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但是原则上倒确实没有被枪毙的。这点真是要感谢毛主席的如天之仁。后来的反右倾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也大体如此。稍微有点特别的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竟被戴上了“叛徒、工贼、内奸”三顶帽子，这大概是因为有“特殊需要”的缘故。其他如彭德怀、贺龙……等无数的人虽然都是被迫害致死，到底没有像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那样“明正典型”。张志新那样的人则属于鲁迅所谓“暗暗的死去”。这些要算是沐“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的深恩厚泽了。

1952年，毛主席也曾跟着赫鲁晓夫批评过斯大林“在阶级斗争消灭以后仍然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的错误（《关于无产阶专政的历史经验》）。但是看来他后来也并没有逃脱斯大林立下的榜样。

至于斯大林和毛主席关于斗争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两国社会的破坏性影响到底孰大孰小，那只好由后人去细细比较研究了。

应当说，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里，司法独立的国家里，本来就用不着什么“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理论。

它纯粹是多此一举，无益而有害。

七

说反右派运动是“中国的大逆转”是极有道理的，但是这只是一般人的看法，而不是毛主席本人的观点，恰恰相反，在他看来，他晚年的理论与实践毋宁是他毕生革命理论与实践的直线发展。

怎样看待1949年到1957年近8年的中国？

有许多书说到，党在这段时期也犯过各种“左”的错误。他们说的都是事实。

但是如果对这段时期有一个大体平衡的看法，那就应该说这是中国近百年来最平稳安定的时期，一切内乱外患都结束了。人民的生活绝大多数可说是温饱无虞。“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政策，虽然种下了后来“吃大锅饭”，养成“懒汉刁民”的根子。但是比之中国大地上百年未能平息的战乱来，却要好得不能比。普遍享受的公费医疗与劳保待遇使无

数旧社会过来的工人职员感激涕零，说“以后不怕老了，不怕病了”。有人以亲身经历对比当时中国人民的生活要比战后的日本人为强。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打退了美国兵，这是以前想都想不到的事。一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使饱受屈辱的中国人热血沸腾，矢志效忠新中国，许多人不顾一切从海外奔赴祖国。确实，农村与城市运动不断，也有不少人受到伤害，但是每次运动到末了都有甄别平反（从反右以后就再也没有甄别平反了）　。总的来说，在人口有6亿之众的中国，实际无故受到伤害的还不能算多，而且按照全国人民刚开始学习的新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新鲜理论，至少许多与自己无关的人也还可以以“难免论”来譬解。当然，这期间，还有两大冤案，即都是毛主席亲自定的潘汉年案与胡风案，但是前一案件基本不为社会所知，后一案件牵涉虽然较广，但是在全国人民中，即使在知识分子中，也毕竟只占极少数，而且既然是伟大领袖亲自定的“反革命小集团”，群众基本上也只有信服的份儿而没有多少牵涉，更不用说老百考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虽然在做经济工作的同志眼中看到有不少问题，但是在毛主席看来却纯粹是伟大的胜利，在中国历史上，哪里有过这样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水库铁路的修建，钢铁棉布的增产都是没有听说过的。应该说广大群众的估计与伟大领导领袖的估计相差也并不远。我们这样三十多岁的青年人都在等待及身亲见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了。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报告使听到的人毛骨悚然。但是，人们一方面庆幸中国在毛主席领导下还没发生这样的事情；一方面还庆幸苏共给中共以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敲起了警钟，我们可以避免这样的祸害了。

但是，反右派运动改变了这一切。从1957年的6月8日开始，在“人民内部矛盾”

的名义下，中国的阶级斗争绵延20年不绝，一批又一批的人，越来越多的人，直到党的副主席、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都以“中国的赫鲁晓夫”的身份被迫害致死，毛主席声言可以避免的“全国性的、长期的、严重的错误”竟成为事实。到他离开人世，亦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受文革直接间接伤害的人竟上了“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远远落到了三十多年前被中国打败的日本的后面，甚至落后于所谓亚洲”四小龙”（其中还包括作为毛主席手下败将的蒋介石统治下的台湾）。

解放初期，毛主席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经验的时候曾不无得意地说：我们是“似慢而实快”，后来的二十多年实际上成了“欲速则不达”了。

这个“大逆转”已成为历史的事实，是1978年以来的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共同承认的事实。

也许，毛主席发动的反右派运动还推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向前发展，它打击了赫鲁晓夫开始的对斯大林的批判，也阻碍甚至扭转了他开始的改革。毛主席还以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及他超英赶美的豪言壮语刺激了苏共二十一大提出要建设共产主义的口号，结果当然不可能成功，又反而引起毛主席的讪笑，《九评》的最后一篇就是批评“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的。

但是，在毛主席的心目中，他是不会承认有这样的逆转的。反右以后，他的心气越来越高，他的平生大愿逐步实现，而且实际上处于大发展，大跃进之中。从三面红旗到三个世界，从不断革命到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也许只有到临近生命终了的时候，他老人家才感觉到有点不大对劲。这一方面表现在他对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估计越来越长上（从几十年到几百年）；另一方面表现在他的最后讲话上。“我平生干了两件事……一件事赞成的不少，反对的不多；一件事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只不知道他老人家有没有意识到造成这样的变化的关键就在他1957年的“引蛇出洞”上。

八

回头来看，毛主席的悲剧在许多前现代的国家中其实并不少见。一种没有任何制约的权力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中无限膨胀，只有“死而后已”。这实在是“理有固然，势所必至” 洞使在当今的世界上，这样的国家也还有，只是没有中国、苏联这样的大国，因此造成的灾祸至少在规模上总还比不上毛主席而已。

据胡乔木说，毛主席曾“认为自己就是中国的斯大林”。（《胡乔木文集第二卷》 第147页）毛主席晚年的命运也确实最近似于斯大林，他们都曾领导过亿万人民，受到过亿万人民的爱戴，他们统治下都不乏聪明智慧的人材而且后者都曾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都曾对他们“进尽忠言”。但是他们自认为、甚至被认为天才盖世，然而却甚至不能理解比较自由的环境中一个普通公民的常识，而一概打击之为毒草，为牛鬼蛇神，为人民公敌，制造了无数的人间悲剧。究其原因，抛开他自己好像洞若观火的空话大话，其实只是对一个“权”字迷恋上。至少在延安整风确立了毛主席一贯正确的地位以后，尤其在1945年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以后，他的权威和威权就是绝对不容怀疑、不容挑战的

了。

有不少事实足以证明他对权力的敏感：1948年，吴晗到平山请毛主席对他写的《朱元璋传》提意见，毛主席就把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公认的朱元璋残酷暴虐的一面说成是为巩固其权力之所必需。1957年，毛主席在自己的卧室里批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没有积极组织鸣放为“死人办报”。同时又说“我看你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这些都证明了毛主席确实是像林彪所说的念念不忘一个“权”字。他自己知道这个权得来不易，因此抓住了就决不放手。如果也稍有放松的时候，那是有意的，为的是好更牢牢地抓回来。其结果，不但害了国家、社会、人民，也害了自己，当然在他这样一个唯物主义者来说，那已经是“身后是非谁管得”了。

1956年苏共二十大刚结束，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传入中国以后不久，后来被定为“右派报纸”的上海《文汇报》就急忙组织人翻译了久居苏联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的《斯大林时代》，在报上连载发表，一时反应强烈。据吴冷西传达，它也引起了“中央”的兴趣，“大家”特别注意她引用的英国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使人腐化”，遗憾的是，他老人家自己最终也没能逃脱阿克顿的论断。

在阿克顿的故乡与许多国家中，专制统治的毒害经过反复的反思已经建立起一套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了。无奈我们中国离这个标准还太远，至于毛主席本人虽然总说“权力是人民的”，但是实际上他就是“人民”。至于别的想法，与其说他不可能懂，还不如说他不愿意懂。连刘邦都能听得进去的“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这样披肝沥胆的忠言，他都视之为右派的“猖狂进攻”。他的理论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刀枪不入的体系。

这篇文章大体上也还是按照中国式的也就是毛主席式的思路来写的，譬如“人民内部矛盾”本来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理论，唯一可以讲得通的就是如有些右派分子以为的那样，它是由革命政权转为民主政权的标志。然而这却正好是毛主席反对的。我们也不得不为此而费了不少笔墨。要真正理解和解决毛主席的问题，必须完全跳出他那自我循环的理论，但是那是另外一篇文章的任务了。

这个历史的逆转一直逆转了20多年。到80年代中国又开始要走现代

化的道路的时候，莫说社会风气的衰败与人民的道德水平的下降都已不是1957年可比，尤其可惜的是：我们永远失去了中国上百年来用血汗与泪水培育起来的一批明达之士。这个损失不知要多少年才能弥补上。

文章写到这里，应该可以结束了，但是遗憾的是，“引蛇出洞”这四个字，我竟至今还没有找到出处。我的印象是：反右开始以后不久这个说法就已流行了，而且好像并没有什么忌讳。有人说这话是毛主席自己说的，所以大家才敢说。事实上省委书记一级人物同类的说法倒不难找到，不过这就算不得“第一手材料”了。看来只有等将来档案解密以后，未来的史家再去努力。义山诗不云乎：“武皇内传分明在，莫谓人间总不知”。

1997年9月，被划为右派40周年初稿1998年8月，最后修改定稿

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储安平

储安平在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的发言中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储安平与“党天下”（节录）

戴晴

六

[谋]①计策、计谋。《书·大禹谟》：“弗询之谋勿庸。”《三国演义》：“某与吕布同乡，知其勇而无谋”……②图谋、营求。《左传·宣公十四年》：“贪必谋人，谋人，人亦谋己。”谋略：计谋策略。《三国志·吴志·陆逊评传》：“予既奇逊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

——《辞海·1935年版》

在1957年春天的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分别会见各界人士。在与新闻、出版界人谈话的时候，他老人家突然转向光明日报的代表，问道：是不是共产党员？

那次出席谈话的是总编辑常芝青，他站起来，说：是，是共产党员。毛泽东说：共产党替民主党派办报，这不好吧！此时是3月10日。

考虑到毛泽东是伟大领袖的同时还是伟大的谋略家这一事实[1] ，很难断言他那时究竟是确实不知道光明日报由谁人主编，还是明知故问。因为，第一，光明日报向来就不曾由非共产党人士编过，后离任的前两届主编胡愈之与邵宗汉，都是身份不常而不是从未公开的CP；第二，早在9个月前，在他《论十大关系》讲话之后，中宣部就已经在紧锣密鼓地活动着，为光明日报物色总编辑。在这个讲话里，毛泽东已经预见到一年后的局面：

[1] 李维汉有一段委婉而精彩的论述解释为什么谋略会伴随毛泽东一生（起码是1927年或1935年之后的一生）：毛泽东同志一生几十年都是在战争和斗争中度过的。对于战争，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政治上同反动派斗争（此处的“反动派”，或许应包括不同阶段的、本营垒内的政治对手，如张国焘、王明等。——笔者）。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和策略同样非常英明，可以说运用自如、得心应手。这些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对他脑子不能不发生影响。

现在我们国内是民主党派林立，其中有些人对我们还有很多意见。……形式上没有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实际

上，这些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就是反对派，在外交、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要改善。

我们要让民主党派人士，谈出自己的意见，只要说得有理，不管谁说的，我们都接受。

要说话，总得有块地盘（大众传播媒介）。那时还没有《世界经济导报》，也没有《现代人报》，不知谁首先想到了光明日报[2]，而且是非共产党员办的光明日报，于是开始物色主角。本来；第四届总编辑的第一人选是徐铸成。当时，这位倔脾气的老报人正经历着他那份缘抗日而创刊的文汇报的第三次停刊；第一次是在1939年，被日伪停掉的；第二次是1946年，国民党停的，这在前一节已经说到；第三次停在柯庆施手里，时间是1955年，公诸于世的名义是"自动"。

[2]　后来，又想到何不让文汇报复刊？于是文汇报1956年10月复刊。这两份报纸，在1957年春均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夏天以后，则作为"资产阶级方向"的代表，受到首当其冲的批判。

1956年夏，徐铸成正带着他文汇报的原班人马，北上首都，在与柳湜、叶圣陶（这两位是当时的教育部长）和谐的合作中，轻轻松松地编着一张周二报纸《教师报》。姚溱找到他。

"喂，心情怎么样？"这位当年的宣传部副部长问。

"很好，很惬意。你瞧，住在乡下，有一部小车，没事就到处玩玩。"

"嘿，昧心之论！你这人一辈子办报，现在一周两张的专业报纸，你过得了瘾、安得了心？"

"的确安心。既然说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文汇报停就停吧。现在教师报对我不错，就安心在这里做了。"

姚溱不再与他打迂回，单刀直入解释形势：光明日报决定完全交给民主党派，章伯钧仍任社长，常芝青撤离，中央的意思叫他接任总编辑。面对这足够诚恳的交底，徐铸成也以实言相告：

"做事总要有一个班底，不能一人唱独脚戏。现在我的人马都在教师

报，让我光身一人去上任，这台戏唱不了。”一再谢绝。

“好，那就不勉强了。”姚溱说。

徐铸成拒绝了，中宣部开始进行第二人选方案。这次是乔木出马，亲自登门征求储安平的意见。

虽然又同龄又是小同乡，与他这位被封过三次的同行比，储安平是“嫩”多了。

英国派头的他不认“班底”说，也不以“上无常操”，或者“上下一日百战”为然，那是上百、上千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有政协吗？有宪法吗？他只认Fairy Play。他不用拉拢谁，也不用提防谁，包括，比如说，常芝青。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天真，令人心恻。

在谈话中，乔木特别提到《观察》，提到他成功地编这本刊物的时候，联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希望将来主持光明日报，与这批旧朋友还要多联络，鼓励大家多写文章、多说话。乔木接着还特别补充说，过去工作上的助手也可以考虑邀些来帮忙。

虽然出自Prf．Laschi之门， 安平毕竟是中国人。他潜在的虚荣心、他对“三顾茅庐”之恩德的顾念，再加上他1949年之后实质上的不得志，都决定了他的欣然受命。乔木接着的作法也是颇具人情味的，先安排他到青岛去度蜜月（此时正值他鳏居10年之后的第二次新婚）：

“把新疆的采访写完，上任的事以后再说。”乔木亲切嘱咐。

他去了， 并在海滨写作， 直到秋天。1956年11月，他收到章伯钧的信，称经“各民主党派公推”，请他出任光报总编。他于是也一本正经地复了信，表示接受。

今天可以肯定的是，这“公推”显然不过走走形式而已——中国八大民主党派近40年历史，类似的形式不知走了多少——但这次，应该说，“策划”与“走”的双方，都没有丝毫恶意，虽然这已成的局面并不是人人都满意的——这点，储安平当时就有了察觉：

我当时有这样一个感觉，章伯钧并不欢迎我作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对我的态度是很冷淡的，我和他过去太没有私人渊源，而党的推荐我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也不好拒绝。

读者在这里可将储与胡、章二人的亲疏作一个比较。遗憾的是，在后来的斗争中，他主要罪名之一竟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章罗联盟骨干分子”。

1957年初，按照乔木“联络老朋友”的指示，他去了一趟上海。从他后来所作的交待看，一到上海，就去拜望徐铸成。

当时，文汇报奉中宣部之命复刊已近半年，那场著名的关于电影的争论，正闹得火热。当时，宣传工作会议虽然还未召开，“双百”的提法已经传下来。徐铸成很兴奋， 但也有不少疑虑。两名小同乡都不再提10年前之嫌，反复切磋这8个字的含义。此时正主持着一张报的徐铸成处处显得比较保守，而即将接手另一份大报的储则“冒”得多了。他不同意“争鸣”只限于学术界，觉得应该扩展到政治领域，鼓励大家多讲话。他断言：“百家争鸣是全面的，电影讨论只是一个局部。如果电影都不能谈，还谈什么百家争鸣？”

读者在前面已经知道储安平办观察的劲头，对他在此刻所作如是说定觉毫不足奇。有趣的是直到30年后，在1986年一次软科学的闭幕式上，当一位开明的中共高级干部将此观点再度明确提出时，与会群众竟欣喜若狂，于是引出郑重的否定与又一次的再否定，直到今天尚未了局。

当时，储氏新的出任已在上海传开，原光华同学决定聚会作东请他。据赵家璧回忆：晚饭约在7：00，大家左等右等，等到9：00这位老学友才匆匆赶到。坐定之后，没吃几样菜，就被一部小车接走了——其红火与煞有介事至此。

几乎与此同时，在1957年那乍暖还寒的季节，毛泽东为说服党内接受“双百”

的“亲莅巡说”，也正在紧张运行中……先是在9省市宣传、 文教部长座谈会上，而且开宗明义就谈到今天谁都不大敢碰的“言论自由”：

有选举权的，宪法就规定他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得让人家讲话。我可以批评他，他也可以批评我，这就是言论自由。有人间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批评得倒，也该倒，证明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没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应该再放。

接着和文艺界人士谈话。当时有一种风气，一篇文章的好坏，不看文章本身，只看“上头”对这篇东西的态度。在那次会上，大家很想摸摸主席对陈其通等四小“左”的态度。毛泽东的反应干脆利落：说我说陈其通四人的文章是好的，真奇怪，我说是要放的么！

当时显得最为开明的康生立刻为这句话作注：“这是他们对‘双百’政策有怀疑。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正适合他们的胃口。”

在与新闻出版界谈过话之后，又会见高等院校校长，开场第一句话即为：马列主义从来就是主张百家争鸣的。

这位巡说人接着去了天津，这次是对党员干部：对百家争鸣没有信心，对百花齐放怕放出毒来。我看完全不是这样。

若采取压服的办法，不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看没一样不可以批评的，只要谁愿意批评。什么人怕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蒋介石那样的法西斯主义。

三天之后，老人家又到了上海。这里有他的好学生柯庆施。而且下面这番话，就是在柯庆施主持的会上讲的：

同知识分子问题、科学艺术问题有密切的联系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的问题。关于这个方针，我们还需要在党内作许多宣传解释工作。有些同志觉得这个方针太危险了。百花齐放，放出些鬼来怎么办？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人说，“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和我们长期共存？还是短期共存吧！”“我监督你，我还用你监督呀？你民主党派哪年打的天下？”所有这些意见都是反对我主张收。

中央认为主张收的意见是不对的。……不但在纯粹的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说话。

接下去到了南京，会见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的党员干部。此时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

没有谁能否认，在这一连串的会晤中，毛泽东雄才大略、博闻强记、风趣幽默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至于与会的大多数，如果不看他们毕恭毕敬的迎送，不听他们当时报以的掌声，仅从他们四个月之后的作为来反观，当时多半只有跟着傻听傻乐的份。

与这轻松融洽的气氛相对照，对人民日报的批评显得分外严厉。除了上文所引“死人办报”外，还有：

宣传会议未登消息是个错误。这次宣传会议党内外人士合开的，为什么不登消息？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

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省委书记会上为什么听错了？这叫“各取所需”。最近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中央开了很多会议，你们参加了，不写，只是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如果继续这样，你们就不必来开会了，谁写文章叫谁来参加会。

在这一阵紧似一阵的批评中，毛泽东提到了光明日报：对当前政治情况的讨论，光明日报连发了几篇，都是当前重要的政治情况（如“为放而拿”），这些情况编辑部应该讨论。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徐铸成朝见毛泽东时的那番景象，也就是本章开头所说的那次会见。这次没有储安平，但常芝青与邓拓都在场，显得特别受冷落。那次会见，徐铸成迟到了。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听到康生的介绍，老人家立即伸出大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就是徐铸成同志？你们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乌虫鱼应有尽有，真是放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功夫再翻翻别的报纸。”

当时徐铸成正被上海市委“反击”得心灰意冷，听到主席的这番赞赏，“我心中翻起热流，感到无比温暖幸福。”

这时康生宣布，有什么问题要主席回答的，请提出来。

徐铸成赶紧揣出他心中最大的结：“宣传双百，心中无数，抓紧一点还是松一点，该怎样掌握，请主席指示。”

读者此刻应该注意的是，毛泽东曾经考虑到“鸣放”的高度和深度，徐铸成此时根本没有触及，更不必说提出诸如民众对权力机关的监督与批评等等了。他只是向党中央主席请教，如何更好地宣传中共的方针。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只讲了一番片面性的问题。在说到鲁迅、李希凡、王蒙等人都有片面性之后，突然说了一句：“我看姚文元片面性比较少。”那时姚是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名干事，在座的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但这位小姚不但被特别指定到北京参加会议，还受到这样的当众称赞，足见毛泽东要培养自己得心应手的理论家的心愿在那时就埋下了。历史已经证明，姚的文字果然在后来的每个关键时刻，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徐舍不得放过机会，仍旧追问：“我体会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政治思想上说，是征求高价的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说的不对慢慢再说清楚，不要一下子压下去？”

他在这里并不敢强调严正的批评（如马寅初的“人口说”）对党对国之宝贵，只问说错了能不能不压，而且限定了政治思想领域。

毛主席回答道：“你的意见很对、很好。”

徐依旧不放心，举出因电影讨论而遭围攻的实例，追问：“请问主席，这时我们应该怎么应付？”

徐铸成不愧老资格报人。他的这个问题之足够咄咄逼人，不在语气，而在回答者无法用含混的语言大而化之。毛泽东当然不会被问住，他在几乎不能回避的时候还是避开了：

“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这场讨论写一篇小结，批评及反批评的小结，这就叫正、反、合，这就叫辩证法嘛，你同意不同意？”面对如此玄妙、又如此高屋建瓴的答案，徐铸成还能说什么呢？他于是点头称是：“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

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预告了共产党的整风：“要用小小民主的方法，就是小民主上再加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先整共产党。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装腔作势，他们没有本钱，又要做官，不摆架子就不行。”

毛泽东下面的一番话很难不令人感动。他诚恳地交底，说他的思

路："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谈话，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去年已经讲了几次，后来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陈、马他们的文章，想到会有人以为他们的文章是代表中央的意见，因此觉得有好好说说的必要。"他承认共产党的拿手好戏是打仗、专政，"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全国性办报没有经验，办学、搞出版、科研都是这样，现在是外行领导内行。"他并且嘱咐："开会的时候，就是要党内党外的人在一起，共产党不要关起门来开会。"这不可能不给人以党内党外不分彼此亲如一家的印象。

4月30日，毛泽东落下了他这场伟大的战略布署中最后的也是最浓重的一笔。

那是"五·一"节前夕，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亲自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大家帮助党整风。他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宣战。"

他还着重号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并责成专人就民主人士的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问题专门开会征求意见。

这次时间地点选得可谓匠心独具：春天已经到了，第二天就要过节，伴着巨大的红灯笼，被告知以"阶级斗争结束"：想来也只有在这样的气氛中，毛主席才会亲切地使用这样的字眼——这字眼后来传到我们主人公耳中，又从他口里说出来，成了十恶不赦、万劫不复的罪行："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

"五·一"节之后，再未见毛泽东出来。用今天的眼光看，颇似临战前短暂的寂静。

※ ※ ※ ※ ※1957年4月1日，储安平正式上任。完成这一形式的，正是对他"不好拒绝"的章伯钧。请看他自己的回忆：

上午9:00，章陪我去了光明日报，到了报社，各部主任都在欢迎我们。

章伯钧说："我把储安平同志带来了，他是一个作家，增加了光明日报很大的力量。"停了两三分钟，他又和别人闲聊了几句，坐了五六分钟，他就先走了。

接着当然是新任总编致辞。储安平此时抛却了1946年办《观察》时

的作派，不再强调自由、民主、进步、理性。他开场的一番话至今光明日报的老职工都记得："我到这里来工作，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他们还记得，在后来的编辑部大会上，他也一再重申："李维汉部长曾对周扬部长说，以后若是有人批评储安平先生，你要为他撑腰。"

他开始上班了。那时，共产党支部在光明日报的活动是地下的，组织生活总是在下班后进行，而且是在常芝青家。但民盟的组织生活在报社内完全公开。4月9日，储安平回娘家一般地参加了民盟支部的组织生活，还发表了讲话：4月1日来时，心情很平静而从容。和大家相处如家人感觉。为什么？

是否胸有成竹？是否有大政方针？是否拉了多少稿？是否摸了底？我却什么也没有。只准备和大家商量。受党的教育要表现在行动中，并需以诚意待人，向人学习。

在讲了对这张即将接手的报纸的印象之后，他又说了一番其实不该在这种场合说的话，后来都成了揪住他打个不停的辫子。不能说他对这种"受命于非常时刻"

之凶险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但对凶险将来自何处显然估计错了地方：我有信心，但不可能无困难，这是规律。民主党派多，一定要挨骂。

我们要估计到这些困难，做得尽力，骂也不怕。

办报就在风浪之中。是否符合事实，风浪也不怕，要登。要精神，要沉得住气。

接着，他开始一一拜望各民主党派的宣传部长和大学里的著名教授。前者属于例行公务，如民进的冯宾符，农工的严信民，民盟的罗隆基、萨空了，民革的王昆仑等等。后者当然都是一些声气相通者，包括数十年旧游：袁翰青、金克木、杨人楩、费孝通、钱伟长、彭子冈、王恒守等等。这些人后来当然也一个不漏地同时被激发起来，又同时遭到反击。就在这前后，他开始与编辑部的同人交谈——在不到三周的时间内，他"见了94位同志，其中26位是个别谈的"。虽然这在后来也成了罪行："施展卑鄙伎俩，企图从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这个环节上来拉拢、收买青年，篡夺党的领导，为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准备着后备力量"，不过，这种干劲，在光报创始至今的十多位总编辑中是绝无仅有的——当

然，这也有说道，“反革命热情高涨”云云。汉语的遣词与思维逻辑到了这个份上，真该是“无声胜有声”了。

当时，常芝青还未撤出，作为原任，储安平对他起码在表面是很尊重的。比如第一次向社长章伯钧汇报工作，就是在与常及总编室主任高天充分商量并取得一致意见之后。但此时他一定感到当初勇气十足的单枪匹马上任是有些唐突了。这感觉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毛主席共产党这种宏大的气势面前，他的班子有点力不从心，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也是他后来最大的罪状之一——“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党）鼓励大家鸣放，而光明日报在鸣放的报道上落在后面，”费孝通当时是这样描述他的：“很起劲，把光明日报看成他办的企业”。

他开始拉人。首先盯住的当然是大公报，他就商于常芝青，能否在保证光明日报领导层有4名共产党员的前提下， 请王芸生在这要紧的时刻帮一把。然后是亲自出动拉人，为光报拉有学问、有能力、有影响，还要有色彩的人。最先盯上的是潘光旦与费孝通——他这时肯定已经完全忘掉费先生50年代初在他的复刊的《观察》上发的那一串既无学问也无色彩，而且自己决不会将其选入文集的那些准垃圾，他更看重他真正的人，而不是作给人看的人。他向他们交待政策——“政策”是储安平之流说了算的么？这实在滑稽，也实在堪怜——拉稿，责备费先生不该把《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那样的好稿给了人民而不给光明。他计划给费专辟一个专栏，甚至要将费调到光明日报社，已到问费一个月拿多少薪水的程度。

他深感光明日报缺乏笔政人才，罗隆基向他推荐陈新桂，说这是民盟总部干部中理论水平比较高的一位。储进一步打问此人为人作风如何，是不是容易共事。罗隆基说：“这一点要说清楚，陈这个人很直爽，有话就当面说，不顾别人的面子下得了台下不了台。”这种特色（或称缺点）储安平绝对不在乎的，但章伯钧不同意，只得作罢。后来事态发展证明，陈新桂确是一名干才。他的言论与态度，仅从57年暮春的版面上看，如果不是最突出，也仅次于章乃器。反击时那些常用的词对他都失去了效用，只好给他套上一顶无可无不可的帽子“荒谬绝伦”。

他还曾与章伯钧多次权衡，能不能在社委会之下设个常委会，要么多设几名副社长？他还想成立社委会的顾问团和编辑部顾问组……尽管时刻想着“分寸”，想着各种势力的协调——这实在够累人的，而我们中国人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这上面了——他的急切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简直到了不避嫌的程度。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他的这些想

头，没有一个兑现，包括他带着几乎孩童般的快乐执意要发表的钱伟长夫人与周培源夫人推荐来的一篇小品文《公开征求拼音专家，请将左文译成拼音文字》[3]。储安平直到辞职的时候，还是单枪匹马一人。

[3] 这篇征求译为拼音文字的小品文的标题是《施氏食狮史》：石室诗士施氏嗜师，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氏适市，适十硕狮适市，是时氏视是十狮，侍十石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试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食时，始识是十硕狮尸，实十硕石狮尸。是时氏始识是实事实。试释是事。

5月7日，在向章社长作了全面汇报的基础上，他第一次在编辑部全体大会上公开他的改进报纸工作的几点意见。

首先，他提出在新的政治形式下要更进一步把光明日报办成名副其实的民主党派报纸。

怎么办？他提出双轨。一方面团结、组织和联系全社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另一方面努力反映民主党派成员的意见和要求。他认为，“光明日报应该成为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讲坛，要创造条件主动组织推动他们对共产党发言，从政治上进行监督”。布置要闻部的工作时，他要求他们多“搞人民生活（物价等）问题的报道，要主动去发掘，体现政治监督，代表普通百姓讲话”。或许是在与高级编辑人员谈心时，他曾发表过“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许登”一类评述。可以认为有所指，也可以认为是一般议论，到后来都被原封揭发出来，令与会者个个义愤填膺。

对他的办报方针的批判是严厉的，已没有丝毫可回护的余地：全盘否定党的领导下的成就，怀着重大阴谋，实践一套完整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办报路线。至于双轨，那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他要搞的当然是单轨，是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的另一条轨道。

应该说，储安平提出的种种方针，不会是他信口开河，老实讲也没有多么了不起的独创性，　其内核，主要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在4月里召开的第七次工作会议、在这个会上，李维汉明确提出，“贯彻‘放’的方针，鼓励党外人士唱对台戏”——后来这一精神衍化为让光明日报与人民日报唱对台戏。李维汉做人一生唯谨，很难想象这种字眼会由他首创。遍查文献，终于找到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过，这种严肃又戏谑的话，还是出自毛泽东。但李维汉的态度是明朗而坚决的，他坚信“对民主党派实

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一个根本性的安排。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赋与的权利义务范围之内，享有组织独立、政治自由和法律面前平等的地位，不仅是党的政策要求，而且是宪法赋与的权利。”而且，作为一种信条——如果不说是策略的话——从理论上讲，　他也并没有改过口。不仅在1957年4月间如此，就是到了夏、秋，乃至到了他口授自己的回忆录的80年代中，也是如此。不幸因为汉语的无比丰富以及多义性，上面的一段话，在不同的局面下，是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的。

接手光报，储安平最拿不出办法的恰恰是他最看重的社论；对此，他曾向各民主党派宣传部门彻底交底：

就现在情况来看写社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光明日报过去的社论，一种是数条，四平八稳；再一种是说共产党的好话，歌功颂德。批评监督的社论没有，要写批评监督的社论，必须社务委员会支持。光明日报的婆婆多，八个民主党派是八个婆婆，民主党派有几百个中央委员，是几百个婆婆，一个婆婆一个看法，就很困难。因此，必须社委会授权。在没有授权之前，只能用个人名义写这方面的文章。

此外，对于始自延安新华日报改版，而降至1957年甚至降至今日都不惮其迂的“问题写作”，也成了他“改进”的目标之一。对于报纸通过“搞问题”而指导工作，他并不是不知道，但他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已有所不同。特别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后，鼓励大家独立思考，对报纸指导工作的要求已经减少了。”他对报纸的理解是：“我们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对于重大问题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他的底气似乎太足了点：“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

那么，他此刻是不是不再认为“（共产）党是我的后台”了呢？应该说并不是。

笔者甚至倾向于认为，　自1949年至今，很少有谁的言行不认为“党是我的后台”

吠比如读者诸君正在读着的这篇文章的写作与发表，就是“党是后台”的直接结果。

问题党不是一个人；就算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死了的人；就算是死了的人，也总有不止一篇白纸黑字的文章留在世上。储安平太相信党

对他作为一个囫囵个的、有思维与创造能力的活人来相信的程度了，更忘记有人或许还会想到他的祖父，他的师傅，还有他在国民党里的私人朋友。以此来对储安平的智力水准下判断是不公正的。他太着迷了，迷到犯傻的程度。

或许并不是这样，他其实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考虑进去了。但他答应下来的既然是“做事”而不是“做官”，就顾不得那许多了。而且，就在他主持光报的短短70天中，这种情绪也没打算隐瞒，几乎所有的人都记得他说的那番颇带了一点感情的话：

光明日报让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办，这句话说得好。但我要看看究竟怎么样，看看我到什么地方就要受到阻力不能前进。我要碰。我要扛一扛风浪，担一担斤两。我要看碰上多少暗礁。

共产党向全社会正式通告自己的整风，是在5月1日，即毛泽东天安门城楼座谈会的第二天。也正是从这一天起，被伟大领袖和中共的诚意所感动，觉得再沉默就太大大对不起党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包括他们之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开始正式鸣放。

头几天，大家不怎么想动；或者说，还不知该怎么动；要是对中华文明的路数比较熟悉，就知道，这是大伙正不约而同地按照中国的老例，先看看再说。真正着急上火的，只有那些自以为对帮助党整风负有重责的人，如储安平、钦本立等。为发动鸣放，或者换句话说，为了“把报纸引向资产阶级方向”，他们真是煞费苦心。

储安平“最恶毒的”九大城市座谈会的主意，就是在这绝境中逼出来的。

到了5月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开始召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开座谈会，各部门、各省市和各高校，也都档次递降地依样召开，请大家帮助党整风。一开始；当然还是启发，鼓励；渐渐地，有人发言了；渐渐地，发言愈加尖锐起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则把其中最“精彩”的送上版面。虽然后来储安平遭到众口一词的指斥，说什么“恶毒”他登什么。这实在有点冤枉他了。他只是追求言论自由，追求不受限制地表达这一原则。某些重要的反驳意见，如马寅初认为“高小呋应该设党委，没有党委书记我这个校长没办法做”这类言论，他都照登。

今天的读者大约只知1957年有右派却不大知道他们怎么个“右”法。择其要而述之：

1．党委治校抑或校委会（教授）治校（黄药眠）；2．共产党内的宗派主义作风（章乃器）；3．民主党派参加协商应有名有实（罗隆基）；4．文教界共产党员负责人不称职[4]（陈铭枢）；[4] “不称职”说当时遍及各界，如经济界。原话为：听说一些领导财政的同志曾公开宣称，根据几年来的经验，总结出来这样一条规律，即是国家的财政收支如果不能平衡，势将导致物价上涨和物资供应的紧张状态。其实这是经济常识。连这样的常识也要从亲身经历里面去总结，我们的财政政策就未免过于盲目了，我们的财经工作也未免太儿戏了（陈振汉）。

5．共产党以党代政， 党不应该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黄绍竑）；党政不分，中央是根（杨玉清）

6．共产党员的特权思想 （李伯球） ； 党员特权造成党与非党之间的墙与沟（龙云、张云川）；

7．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协制度需要改造（叶笃义）；8．三大主义（官僚、教条、宗派）限制新闻自由（张友鸾）；9．要求人生三大事：物质生活保障、精神的民主与自由（章伯钧）；10．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是政治设计院（章伯钧——这话最初是毛泽东讲的）；

11．群众鸣放得越彻底，党的威信就越高，把鸣放重点放到基层去（王造时）；12．成立平反委员会（罗隆基——他作此语的出发点是怀疑现有的党政机构自我改善的能力）；

13．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北京大学学生）；14．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套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荣子正）；15．我们对当前经济科学的意见。这是陈振汉等六位经济学教授特地聚在一起认真讨论之后准备上呈的，事后对他们进行的概括性批判为：“会上六人都发表了意见，污蔑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教条主义、国家经济工作中有很大的缺点错误却不准公开讨论。企图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国家的经济建设，说政府应该吸取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来制定政策，制定经济政策时应请经济学家参加设计，政策制定后应公开讨论监督。”（陈振汉、徐毓楠等）16．共产党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群众不敢信任共产党，因为他们在

八年中体会到共产党善变。若你们再不争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路，总有那么一天了。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大家也不会卖国（葛佩琦——这就是后来被概括的“要杀共产党”的那段话的原版）；17．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定息不是剥削。（章乃器）；18．党天下：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储安平）；……

储安平的这个发言是在6月1日作的，差不多是统战部座谈会闭幕的前夕了。储安平自己交待：

解放以后，一般说来，我很少在外面说话。鸣放开展以后，也很少讲话。九三、作家协会来邀，都未发言，多少采取逃避的态度。一则我对发言的积极性不高，二则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谈。所以统战部座谈会开得很久，我一直没有去。5月30日上午统战部来电话要我去。我答应去，但说明不发言。下午听说6月1日还要开会，统战部彭处长希望我6月1日发一次言。我31日上午还在报社工作，31日下午在家写发言稿，那天下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没有外出。伯钧同志说我的发言稿罗隆基看过，并无此事。

尽管储安平是一个风头很健的人， 笔者依旧倾向于相信他确实直到5月31日还不想到会上去说话——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无话可说。但当一顶顶高帽送到头上，一声声恳挚的要求送进耳廓，他让步了。而他一旦决定讲，就想博个满堂彩。用后来章伯钧的评价，就是“现行政治上的一些人，大都只说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要汽车、干部、房子之类，能谈大问题的人不多。”

在那天的会上，他不但持有照本宣读的发言稿，这稿还是打印好、估算好版面，并特别注有“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发言稿”，“希用原题、原文勿删”字样的一份交报馆直接发排的成稿。

他期待的效果出现了。会上即博得一片喝彩，会下更盛传不衰。大家都记得马寅初当时即用手拍着椅背，连称Very good，Very good！第二天，在见报的同时，中央台全文广播。他以少有的亲切对孩子们说，“来，听听，这是爸爸昨天在会上的发言。”他不知道的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那篇给党内干部阅读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已发下半个月，此时正是文中早已点明的“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顶点在哪儿呢？至今未见任何权威性的文献加以说明。若将随后批

判的火力的强弱，及对人头处理的宽严作参考，高潮应是那个与治蝗虫的农药同名的“六六六”

事件了，　即6位教授在6月6日应章伯钧之邀紧急聚会，讨论鸣放形势。对照他们当时所怀有的悃诚，和后来对他们的解释，只能说，“足令历史带泪看”。章伯钧先介绍学校的局面，请大家研究民盟在运动中应该如何工作。费孝通说，现在各大学的学生情绪激烈，情况十分严重。老师若去给学生领头，事情就闹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完了。曾昭伦认为形势一触即发，共产党大意不得。钱伟长特别指出学生在到处找领袖，期望着教授们站出来说话……他们决定这时候一定得出来，不能让共产党进退不得，要帮助真正继承了列宁衣钵的“毛公”，要帮助共产党稳住局面。

此时，　距《人民日报》那篇晴空惊雷般的社论《这是为什么》的发表只有2天……他们怎么会料到，毛泽东对“六六六”的理解竟是这样：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的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李维汉去世前的一段回忆，或许可以部分解释这一局面形成的过程：

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五月中旬，汇报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发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

在这场较量中，很值得共产党骄傲的，是那段几乎每个中国人在“文化革命”

中都背得滚瓜烂熟的语录——“阳谋”；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

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

这确是事实。毛泽东的警告在1957年1月即已作出：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复辟？

但怎么解释4月30日天安门城楼上的座谈会呢？　怎么解释那几乎征服了所有文化人的谈笑呢？从4月30日到5月15日，只有半个月，究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或者不过什么触动，使他一下子暴躁起来，而酿成这半个世纪都未必缓得过劲来的悲剧呢？

李维汉这样回忆在5月10日前后“向主席汇报”的情景：……及至听到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

怎么估计罗隆基这几句话对毛泽东的伤害也不过分。这伤害不仅仅在于诸如谁打天下、谁坐天下，交椅怎么摆等等要命的问题，而在于它是一个旧伤疤，伤害一直可以追溯到1910年末，追溯到他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5] 。更不可以忽略的是，这伤害也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加予的，张国焘、罗章龙、王明、张闻天，也许还有别的人，总之，一批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洋教育的人，没准都让他十分不舒服过，特别在他们还没领教他的手段而“放肆得很”的时候。当然，当他们在他的智慧下活动的时候，他可以称赞，甚至尊重他们；要是想反，他就要让他们看看，究竟谁“大”，谁“小”；谁真有学问，谁“书读得越多越蠢”。对这批衣冠楚楚，满口洋文，爱洗澡、爱吃药的秀才们随意嘲弄，打趴下再拎起来，拎起来再打下去，可以说是伟大领袖终生乐此不疲的游戏。

[5]　当时周作人教授对青年毛润之很是忽视；　图书馆的高级职员也因他用龙风舞的字体书写卡片而面斥。对此，毛曾在给家乡友人的信中流露：受够了洋教授的窝囊气。

5月上、　中旬，相当一批亲随已经窥知了毛泽东的意图。党内文章

一下达，高级干部们心里都有了数。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于是东施效颦，也残忍地玩弄起那些“不可一世的高级知识分子”来。比如人民日报依旧在发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如不但统战部的座谈会仍旧开，新闻界等在16日之前还新召开了会议；如几次三番催促储安平之流发言；甚至担心右派品种不齐，有意制造一些。请看李维汉的回忆：

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了北京的吴金粹、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

但当时这批已知情的中共高干确实有意保护一批人，究竟是有组织的布置，还只是出于他们个人的友情，今天就不得而知了。今日学界盛传的是，田家英——他是毛主席身边的大秘书，“文化革命”刚刚开始就自杀了——特别着急，急得火烧火燎。一再提醒他30年代就认识相知的老友曾彦修，让他快快闭嘴，不过曾彦修对此予以否认。他清楚记得的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些“过激鸣放”把他吓坏了，比如“到人事科抢档案”、“到天安门示威”等等。他觉得没有办法控制局面，只好就商于田家英，问能不能把他从这里调开。田的回答是：“你胆子太小了，要放手发动群众，根本还没有发动起来嘛！”他又去找当时文化部主管出版的副部长陈克寒，陈也说：“没发动起来！真有什么事也没什么不得了，怕什么？！”曾彦修记得很清楚，这时确实已不是5月初而是5月底。曾彦修认为，或许大家把田家英类似传说中的另一次事先警告安到了他的头上，那次是对张闻天；时间是在2年之后的庐山会议上。那次，田家英与胡乔木苦苦劝说张闻天不要发言，张还是发了，从容而坦荡。当然，这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柯庆施此时心情可能相当复杂。他特别关照文汇报，凡是北京方面来的给人戴帽子的稿，都要事先与他通气。那位老黄牛一般只知干活、不善言词的文汇老人严宝礼的名字就是北京点了而由柯庆施勾掉的。这一义举，并不表明柯庆施对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地位与作用有什么与毛泽东不同的见解；如果非说有，也只在用语方面有了一点突破。他独到的评价是：中国知识分子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常会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李维汉也有要保的人，他只好耍起小技巧：工商界座谈会开始于五月中旬，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

不会有人出来保护储安平的。《这是为什么》中的一句话：——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已经规定了他此后无可更改的被批斗的地位。社论发表的当天下午一时半，储安平辞去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这时候，他那“经民主党派一致推举”的可爱形象已不复存在。史良当天即就“党天下”稿向她认为应负有责任的章伯钧兴师问罪。章伯钧此时对储安平的了解显然比两个月前勉强接受他的时候多了一点。他的回答是：

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而且一再揄出卢郁文[6] 来，卢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才有定评。

[6]　卢郁文，民主人士，在鸣放阶段几次提醒向党提意见要实事求是，不应只讲缺点不讲成绩。后来据称为此接到谩骂威胁的匿名信，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笔者至今倾向于这是一场类似国会纵火案式的小把戏。

接着， 6月9日， 储安平的老朋友袁翰青等人去看他。在被问到“打算如何就‘党天下’问题写检讨”的时候，储的回答是：“可以写，检讨自己对‘知无不言’是有界限的这一点认识不清。如果知道，就不说了。”袁说，如果这样，你还是别检讨了。

11月，人民日报点民盟的名：“可注意的民盟动向”。费孝通去看储。此时，本文男主人公的“心气儿”似乎还很足。费孝通回忆：谈到“党天下”的发言，他拿出一叠信来，说许多人支持他的发言，表示颇有群众，并谈及要一个民主党派的副主席才能当光明日报的总编辑。

要他再当总编辑，就得选他当副主席。这次不是真心要辞职。

笔者接触到这份文献时，很是吃了一惊。直到那时，储安平引以为恨的，不是别的，而是他代表不了民主党派，不能把已经开始了的事情做下去。他可能还不知道，这股“气儿”，无论出于无知，还是信念，或是别的什么，总之，只要你是活在那个时候中国的这块土地上的，就得给你泄泄。

6月上旬以后， 所有储安平与之沾边的机构，开始或分别，或联合对他进行批判：最早的是民盟光明日报支部（6月11日），接着是社务委

员会（6月15日），然后是民革和民盟的联合大会，再后是九三的常委会（6月21日）。

7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专门声讨右派分子。储安平此时已不能不“向人民投降”，并以此为题作了一个4000字的发言。用今天的标准看，虽不十分诚恳，把自己骂得确是够惨的了。而且这检讨是他主动要求作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特别看重他自己的人民代表资格。但在别的会上——或者说在别的气氛或情绪下——就不是如此了。据他的同人对他的描述：……不顾会上许多同志揭发的大量事实，储安平的发言都是捧着一份过去他在别的会上交待时准备好的书面材料，照本宣读，且只谈光明日报的具体业务，避免回答政治问题。

这时还是夏天，到了冬天，作为收尾，九三学社与光明日报联合举行了千人批判大会。那次，专门请了中央党校马列主义水平高的孙定国同志作重点发言。在孙的发言面前，“储安平理屈词穷，不得不向人民低头认罪。”

读者或许有兴趣知道一下“章罗同盟”。它属于右派分子中最高定罪，储安平被说成是该盟重要成员。据千家驹回忆：毛泽东认为“右派”的猖狂进攻，以中国民主同盟与农工民主党表现最为恶劣，“其源盖出于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云。

“章罗联盟”这个毛泽东钦定的罪案，其实完全是一场冤案，真可以说是千古奇冤！章伯钧与罗隆基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副主席，我和他们两人都很熟，与章伯钧的来往尤为密切。凡是对民盟内部历史稍有所知的人，谁都知道章罗两人在民盟内部极不相能，互相水火。

反右斗争以知识分子为重点，罗隆基是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被划成右派，大家是可以理解的。至于章伯钧，他自命为“左派”，在整风初期，他没有发表什么实质性的言论，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为了要使章伯钧上钩，特地多开了几次政协座谈会，一定要章伯钧发言，章伯钧就抛出了“政治设计院”的谬论。这一下就被抓住辫子。“章罗联盟”的名词是毛泽东定的，说他们两人结成“联盟”来“反党”，要取而代之！

这在稍知民盟内幕的人无不认为滑天下之大稽！真叫黑天冤枉！

在1978年的摘帽决定中，体现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这一科学精

神，只因“真理标准讨论”那时尚未真正渗进这一领域，故言语之间不免还有“凡是”味道：“章罗同盟”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在向党疯狂进攻中是互相响应的，都是企图在我国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但没有发现二人在组织上共同策划、进行阴谋活动的事实。

反右斗争的最强音是毛泽东本人发出的。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他……作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报告…………这一百天，时间有很大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

……

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

……

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

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

……

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

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之后也是要受整的。

从夏天到秋天到冬天，心里“七上八下”的知识分子们，包括后来被划的与未被划的，总之在前一段有翘尾巴之嫌者，开始努力表现，以实际行动求自保。笔者在这里已不忍心摘录所有这些学者、教授、名流们横七竖八的相互揭发、质问、攻讦……像在一片巨大的、四周围满了观众的沼泽中，他们踩别人的时候，对自己的上升都怀着一丝希望，殊不

知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一同沉没。他们的表现没能争得站在坚实地面上的人一援手，只给自己留下永远不可告人的悔恨。

这是一个尸横遍野的战场。中国的文化人在这里写下他们最悲惨也是最耻辱的一页。

七

[命]梵文Jiva的意译，即“灵魂”。耆那教名词。分受物质束缚的和不受物质束缚的（即解脱的）两种。受物质束缚的“命”，又区分为动的和静的两种。前者存在于动物、人等有生命体中，后者存在于地、水、火、风等无生命体中。

——《宗教词典》

60年代初的一天，梁漱溟只身踏步，踱到厂桥棉花胡同。那天天气很好，胡同里也打扫得干干净净。

他缓步走着，用他那常年素食者几乎悄没声儿的脚步。自从1953年与毛泽东当众发生激烈争执以来，这位对人生抱着炽热而又冷峻态度的哲人，整日价以“学习”

为业，他画卯的地方干脆就叫：学习委员会”。

他是去看储安平的。他们二人曾为同道——鼓吹已成陈迹的第三条道路；他曾冷眼看这小伙子潇洒地周旋于政界与学界之中，也见过他如何正在兴头上被兜头泼上一瓢冷水。如今他又去看他，这几乎小他20岁的昔日闻人已匿迹很久了。

他来到甲12号门旁，敲门，无人应。再敲，依旧无人应。如是者四。换了任何一个人，此时都会转身走掉了，不巧访者恰是不达目的不肯轻易放弃努力的梁先生，于是又这么周而复始地敲了下去。

门终于开了。高大、清瘦、几乎面无血色的储安平出现在门口　尔到20多年的老友，他没有一丝热烈的表示，只说了一句：“不想见人，叫门是从来不应的。”

客人被让进一个不算宽敞的独院，三间正屋、两间厢房。令这位老北京惊讶不止的是，墙边拴着一只羊。

家中静悄悄的，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书和字典摊在桌子上，不见报纸，不见杂志，只有一帧他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孤零零挂在墙上。他们坐下来，东拉西扯，可惜梁先生在1987年回答笔者的追问的时候，具体内容都不大想得起来了，只记得储安平最后送给他一套完整的《观察》：“再也没有凑得这么齐的一套了。这是我自己保存的最后的一套。”储说。

当时，梁漱溟只感到某种“精神分享”，正如看到一本好书、萌生出一个好念头要迫不及待地告诉心心相印的朋友一般。他没想到这或许是一种沉甸甸的托付；也没深究，这闭门养羊的汉子为什么对自己一生中仅有的那闪光的一瞬已不再眷恋。

他收下了，想着“为老友代存”吧。不料到了1966年夏，在他也被深夜的敲门声惊起之后，眼见这老友的珍物，与他三代京官的祖上留下来的全部古玩字画，一同焚于红卫兵点起的火堆中。

他不知道，也许就在那个、或者和那个同样躁动的深夜，储安平正挤上一路又一路公共汽车——或许他没有乘车，而是一路踩着新从树上飘下的落叶——来到京西青龙桥边。那发自冀北山下的潮白河水（京密运河），正在两堤的夹拥中汩汩淌过。

※ ※ ※ ※ ※九三学社。坐落在西四颁赏胡同，门面不大，院落深深。夜深了，还有人走出走进，“西纠”（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学习当年老八路，号上了他们的房子。

这里现在是西纠的司令部。九三的老朽大都被轰走了，只留下几个人值班。

十一时，电话铃突然响起。留守的李义拿起听筒，对方是颐和园派出所：“有个储安平，是你们九三的吧？”

“是，怎么回事？”

“打算自杀哪。现在人在我们这儿，快来领回去吧！”

当时机关正有一部车。请示了西纠之后，在一名小将的监督下，忙驱车赶往发事地。在派出所设备简单的小屋里，李义看见了本文男主人公，他低头坐着，上下透湿，脚边汪了一洼水。

“在桥头转悠半天了，我们一直盯着他。这不，刚跳下去，就救上来了。”民警说着，口气淡淡的，“你死不了，那水才齐胸……够冷的，快回去吧：”

李义几乎认不出他了，不在衣貌，而在神情，像被剥光了示众一般，流贯在这位前总编辑全身的，是一种绝望的畏葸与沮丧。这怎么能是人称“小大英”[7]　的储安平呢？不是1946年的他，不是1957年的他，60年代初也不是这副样子呀！

[7] 一种英国香烟，又称“红锡包”，对储氏神气十足之打趣。

作为“大”　　右派，九三给了储安平尽量好的待遇，每月100元生活费，没有惩罚性劳动，也没有点卯般的例行训斥。当然，他要求工作，要求过不止一次。每每听到又有给右派摘帽的文件下发时，也曾打探过自己被摘的可能性[8] 。虽然次次都遭到拒绝，但却从未失去过外表的平静。在这期间，孙承沛曾出面联系商务印书馆，问能不能拿些书稿请储安平校。商务欣然应允，双方合作很融洽。储安平得到报酬后，郑重地交到九三总部。他认为，他已经从机关领到生活费，这笔钱不可再收[9] 。但他很少笑，李义甚至想不出微笑着的储安平是一副什么样子。他给人的印象是好端架子，似乎在努力保持一种尊严，哪怕让人觉得疏远。至于北京话所谓的“心气儿”，李义不认为这前途并不乐观的著名右派已经没了，因为在1961年纪念七一的时候，储居然还冒出了这么一句：“四十周年纪念灰溜溜的，共产党没把国家搞好。”

[8]　　在这里，李义的回忆与赵家璧的回忆略有出入。赵家璧记得1959－1960年间，他作为上海政协学习团的一员，到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接受培养。到京后，他去看老朋友，其中当然包括储。归来后即在小组会上提起，组长也立即上报。第二天副院长和教务长即找赵谈话，让他私下多去几趟，以老友身份劝劝储，早一点出来，主动找共产党，请共产党为他摘帽。领受旨意，赵后来果然去了十多次，而储并不知道他是“被利用了，有目的去的”。据赵回忆，“那时大右派都出来了，帽子也摘了，储脾气很倔：‘不出，不找共产党，不找统战部，也不去找九三。”

想来李与赵所记忆的大概是储的不同时期的情绪表现：李在先，赵在后，梁在更后。

到了这时，储安平可能已经心如槁木，用他女儿的话说：整个堕落

了，来往的都是什么人？牧师，送羊草的！

[9] 一般人：包括他的亲属，都认为储安平在钱财上“特别抠门”。据此节看，他的“抠”，其实是界限清楚——该拿多少拿多少，想阔气自己挣去。对于特别困难的人，他并非铁石心肠、坐视不救，如他的勤务员的瘰疬病的妻子，就一直无偿住在他的私宅。在他的观念里，施舍就是施舍，不是对上帝的敬畏，也不为买来世的幸福，更不是谁对谁的义务，只是强者对弱者的扶助，是人类同情心的表现。

“上车吧！”李义说。路上，储安平一句话也没有讲，即使当车子开进城，李义叹着气说：“你这是干什么呀？不该想不开嘛！”的时候，红卫兵小将也一路向他宣传党的政策：“每个人都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党会给出路”云云。

回到九三学社已是11：00。院角厨房边上有间小南屋，平日没人，烧锅炉的有时住住，红卫兵们没看上，那时正空着。

“就先在这儿住下吧。”李义说。

这时管事的一位女性副处长也来了。对于此人，别人说起她来不怎么叫名字，而是称某某的夫人，我们在这里权且称她为A夫人。A夫人吩咐一名干部到储家去给他取衣服。那人去了，一进门，满满一院子红卫兵，屋里屋外抄得乱七八糟。

“你们这么些人在这儿干什么？”那干部问。当时能以这样的口气向小将作这种内容的提问，俗称“吃了豹子胆”。

“我们在等储安平，他现在在哪儿？”

“在我们机关，他自杀了……”

“死啦？！”

“没有，跳下去了。水太浅……”

小将们一阵大笑。笑毕问明他的身份和来意即帮着找衬衣内裤，还有大衣。把他送出门，为首的一个问：“我们还等他吗？”

“这我可不知道。谁让你们来的问他去吧。”

他回到九三，敲敲小南屋的门，把衣物递进去。“谢谢。”储安平说。这是那夜他说的唯一一句话。

他们不知道，储安平其实死过，短暂的死，如果我们把大脑的思维活动的中止称作“死”的话。那是在1947年春，他做胃部手术而被“施用闷药”。就在他的思维即将终止，亦即“死”即将来临的时候，他曾有过十分清晰的感受，并且立即用文字记录下来，希望“能够成为医学心理学家或普通心理学家的一份有用的材料”

——他绝不会想到，40年后，后人会反复推敲他这篇即兴纪实，以对他的“失踪”

给出一个论断：

……大约在吸到第三口或第四口时，我便开始感觉到一点一点“黑”

起来。这情景很难描写……我的感觉是好像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仿佛走入了非洲的一个大森林（实际上我并无走入非洲森林的经验，此处亦是一种假借），走一步黑一步，越走越黑。

我曾经在新闻片中看到过纳粹罪犯被施绞刑的情形。在这时，这个记忆骤然地引起我心理上的一种联想作用。无论是从我的思想或是从我的过去而言，我原无将我自己和那些纳粹要犯联想到一起的可能。这个联想的发生，虽然是由于我看过那张新闻片的关系，而形成这个联想的中心则为“权力”一事。无论在当时或者现在事后的分析，这种联想显然并不牵涉到任何道德上的问题，或者政治上的成败的问题（政治上的成败本是相对的）。这个联想的中心思想，只是说，那批曾经赫赫一时有大权力的人物，这时竟毫无反抗的能力，其生死完全操之于他人掌中，而将在顷刻之间结束其生命。我们平时，凭这支千钧之笔，发挥我们的理想，陈述我们的抱负，替一切受难的人们呼吁，抨击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扫荡各式各类的人渣，保持有一个虽然飘渺而不可捉摸但其坚硬却胜过钢铁的意志，而在这时，整个的生命（包括寄托在这个生命上的智慧、意志、理想、权威、品格），都操之于他人，一切听人摆布，自己失去了任何表示意志的能力，甚至即将失去任何表示意志的机会，心里充分感觉自己的生命，一秒一秒更接近“死亡”——在那种情形下，亦不能自已地发出一种对于人生的轻微的感伤！

从这里看出，储安平对于死的最大的恐惧是在不受物质束缚（即解

脱的）那部分。他几乎压根没想到喉管折裂、颈动脉阻断，没想到断气前可怖的痉挛与抽搐。

他对死的恐惧在于精神与意志尚存，而居然无所寄附。那么，当即使生命依旧存在却无可寄附的时候，这生命还可贵么？这死还可惧么？

在我当时的心理上，一方面占据着由于有如上述有关“权力”一端而进发出来的感想，一方面又同时联想到一切被迫即将丧失其生命的那些人们，而进发一种深沉的同情。我所谓“一切被迫将丧失其生命的那些人们”，所指范围权广，通常最主要的部分即那些因犯罪而被判死刑或因政治见解不同而被处死刑的那些人们。罪犯罪犯，原都由于现代社会的罪恶；而由于政治上的斗争或忌妒因而被人或公开或不公开的处死，更是人类社会里最可哀痛的不平事情。当他们从囚房提到刑场，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之路时，没有人可以知道他们当时的心情究为如何，而他们自己显然也不再获有机会向他人报告他当时的心理。无论电刑、绞刑，或执行枪决，行刑的本身虽只是一刹那之时，而自囚房至刑场这一段，总是一段可怕的、不堪想象的路程。当我被闷药的药性一秒钟一秒钟地逼近死亡的境界时，我深深体会到那些不幸的人们的内心的悲哀。除了少数例外，没有人不是留恋他们自己的生命的。然而他们竟活生生的被人强制结束他们的生命。无论他们是否热泪盈眶，他们的悲哀终是一种绵绵无尽期的悲哀。

在1966年，当他一步步向青龙桥走去的时候，感受肯定已与此时不同。他或许已经不认为“哀莫大于心死”，而是“哀莫大于心不死”了。

我说我当时有一种“轻微的感伤”，这感伤是属于人性的感伤！……一切引起联想的，都是一种属于人性的联想，而非利害的联想。最明显的就是关于我的孩子。我是一个离婚多年的男子，可是我有很可爱的孩子。

我的女孩性情柔和，知趣识礼，年龄虽小而已表现一种善于治家的本性。

我的最小的男孩，则天资颖慧，聪明玲珑，具有一种使任何人一和他接触便会喜欢他的魔力。我非常爱他们。可是这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

有关利害或感情的思念，只有一项，在当时曾经占据过我的心灵，

就是关于国家的前途。我当时曾经确切的感到，万一我此去一闷不醒，最后使我不能“瞑目”的，实莫过于今日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走上轨道一点。因之我在事后感到，对于一个真正的忧国之士，我认为在三十四年八月至三十五年二月之间年老寿终者，实不失为一种人生大福。因为那时抗战终获胜利，政协亦庆成功，而为日后发生的种种纠纷与悲观，尚未显露。在那时死去，可谓心情宁静，无所遗憾。到现在，假如我们竟然因病身故，实有死不瞑目之感。

安平作此文时不过一介报人。到了1966年，不但连这小小报人也已不是，还背负着即使心灵足够粗砺，也不可能不时时感到的耻辱。这他在1957年就当众招认过：“当全国对我进行严厉的批判、我开始看到我自己错误的时候，我内心感到无比沉痛，感到无地自容。每天邮差同志送报纸信件到我门口，我自己都没有脸到门口去拿。上上星期我因病去看医生的时候，我都不敢讲我姓储，深恐医生怀疑我就是那个右派分子储安平。”这抽紧的心可以说一刻也没有舒缓过。那么，到底是什么支持着，又让他活了将近10年却在最后一刻终于支持不住了呢？我们今天能找到的答案只能是对国家前途尚存的期望，和由于预感到这人类大悲剧的即将来临而生的绝望。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讲，还有自1947年以来就有的对“受物质束缚的命”之终结的坦然：

我终于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止了我的知觉了，就像一个小孩在哼着山歌时忽然睡了一样。

但他失败了，当青龙桥民警行使公务，将他从水中拽出的时候，已注定了他再得不到“永久的安宁”，而是辱上加辱。但在那清冷的水中，他究竟还想到了什么？

有没有类似张东荪教授在监狱里自尽前用双手拉住套在颈上的绳子一类的行为——并非智力活动的结果而只是一种生物的自然反应？他又被扯回人间，当他在九三学社小南屋温暖干燥的角落里蜷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实际上已向“生物习性”让步？

第二天，他交了检讨书（自杀经过及对这一错误的认识），向红卫兵和九三值班人员提出“能不能不回家，就住在这里”，并要求把一批银行存单交社机关保管。

前边已经说过，储安平在银钱上是十分精细、精确，乃至近乎苛刻的。他的两任妻子都没有管过他的钱，他的儿子因为不愿开口向他要零

用钱（以免受辱），十几里路步行上学，以省下车钱买些少年人渴望的杂物；而在高中毕业以后，为尽早经济独立，大学也不肯考——这又伤了他的心，储安平的儿子居然不念大学！

不知他当时准备交到社里的钱是个什么数，这对他是很重要的，因为可能包括《观察》解散时，流落到国境以外的股东们的股金（董事会决定交他保管），还有国家收购他一所大房子（现阜内鲁迅博物馆）的报酬。他曾去找过他的次子，请他保管， 这个被深深伤害过的孩子一口拒绝了。至于A夫人，当然不会接受，就算她有这份侠义心肠或说对事物的分析能力，也不愿担这种责任：想留在这里，把机关和红卫兵司令部当作避风港么……她如实向统战部汇报了。当时在那里主管工作的，想来既不是李维汉，也已不是徐冰和薛子正。回复是明确而坚决的："储安平，大右派，保护起来，不合适。

放到社会上经受锻炼。"A夫人将这一决定向储安平作了口头传达。

如果在这前后发生的另一个细节不是这样而是别样，我们的故事可能要全部重写：储安平的小儿子刚刚来过，他给父亲送来了简单的行李。尽管苦苦的哀求转达了，这名年轻的音乐学院钢琴系（而非作曲系，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教师还是拒绝见他。

这最后的打击是沉重的。或者换句话说，他此时已经受不住哪怕轻微的一击——特别是来自他最爱的人。

他不能怪他们，他的妻和四个孩子。他只有怪自己。他对他们的爱是放在对自己的钟爱之下的，并且包含了太多的训导与功利——正常的男子不会这样作丈夫与父亲。

这里当然也不包括他的第二届夫人，虽然他与她的恋爱曾闹得沸沸扬扬，以至引出那么多社会讥评与长者干预。但她既然是为他的名声与地位而来，自然会随着他名声地位的丧失而去。

他也不能怪他的长子。他几乎没有扶养过他。这个没有受足教育就参加了志愿军的少年，得到的赠言是："初中文化，参军最合适。没本事，就保卫祖国去吧！"

他在1957年夏就登报与父亲断绝了关系，比章伯钧的儿子还要早。

他的女儿是爱他的。这个心地淳厚的姑娘，本是储家最进步、最不

带任何批判地热爱新中国的一个，但在父亲的问题上，她的表现最“右”，就是不贴大字报、不在会上表态，清队的时候坚决拒绝发言。出事的前两天，她还打发丈夫把新培育出的无子西瓜给父亲送去……可惜储安平是个重男轻女的典型，对新生的女婴，他居然说过“弄死得了”一类的话。

所有的一切，都好像已经很远很远了……他把行李卷卷好，面对着一张张写满了忏悔及恳请组织保护的认罪书，坐在那里发呆。

A夫人的声音传了进来，“轰出去，一定得把他轰出去！”说得又清脆又利索，他听得很真切。

他站起身，把行李夹在胳膊底下。

10月的北京阳光明媚。他跨过那扇曾经那么意气风发地进进出出的小门（他曾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还曾任机关报《社讯》的主编），朝那满是黄军装、红袖标与铜扣宽皮带的街上走去。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踽踽走出胡同的当儿，A夫人即用电话把她自己的这一让阶级敌人到大风大浪中去经受考验的革命行动通知了不知什么人。

接着，发生了我们在本文最前边描述过的那一幕。也就是说，他回到了家、放下了行李，以后……

抄他家的有两类人，　分属北京4中、91中，可能还有别的什么中或小。第一类是政治性扫荡：这家伙可是红太阳亲自点了名的阶级敌人；第二类显然比较看重经济问题，他们从另一个敌人，家住地安门的郭牧师处发现他存在他那里的存单，他们或许是这样想的：好家伙，自己手里还不知攥着多少呢！

他的失踪几天之后才被发现。报上去，报上去，先是“文革”领导小组的暴怒：“出逃！查！”接着周恩来知道了。由若干名军人组成了一个调查组，整整找了近2年。　虽然作了死亡结论，虽然银行也已同意亲属出示证明可以提取存款，但所有的老朋友都在苦苦追索，因为，“查无人、死无尸！”也许……也许有一天……他还顶着右派帽子哪！

他们有许许多多话要告诉他，他们想让他知道他离去后的一切：工人对解放军的大规模武斗、英雄纪念碑前如雪的白花。

但他们似乎更应该向他祝贺，他走得好，走得干净，走得是时候。

伴着他离去的，虽然没有眼泪，没有哀乐，也没有反复推敲过的悼词，可他是挺着腰板，站着走的。他走的时候是个人，而不是一块招人疼、招人爱，却是想怎揉就怎么揉的抹布。

1967年章士钊到香港。在那里，他读到一首感怀诗，那是一名老报人写的，讲他自己1957年的一场梦。在这梦境里，宜兴出生的一名报人蹈海而亡，章士钊慨道：铸成殆将不免矣！

但徐铸成活着，到今沉静地坐在他上海的寓所。

他们忘了，储安平也是宜兴人，他也主编过报纸——70天。

或许，这飘泊无所的灵魂为潮白河所拒，却为大海容纳了？

愿他安息。

1988．10

（选自（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江苏文艺出版社。）

我的发言

章乃器

（原题《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一

读了6月6日和6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的报道，我愿意发表如下的几点意见：

我觉得“抵抗改造”、“离开社会主义”、“离开党的领导”……一类的大帽子多了一些。这样会使还不敢大放大鸣的工商界人士更加滋长了顾虑。实际上，即以受到批评最多的李康年同志来说，他的建议的用意仍然在于早点消灭资产阶级，摘掉资产阶级帽子；那就没有理由说他是要离开社会主义，而只能说他是过急地追求社会主义和不问条件是否成熟就想摘帽子。而摘帽子的同时，又要求过多的赎卖金。用推论的方法追究思想根源，也应该实事求是，力求全面；不应抓住一部分或一点来推，而且一推就是十万八千里。实际上，要求早点摘帽子，是工商界普遍的思想。回想在解放以前，我们向工商业家做工作，只要有人稍稍表示同情社会主义，我们就珍若拱璧，视为工作的重大胜利。当然，时代是不同了，看问题应该结合形势的发展。但对于不愿意再被称为资本家的人反而说他是离开社会主义，那是无论如何都说不通的。我想，只要根据宪法规定，给工商业家以平等公民的待遇，他们是可以少安毋躁的。这就必须诚心诚意地帮助党做好整风工作。

二

×××同志说我批评“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这是不实在的。请查一下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的原文，我说的是“因而曾经助长了一些独裁作风和家长作风。

自然也就助长了宗派活动。……看起来有时似乎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实际上，今天在民主党派中进行宗派活动，如果不是若隐若显地拿起统战部的幌子，是不大可能的”。说“助长”，说“看起来似乎”，说“幌子”，这同×××同志的“在参加”是有多大的出入呢？这是有意的睁开眼睛撒谎，还是健忘呢？他还说，民建内部有左、中、右的分别，有一些人的看法与党的方针、政策比较一致，这是对的。

但我要再问一下：在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的方针之后，居然还有人对思想问题组织“围剿”，这是不是与党的方针政策一致的呢？他还谈到骨干分子是否参加宗派活动的问题。我的看法是“骨干分子一般地不会参加宗派活动，骨干分子参加宗派活动，是领导人的宗派主义造成的。”

三

看来，直到现在，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仍然还有许多人没有想通或者没有完全想通。这中间，有一部分人是没有认识到今天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的强大，怕整得太狠就要整垮了。这些是好良心人，但也应该对他们说明白：我们不怕伤风、感冒。另有一部分人，他们对于党的伟大方针仍然存在着试探的意味，怕表面宽大、内里并不那么宽大，怕“放”了之后要“收”，“收”的时候要反过来整，因此，还是“保留三分”、“观望一下”为好。

这些是世故较深的人，他们对党的方针是信任不够的。还会有少数人，是乘机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方法，以求对自己有利，表现了“唯我独忠”的姿态。这种人的思想就值得检查了。应该明确，在目前，忠诚接受党的领导和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多数人，忠于接受党的领导和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并不是什么希罕的事；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时候，只要是根据事实，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这是正常的；和党共事日久，说话不从“拥护一番”说起，而是老老实实“开门见山”地说，更是正常的。这都说不上什么“脱离社会主义”或者“脱离领导”。当然，也是根据事实，也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别人的批评进行反批评，也是完全可以的，是正常的 扶不能只许说反面的，不许说正面的。扣帽子也没有什么，只要不乱扣。

四

×××同志批评我曲解了斯大林“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一句话。首先我不同意他的方法。这一句话对某些党员会起到什么影响，我认为应该从客观实际去找。这样，整风期间报纸上的报道就已经提出不少的材料了。×××同志刚刚相反，他从列宁文选里去找，找出斯大林演说的全文来谈问题。这是标准的教条主义的方法。应该问一问：究竟是联共党史发行的广泛呢，还是列宁文选发行的广泛呢？

究竟有多少人能同×××同志那样，在读联共党史的时候要到列宁选集里去找根据。

自然，即使找出了根据，仍然不能说明斯大林这句话是科学的。×××同志还说：“章乃器同志说在‘过五关’之后还要有‘脱胎换骨”抽筋剥皮’的最后一关。”

这不是睁开眼睛撒谎，便是健忘。我所说的是可以被敌人用来进行反宣传，在“脱胎换骨”之下加上“抽筋剥皮”。×××同志这样的辩论作风，究竟正派不正派，是值得他考虑的。

五

此外，还有些类似谩骂的“批评”，我认为不值得争辩；的确，群众是能够辨善恶的。有许多有关理论性的问题，请大家在我所写的（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问题》和《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发表以后，再给以批评，我也暂不作答。关于我在《工商界》发表的文章用了民建副主任委员的头衔一点，我要说明：我从来发表文章都不愿用什么头衔，这次是由于《工商界》编者的要求我才同意的。我也没有理由不同意，因为我的确负有这样的头衔。同时，用了这样的头衔，也不意味着就代表什么组织。文章总是表达自己个人的意见的。所以，我也看不到任何人有权力可以制止一个人发表文章用头衔。对这点，我毫无成见，请法学家加以研究吧！

六

最后，我愿意告诉工商界：整风运动是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共产党绝不会做半途而废的事情。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我们要完全相信党的方针、政策，用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揭发矛盾，帮助党做好整风工作。不要伯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整风运动从某一些角落来看，肯定会有曲折，肯定会有过“左”、过右的偏向，但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

（原载《人民日报》1957·6·10）

在民建会、工商联党委联席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1]

章乃器

[1] 这篇和后面的一篇文章， 是作者1957年6月15日和17日在民建会和全国工商联常委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他的发言摘要发表在1957年6月16日、18日《人民日报》上。——编者

我今天发言没有准备。刚才听了大家发言，对我的热情我很感激，但讲道理还不能说服我。这是老实话，假如不老实的话，今天也可以来一个假检讨。现在就几个问题谈谈：

一

同志们反映：现在下面的工作不好搞了，说是我的言论挑拨起来的。我不同意。

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自从党提出了整风运动，主张思想改造和风细雨，又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下面的情况，是在党的领导下自然发展起来的。什么地方可以证明这一点呢？请诸位把最近一期《工商界》月刊翻一翻，其中发表文章的人并不是没有代表性的，这些文章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讲过的，都是在我的文章发表以前讲的，时间不妨可以查一查。在我的文章发表以前已经有人讲了那么许多话，这说明下面的情况是在党的整风运动号召下发展起来的，不是我的文章挑拨起来的。

二

在这时期，我们作思想教育工作会不会遇到新的困难呢？肯定是要遇到新的困难和新的问题的。思想改造工作现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从过去的压服转到说服的阶段。说服必须要有相当高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才能做到。下面的情况，说是我章某人几篇文章挑拨起来的，不但时间不对，还没有看到思想改造的总形势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大家是自然而然地把过去闷在肚皮里的话都拿出来了。我诚恳要求我们工商界的领袖人，对思想改造负有责任的人，应该把这个形势发展认识清楚。目前是处在思想改造的新阶段，思想改造工作更复杂，正是发展过程，而不是我章某人一个人挑拨起来的。

三

两条路线问题，就是拥护社会主义与离开社会主义的问题。我在资本主义时代是要社会主义的；在社会主义时代反而要离开社会主义，那真是奇怪。我曾讲过，看我这个人，看五年看不清楚可以看十年，直到死我也不会离开党，离开社会主义的，若再不相信，可以在死后把我的骨头烧成灰看看有没有离开社会主义的反动成分。我曾想写篇文章自我表白一下，但想到在这个时候不应该写，于是没有写。离开不离开社会主义问题，我认为今天我们的革命已胜利，政权已巩固，这情况和革命没有胜利前是不一样的。革命没有胜利前有领导权问题，有政治路线问题，今天，革命已经胜利，宪法已经公布，政权已经巩固，不可能再有领导权问题、政治路线问题了。尽管有少数人发表一种大家认为反动的言论，那是发牢骚。如农民有时候也是有一些牢骚的，尤其对我们的粮食工作有意见，对我们的干部骂得很厉害，但是，发牢骚是一回事，对领导权不发生问题。我过去曾说过，不怕资产阶级造反，资产阶级不可能造反，也不会造反。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肯定的，路线上没有任何人动摇。两条路线问题，今天与革命胜利前是不同的，而且有很大的不同 焚例来说，当革命没有胜利，还进行斗争的时候，欧洲国家中有社会主义政党，也有社会民主党，小资产阶级也有它自己的政党，那时领导权没有确定，路线也没有确定，必须进行坚决的阶级斗争。可是，在革命胜利之后，在今天，我们应该把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分开来。在理论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一直在继续着，一时一刻也不能放弃。但在政治上却不是如此的。例如，一个佛教徒说：“佛教要世界大同，但过去只能思想上想，走不通；现在共产党领导革命胜利了，走上社会主义，将来一定能够走上世界大同，在共产党领导下走通了，因此我拥护社会主义，但我是从佛教立场上拥护社会主义的。”又如一个基督教徒说：“基督教本来是要走社会主义的，现在共产党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基督教要走而没有走上的路，因此我们拥护社会主义。”又如有的老国民党员说：“我是三民主义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失败了，共产党领导革命不但实现了三民主义，而且超过了三民主义，所以我拥护社会主义，但不是从马列主义立场而是从三民主义立场来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以上三种人，如果从哲学理论上来讲应该批判；但是从政治上讲应该举起双手欢迎才对。不这样做，我们的民族大团结会受到阻害。如西藏信奉喇嘛教，他们要走社会主义，要不要他们呢？应该要的，走的慢也欢迎。总之，今天和革命胜利前是不一样的。是离开社会主义还是拥护社会主义，要从政治上看。戴大帽子是违反实际，违反宪法精神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是大家一致拥护的，但

在具体作法上有些问题可能有不同的认识，这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范围之内的，不是什么离开社会主义的路线问题，不能这样乱戴帽子，乱说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有这样一点认识。

四

资产阶级两面性问题，在民建二中全会的时候我就肯定两面性主要是思想作风上的问题，没有一句话否定两面性，从来没有说过两面性不存在。我从前讲过的话和今天所写的文章差不多。正因为两面性是思想作风上的问题，所以改造更困难，是个长期的任务；民建和工商联的工作也是长期的。我从来没有否定两面性的存在，希望大家看看我的文章。批驳一个人的文章不要不看就来批驳，不要认为是毒草就不看了，不要怕毒草，毒草也要先经过化验。

五

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问题，在我看起来只能是阶级合作的关系，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关系。从民族资产阶级来讲，它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比起工人阶级，是落后的，但不是反动的；以后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也是落后的，但不是要进行资产阶级复辟。所以，我认为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只能是先进领导落后。如果大家不同意“落后”这个提法，请大家提一个名字，是否叫做先进领导“反动”？

六

阶级和阶级分子的关系问题，我肯定阶级是有本质的区别，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有本质的区别。至于阶级分子的本质问题，这要看大家怎样解释，如把本质解释为本能，那就是“先天”的了，那是站不住的。任何一种思想习惯都不能说是“先天”的。反动的人我们还可以把他教育改造过来。

阶级与阶级分子应当有所不同，这就是集体与个人的不同。从辩证法来讲，个人组成集体要起质变，阶级分子组成一个阶级也起质变。如资产阶级的形成过程，起初只有零零碎碎的资本家，没有什么具体组织，阶级本性尚不严重，当然那是处在上升的阶段。等到资本家组成旧商会，它形成一个具体的组织，阶级的恶劣本质就逐渐显著起来。再进一步资产阶级组成资产阶级政权，阶级恶劣本质的危害性更大了。更进一步组成国际资本主义，阶级本质的危害性就更加大。由分子组成集体

要经过几个阶段，是个质变过程。一万个资本家组成资产阶级，并不等于一万个资本家加起来、它要起一种质变。任何分子与集体的区别，只有这样看才符合实际。

由分子组成集体，不是一个数量上的积累，而是质量上的突变。所以，阶级本质是根本的，不可调和的；而人是可以改造的。人的本性和阶级本质不同，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也是完全符合理论的。

最近，《文汇报》上刊载了徐懋庸一篇文章，谈到人性问题时，说人性有阶级特性，也有共性，在阶级社会里，阶级特性掩盖了人的共性。马克思曾经讲过，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特性消灭了，只有人的共性了。

七

我最近参加了许多整风座谈会，发现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真是了不起。那些平时看起来很平凡的人，在整风运动中看出，他们的政治水平、理论水平、业务水平出乎意料的高。我认为毛主席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出党整风，是个很英明的号召。过去由于有“墙”有“沟”，许多力量都在互相防范、互相摩擦、互相戒备中抵销浪费掉了。这包括党与非党的关系，公方与私方的关系。如果在整风运动中，把“墙”拆掉，把“沟”填平，过去互相抵销的力量变成互相协作，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我想可以把社会主义事业加快二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完全可能的。我感觉到有些机关、企业里的“墙”和“沟”是个重大问题。我看我国的许多旧人员、旧知识分子和工商界的积极力量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潜在力还很大。

这是由于过去的斗争遗留下来的副作用。当然，过去的斗争是必要的，而且有很大的成绩，但副作用也不能否定，必须消灭才行。如果经过整风，把“墙”拆掉，把“沟”填平，大家互相协作，都成为同志关系，这是社会主义的最大的利益。

八

关于我的几篇文章问题，不外乎是“是非利害”问题。“是非”就是是还是非；“利害”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还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我要问：现在工商界私方的主要缺点在哪里？主要缺点在于消极自卑。因此，我觉得用一种实事求是的方法，把这种消极自卑解除，把过去不大

恰当的帽子去掉，相信在工商界思想改造中的重大问题消极自卑是可以改掉的。我相信党的整风就是这样的要求；先从“是非”

来讲，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工商界的消极自卑是否是主要的缺点？他们现在是否已经把所有的力量都拿出来了？他们的积极性都充分发挥了？我看没有。我感到上层较好，中下层比较差一些，即说上层也不一定都积极。究竟是多数人提高了呢？还是少数人提高了呢？从“利害”关系来看，我从没有说过工商界不要改造。工商界是要进行思想改造的，但不应是压服而是说服。不要用几顶大帽子来压。要给工商界以平等的人格。是否有些同志对思想改造的要求有点唯心主义，假如要求工商界都变成马列主义者，这是不切实际的，是唯心主义的。思想改造到哪一天才能改造好？我可以回答：活到老，学到老，但是，这个回答不能解决那些要求脱掉帽子的人的具体问题。毛主席曾讲过，猴子变人工商界并不是都能接受。我认为对工商界的思想改造工作，不能好高骛远，应该先讲讲国家政策，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等等，由近而远。我很欣赏南京市民建分会和南京市工商联举办的伟大祖国讲座，不过，除了讲祖国的伟大外，还应把祖国建设中的困难也讲一讲，交待明白，使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家能够安于社会主义的按劳取酬，安于现在低工资制的待遇，让他们充分发挥积极性，这样才恰当。现在要把每一个人都改造成为马列主义者，成为圣人，是唯心主义的说法。到哪一天才算基本改造完成呢？只有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那一天，才是基本上改造好，——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会有一些人的思想没有改造好的。思想改造脱离物质基础就是唯心主义。把现在的物质生活给大家讲清楚，使大家安于现在的生活是非常必要的。毛主席是很唯物的，他说不能让饿着肚皮接受改造。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是思想改造的物质基础，这是英明的，唯物主义的。今后民建和工商联应该把适当安排的工作做好，把前途的美丽和前进中的困难讲清楚，这才是唯物主义的；好高骛远是唯心主义的。所以我说对工商界工作的缺点有两句话，一是估价不足，二是对思想改造的要求过高。思想改造工作应该一步一步来，要随着物质基础的改变而逐步提高。

1957·6·15·下午

在民建会、工商联常委联席会议上的第二次发言

章乃器

我今天的讲话一部分是上次没有讲完的。

一

首先我谈谈思想改造中说服与压服问题。可以检查一下现在的会场是压服性质呢？还是说服呢？我认为应以中共中央这次整风的指示作来标准。可能大家记不清楚，我来念一段给大家听听：“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开会应该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应该多采用同志间谈心的方式，即个别地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斗争大会。不论在座谈、小组会上，进行批评的时候，或者个别交谈的时候，都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不应该肯定自己的一切，拒绝别人的批评。同时，对于批评者要提倡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以免抹杀别人的一切，使批评变成片面的过火的批评。每个人都应该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积极地向别人提意见，但是不得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所不同意的批评。对于一些带原则性的争论，可能的时候应该作出必要的结论，但是必须容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不论错误大小，除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并且要给以积极的，耐心的帮助，这样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我上次说×部长的讲话不能解决我的思想问题，就是作为党员，党章规定，党作出决议后，党员还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党内民主还有这个权利。

二

有同志说：“你说工人阶级不剥削、反剥削，为什么不说工人阶级被剥削呢？”

我说工人阶级不剥削、反剥削是经过考虑的，不是那么粗枝大叶的。解放初期有人说工人阶级是被剥削的，后来受了批判。因为解放后

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已成为领导阶级，不能再看作被剥削阶级了。大家看应该怎么好。

三

定息对私方个人来说是不劳而获，从阶级来说是剥削残余，我说这些话至少是通过脑筋的。　对私方个人说是不劳而获，理由是：1．私方交出的财产，其性质已经不是剥削的资本了；2．合营企业的职工已经不是剥削的对象；3．私方人员在企业工作已经不是剥削工人的人了；4．定息是从国家利润中间留下一部分给私方的，假如利润不够或亏损，还要从上级专业公司或交通银行拿款子来给定息。从个人来讲，除了由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还有以上这些理由，应该说这不是剥削。从阶级来讲，肯定是剥削残余，这是因为，给定息是根据这个阶级的资本支付的，这是国家利润的一部分，所以是剥削残余。这样讲是符合实际的，是符合理论的。但不劳而获也并不是光荣的，不劳而获有什么光荣？从个人来讲，如果也说是剥削收入，不合逻辑。所以，我认为常识与科学分析是有区别的，有些常识是符合科学的，然而不等于所有常识都符合科学。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向科学进军。

四

讲一讲集体与组成人员的不同。上次是从坏的一面来说的，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我不是说资产阶级分子没有剥削，我是说，成为资产阶级后，阶级本质越来越恶劣起来。反过来，现在从好的阶级再讲一讲，从工人阶级来讲，领导我们的工人阶级没有组织起来以前，革命的力量是不够的，斗争是自发的；但一组织了工会，力量就强大了，有的大一倍甚至几倍；假使再有共产党的领导，力量就更大了，不但在经济上能取得胜利，而且在政治上能取得政权。这是质的突变，而不是数的增加。我们有些工商业家在这方面没有看清楚，他们看个别工人是平凡的，就认为工人阶级就是这么回事，这是完全错误的。工人一经组织起来形成阶级，力量就会增加几倍，要是12000人的话，就会变成36000人或更大得多的力量。资产阶级心里面有一套轻视群众的心理，不知道个别的人要是参加了群众运动，力量就大多了，群众的力量并不等于个人力量的相加。拿破仑说过，一个法兰西人和一个日本人比，比不过日本人；但300个法兰西人和300个外国人比，力量就大了。

五

对资产阶级的看法。我对资产阶级看了40年，也可以说是研究了40年。我对资产阶级的认识，是经过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是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的过程。现在到了否定的否定的阶段。否定的否定法则，恩格斯、马克思是把它肯定的，苏联在过去有一个时期不重视这个法则，现在大家也肯定了这个法则。我认为由肯定到否定，否定的否定，从现象上看貌似肯定。我提出资本主义经营的优点是有的，这一点我要是讲起来，可能又说我是歌颂资本主义。大家可以看看刘少奇的报告，我所肯定的资本主义的精华没有超过这个报告的范围。同志们看过列宁的文章，列宁肯定资产阶级的优点就更多了。如果说我美化资产阶级，难道列宁、刘少奇也美化资产阶级？

还有一点附带声明，我认为思想上有些资本主义思想，有些封建残余，不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说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改造的。如果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面太广了。我认为从政治上看，要资本主义复辟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这次党的整风文件，对党内知识分子也说明这样的精神。“对于知识分子党员，还要着重要求他们联系工农群众，分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克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加强党性。”可见，思想斗争还是应该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不能说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政治上是反动的。这一点请同志们多多考虑。

六

××老讲的话，有些地方满好。但其中对我的文章的批评，也许是执笔的人疏忽了，或性急了一些，如×老说我说：“历史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都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不错，我是这样说的。但×老接下去说我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只能是先进的分子领导落后的分子，并没有阶级的区别存在；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阶级领导别一个阶级的问题存在。”×老由此推论说：“这不仅否定了今天工人阶级的领导，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阶级的存在。”

为什么我说执笔同志性急了些呢？我接上面那句话讲的是：“不能设想一个先进的阶级领导一个反动的阶级”，这说明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只能是一个先进的阶级领导一个落后的阶级。要是说我否定社会阶级的存在，否定一个阶级领导一个阶级，我思想上是不能接受的。这是需要平心静气，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解决问题。

七

我们为了对工商业者思想改造有利，今天不是打擂台，应该根据工商界客观思想情况的存在，作实事求是的解释与说明，对症下药。应该是这样的过程。

说我要争取市场，这对我说是很可笑的。今天任何个人要争取市场都是做梦，是条死路。×××发表在报上的发言，有两句话："没有共产党，章乃器怎能当人大代表，怎能当部长呢？"部长也好，人大代表也好，这是人民给我的荣誉，我以责任感来接受，没有认为是权利。争权夺利的事我向来不做。说我写文章争夺市场，请考察我这些文章是怎样发表的。登在《工商界》上的这篇文章，是我要写文章在《工商界》刊登呢？还是《工商界》出题目要，写文章呢？既然要我写文章当然只能写我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别人的思想。这怎么能说是争夺市场呢？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两篇文章，第一篇是在统战部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的谈话，当时我曾说最好作为内部谈话，×部长说：为了开展整风，发表了对推动整风有好处。没有想到那次的谈话，《人民日报》上发表出来了，《人民日报》第二次登出来的《"墙"与"沟"》一文，因为我那天有事，没有参加座谈，是以书面发言的，我还写了一封信给×部长说是否要发表，请你考虑，我个人是没有顾虑的。我常常想我是依靠共产党的，有人要求民主党派轮流执政，我是不赞成的 顿如由民主党派轮流执政，我从民建某些同志的行为来看，我是会被陷害的。我认为党中央是会明是非的，所以搞得思想不一致，要查根源。两面性问题，在二中全会的发言我也是要求作为内部高级领导讨论的，大家可以查考记录。也可以查一查我开始时有没有说过没有两面性。

八

争鸣不是抗拒批评。有一些复杂问题是要经过反复讨论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同志们可以检查一下，从两面性的问题提出后，有许多同志不同意，引起讨论，有些人是否通过讨论也提高了呢？说章乃器荒谬言论，我是不承认的。《人民日报》说章乃器"拒绝批评"，这四个字我不接受。老一套的东西，往往容易不自觉地拿出来，我们会场上的气氛都可以看出来，今天会场上的组成人员是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高级领导，被批评的对象是两会副主委——章乃器，和风细雨够不够呢？是压服还是说服呢？我怀疑各地开会是压服多还是说服多，请检查一下。我真诚地要求在这次讨论中，大家以说服的态度和方法解决问题，对工作有利。有些同志有些意气用事，希望轻松愉快些，我是"心安理得，轻松

愉快”。我不承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再讲一句话，我这人不勉强争取作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的帽子，可能实质上我还是左的。大家通过讨论提高思想很好，但不要想入非非，变成虚无主义。

关于李万铭的话，我是说不应当对党员个人崇拜，完全没有拿李万铭代表党。

说平等人格，是说不要给工商界扣帽子。为什么工商界要求摘帽子呢？有帽子就说明是不平等的。在宪法上规定有要扣帽子吗？我看是没有吧？

有人说我在《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的发言是袒护章伯钧、储安平。这是不对的。我认为现在正是对这些人批评，检讨慢些发表好。我对他们是实事求是的批评。

至于是不是实事求是，有记录可查，将来可以公布。

对工商界的问题，我并不是以工商界身份代表工商界，而是以国家高级干部的身份来发表对工商界的看法。我是为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根本不必要在工商界争夺市场。

至于先进领导落后的问题，改为新生领导衰落也好，可以考虑。我觉得应该从思想上去认识。新生也就是先进，衰落也就是落后。由于党坚决执行和平改造政策，因此引起改造高潮，不要共产党领导完全不是事实。

说大家都有两面性，并不是说所有有两面性的阶级表现都一样。这在我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我举一个例子，人都有两个眼睛，并不等于人都是一样，没有好坏。

人有先进、落后和反动的，这是客观事物的反映，是客观存在的辩证的性质。

说我的言论是反动的，是挑拨的，我想可以检查我的全部言论。我对党中央没有说过一句不利的话，没有一点损害党中央的威信。就是在墙和沟这篇文章中，也说明了中国的党是一个好党。对党员的教育是另外一回事。很明显的，有错误的党员是少数。1200万党员如果有百分之一有错误，也不过12万人，只是少数人的问题。

另一点，为了保卫、巩固我们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国家政权，不怕公开，就怕隐蔽，反对的公开站出来，不可怕，隐蔽，偷偷摸摸地做坏事情才会令人痛恨。因此，我认为大家有一些不满情绪与牢骚、怪话，让它暴露出来没坏处。比在少数人中传播比较好。整风运动的精神是好的公开的，对我们的批评没有什么可怕。的确，在中国搞匈牙利、波兰事件是搞不起来的，希望在这时期让工商界畅所欲言，暴露思想。有些混乱思想，在党中央应是意料之中的。

有人说，我好比是给资本家抽大烟，在高潮以前还可以这样说，高潮以后已戒掉了。

否定运动成绩，否定领导的话，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可以看我的文章。我从来没有一句话否定“三反”“五反”等运动的成绩，也从来没有一句话否定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我讲得明明白白，白纸黑字。

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是在资本主义消灭以后，在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内部斗争中。我说这句话是表示对官僚主义的痛恨，不能说是留恋资本主义。

另外，说工人阶级与资本家一模一样，我没有这样说。我说是先进与落后。

有人说我说中小工商业者都是市侩。中小工商业者中有市侩大资本家中也有市侩。这是歪曲我的话，我不能承认。

我再讲一讲，我对我这些言论的态度，一个人的文章不可能完全对，我个人发表的文章可以全部推翻。希望同志们按照整风的精神来处理，按照整风运动指示的精神好好的讨论这些问题，处理这些问题。我要求组织少数人讨论，也就是这个意思。

我这个人写文章不是不经过考虑的。我还是诚恳地希望同志们按整风指示的精神，好好地讨论这些问题，我希望少数人讨论，也就是要按照整风指示的精神来研究。我认为整风运动的指示应作为思想斗争的指导。

1957·6·17下午

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

章乃器

本报特约新华社31日讯在今天继续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谈了话。

他首先谈到这次座谈会开得很好，因大家都说了真话，把问题摆了出来，这样就有利于解决。接着他说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从消灭民族资产阶级过程中间，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提高工商业者的政治觉悟，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以作到妥善地消灭资产阶级，只有这样才对社会主义有利。

他认为只要明是非、除三害，就能发挥私方的积极性。

他说，对工商业者的改造，不能采取形式主义，有些人自认为立场很稳，口号喊得很响亮，给工商业者“扣帽子”，甚至用打击吓唬的办法，压服他们，结果，使工商业者缩手缩脚，不敢做工作，还有的不敢接近工商业者，生怕玷污了自己。

这都是形而上学，没有真正从工人阶级利益考虑问题，因为这样就谈不到团结改造工商业者了。

接着他就如何发挥和提高私方积极性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这只有六个字，就是明是非，除三害。因为宗派主义者是不愿明是非的，他靠颠倒是非来弄权，只讲亲属、裙带关系，只顾听恭维、奉承。主观主义者不可能明是非，因他脱离了客观实际，完全凭主观想像处理问题。官僚主义者不敢明是非，他们心里虽有是非，但怕讲出来会影响自己的地位丢掉纱帽。他们只知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或做群众尾巴。这三者是互相统一的。

他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

他认为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复辟，但官僚主义时时刻刻会在人们思想中复辟。如果社会主义企业加上官僚主义，那它的效率就将比资本主义企业低。我并不是留恋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也有好有坏，我们应该吸取对社会主义有益的东西。他说，为什么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经营得反而不如过去的现代化私营

企业呢？这是因为资本家为了图利，善于选用人才，并且对人才的培养、提拔，还要尽量表示公平，不这样，他就很难和别人竞争。而有些社会主义企业却不能做到这点。他说，只有做到是非分明，按功、过提拔安排，才能真正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光“重德轻才、以资代德”就会造成是非不明，调动不起来积极因素。

他说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党与非党，则工作永远做不好。

他说，关于公私合营企业里几种关系问题，应该明确以公私共事关系为主，阶级关系是残余，因阶级已基本上消灭。在工作关系中，不应该分公方、私方，党与非党；要按职责和分工办事。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党与非党，则工作永远做不好，只有在思想改造的学习中，可以提醒工商业者还有阶级关系残余的存在，但也不能千篇一律，要因人而异。如果一个私方很进步，和公方、职工的关系搞得很好，就不能强调阶级关系。另外，不能把阶级关系当成一种压力，去改造工商业者，只有通过说服教育，才能达到改造的目的。

他认为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而应说是不劳而获的收入。

接着他谈到定息的性质。他说，有些人认为定息的性质是剥削，我认为很值得研究。因为照剥削字面讲，被剥削者应该是很痛苦的，但我们又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当前的矛盾，并不具有对抗性，这就说不通了。我认为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而应说成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样，工商业者才能心平气和。他还说，2000元的杠子，也有重新考虑研究的必要，因为这个数字太小了，很难划分2000元以上的都是资产阶级；2000元以下的都是小资产阶级。

他还谈到群众观点问题。他说，不关心群众疾苦的人，尽管每天都和群众在一起，也不会了解群众的情况，这是假的群众路线。他对大家说，对资产阶级要恨，但对资产阶级分子要爱护，要抱着与人为善，热爱群众的精神去团结改造工商业者。

他认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他还说，目前我国所有阶级的特性已基本消灭。

最后，他谈到工商业者两面性的问题。他说，关于这个问题，已专门写了文章，即将发表出来。他认为，必须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经过“五反”和全行业合营高潮，工商业者交出了生产资料，如仍教条主义

地强调两面性，这对工商业者自我改造的信心有很大影响。他说，哪个阶级都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也有，只不过积极、消极两面的比重大小不同，这是一个先进和落后的问题。他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即一是剥削阶级，一是不剥削和反剥削的阶级。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不能说有本质的区别。资产阶级的剥削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只能消灭，不能改造；而资产阶级分子是可以改造的，因他的剥削不是与生俱来的。他认为目前我国所有阶级的特性已基本上消灭，大家正在向人类的共同本性过渡。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

我的检讨

章乃器

（这是作者在1957年7月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我是一个犯错误的人。我的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

的确，在解放以前，个人英雄主义对我是起了一些有益作用的。那时我正处在社会主义的理想与资本主义的现实环境的矛盾中。依靠党对于我的领导，也依靠我那不与当时环境同流合污的个人英雄主义，我才能脱离泥坑，走上革命。在一九五二年，我曾经批判了我的个人主义。我认识到：即使它在旧时代曾经对我有用，今后是无论如何都要不得的了。我认识到：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同个人主义是恰好对立的。在以后的三年多的时间内，我的个人主义有所克服。但，从一九五六年春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的个人主义又有所滋长。更因为自恃不争名夺利，没有什么个人利己主义，反而助长了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 愤体表现在同许多方面的工作关系上甚至家庭关系上，都发生了不协调的情况。而这次在言论方面所以发生的错误，正是同我的个人主义和片面乐观观点分不开的。那就是说：我把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估计得太乐观了；同时，由于文章是从一系列反教条主义的争论当中发展起来的，带来了许多个人主义的意气，也就带来了片面性；还有，发表而不慎重估计影响，又犯了自由主义的作风。

在学习了毛主席的讲演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后，又得到许多同志的热情帮助，我在思想认识上有所提高；现在先就以下几个论点，加以检查纠正和澄清：一、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我本来说：定息从私方人员的个人来说，是不劳而获，而不是剥削；从整个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则是剥削的残余。这是根据过去已经有人肯定：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而引伸出来的。现在毛主席的讲演分析了：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之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这一分析是十分正确的。从而，他在下文所说的：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也是十分正确的。我应该否定我本来的错误说法。

二、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我的原文把“本质”解释为“本能的、先天的”，“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这种解

释是片面夸张、脱离实际的。因而，根据这种错误解释而得出没有本质区别的结论，当然是错误的。

一般对于“本质不同”的解释，应该是剥削同不剥削、反剥削有本质的区别。这种本质的区别当然是存在的。

三、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我并没有说，社会主义必然带来官僚主义。恰恰相反，我认为“只要肃清‘三害’，就成为标准的社会主义的企业、机关”。但，某些右派分子已经把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甚至“三害”之间画上了等号，我的说法容易同他们的说法混淆起来。我应该否定我的说法。

四、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我没有这样说。我说它有两面性，但内容已经改变。我的说法还会有错误，当继续检查改正。

五、工商业家不经过改造就可以爱社会主义——这不是我说的。我在《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文内，单在（二）、（三）两段内，就有三次提到了党和政府的改造政策的胜利，而且还强调提出，“存在决定意识”，要看到“大存在”——人民力量的强大、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的强大、祖国史无先例的统一与兴盛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日益团结与繁荣。

其他还有需要纠正的错误论点，容我继续检查。对于理论上的错误，一经搞清楚，是可以毫不顾惜地加以否定的。

我坦白承认，我极力主张缩短人民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以利于团结和工作队上了我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社会主义改造的过分乐观的估计， 片面强调提高他们的积极性的一面，就很可能带来混淆阶级界限的副作用。但我绝对不会愚蠢到认为资产阶级比工人阶级高明，资本家比工人好。我一贯主张工商业家需要在长时期内进行人的自我改造。我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估价，总的是四句话：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长有所用，死得其所。是说它在我们的时代里能够发挥一些有益的作用，最后能够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消灭自己；这是好的。我不认为这是美化资产阶级。我始终认为它是比工人阶级落后的阶级。一个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他在思想战线上肯定是属于右派的。但我经深刻检查，我同那些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

许多同我接近过的人都可以证明，我经常是一个革命乐观主义者。我曾向许多人说过，解放以前，有三种威胁经场防缠着我：一种是政治威胁——反动派随时可以杀害我；另一种是社会威胁——反动派可以指使流氓迫害我；还有一种是经济威胁——企业随时可以破产，陷于失业。解放后，这三种威胁都完全消失了。我现在只有一条心——做好党和国家交给我的工作；学习也是为着工作。我每天工作和学习的时间，往往超过十小时，为的就是社会主义。

八年来，我的言论和行动同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确是毫无相同之处的。第一，我从来没有夸大国家工作的缺点，抹煞国家工作的成绩。刚刚相反，我经常为每一点一滴的国家工作成绩而引以为荣；因为那当中有我的极其微末的贡献。第二，我坚信党和国家的强大，绝不相信匈牙利事件会在我国发生，而且从来也不打听学生可能闹事的消息。如果要检查我的思想的片面性，那只是片面的乐观，而绝不是什么悲观。第三，我参加各项工作、各种会议，以至到各地去视察，一贯地都是以主人翁的自觉，帮助领导上解决问题，而绝不遇事生非，到处点火。第四，对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我一贯表示最友好、最真诚的态度，没有丝毫违背“一边倒”的精神。第五，我从来也不搞什么小组织，从来也不争取私人的权利；对于国家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和待遇，经场孵得已经过高，从来没有丝毫不满。因此认为必须夜以继日地劳动，做好工作，才能对得起党和国家。第六，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对党所提的意见，没有超过批判“三害”的范围，所指的只是某些和部分党员的缺点，而绝没有涉及全党和党中央的地方。我相信，目前一些对于我的流言，都会逐步得到澄清。

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不但没有怀疑，而且往往还觉得是出于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体工作的做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见的，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与党员的合作共事关系，绝大多数也是和谐的；但对于少数党员的态度、作风是有批评的。

我愿意问清楚道理，要求讲清楚道理，态度往往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觉得许多党员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我自己也觉得不应该自外。态度的直率也自以为是从党员那里学来的；可能加上了一些自己的个人主义，就不够端正。

自从学习了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展开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以后，我提了一系列有关非党人士对党员态度不够正常的意见。我认识

到，中共是一贯反对个人崇拜的；但，我们一部分非党人士却违反了党的意旨进行个人崇拜。如政协全国委员会，就曾经通过一个设立毛泽东大学的议案，当时我也是举手赞成的；这个议案是因为毛主席的反对才没有实行的。一个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使别人同享幸福”

的基础上的党，一个努力于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与全人类的解放斗争中来解放自己的党；它被迫进行战争，为的是永远消灭战争，它实行专政，为的是最后消灭专政。

这一系列大公无私的伟大精神是容易使许多人体会不了或者体会不够的。对革命领袖以至对党员的尊敬是应该的，这是经过鉴别基于理智的事情。这同神化革命领袖，以至对党员进行盲目的个人崇拜，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公报要求党员警惕资产阶级的无原则的捧场，认为那是糖衣炮弹。我曾经批判了那些用无原则的捧场和个人崇拜腐蚀党员的现象。显而易见，这与所谓“丑化党员”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本来，我有什么理由丑化党员？我每天和党员在一起工作，怎能丑化党员？坦白地说，我的确丑化了一些对党员进行阿谀奉承的人。也很可能，我在这上面态度又有些过火了。

我绝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到死都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立志、下决心，是每一个人的主观可以决定的。哪能设想，一个在黑暗时代，在敌人千方百计的威逼利诱之下，都不肯表示反共的人，今天反而要反党？不能设想，一个在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在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如此辉煌胜利的时候， 反而要反社会主义？8年来，我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要依靠什么政治资本搞争名夺利的勾当。我一心依靠党，愿在党的安排下做一名自食其力的普通公民。

居然有人说我参加了章伯钧、罗隆基在全聚德召开的会议，而且答应在他们所策动的未来的反动组织中担任职务。我必须声明，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近两年来，我一共只到过四次全聚德餐馆，都是有关方面宴请外宾的场合。我的行动是众目共见的，是可以调查的。王造时上次来京的时候，我曾和他谈过一次话。当他提到要恢复救国会，征求我的同意的时候，我即一口回绝。我说，第一，我在重庆时就离开了救国会，救国会解散我也没有与闻，今天没有资格主张恢复它；第二，我对民主党派工作没有兴趣，参加了一个民建已经嫌多，屡次想退出，哪有心情再搞第二个？第三，我和救国会的某些同志过去合作得不好，今后也不能希望合作得好。哪能谈得到什么担任职务呢？

某些人相信：“众口可以烁金”；“曾参杀人”，重复了3次，慈母也为之动摇。我认为，这是旧时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

我始终认为：我的问题只是思想的问题；我的错误只是理论上的错误。当然，如果我的理论错误已经造成了超出时代思潮影响所可能引起的波动，那我应该负责。

我请求领导上结合动机和效果，加以检查，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显而易见，会有许多人带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进入社会主义，但我，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却不应该再有个人主义思想。我一定坚决克服我的个人主义思想。

希望同志们继续帮助我！

（原载《人民日报》1957．7．16）

章乃器在1957年

章立凡

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1957年那场政治风暴的前前后后，父亲始终是一位不断引起争议的人物。有的人激赏他那种刚正不阿的性格，誉之为“中国骨头最硬的知识分子”；而在另一种场合中，他又被金口玉言地赐予“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之类的“活谥”。成为这样一位集毁誉于一身的人物，或许是他在历史上的幸运，但同时也是他在现实中的悲剧。

自1979年起，我不断地为父亲的平反问题提出申诉，民建，工商联（父亲是其创始人）的胡厥文、胡子昂老先生均主张平反，但有两位当年整过他的同事却联名致函中共中央， 反对平反。1980年4月间，有消息说，在27位当年被划右派的知名人士中，父亲在不予改正之列。我手持当年印发的《关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材料》，到胡耀邦同志处上访，请求对这些言论重新甄别评估；又分别给邓小平、陈云同志上书。同年6月传达的中共中央60号文件，父亲的名字被列在改正的22人之首。

一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在1957年当上“右派头子”殆非偶然，他的命运早就由他的性格决定了。请看邹韬奋先生在“七君子之狱”时对他性格的描述：乃器的性格是偏于刚强的方面，但却不是无理的执树；他和朋友讨论问题，每喜作激烈的争辩，只要你辩得过他，他也肯容纳你的意见，否则他始终不肯让步。有些朋友觉得他在争辩的时候有时未免过于严厉些，但是知道他的性格的人，便知道他心里是很纯洁的，是很热烈的，一点没有什么恶意。

另一位老友许汉三也有类似的记述，我和他交往几十年，看到他办事情，总是要实事求是，在参与会议或商量事情时，或赞成或反对，总是态度明朗不作模棱两可之词。遇到情况特殊，势炎逼人，不能反对的时候，他宁肯沉默不语，也不作违心之论，以表苟同。

可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或接受父亲的性格。他一生经商、治学、从政，始终未脱书生本色。解放后担任了一些重要职务，但清高孤傲的脾气没改多少。对于某些圆滑世故、阿谀逢迎的政客作风，他往往

因不以为然而有所讥讽。父亲对工作一贯勇于负责，不避嫌隙。他能力强而又比较自负，有时在国务院的会议上，他为一些工作上的问题舌战群儒，力持已见，虽然周总理一般总是尊重他的意见，但也难免招致其他同事的不满。许汉三曾回忆说："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有些党外人士心存客气，或有所畏惧，对执政党的政策或对普通党员有意见，甚至发现错误，多数唯唯称是。而章乃器遇到这种情况，则不仅与其争论，而且还进行斗争。

我怕他受到打击，多次劝他不要这样做，他总是反过来批评我，说我的意见实际上是'明哲保身'的个人主义和作客思想。他多次在公开讲话或私人谈话中，劝人不要有作客思想。要把国家一切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不辞劳怨，全力以赴。"

父亲除担任国家的粮食部长外，还担任民主建国会及全国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

他的这两项职务经常会涉及到一些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政策问题。早在1957年反右以前，他就在两个问题上与一些同事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第一个是关于民建的性质问题。在当时的一些外事活动场合，如接待英国工党代表团时，　　民建是以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面目出现的。在1955年5月民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父亲作工作报告时，按照自己的理解插了几句话，大意是说：在国际友人面前，可以说民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但同时要说明，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个政党。如果外宾们说：那你们的党可以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了，我认为可以欣然承认。他的这番话引起了一场争论，许多人不同意"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的提法。到了后来，这一提法被截去了"政党"两字，成为他美化资产阶级的一大罪状。

父亲在辩论中引用了列宁和刘少奇关于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进步作用的论述，以及刘少奇"红色资本家"的提法作为佐证。他还谈到："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指着我说，'我很同意你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我们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存在？'我提的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既然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有什么不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政党'？"

到了1957年反右时，毛泽东改变了说法，他在10月13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

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就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此乃后话。

第二个争论的问题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民主革命时期的提法是既有革命的一面，也有软弱、妥协的一面；建国初期的提法是既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1956年国家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 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种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转换，当然也需要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出新的估价，但当时的理论界尚未作出应有的回应。

父亲一直抱着消灭阶级的社会理想。早在1949年9月的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就号召民族工商业家：要准备在将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摆脱资本主义衰老时期的苦恼和罪恶”；“在目前努力发展自己的事业，积累自己的资本，而同时准备在将来条件成熟的一天消灭自己的阶级……当消灭自己阶级的时候，每个人会更愉快的生活着，事业会更光荣的为人民服务。”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公开提出消灭自己阶级的主张，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出于响应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号召的良好愿望，父亲在一些内部场合，对新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有所探讨，他提出：“八大”政治报告中“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这句话，“能不能解释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也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如果可以这样解释，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已经基本上消灭了，留下来的只是残余或者尾巴罢了。”“既然政治经济上的消极面已是残余，而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地是思想作风还有消极的一面，那么，与其笼统地提两面性，还不如在大力鼓舞生产积极性的前提下，具体的指出必须改造的哪些资本主义的思想作风。”出人意料的是，他这些在内部探讨的意见却被搬到一些会议上进行公开批判，并被贴上“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的标签。于是父亲不得不与批判者展开一场新的辩论，这场辩论一直持续到1957年。

在私营经济大量出现、并在国民经济中重新占有一席之地的今天，回顾这两场辩论，确实令人有不胜今昔之感。而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父亲的悲剧角色似乎已是命中注定。尽管如此， 父亲仍保持他直言不讳的风骨，在1956年7月和10月的统战工作座谈会上，他对党派关系、阶级关系、党与非党关系等问题上也提了不少尖锐的意见，批评了人为制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简单化、统战工作庸俗化等倾向。

毛泽东当时已对他这位老朋友很有看法， 他在1957年1月27日的一次党内会议上说："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们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二

1957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2月27日下午三时，父亲到中南海怀仁堂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到京准备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协委员们，也全体列席。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会议开至晚七时方散。毛主席在讲话中谈笑风生，纵论古今，特别是他谈到阶级的消灭和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其理想和人格的魅力给1800多位与会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人们在夜幕中离开灯火辉煌的怀仁堂时，一股温馨的暖流开始从这中国的政治中心流向全国。

政协会议期间，父亲接待了一位上海来的老友——当年"七君子之狱"的"难弟"王造时博士。此时的王博士，已不复当年在法庭上滔滔雄辩的风采，这些年来，他一直寂寞地在复旦大学当一名教授。有的朋友为他感叹："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王造时此次是来京出席政协会议，同时也是为了向中共方面澄清一桩历史误会。

此事说来话长，抗战期间，苏联政府继与纳粹德国签订"友好互不侵

犯条约”之后，又于1941年春与日本法西斯政府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相互保证尊重“满洲国”

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消息传出，中外舆论哗然。在重庆的救国会领导人联名发表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对苏联的这一行动表示遗憾。此信是众人公推王造时起草的，署名者为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仆、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王造时九人。后来沈钧儒应中共的要求，收回了这一信件。父亲不同意收回，因而脱离救国会。为此，父亲和王造时均沾有“反苏”之嫌。

解放后，王造时为此信一直独自背着“始作俑者”的黑锅，心情很不舒畅。此次来京，他坚请沈、章、史、沙等同人为他作证，共同承担责任，澄清此事。周恩来总理和统战部负责人接见了他，误会得以消除，王的心情也好多了。

周总理在与王造时谈话时，对救国会于1949年自行结束一事表示惋惜，并问他是否考虑恢复救国会。不料王对此过于认真，在京先后拜访了一些救国会的旧友，想共同倡议恢夏救国会，但响应者寥寥。当王为此征求父亲的意见时，父亲坦率表示：“第一，我在重庆时就离开了救国会，救国会解散我也没有与闻，今天没有资格主张恢复它；第二，我对民主党派工作没有兴趣，参加了一个民建已经嫌多，屡次想退出，哪有心情再搞第二个？第三，我和救国会的某些同志过去合作得不好，今后也不能希望合作得好。”

王造时不久就回上海去了。两个多月之后，这对20年前的“难兄难弟”，又不约而同地成了右派，他们这次会见也被说成是“阴谋组织资产阶级政党”。“文革”

中，王造时惨死在狱中。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欢迎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提出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执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30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毛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

5月间，　在一派“和风细雨”的迷人春色感召下，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纷纷直陈己见，全国鸣放进入高潮。谁也不会想到，仅仅

一个月之后，阶级斗争的号角又重新吹响，“向自然界宣战”变成了“向早春天气”宣战。

三

为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　中共有关部门5月间在北京分别召开了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前者开了13次，后者开了25次。在这些会上，不少人对党的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当时称为“三害”）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

父亲一直是主张独立思考的，　整风开始前，他在4月15日的一次发言中，提出要防止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他认为：“革命领袖有时为革命辩护讲的话，就不能机械地用来指导今天的革命工作。”并举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两句话为例，指出这些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适用的；但“现在生产建设有些工作细致些，尤甚于绣花”；在革命胜利后对反革命分子的改造中，“也不是采取残酷手段，而是采用革命人道主义”。

当时，父亲的主要精力放在粮食部的工作上，计算粮、油的全国社会平衡，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一届人大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他还在部内召集了几次会议，讨论适当放宽北京市周围的粮食统销指标和改进粮油特殊供应的办法，以阻塞漏洞，防止发生“大民主”一类的不安定情况。自1952年他主持创建粮食部以来，为了解决这个六亿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父亲每天工作都在10个小时以上，连星期天也很少休息。由于工作繁忙，他在整风期间只参加了三次鸣放座谈会。

在鸣放中，非党人士普遍反映“有职无权”。在5月8日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父亲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讲到这里，他声明说：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政治思想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

父亲还对《人民日报》 4月22日的一篇社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社论中说工商界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提法不妥，“照道教的说法，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改革关、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就是说，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已经改造过了，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如何能不消极自卑？”

次日一早，父亲打开《人民日报》，发现自己昨天的发言赫然刊载其上。这天他再度参加座谈会时，向一位中共领导说，我认为会议是内部会议，内容是不发表的，发表了我觉得有点意外，我怕会影响大家发言的积极性。这位领导说，以后发表与否，听各人自便；但发表了，对推动全国的运动有好处。

12日他出席了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但只作了简短发言，鼓励大家畅所欲言。13日他因为有事，没有参加民主人士座谈会。只送去一篇题为《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的书面发言，并附一函说：稿子是“信笔直书”的，草率的，也是坦率的；要不要发表，请领导同志掌握，我并无顾虑。这一篇书面发言于次日见报。

此前已有不少人士指出，党与非党之间存在着“墙”和“沟”，于是有党的领导人提出要“拆墙填沟”，开诚相见。父亲在这篇书面发言中提出，斯大林所说的“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是不科学的，容易引起误解，可能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 还有很值得注意的一点：1200多万党员，只要有1％的党员犯错误，绝对数字就是12万多人。这么多人在领导地位上犯错误，对国家和人民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害。

他还批评了“以党代政”的现象，指出，不少党员对国家的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不但国家行政机构的作用没有被足够的运用，国家的权力机构也没有被足够地重视——县以下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不正常和不充实的情况是严重的。他主张：党组织有如戏剧的编导，其他国家机构有如演员、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编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代替其他人员。这样，党组织可以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清醒，领导更加全面，而且更加主动。

四

5月20日这天凌晨，　父亲呷了一口青花瓷杯中已冷的龙井茶，燃起烟斗在书房内被步。写字台上，平摊着刚刚完稿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这是《工商界》　月刊指定的题目，为了赶在6月10日刊出，他不得不熬夜赶写。自从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以后，他感到心情很舒畅，这一夜他在案头直抒己见，一挥而就。

父亲不可能知道，此时在党内的一些高干的案头，正放着毛泽东五天前写的党内通讯《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中有一段后来很著名的话：“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他也不可能知道，一些领悟了领袖战略意图的党内领导，这两天正忙不迭地给某些党外朋友暗中打招呼，劝他们免开尊口，免得日后吃罪不起。

5月31日，父亲出席民建中央召开的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并即席发言。6月1日和2日，《大公报》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节录他发言内容的新闻。他再度感到意外，因为这是在一个内部会议中提出供大家讨论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见。由于两报发表的新闻都很简略，而且内容也互不一致，他只好再度开夜车将发言的大意整理成文，加上《关于工商界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标题，于6月3日送交《大公报》编辑部。

在这两篇文章里，他回顾了不同历史时期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他认为：阶级必须最后消灭，但人是可以改造的。从这点来看，阶级本质与人的阶级的特性是有所不同的。资产阶级的本质——剥削，的确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

当封建社会孕育资产阶级的时候，就遗传给它以剥削的本质。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的阶级特性却并不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难道曾经有从娘胎里出来就一定要当资本家的人？“脱胎换骨”的提法会把改造工作神秘化起来，使人望而生畏。

他还对定息的性质发表了看法。当时经济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定息是剩余价值，另一种认为是剥削而不是剩余价值。父亲则提出：从整个阶级来说，定息是剥削的残余；而具体到个别的阶级分子来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他的理由是：一、私方交出的财产，其性质已

经不是剥削的资本了；二、合营企业的职工已经不是剥削的对象；三、私方人员在企业工作，已经不是剥削工人的人了；四、定息是国家利润中间留下的一部分给私方的，假如利润不够或亏损，还要从上级专业公司或交通银行拿款子来给定息。他还谈到，有些人在解放以后，为了响应政府发展生产的号召，把银行存款提出来投入企业，过去几年股息的收入还不如存款，今天的定息也不如存款，还要负剥削的恶名，他们心中是不服的。对于这种情况，必须区别对待。关于划定资本家成分的问题，他指出不少职工的存款都超过2000，资本稍微超过2000元就算有一个资本家，似乎不够合理。

父亲在这两篇文章里还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他认为："假如不幸而让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当中起主导作用，那不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幸，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损失。""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肯定不可能在我国复辟，而官僚主义却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复辟。

在资本主义当中，我们还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在生产、经营上有益的经验和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他的这些观点在当时被扣上美化资本主义、美化剥削、攻击党的领导等等罪名，以今度之，却可谓不幸而言中。

进入6月以后，　形势果然象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变化。先是由一位著名的国民党元老出面，于6月2日发表书面的谈话说，"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这是"右派"作为一种政治新概念，首次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6月3日民主人士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在统战部长李维汉的总结发言稿上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

6月5日，初夏的北京落了一场雨。在国务院礼堂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已有人开始对父亲的言论提出指责。据民建的一位老先生在日记中记述：当天下午四时半，周恩来总理来谈中央结束鸣放的日期及对鸣放的看法等问题。夜九时半，他被从睡梦中唤醒，紧急召往中南海颐年堂去见毛主席，工商联的某老也被同时召见。

毛同两老谈了"鸣放中发见种种"，认为："章乃器是和我们走两条路的"；还谈到"章伯钧反动语"　，　"他和罗隆基勾结了"。毛泽东希望民建

的他回到民盟去（他曾是民盟发起人之一，后又于1947年主持解散民盟），但他有自知之明，回答说“走不进”。三人谈话持续到12时29分方结束。这场谈话给父亲的政治前途以及所谓的“章罗同盟”定下了调子。

毛泽东既有此旨意，两老平日与父亲又有过龃龉，第二天就在民建、工商联的一些相关人士中奔走相告。这时，父亲应《工商界》月刊之约撰写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一文尚未发表，于是有人打电话给他，要他同意提前印出来在工商界座谈会上讨论。6月7日，这篇文章在座谈会上散发，立即成为有系统的攻击的靶子。

五

6月8日的《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发表了毛泽东为该报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日，中共中央下达了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反右派斗争”就从这一天正式开始，“和风细雨”一下子变成了急风暴雨。

当天，举行了最后一次工商界座谈会，父亲虽未与会，但已陷入重围。此后的十余天里，批判急剧升级，火药味越来越浓，帽子越来越吓人。他从一位与中共共事多年的民主人士，一下子变成了“反共反人民的老手”、“右派头子”。

这时的批判方法也颇堪玩味，有不少路数其实是开“文革”中“大批判”之先河，披览之余，兹择其妙者分类列举如下：一曰移花接木法。此法源自古代幻术，你的原话是这个意思，经批判者移花接木，就变了另一种意思。如原意是担心思想改造要“脱胎换骨”的提法会加重被改造者的思想负担，并被敌人用来作反宣传；有批判者演绎出“抽筋剥皮”四字移接于后，指称：章乃器说工商界在过“五关”之后，还要有“脱胎换骨”“抽筋剥皮”

的最后一关。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右派抵制改造时也引以为据，并表示不解：“这位先生，谁人去抽他的筋，剥他的皮？”

二曰断章取义法。前法是加法，此法是减法，取自古代刀笔猾吏。你的原话本意是完整的， 经批判者掐头去尾， 截取一段，曲解成另一种意思。如前面提到的“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红色”是形容词，以修饰“资产阶级政党”，本意是强调民建的进步性；批判中删去“政党”二字，变成“红色资产阶级”，就可作为美化资产阶级的罪证。又如原话是“定息不

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截去后半句就变成“定息不是剥削”，与原来的意思大不一样。

三曰无限上纲法。此法明清两代文字狱常用，经过“文化大革命”更加发扬光大，家喻户晓。你批评教条主义，就把你上纲到反对革命导师的领导；你批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以党代政，就扣上“反对党的领导”的大帽子。大网弥天，罗织入罪。

四曰整旧翻新法。此法传自民间的工匠，裁缝师傅用之最多，割裂时代背景或曲解原意地加以诠解，挂联当前形势，一番穿凿附会，就足以证明你的反动立场由来已久。当时民建、工商联曾为父亲编过这样的专辑。在我为他申请平反和编纂文集的时候，这几本现成的小册子倒是帮了我不少忙。

五曰指鹿为马法。此法袭秦代宦官赵高之故智，似是而非，偷换概念。例如父亲的文章谈到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认为“历史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都只能是先进和落后的区别，不能设想，一个先进的阶级可以领导一个反动的阶级”；到批判时就被曲解为：“这就是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只能是先进的分子领导落后的分子， 并没有阶级区别的存在” 。经此加工，一段论述阶级关系的话变成了“否定阶级区别”。

六曰无中生有法。老子《道德经》云：“世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是一种对万物起源的哲学思考。而用此法整人者大都不明事理，更无道德可言，或捕风捉影，或凭空捏造。例如“章罗同盟”就是其典型杰作，章伯钧、罗隆基在民盟内素不相和，被硬拉到一起，株连多人，铸成冤案。父亲与此事风马牛不相及，但也有人造谣说他参加“章罗同盟”在全聚德的会议云云。

七曰兜头泼粪法。此法流氓泼皮习用，只须将大桶粪秽向被批判者全身泼洒即可，不必多下考据功夫，最适于文化水平不高的批判者使用。诸如个人财产、邻里纠纷、夫妻夜话，男女私情之类最宜入选，越是耸人听闻，就越能达到使被批判者名誉扫地的效果。

八曰乱棍齐下法。此法历代公堂皂吏多用之。批判者倚仗人多势众，棒喝声威，不容被批判者有辩解的余地，敢有不服者，乱“棍”齐下，打得你“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直到诬服为止。

帝王术讲求“文武之道”。前面六法皆是文法，深文周纳，以谋略取

胜。后二法是武法，虽等而下之，但简单易行，屡试屡验。但充其量也只算是文斗中的武法，有别于“文革”中真刀真枪的武斗。

此时的人际关系也最富戏剧性，诸如公报私仇、卖友求荣、夫妻反目、反戈一击之类的例子层出不穷。这似乎也怪不得被喻为附皮之毛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部分都近于疯狂地洗刷自己，与“卖友求荣”相比，“卖友求生”已算不得什么人格上的瑕疵。其中最可悲者，是那种高压之下声泪交加的忏悔，与批判者“打落水狗”

以自保的冷酷。批判的声浪震撼着大大小小的泥塘，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化”，边缘的泥土不断陷落，泥塘的面积不断地扩大，站在塘边呼喊的人们也纷纷滚落其中。

谁无妻儿老小，一人入围，全家罹祸。求生的挣扎，足以使人忘却他不久前还为之骄傲的士大夫道德和知识分子人格。在轰鸣狂转的国家机器面前，人类的生存本能战胜了理智与良智。

六

在这场疯狂壮烈的交响曲中，仍奏出一丝不和谐音。

当其他人已在冥思苦想如何逃脱劫难的时候， 父亲却要作反批评。他在6月10日工商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中说：“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时候，只要是根据事实，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这是正常的；和党共事日久，说话不从‘拥护一番’说起，而是老老实实‘开门见山’地说，更是正常的。这都说不上什么‘脱离社会主义’或者‘脱离领导’。”他不但坚持自己的观点，还为在会上受到批评的李康年辩护。他批评少数人是乘机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方法，以求对自己有利，表现“唯我独忠”的姿态。他表示相信“整风运动是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共产党绝不做半途而废的事情。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

在6月15日和17日民建、 工商联常委联席会议上，他两度与人舌战，逐条反驳对他的批判。针对有人歪曲他的观点，他提出：“希望大家看看我的文章。批驳一个人的文章不要不看就来批判，不要认为是毒草就不看了，不要怕毒草，毒草也要先经过化验”。他强调：“我认为毛主席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出党整风，是个很英明的号召。过去由于

有‘墙’有‘沟’，许多力量在互相防范，互相摩擦，互相戒备中抵销浪费掉了……如果在整风运动中，把‘墙’拆掉，把‘沟’填平，过去互相抵销的力量变成互相协作，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我想，把社会主义事业加快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完全可能的。”

与会者都是与他共事多年的老友、同事乃至前辈，但此时个个将面孔翻起，露出唇枪舌剑。下面摘录一小段会议记录，可略见一斑：章乃器：否定运动的成绩，否定领导的话，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可以看我的文章。我从来没有一句话否定“三反”“五反”等运动的成绩，也从来没有一句话否定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我讲得明明白白，白纸黑字。

×××：你巧妙的地方就在这里。

×××：你就是这样巧妙地否定党的领导。

章乃器：×老，你年高德劭的人，不要这样急，最好冷静一点。

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是在资本主义消灭以后，在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内部斗争中。我说这句话是表明对官僚主义的痛恨，不能说是留恋资本主义。……希望同志们按照整风的精神来处理，按照整风运动指示的精神好好地讨论这些问题，处理这些问题。我要求组织少数人讨论，也就是这个意思。

×××：你违反宪法，是两条路线的问题。

章乃器：那是你的宪法。

在当时的形势之下，与会者除了倚仗人多势众外，根本不可能有平心静气的说理，更无人能从马列主义理论上与之辩驳。父亲引经据典的滔滔辩才，淹没在“这是两条路线斗争”“你要搞资本主义”“否定党的领导”之类的口号和帽子堆中。

这真像是一场与聋人的对话，双方各唱各的调，无法进行相同水平的理论交锋，只剩下了以数量取胜的“人海战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品和水平，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可怜过。

也许是对这种无意的对峙感到孤寂，也许是预感到被堆上祭坛的命运已定，而有了“一切放下”的悟性，他在会上说了这样的话：“有人要求民主党派轮流执政，我从民建某些同志的行为来看，我是会被陷害

的。”“我这人不勉强争取做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的帽子。”

七

有了上述的悟性，父亲的态度显得更加洒脱，手持被视为他的标志的英国烟斗，从容不迫地在各种场合应对各种批判。

6月15日《光明日报》社召开紧急社务会议，批判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

该报当时是民主党派共有的报纸，各党派都有领导人担任社务委员。前面提到的民建那位老先生是社务委员，过去是常常主动出席的，这次却临时把开会通知书转给了父亲。父亲也是社务委员，出席会议是份内之事，他当然明白此公的良苦用心，但还是坦然与会。

一进会场，他就对章伯钧说：“宗兄，你检讨了，我看早了一点吧？”因为同样姓章，故便以“宗兄”相称。但两人除了开会见面之外，并无私交。以前章伯钧到家中拜访过一次，父亲因为忙，一直没有回访。至于储安平，父亲只是在一些场合与他握过手而已。

由于开会的人未到齐，大家坐在一起闲聊。谈到章氏的始祖，章伯钧说是秦二世时的将军章邯，后来投降了项羽。父亲说，这应否算投降还须研究。这段对话在二天后的报上刊出，变成了“章乃器借着这一点，讽刺章伯钧说，‘你祖先原来是个投降将军！’”其实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章邯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祖先，章乃器是不能自辱其祖的。这段报导还触发了一位漫画家的灵感，报上刊出了一幅两人互相涂脂抹粉的漫画，题曰“宗兄宗弟”。

这时的章伯钧、储安平，众人已是避之唯恐不远，批之唯恐不痛，更不用说为他们辩护了。父亲自己也是众叛亲离，反倒有心替他们二人说话。他说：“储安平的言论（即《党天下》一文），从政治来看是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的。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的好。”“并不是说对于毛主席和周总理，就不能提意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本人是欢迎意见的。但是可以写一封信或请派个人来谈一谈。”“公开发表可能伤害全党、党中央威信的言论，这一点对负责精神是不够的。应当很郑重。”

6月16日的第二次社务会议上，又有如下的对话。

章伯钧望着坐在他对面的章乃器，说：“我的宗兄是不是谈谈，给我提提意见？”

王昆仑笑着说：“是同宗嘛，把你们的家务事摊开来谈谈吧！”

章乃器笑望着章伯钧，说：“你到我家只去过一次，我还没有到你家去过哩！”

章伯钧半笑着说：“我们人没有联系，思想有联系吧！”

章乃器于是向章伯钧提出这样的意见：“我的宗兄主要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还不显著。我看他是粗枝大叶，兼职也太多，管得太多，身兼两个党派的主席、副主席，又是政协、人大、交通部。也许党务管得细。光明日报和国务院的事，该打屁股。

……安平向你请教，恐怕你说话是相当随便；坦白，是好的，这恐怕给安平错觉，助长他错误思想的发展。……我的宗兄，你对国务会议很马虎，很少发言，很少研究，常迟到早退，责任心不够。因此，你翻过来讲国务会议开得不好，不发扬民主、不深入细致，我不同意……”

父亲在发言中谈了对整风的看法，他说：“我从前到外地视察，开座谈会，发现有几种人态度不正常。 1．旧知识分子、旧人员；2．工商业者；3．没有民族关系的宗教界人士。这几种人，我常察言观色，情绪不正常。因此，我感到过去几次大运动，是必需的，但遗留下来的副作用，是严重的。这次整风中发现，有许多人以往看来庸庸碌碌，这次大鸣大放，发表的意见从理论到业务，头头是道，天才都发展出来了，我非常高兴。”

对于这次运动中的人际关系，他另有一番高论：“据我向医院接触，有两种人特别多，一是神经衰弱，二是血压高。我想在运动中，斗人者难免得这种病，被斗者更难免。所以我讲，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阶级特性也可以说已经基本消灭，大家是一致在向人类的共性过渡。不要没有人情味。人，不论党与非党、公方与私方，互信。……我想，在自己的思想未通之前，应该心安理得，轻松愉快地考虑。

因为问心无他，何必惊惶？希望在整风中，批评者、被批评者都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

八

父亲呼唤和风细雨， 迎接他的却是雷电冰雹。6月18日，即座谈会之后两天，民建中常会撤销了他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职务，19日民建、工商联又通过决议，停止他在两会的一切职务，一场围剿式的大批判铺天盖地而来。

6月20日，民建的两位处长奉命来家中与父亲谈话，要他作检讨。父亲回答说：现在要我检讨，我只有批评。但他仍表示，粮食部的业务工作我还是继续干。我准备给国务院写报告，要求检查我的言论和行动，是否反对社会主义，如果反对，就解除我的粮食部长职务好了。人大、政协明年再提名选举时，不要再提我的名。两处长问：毛主席的文章发表了，你是否可以根据其中的精神作检查？他回答：我觉得，我的言行没有违背那六条标准。

两处长所说的毛主席文章， 即指毛泽东2月26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的讲话。在前一段的批判中，不断有人搬用讲话中的内容打“语录仗”。由于大家听的都是录音，记录上不尽相同，批判中常常为此争论不休。 6月19日，这篇讲话经“根据当时的记录加以整理，并且作了若干补充”后，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其最主要的补充，是在原讲话宣布“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之后，加上了一笔“但是”，即强调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有位当场聆听过讲话的“大右派”，本指望能靠这篇讲话的内容保护自己，及至看到原意全非的正式全文，不由得惊呼：“完了，完了，全变了！”

6月25日这天， 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周恩来总理即将在一届人大提出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谈到当前的反右，并有一段批判父亲的文字。父亲突然站起来，动情地说：“我要对周总理说几句话。你是总理，我是协助你工作的国务院干部，过去工作中遇到问题，总是大家共同分担困难。现在我遇到了问题，作为总理，批评帮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干部，只根据他所说的两三句话，就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个断语，是不是值得考虑？”

一番话直指人心，语惊四座。以折冲樽俎、辩才无碍著称的周公竟一时语塞。

在场的其他人见势头不好，群起而攻之，接下去又是一场唇枪舌剑的混战，秩序纷乱。父亲力持已见，并且声明，他所以如此，是因为爱护党中央像爱护眼珠一样。

平心而论，周公又何尝不爱护这位相交20多年的老朋友，何尝不了解他的出众才华和正直人品？1949年经周公安排，父亲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1952年又提名他出任粮食部长；他婉劝父亲专门致力粮政，避免卷入民主党派的内部纠纷，也是出于爱护党外干部的一番苦心。这两年周公处境不好，被迫做检讨才勉强过关。今年赶上整风反右，形势比人强，事关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也只有坚持党性，作违心的批判。最后他对父亲说："你不悔改，将自绝于人民。"会议就此不欢而散。

这场争论是两位朋友多年交往中唯一伤了感情的一次。父亲的话份量颇重，是一种道义上的责备，其对周公内心的刺激恐怕也非同一般。后来他俩在另一些场合见面，父亲仍是一副俯仰无愧的态度，周公则温语有加，往往作了一些额外的宽容姿态以示弥补。这件事当时见诸报端之后，父亲的性格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至今一些老前辈见到我，还常常会提起此事。

接下去的批判逐渐演变成一场闹剧。例如当时各报都刊登了一位抗日老战士口述的《回忆一件往事兼质问章乃器》一文，大意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之际，是他所在的游击队将章乃器、胡风、史良、邹韬奋等人救出，转移到安全地区。老战士谴责章乃器："在最艰苦的时候，党派了自己的儿女用生命搭救了他，解放后又把他放在国家的领导岗位上"，而章竟"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最后他用"这种人简直没有人味！"的粗话，表达了自己的革命义愤。事实上，香港沦陷时，章、史二人都在重庆。

这位老战士可能是记忆有误，但历史岂是能够随意涂抹的小姑娘？多年来不断搞运动，中国人的观念变得很容易走极端。当一个人"走红"时，他的履历可以是投身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一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人士，到了墙倒众人推之际，便有了下列种种说法："爱国是假的"、"他的抗日救国是为了创造向蒋卖身投靠的资本"、"勾结特务、反革命、右派分子进行阴谋活动"、"破坏土改"、"一贯违法乱纪的不法资本家"、"组织反党小集团"，等等，等等。翻开当年的报刊，这样的批判词比比皆是，大多出自与父亲共事多年的一些老友之口，其中也不乏他早年帮助和提携过的晚辈。更有甚者，他的一位工商界老同事，过去有困难时曾屡屡受过父亲的恩惠与保护，此时竟反咬一口，纠集一些人，乘机对父亲提起诉讼，提出资产要求。

反戈一击，是50年代开始的一种时尚，其给国人道德情感造成的伤

害，也是十分致命的。要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上认识朋友，这场运动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也开创了最坏的先例。父亲一直到逝世，都不肯原谅某些伤害他最重的朋友。其实这些朋友，在后来的十年浩劫中，也和他一样品尝了苦果，近年来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忏悔。

九

1957年6月26日，　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父亲和往常一样，每次都按时到会，自20年代他进入银行界起，就养成了守时的习惯。会议期间代表们的用车是统一安排的，有一次车子因接侯外庐耽误了一会儿，开到时父亲已在家门口等候，并指着手表对司机说，你晚了五分钟。

怀仁堂——这座皇家禁苑中轩敞的古老建筑，曾默默地注视了几个朝代的盛衰荣辱。自1949年以来，这里一直是新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建国前夕，父亲曾在这里与600多位政协代表一起，　举手通过了政协的《共同纲领》，选举出新国家的领导人；　1954年9月，他在这里举手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他曾多次在这里出席最高国务会议及政协、人大的历次会议。如今，这里的一切都与往常迥异，不见了昔日的肃穆祥和，雍容谈吐，所有的人都紧绷着面孔，闷热的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

这是一场对中国知识精英的大围猎，陷入网中而又保留着人民代表身份的“右派”们，不得不放下学者名流的架子，在各个小组内接受着无休止的斗争，违心地作着屈辱的检讨。黄绍竑因为经受不住，两次吞安眠药自杀，被送入医院抢救，总算保住了性命。陈铭枢则在赠答友人的诗中，以这样的诗句形容当时的气氛和自己的心情：

君诗忧患积，一语九回肠。

痛定宁思痛，群弦已共张。

赤标天下鹄，青换眼中桑。

莫负苍生愿，相将造乐康。

父亲是四川省选出的代表，在“群弦共张”的四川组会议上，面对着他熟识或不熟识的面孔，忍受种种的批判乃至谩骂，以辩才著称的他生平第一次尝到了舌头的厉害。但他仍拒绝强加的罪名，声明自己“不是一

个政治家，也不配做一个政客”，如果要他作言不由衷的检讨，他没有气力。

他在会上做了个书面检讨，承认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但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说：“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不但没有任何怀疑，而且往往还觉得是出于意外的好。

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体工作的做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见的，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与党员的合作共事关系，绝大部分也是和谐的；但对于少数党员的态度、作风是有批评的。我愿意问清楚道理，要求讲清楚道理，态度往往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觉得许多党员没有把我当作外人，我觉得自己也不应该自外。”

在逐条辩驳了强加在头上的种种罪名之后，他郑重声明：“某些人相信，‘众口可以烁金’；‘曾参杀人’，重复了三次，慈母也为之动摇。我认为，这是旧时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

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发展，对右派的处理问题也开始提到日程上来。7月7日下午三时，由周恩来主持在政协礼堂召开了一次会议，就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黄绍竑、龙云等的处理问题进行磋商。父亲是民主党派中被停止职务的第一人，前面提到的老先生给周恩来递了一个条子：“请问国务院工作人员有没有被停职或类于停职的规定？”他注明这个问题是“为了章乃器”，但为避免承担责任，他又在条子上注明“随便发问，并不是我主张。”周公用铅笔批道：“有这样一种处分方法，但对部长级还没有用过。”会上还谈到了苏联撤销莫洛托夫、马林可夫职务的经过。

两天后，毛泽东在上海又点了一批右派的名，并且说：“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毛泽东说：“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你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大识字的人，他们知识高。”

在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　毛泽东对“八大”的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矛盾的论述提出异议。　在与会者中引发了争论。他在10月9日的最后讲话中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在事

实上改变了“八大”政治路线，为此后一系列扩大阶级斗争的举措开辟了道路。

10月13日，毛泽东指示说：“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象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还要说服他，说几次，他硬是不服，你还能天天同他开会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看他怎么办？”

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统战会议，提出了对一百多位民主人士“右派”的处理意见。针对当时普遍掌握政策过“左”的现象，刘少奇在会上说：“当前党的统一战线，‘左’一点大家都赞成，说右派不要安排，大家都鼓掌。对右派的安排，××就表现的很‘左’，×××也不赞成章乃器，似乎×××却成了‘左’派。……现在是犯‘左’的可能性更多。”他提出：“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是头面人物，要安排。”当时对这三人处理的底案是：撤销国务院部长和人大职务，保留政协委员资格，章伯钧还保留政协常委。

当时给父亲定案的最大障碍，就是他始终不肯像别人那样，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尽管处境艰难， 他仍泰然自若，每天准时到粮食部照常工作份说是因为他在部内威信很高，“威风打不下来”，于是又有人安排了民建、工商联与粮食部的联合斗争会，自12月19日起开始举行，两会的负责人均到粮食部与会，一连斗了三天，父亲安坐聆听，时而咬住烟斗抽烟，时而闭目养神。到第三天时，某公（父亲昔日有恩谊于他）声讨刚毕，父亲突然起身走到他跟前，大声说：“你没良心！”登时全场大哗，接下去又是一场人海战术式的围攻。父亲如此强项不屈，会是没法再开了，于是转而责令他写书面检查。

1958年1月，父亲写出了一份3万多字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回顾了自己在整风中的全部言行，以及建国以来在民主党派工作的方面的全部经历。他在文章最后写道：“我对党披所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希望逃避处分（当然也不是希望处分）。一个只能为官，不能为民的人，不能不是十足的官僚， 他不但当不起一个革命者的称号， 而且不配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民。”

“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泯灭良心来对待自己。”

直到被撤职，父亲始终拒绝在他的右派结论上签字。主持审查处理工作的领导（即当初鼓励他鸣放的那位——李维汉）也承认章乃器“心口

如一”，高压无用，只好硬着头皮拍板：我们不是法院，章乃器不签字，照样可以定右派。

父亲被定为“极右分子”。

十

父亲这种倔强的态度，使他在后来付出了更大的代价。1958年2月1日至11日，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提前举行，会上通过了撤销章乃器等38人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他的名字第一次被排到“右派”中的首位，这是一种“加重处罚”的信号。26日，他在民建和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职务也被撤销。

1月28日上午， 父亲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周总理召见。他已预感到是怎么回事，便穿戴整齐，坐车前往中南海。

11个月以前，他来到这里，聆听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迎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现在还只是农历的腊月，再过几天就是立春，这个节气来得比去年还早。中南海湖面却依然封冻，周围仍是灰蒙蒙的一片……沉思中，车已到西花厅前停下，他振作精神，安步踱入这座早已熟悉的古老建筑。周恩来总理、习仲勋秘书长和徐冰副秘书长已在客厅内等候。由于事态已经明朗，双方的情绪反倒显得比较轻松，接下去是一场无拘束的谈话。父亲在他的《七十自述》中，记下了这次谈话的内容：周总理对我说，要撤我和伯钧、隆基的职，马上要提交国务会议讨论，已经告诉了伯钧、隆基二人，而且不让他们出席会议，但可以让我出席会议申辩。我问，我写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等文件有没有看过，他说没有，我说，那是很遗憾的。我问，撤职的事情是否最后决定了。他说，党中央决定了。我说，那还申辩什么呢？我愿意放弃出席的权利。他说，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他又说，也曾考虑过是否让我们辞职。可是又何必那样转弯抹角呢？我说，撤职倒没有什么，但是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他说，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们党是准许保留思想的。

于是，他又谈到和罗隆基谈话的经过，他曾问罗作何打算，罗答要么就自杀，否则便只好接受。总理说，你可以去美国。罗问，是否意味着驱逐出境？总理答，绝不是。总理问我作何打算？我说，我是全心全

意，全力投向党的，党给我处分，我愿积极接受下来，作为党对我的锻炼和考验。我和党共事已经30年了，仍然没有被了解，那就请再看5年吧，5年不够，也可以看10年，到那时我也不过70岁；我现在就好好地锻炼体格，充实头脑，准备到时再为党工作10年。总理笑着说，你倒真乐观呀。最后我重申：我是永远不反党的；我要使那些诽谤的流言，彻底地破产；我决不做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蠢人。

谈话结束，父亲与周公和习、徐二位一一握手道别，离开了西花厅，从此再也没有来过。他乘坐的黑色“吉姆”轿车驶出红墙，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穿行。望着车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 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9年来，他第一次有了闲暇……

29日下午，国务院第69次全体会议决定，撤销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的部长职务；并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审议决定。

1958年1月31日，毛泽东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3次会议的决定，撤销章乃器的粮食部部长职务，撤销章伯钧的交通部部长职务，撤销罗隆基的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

似乎一切都该打上句号了，但这只是劫难的开始。

在这场对知识分子良知的大围猎中，55万人被打成“右派”，沦为贱民，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1％；如再加上被内定“中右”、“右倾”者，以及所有受打击者的家属子女， 受到迫害和株连的人数当在200万以上，造成众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右派”中除个别人外，均被处以撤职、降级、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监督劳动、劳动教养等不同处分，其中半数以上失去公职。一些人还被扣上“反革命”帽子，判刑劳改，甚至被枪决，在运动中自杀及在劳改或其他迫害中死去的人数更无法统计。

十一

“反右”使“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科学与民主”的传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运动刚刚告一段落，又提出了“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历史的车轮急剧左转。

此后的数年间，经历了“大炼钢铁”和“吃大锅饭”的所谓“大跃进”，庐山会议的“反右倾”，“神话”一天比一天多，口号一天比一天左，科学知识不再被尊重，蒙昧主义大行其道，没有人再敢于提不同意见。直到发生全国性大饥荒，一下子减少了2000万人口，这股反科学的蛮干狂热才逐渐降温。

在这段时间里，父亲在北京东城灯草胡同30号的宅院中，闭门蛰居。对于一个刚过花甲、精力充沛的实干家来说，失去工作的权利是一种莫大的痛苦，但他仍以达观的态度面对人生，将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他每日手不释卷，阅读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和专著，写了数百万字的笔记。他还以前所未有的认真态度锻炼身体，除了气功、腰腿八段锦外，每天坚持做25个俯卧撑，还在浴室用冷水浇淋全身，并摩擦全身两千多下。

在公众场合，他仍是精神抖擞，谈笑风生，丝毫没有其他“右派”那种抑郁消沉之态。

一次政协开全体会议，周总理和另一位领导（即曾鼓励父亲鸣放，后来又主持给他戴帽子的那位）接见与会的委员们，周公与父亲握手时笑着问道：“老章啊，你还是那么自负吗？”“是别人看不起我，所以只好自负一些。”父亲也笑着回答。

那位领导有些尴尬，忙解释说：“谁也没有看不起你，是你自己要孤立你自己。”

还有一次在政协开会，巨赞法师拍着他的肩膀说：“章乃器啊，我看你的右派分子帽子可以拿下来了。”他风趣地回答：“这是别人强加在我头上的帽子，我是不认可的；对于我头上的这顶民主人士的帽子，我倒有点不耐烦了，准备丢掉了。”

某次政协组织到外地视察，同行者中有王枫、董竹君两位女委员，路上聊天时，心直口快的王枫问他：“章先生，我们以前一直读你的文章，对你很钦佩的，可这一次，你怎么会当右派？”面对这有些唐突的提问，父亲显得很有涵养：“王大姐，再过10年，你就知道谁对谁错了。”

可是对有的故旧，父亲却一点不讲恕道。一次政协小组会上，某教授（年轻时曾受父亲提携，“反右”时积极斗争他）碰巧坐在他的身旁，父亲吟诗一首赠给教授：“名裂身未败，家破人不亡。钢筋铁骨在，冷眼

对豺狼。”教授大怒，反唇相讥，指控他意在攻击党的领导。以两人间的历史恩怨而言，这首诗的份量当然不轻。

在经历了“文革”的劫难后，父亲已经作古，教授亦有悔悟，主动提出应给父亲平反，这也是应当记述一笔的。

1962年三四月间，父亲向二届政协第三次会议提交了两个提案，就他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提出申诉， 而彭德怀也在6月间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八万言的申诉书，虽然两人并无任何联系，但这种举动在当时被批为刮翻案风。有些好心的朋友向他提出劝告，但父亲表示：“‘唯事实为最雄辩’，事实越到后来越清楚。我相信事实，我无限相信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我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多受一些锻炼，但不能改变我对党的信任。我认为这一点的硬骨头是需要的，党绝不愿他的朋友是软骨头。”

1963年1月19日，民建中央通过了《关于开除章乃器会籍的决定》。2月14日，民建中央致函全国政协，申明撤销章乃器作为本会代表的资格，并建议撤销其政协委员资格。3月7日，政协常委会通过了撤销章乃器政协委员职务的决定。从此，父亲永远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据说，周恩来对开除会籍的做法不以为然。他批评说，一个人总要有个组织，你们把章乃器的会籍都开除了，将来怎么做他的工作？

在政治上受到进一步打击的同时，父亲在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反右”后他的工资由行政四级降为十级，但仍保留服务员、炊事员、警卫等其他待遇。撤销政协委员职务后， 工作人员全部撤走，改为发生活费150元，后经周恩来过问，增加到200元， 但房租、水、电、电话等费用均改为自己全部负担。更有甚者，1957年的那场被人诬告的经济官司，又被用来作为政治上的打击手段，致使父亲在1964年底败诉。法院查封财产清偿，并曾一度将他羁押。这宗令新中国法制蒙羞的旧案，至今尚未得到纠正。

父亲在逆境中仍保持自己的信念，他作了一副对联：“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坚信历史会作出最公正的结论。在此期间有关部门曾根据来去自由的原则，征求他个人意见，表示如愿出国，可提供一切方便。但父亲认为，他是为了自己的爱国理想，才放弃了在香港大有可为的事业和优裕的生活，回来为新中国贡献力量的。不管个人境遇如何，绝不违背初衷。

不久，一场更大规模的浩劫席卷了全中国，父亲的生命之火在这场历时十年的漫漫长夜中耗尽。1977年5月13日，他在曙光出现之际赍志以殁。

1995年9月3日脱稿

章乃器传（节录）——最后的历程

章立凡

1966年6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狂飚震撼了中国大地。在“文化大革命”

的“红色恐怖” 中，像章乃器这样的人物，自然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8月24日，红卫兵冲入章乃器的住宅抄家，他本人则被押往吉祥戏院，这里正在举行血淋淋的“打人集会”。送到这里的“黑七类”分子大多是有来无回。章乃器周围的人一个个倒在血泊中，唯有他凭着意志和气功的功力硬挺着，不久也因伤重而昏死过去。

也是他命不当绝，恰在此时有一位民警奉命前来同红卫兵交涉，说是此人若打死了，不好向中央交待，好说歹说总算把他要了出来。章乃器成为从这座戏院中活着出来的幸存者，但当他被送往医院求治时，竟遭到拒绝。章乃器挣扎着爬起来，在医院的长凳上给周恩来写了几个字：总理，我被打，已经受伤，医院不给治疗，请你指示。信送出后不久，章乃器被推进了急救室。事后得知，周恩来指示医院：无论何人，一律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给予治疗。

章乃器经医院救治后被送回家中， 但他的苦难还没有结束。 请看他的自述：“8月25日以后7天的遭受，是每天总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虐我。门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理，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记述的，是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1][1] 章乃器：《七十自述》，《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第47、48、49页。

面对这种极“左”狂热下令人发指的暴行，章乃器对付的方法就是：“镇静、镇静，再一个镇静。”他说：“我之所以能镇静，首先是因为我没有畏惧之心。死没有什么可怕，所求的只是死得其时或死得其所。我知道，只要来者是真正的群众，他们是不会杀害我的。……此时此

地，我是没有死的理由的。我可以镇静对待。”

“其次，是因为我没有仇恨之意。我看到，人群之中即使有不纯的分子，但绝不是我的敌人，也绝不是阴谋陷害我的仇人。他们主要是一群天真的孩子，他们的缺点只是水平低和受蒙蔽而已。我应该心平气和的对待他们，以争取他们的理解和同情。”

“又其次，是因为我还有顽强地活着的愿望。我认为，我现在决不能死，我要等到党看清楚我是一个对党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然后死而无憾。我深信，事实是掩盖不住的，事实总是越到后来越清楚。我活着，我的精神面貌就可以证明我对时代的乐观。这是有反动思想的人所万难做到的”。

章乃器凭着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力， 进行了8天的绝食。直到他被赶出原来的住所，迁入北京东郊的一座普通居民楼，他才恢复进食。从那时起，他蓄起了胡须。

他凭着自己修炼多年的气功的功力，自疗好身上的创伤。他说：“我这时除了遍体鳞伤之外，右目的拳伤特重。看出去有个红色的外围带锯齿形的椭圆圈，经常在眼前闪现，可能是瘀血所致，内伤也相当重，右胸、背、股、尾间和膝部经常疼痛。

但到第三天，我发现手上的乌紫退色了，右目已能见物，内伤疼痛也减轻。真是气到之处，效验如神。”[2]

[2] 章乃器：《七十自述》149页。

章乃器一生的最后10年，就是在北京东郊那座普通居民楼的斗室中度过的。他在逆境中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当健康完全恢复以后，章乃器每天清晨到附近的日坛公园做气功，然后到菜市场买菜，回家后自己动手烧饭。尝过他烧的饭菜的人们一致公认，章乃器的烹饪手艺很不错。他的生活费在运动中被造反派降为50元，这点钱要维持他自己和小儿子立凡两个人的生活费用，是很困难的。章乃器说：“钱少了营养不能少。”他时常买些价廉而又富有营养的“猪下水”，漂洗干净，做成酱肚、溜肥肠、猪肺汤等各色菜肴下饭。当儿子为生活的艰辛而抱怨时，章乃器总是说：“现在的生活，比起40多年前我在北京失业时好多了。”

章乃器的藏书和笔记，在抄家时已散失殆尽。但他仍好学不辍，利用一切可能寻求书籍阅读，并坚持作笔记。当时有不少单位找他“外

调”，他便利用这个机会写了不少回忆录，前后约有上百万字。在那种极“左”思潮泛滥的年月，历史常常是被歪曲颠倒的，章乃器却坚持讲真话，为此经常跟外调人员发生争执。有一次几个外调人员一定要他写材料证明张劲夫是叛徒，他没有这样写，这几个人对他拍案威吓，章乃器忍无可忍，当场把自己写的材料撕成了碎片，厉声喝道：“歪曲历史的材料我不会写！”又有一次，有人硬要他证明钱俊瑞是特务，他也没有照办，并对儿子说：“过去救国会工作的时候我同他（钱俊瑞）确实有过不同意见，但我不能无中生有地陷害人家。”

章乃器很欣赏诸葛亮“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句话，还不时诵读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和《五柳先生传》等名篇，他多次谈起家乡青田的明秀山川，想同儿子一道“布衣还乡”去过隐居的生活。但他终究不可能超然世外。有时他在儿子的陪同下悄悄探访故旧，劫难余生，故人相聚，议论之间章乃器往往会流露出忧国忧民的孤愤之情。在这一时期，他和劳动人民有了更多的直接交往，在周围的人看来，他是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老头，大人们称他“老章”，孩子们叫他“章爷爷”。他在公园里和人们探讨气功，一位退休的老工人还不时到家里来找他下棋，却很少有人想到他曾是个做过大事的人物。

章乃器从人民群众中获得了以往政治生涯中未曾遇到过的朴实的友情，也进一步理解和感受到他们的疾苦。他曾经说：如果有一天允许我讲话，首先我要办两件事，一是请国家提高中小学教师工资，他们是灵魂工程师，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他们工作最辛苦，工资最低，这种现像是不正常的；二是要提倡粮店出售主食面包。

面粉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又低于大米，主食面包如能进行工业化生产，一定价廉物美，既节省时间，又能提高中国人的体质。

1975年1月，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开始在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章乃器的处境也有所好转。他写信给党中央反映自己的情况，受到了重视。陈云、张劲夫等曾代表党中央与章乃器进行了亲切、　坦诚的谈话。4月，毛泽东、周恩来指示，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事实上章乃器从未承认过自己是右派，但这已是在当时可能作出的最佳安排。他的生活待遇也有所改善，并准备安排他为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顾问。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掀起所谓“反击右派翻案风”的逆流，对章乃器的职务安排未能实现。

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80岁。十年浩劫的漫长黑夜，耗尽了他最后的生命，当曙光出现之际，章乃器的生命之火熄灭了。他逝世时仍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摘帽右派”，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当时，“七君子”

中的两位健存者——史良和沙千里出席了追悼会。会后在《光明日报》第四版末尾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排除“左”的干扰，拨乱反正，落实各项政策， 在邓小平、 陈云、胡耀邦等的直接过问下，章乃器的右派冤案在1980年6月得到改正。1982年5月，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章乃器的一生，显现出一个旧民主主义者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前进的思想脉络和行动轨迹。他为人刚正耿直，才华横溢，富有爱国理想和实干精神。有时是拘于历史的局限，有时是误于率直的性格，他的一生经历了曲折、苦难的里程。但他始终怀有一颗赤热的爱国之心，保持着中国知识分子“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传统气节。章乃器晚年的悲剧，既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损失。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已对章乃器的一生作出了公正的结论。他的名字，将作为中国近代中外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而彪炳于史册。

章乃器——中共的诤友

翟作君 王蕙炎

1957年，有份资料集名为《章乃器反共三十年》，这是配合“反右斗争”编写的材料。章乃器遭到了全国范围的批判，一夜之间就成了“极右派”、“反共老手”。

纵观章乃器的一生，他恰恰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20多年的冤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得以昭雪，尽管此时章乃器的生命之火已经熄灭，然而他的事迹和他的名字将永载于中国史册。

热血沸腾追求革命

章乃器，1887年3月4日出生在浙江省青田县小塬村的一个破落乡绅家。原名章埏，后因读《老子》有“陶人埏埴以为器”一语，遂改名“乃器”。

章乃器的祖父章楷，是清同治年间浙东名士，为人耿直，好济困扶危伸张正义。

这种刚正不阿的性格，在章乃器身上得到继承。

1918年夏，章乃器从杭州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毕业后，进入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当练习生。翌年春，他便辞职来到北京，进了北通州京兆银行，当了营业部主任。

此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给年轻的章乃器以极深刻的影响。

从此，“科学和民主”成了他终生不渝的信条。1921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他进了一家中美合办的实业公司。这里虽然待遇优厚，但是洋经理却骄横跋扈，章乃器不愿意卑躬屈膝，只干了3个月便愤然辞职。章乃器回到上海重新进入浙江地方实业银行。

1927年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北伐军占领了上海。章乃器欢欣万分，和人们一起走上街头欢呼北伐的胜利。当他“以为祖国从此可以转弱为强，中华民族吐气扬眉为期不远”而对国家前途充满

美好憧憬时，蒋介石却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转入低潮。

这年11月，章乃器独立创办了《新评论》半月刊，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的各项政策，这是他参与政治的初步尝试。他把“要做潮流的指导者，不做潮流的追逐者”

奉为《新评论》办刊的信条。1928年5月3日，济南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制造了“济南惨案”。章乃器在《新评论》上连续发表文章，他一方面呼吁对日宣战，另一方面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旧军阀换新军阀，或旧军阀做新军阀，还不依然是一个军阀？”他宣称：“几十年来帝国主义的压迫，几十年来政府的压迫，几千年来封建制度的压迫，这许多压迫还不沉重吗？当然，这一定需要革命——激烈的革命，非如此，无以泄发郁结的民气。”章乃器的激进言论，自然使国民党当局无法容忍，1929年春，便以“袒共”的罪名将《新评论》查禁。

党的诤友 抗日斗士

1932年， 章乃器出任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副总经理。6月，又主持创立了国内第一家完全由国人创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章乃器为中国征信所制定了一套严密科学的工作制度，使该所的调查工作效率极高，受到了社会的赞扬。章乃器不仅是一位成功的银行家，而且他还是一位有成就的经济理论家，他主张用经济手段管理中国的货币和金融市场，以保护民族工商业。同时，他又是一位共产党的同情者、支持者。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武汉地下党的领导人杨贤江经常将款项汇到上海，通过章乃器存入浙江实业银行，保护党的活动经费。章乃器三弟章郁庵是共产党员，曾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就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的公开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曾多次将苏区运来的金银交章乃器通过银行换成现钱，充当党的活动经费。

30年代初，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一些同志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处境危险、生活困难，章郁庵便通过章乃器把这些同志安排到中国征信所挂名支薪，隐蔽待命。1935年陈云在长征途中奉命到上海恢复党的工作，也是通过章乃器与章郁庵联系上的。当时章乃器曾安排陈云在秘密住所隐蔽，后来才转道前往苏联，可见章乃器为党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

1935年12月，他与马相伯、沈钧儒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正式成立，发表了《救国运动宣言》，提出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等主张，章乃器被推选为该会的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主管财务，兼作宣传工作。

目睹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而蒋介石仍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继续实行“剿共” 内战，章乃器于1936年1月在《大众生活》上发表了《四年间的清算》一文，文章指出：“在‘前方军事剿匪，后方文化剿匪’政策之下，杀戮了多少的勇敢有为的英俊少年！毁灭了多少田园庐舍！消耗了多少枪械弹药！到了今日，外无以攘，内未得安。‘外力’积极‘内侵’的结果，连安内的基本地带‘长江腹地’都受到敌人的威胁，这样下去，恐怕就要到‘无内可安’的末日！”他在文中呼吁：“我们不能再用自杀的手段，伤耗民族的元气！”“停止一切内战，大家枪口一致向外！”他还表示：“刀锥斧钺，我自己来担当”。沈钧儒当时就称赞这是一篇有血有肉的好文章。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6月2日，沈钧儒、章乃器前往市政府会见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向他阐明全国各界救国会的宗旨，递交成立大会宣言等文件。吴铁城当即诬称救国会有野心。章乃器和沈钧儒毫不为吴铁城的诬指所屈，严词拒绝收回《宣言》。而后，章乃器与沈钧儒、史良等前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愿，提出立即对日抗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保障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等要求，并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以扩大宣传救国主张，唤起民众。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提出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救国主张后，章乃器同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四人发表署名文章《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条件》，公开表示赞同。文章发表后，国内外反响很大。

由于救国会的团结抗日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国民党对他的仇恨也与日俱增。章乃器也不断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威逼利诱，章乃器干脆辞去了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之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爱国运动中去 啡国会的活动，也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度仇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终于对救国会下了毒手。1936年11月23日凌晨，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被国民党当局无理逮捕，成为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 啡国会领袖无辜被捕的消息传开后，激起了人们极大义愤，抗议和营救的文、电雪片似地从国内外飞来。

七位爱国领袖被捕后20天，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于国内外形势，1937年7月31日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释放“七君子”。

章乃器出狱后，斗志不减，将他在狱中撰写的《救亡运动论》中的《抗日必胜论》和《民众基本论》的两个部分印成小册子于1937年10月正式出版。他在文章中提出了“武器的力量并不是绝对的，而人的力量毕竟还是决定胜负的因素”的重要见解。他还批驳了形形色色的亡国论调。他指出“有些人把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日苏或日美战争的爆发，中国与英、美、法等国的结盟等外力因素上，也是不现实的。是机械主义的抗日论。”他认为“抵抗侵略主要的力量是我们自己。”

1938年3月，　章乃器应安徽省主席李宗仁邀请，出任省财政厅长兼安徽省银行董事长。在任职期间，他了解到新四军军饷很困难，便以统一税收的名义，报请省政府每月补助新四军3万元。　这在当时“是任何地方政府所不敢的。”结果，1939年3、4月间，蒋介石终于下令“另有任用”罢了他的官。

“红色的资产阶级”民主人士

抗战胜利后，章乃器筹建昆圣影片公司，同时积极从事民主运动。1945年12月与胡厥文、黄炎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民主建国会成立后，即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

1946年2月10日上午，　“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大会”在校场口广场举行，到场群众万余。国民党当局派出特务暴徒殴打与会群众，受伤、失踪者达六十余人，制造了“校场口血案”。事发后，章乃器、郭沫若、阎宝航即向公众披露了血案真相，强烈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

1946年4月，民主建国会迁往上海，章乃器也到了阔别8年的上海，继续从事和平民主活动。　1947年9月，蒋介石阴谋对民主人士大逮捕，章乃器被迫流亡香港。

1948年底，应毛泽东的邀请，在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下，章乃器和其他三十余位民主人士搭乘苏联货船阿尔丹号北上。1949年1月7日船抵大连。章乃器在东北亲眼目睹当家作主的工人、农民努力进行生产建设的热烈场景，而旧社会常是的烟、赌、淫、乞等弊病，在解放区几乎绝迹，这使章乃器感慨万分。一次参观途中，同行的人们唱起了一支革命歌曲，歌曲第一句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章乃器认为要确切表达党的历史功绩，建议在“中国”之前冠以“新”字，将歌词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久，章乃器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你的

建议很好，我们已经让作者把歌词改过来了。”

1949年6月15日， 章乃器作为民主建国会的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 10月1日章乃器出席了隆重的开国大典，并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兼财经组组长、政务院编制委员会主任。1952年8月， 章乃器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以后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主建国会副主席。由于职务上的原因，他经常涉及一些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 政策问题。1955年4月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章乃器发表了这样的观点：“民建的性质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内的， 要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党派。但他同时声明：“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个政党。如果外宾们说那你们的党可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那我认为可以欣然承认。”1956年，章乃器在民建会第一届中央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发言说：“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指着我说：‘我很同意你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我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的存在？’我提的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既然可以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有什么不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政党？”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章乃器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也已经基本消灭了，留下来的只是残余或者尾巴罢了。”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笼统地提两面性，不利于调动工商界的积极因素。与其笼统地提两面性，还不如在大力鼓舞生产经营积极性的前提下，具体地指出必须改造的那些资本主义的思想作风。这些都是章乃器在国内出现了新形势的情况下，对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的转换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新的估价，在理论问题上作探讨时所发表的一些观点、见解。

披肝沥胆 推心置腹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毛泽东于4月30日起，多次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号召他们对政府的错误和缺点，大胆提出批评，帮助党整风。章乃器参加了其中的三次。5月13日那次座谈，章乃器因事未能出席，但仍送去了一份书面发言，并附去信函一封说明稿子是“信笔直书”，是草率，但也是直率的，是否发表，请领导掌握。后来，他又写了《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这两篇文章都见了报。

这时，章乃器仍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粮食部的工作上，谁知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却风浪骤起。从6月5日起，他的言论遭到了全国性的批

判，他本人也于一夜之间由著名的爱国主义人士变成了“极右派”、“右派头子”、“反共反人民的老手”。

当时，章乃器受到“批判”的观点，除了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及“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等外，还增加了“与党争权力”、“反对党的领导”、“鼓吹定息不是剥削”、“号召工商界‘抬起头来”同党进行斗争”，、“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是‘脱胎换骨就要抽筋剥皮’”等。

事实究竟如何呢？

首先，关于“与党争权力”的问题。当时，曾有党外人士反映“有职无权”。

章乃器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他说：“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同时他也声明：“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织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织管政治思想领导，党组织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章乃器说这段话是有历史背景的。他曾于1955年先后两次致函毛泽东，反映工作中某些党员干部不尊重科学和宗派主义的作风。毛泽东复信说：“感谢通知我这些情况和你的意见。干部中的片面观点总是会有的，问题是好好帮助他们学会实事求是全面分析的方法。”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问题得到了纠正。章乃器所说的“斗争”，就是指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风而言的。但在1957年却以此诬指章乃器与党争夺权力。

其次，关于定息是不是剥削的问题。1956年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经济学界就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定息是剩余价值；另一种认为是剥削而不是剩余价值。章乃器在《关于工商业改造辅导报告工作的几个问题》中讲：“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是比较合理的。剩余价值、剥削和不劳而获的收入这三个名词，本来一般是可以通用的。现在既然已经明确定息不是剩余价值，那就可以进一步明确定息也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像这类学术问题，或者说是如何制定政策的问题，是可以探讨的，但在那场“反右斗争”中硬把章乃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确切地概括为“定息不是剥削”，因而成了当时集中火力批判的靶子。

第三，关于对民族工商业者思想改造的问题。章乃器认为“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的阶级特性并不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章乃器不同意思想改造要“脱胎换骨” 的提法，他认为民族资本家改造了近8年仍然需“脱胎换骨”，会使人望而生畏，其结果是“阻碍了人们接受改造，而不是鼓励”。但是章乃器的观点却被曲解为“脱胎换骨就是要抽筋剥皮”而加以批判。

第四，关于反对教条主义、个人崇拜问题。章乃器说：“假如不幸而让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当中起主导的作用……那不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幸，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损失。”他还认为革命领袖有时为革命辩护而讲的一些话，也不能机械地用来指导今天的革命工作。他举了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句话为例，指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适用的，但是“现在生产建设中有些工作细致些，尤甚于“绣花”；在革命胜利后对反革命分子的改造“也不是采取残酷的手段，而是采用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就是因为这些，章乃器被说成一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

他争辩，也表示：“不勉强争做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帽子。”

1958年1月， 章乃器写出了3万余字的《根据事实， 全面检查》。文中表示：“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泯灭是非来对待自己。”

没有沉沦 依然乐观

1958年1月31日前后， 章乃器被先后撤销了所有的职务，仅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从此，章乃器开始了漫长的家居生活。对于一个精力充沛的实干家来说，失去工作的权利是最大的痛苦，但是他没有沉沦于痛苦之中，他每日手不释卷，阅读了大量经典著作及各种专著，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笔记。后来他虽然曾经提出过申诉，却未被接受反而被斥之为“翻案”，接着又被撤销了政协委员的职务。此刻，章乃器不仅在政治上受到打击，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

1966年6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狂飙震撼了中国大地，8月24日，红卫兵冲入了他的住所，章乃器被押往吉祥戏院，这里正举行着一场血淋淋的打人集会。

送到这里的“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一个个被打得倒在血泊之中，章乃器也被打昏在地。他曾作过以下的回忆：“8月25日以后7天的遭遇：每天都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虐我。门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理。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充分的。”“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

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浇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家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章乃器面对暴行，镇定自若，相信党和大多数群众是会理解他的。他说：“只要来者是真正的群众，他们是不会杀害我的。”他又说：“我认为，我现在决不能死，我要等到党看清楚我是一个对党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然后死而无憾。我深信，事实是掩盖不住的，事实总是越到后来越清楚，我活着，我的精神面貌就可以证明我对时代的乐观。这是有反动思想的人所万难做到的。”

章乃器一生的最后十年，就是在北京东郊的一座普通民楼斗室中度过的，他身处逆境却依然乐观，而且始终保持着坦率、正直的秉性。

1977年5月13日， 章乃器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80岁。从1957年的“反右”

斗争到1966年开始的10年浩劫，终于耗尽了他最后的生命。20年，而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几个20年呢？直到他去世，还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摘帽右派”。不能不想到他是带着遗憾走的。在一个静静的小型的追悼会上，当年“七君子”中两位健在者——史良和沙千里为他们的同志送行。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章乃器的“右派”冤案终于在1980年6月平反昭雪，1982年5月，他的遗骨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翟作君：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王蕙炎：上海市第二中学高级教师）

关于成立“政治设计院”的发言

章伯钧

现在工业方面有设计院可是政治上没有设计院“共产党的民主精神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效果。”

民盟副主席章伯钧说，今天他谈个人的意见：第一点，近20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很正常。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民主精神，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效果。这在中国政治史上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都是一件新的事情。兄弟国家很重视。帝国主义国家想找我们的毛病，但找不到。比如近两周来提出的学校中的党委治校的问题，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就我接触到的朋友来说，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党是可以从政治上领导科学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这种制度有缺点，发生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缺点。因此，大家认为应该更多地听取教授和学生的意见。这证明，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现在应该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最近我参加了北京的一些座谈会，感到仍有人没有把话说完。在一次高级技术人员座谈会上，有人发言后问我到底怎样，下边可能顾虑更多。因此，今后应该彻底地广开言路。现在光是中上层人物的意见，固然能够反映很多方面的意见，但是，还应该普及到下层才好。下层干部在几年来对国家贡献很大，其功不小；但是犯了不少错误。因此希望这次整风能听一听基层人民的意见。

“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

其次，谈几个问题：几年来，特别是从去年政协会议以后，国家领导方面很重视各方面的意见，民主生活日渐丰富。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重大问题，可以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如这次整风，结合检查改进工作，当然是好的。过去，作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的

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又如体制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分权问题，去年只交地方党委书记和少数党外高级干部进行讨论。主要是党内讨论。应该利用政协、人大的各种委员会、民主党派去讨论，这些人都有相当的认识和经验。再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党内的一些同志，大有问题，相当混乱。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陈梦家在文汇报上的意见，我部分地同意。

“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设计院。”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等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所要作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作的事情要经常地讨论。

近来，政协委员到了下面视察工作，工作是增多了。但还不能停留于视察工作，要进一步让大家经常讨论国家的重大问题。

“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大多数教授都反映说会多，这要看什么样的会 顿使是千篇一律的报告会，形式主义的会，最好是少开一点。比如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的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但如果能够提出问题，拿出材料认真讨论，有丰富的内容，能够发挥各个人的见解，这种会大家不会感到多的。关于体制问题，如何搞，大家可以深刻讨论，文字改革问题也可以由大家讨论。

在政协、人大常委会里面，共产党中央要考虑放上一批能干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的许多领导同志，有知识，有精力，可否在统一安排的原

则下，分配一部分参加到上述机构里面，经常同各方面的人士交换意见，而不要像现在的一些共产党的同志那样，只是看看你们怎么讲，今后人大常委会、政协讨论问题，各部应该有常务部长出席代表各部说明政策。这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政治。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于老年的知识分子，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的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社会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一再讨论，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鹅查要有准备，要好好作。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革命中发生了极大的作用。这方面的经验还得总结一下。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找理论根据教育共产党员，那固然必要；但是还不如从实际生活中，从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开始直到现在的统一战线工作，作一个总结。对党员的教育作用更大。在作某一部门的总结的时候，也可以请有关各民主党派参加，这也可以少发生一点主观主义的毛病。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

越是崎岖越坦平

——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章诒和

问：凡5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章伯钧是中国头号大右派，能否谈谈他的生平？

答，现在的人，只知章伯钧是大右派。他以此获罪，又以此留名。历史本身就隐含着无法估计的因素在内。

1895年阴历十月初一，我的父亲出生在安徽桐城的一个地主家庭。所谓地主，不过小康之家。6岁那年，他的父亲不幸溺水而亡。从此，他与二弟章伯韬（3岁）、二弟章伯仁（5个月）由两位叔叔抚养。

他先入私塾，一年后转入乡间育才小学。我父亲自幼喜读书作文。每日归家放牛，以牛背上的吟诵为一大乐事。小学毕业遂投考省内有名的桐城中学。因数学不及格，几将落榜。后因文章着实写得漂亮，被校长（桐城派文人）破格录取。章家距学校90华里，那时的寄宿生须自带伙食。于是，我的父亲每月利用假日，由家肩挑大米、菜油，跋涉返校。他得知叔父为侄儿的求学上进，不断变卖田产，经济日渐拮据，便更加刻苦自励。

1916年20岁的父亲赤脚草鞋来到武汉，考入武昌高等师范英语系。这时，新文化运动正以磅礴之势在全国兴起。他酷爱西方哲学著述，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明确意识到中国人必须用民主科学态度去重新审视历史，正视社会现实。从此，民主主义开始成为他政治上追求的理想。他一面勤学功课，一面结交有志之士。其中有恽代英， 这个与他同龄的江苏武进人在武昌成立了《利群书社》 、《互助社》、《共存社》。我父亲常去书社读书学习，与恽代英相处甚洽。后又与肖楚女相识，肖乃湖北汉阳人，熟悉武汉社会情况，遂多与之探讨有关改造社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父亲在武昌高师曾发起组织读书会，继而又参与组织学生会。五四运动爆发，他作为武昌高师学生会代表参加了武汉学生联合会，积极组织武汉学生开展反帝反封的爱国运动。

1920年，刚毕业的父亲即被聘为宣城师范英语教员。不久，升任该

校校长（宣城师范又名安徽省第四师范）。为了把学校办成传播进步思想的园地，他先后聘请恽代英、肖楚女、陈霞年（陈独秀之侄）来校任教。恽代英任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员，月薪与校长相等，大洋百元，父亲与他商讨革新教育的方针、计划，决定从充实教材、改进教学方法入手。不仅使学生学好书本知识，还要懂得人生意义，树立革命理想。为此他俩付出很多心血。利用课堂宣传民主科学，带领学生走出校门，去了解中国社会现状。　　一次，恽代英领着学生远走黄山，沿途作社会调查，数日不归兑长纷纷跟父亲要人，认为这是把孩子引入歧途。他再解释也无济于事，最后闹得满城风雨，还告到芜湖和安徽省当局。半年后，恽代英被迫离职，我父亲通过高语罕介绍他到芜湖省立第五中学教书。为实现改革教育的理想，继恽代英之后，父亲又邀请肖楚女任教。肖楚女的作风不减恽代英，又极善讲演，把个课堂作为传播真理、批判封建思想的讲坛。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芜湖与安徽省教育厅，又免去肖楚女之职，父亲也愤然挂冠而去。他任宣城师范校长仅一年，其敢作敢为，改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教育举措，至今在安徽老一辈人心中仍传为佳话。后来的宣城四师，一直是皖南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当然，现在“宣师”的学生已不明细这段历史，据说该校园里高悬着恽代英、肖楚女的肖像，却无人再提章伯钧。

1922年，省长许世英以安徽省公费送我父亲赴德留学。他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攻读黑格尔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他与朱德同住一室，又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党小组副组长。1925年邓演达被迫前往欧洲游历，在这群留学生中与我的父亲交往较密，常促膝长谈，探索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道路。对这两个问题，两人观点极为接近，可谓志同道合。邓演达的精辟思想，据我父亲的阐释和回忆，可以归纳如下：

●资本主义在中国尚未形成，在经济上受制于帝国主义。

●中国资产阶级并未掌权，国家政权实际上是军阀、官僚、买办的统治。

●各中小城市虽被外国商品侵入而涂上一些资本主义色彩，但土豪劣绅依然垄断了乡村，广大地区笼罩着封建主义制度。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结构，是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是一个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压迫下不断挣扎、日趋腐朽破碎的社会。而所谓前资本主义，则是指中国从东方式的封建社会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变阶段。

●这种社会规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性质，是带有民族性的平民革命，建立农工为重点的平民政权，实现节制资本（国家资本主义）和耕者有其田，以准备向更高的社会阶段过渡。

邓演达的观点，不仅为父亲所接受，而且运用于后来的革命实践。在福建事变中他就是以这种理论为指导的。后来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言论，也一贯以这些理论来表明自己的主张。北伐出师，我父亲一直在邓先生左右进军到武汉，并深受倚重。邓演达被杀害，父亲继承着邓演达这面旗帜，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第三党几次易名， 但都是以邓演达手拟的纲领作为党章的基石。 父亲对别人曾说："要像寡妇守节一样，守住邓先生的精神。"我想，父亲用他的一生完成了自己的承诺，并付出了失败、流放、通缉、被黜出以及凄孤而死的代价。

我父亲在柏林大学的四年，系统地研习了马克思主义原著和充满辩证精神的黑格尔哲学。因而，他有着建立在丰厚社会科学知识基础上的理论坚定性和崇尚真理的革命意志。这一切，为其后来无条件献身社会、追求进步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他在北伐失败后，参加发动南昌起义；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参加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建事变失败后，流亡日本；在日本一边重新学习、反思自省，一边又重振组织；日寇发动侵略的枪声一响，他立即潜回香港，率先响应中共《八一宣言》；在蒋介石宣布解散民盟的时刻，他流亡香港与沈钧儒一道宣布恢复民盟……。这一系列不屈不挠的表现，都与他在德国的初衷相一致。在家庭生活中父亲从来不怎么检查我的成绩单，但极其重视"如何做人"的教育。他常说："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最起码的条件和最终的要求就是表里如一，始终如一。无论生忧患之中，还是处落魄之境，无论自幼至长，还是自长至老，在这个问题上应无一刻的松动。"

我父亲的奋发求学与精神气质，对他的两个弟弟起着表率与带动的作用 短他去德国之后，二弟伯韬赴法国留学，为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语文部主任，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三弟伯仁到日本留学，后去苏联也成为共产党员，继陈绍禹（王明）之后，任苏联远东区伯力学校校长。一家三兄弟相继出国深造，被家乡亲友同学称为"一门三国"、"一门三龙"。而且，这"三国"、"三龙"还都是共产党。但兄弟三人均未能善终，我父亲成了反党右派；我二叔操劳早逝；我三叔在斯大林清洗中被枪决。

问：章先生最初是共产党，为什么又离开了共产党？

答：这个问题我现在只能回答一部分原因。大革命失败后，我的父亲对当时共产党内连续出现的“左倾”路线极为不满。对第三国际亦大有看法。他作为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深感自己不能适应。

所以在与中共失去联系之后，再也没有主动恢复。他愿意追随邓演达创建第三党。邓殉难后，他矢志奋斗到底。在漫长的斗争中，他历尽险阻，贫病交加。蒋介石用高官利诱，用权势威迫，他都不为所动，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民主战士。

问：据我们所知，章伯钧先生不仅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领袖人物，而且还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和实际负责人。

答：是的，但现在实际上已经把章伯钧遗忘了。记得1981年民盟中央召开了一次纪念建盟40周年的座谈会。母亲就是兴冲冲而去，悲戚戚而归。

谁都知道，民盟是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建立的，它承担着国共两党之外“第三者” 角色和重要的调停作用， 以推动两党团结抗敌。它是由三党三派组合起来（即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职业社、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人士）。本着“一则团结各党各派，抗拒蒋介石的打击；一则同共产党合作”

的目的，父亲怀着巨大的热忱，拿出全部的精力投入了民盟的酝酿、筹建及日常工作，在周恩来的支持帮助下，奔走各方，沟通意见，尤其是争取青年党的加盟，我父亲不知与李璜、左舜生打了多少交道。

1941年3月29日民盟秘密成立。父亲是五人常务委员会之一员，兼任组织部长。

1958年1月26日， 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章伯钧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组织部长的职务。

我是章氏后代中唯的一盟员。但只要提到民盟，我内心总是隐隐作痛。因为为了这个组织，我父亲几乎送命，他的家庭几乎破裂，我和姐姐整天被搁在乡下的红薯地里，形同孤儿。它存留在我心中。

问：现在出版的关于反右运动的书不少，您都看了吗？

答：现在出版的关于反右运动的书，我翻翻而已，如叶永烈的，如

化名为姚杉尔的“中国百名大右派”，它们算是文学作品吧。从前的血泪，可以成为现在的资本；写别人的血泪，可以转换为自己的资本；不懂得民主党派，不熟谙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是弄不透反右运动的。别以为把那些旧报纸上的东西用粗针大线穿起来，就自诩为“本书是一部系统研究1957年右派的问题的开山之作”，是对“那个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进行了真实的记述，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我同意这样的观点：文学也在分化，就整体而言，几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基本上无所作为。

文学不再是艺术，而是商业活动的特殊形式。他们不是创作作品，而是制造作品，用发表过的文章或资料加以组合，再“返销”给出版社。其中，纪实文学、内幕故事和名流生平、隐闻是其着重关注的领域。

问：那么，您能谈谈反右中章先生的情况吗”

答：对这个问题，我只能简而言之。

新中国成立，我父亲在政府部门和其它部门担任许多职务。诸如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交通部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等等。每年都要出国，参加世界和平代表大会。他春风得意，心情舒畅。他认为自己是靠拢共产党的，共产党也是善待他的；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追求民主科学的职业政治家，对当时在权力行使、方针决策、政策贯彻以及意识形态、外交业务方面存在的问题，他都有所察觉，也有所议论。

1957年4月30日， 他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非常兴奋。

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概念的提出，“今后主要是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的总体方针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确立，是毛泽东对自身理论的突破。而这种突破将有益于他的社会实践。父亲说：第一代领袖是决心要把国家前途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领袖；第二代领袖是要能满足人民生活渴望的领袖，而生活又是不那么容易满足的。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和解决途径，他很可能要去完成两代领袖的任务。当中共提出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我父亲是相信的，相信毛泽东当初的确想整风，也要整风。

但为什么忽然从整风转变为反右，又是在什么时候确立了这种转变，父亲却一概不知（现在有人考征是罗隆基的一句话触怒了毛泽东同志，我不完全相信此说）。

既然确立了反右，也就同时确立了反右目标。于是中央统战部出面召开座谈会，让目标“入围”。于是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亲自电话催促父亲，一定要出席座谈会，给中共提批评意见。父亲再三推托，声明自己的观点意见平时都讲过了。“平时讲的不算数， 一定要在会上讲。”——看来，非去不可了。1957年5月21日下午，腹泻不止的父亲坐在“吉姆”车内，心里还不知一会儿该说些啥？想来想去，想出个“设计院”，还有些即兴内容：

●今天，我谈个人意见。近20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正常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民主精神，已经取得了极大效果。

●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待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要做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做的事情要经常讨论，●近一两年来，政府对老年知识分子问题，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效果。

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做。

●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问题，多听听多方面意见。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的。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意见；我不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以上这篇刊于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 的发言，最终成了我父亲划右的罪状和定性材料。罪状的第一条是主张政治设计院；罪状的最后一条是反对文字改革。

另加了一条是主张“轮流坐庄”。

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给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 扶定保留五个右派分子，以证明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领导者的错误在于“扩大化”。在此决定下达的前一天，中央统战部把我母亲（由我陪同）找去谈话。谈话大意是：“既然中央给反有定性为扩大化，那么就需要保留一些右派，要保留右派，就需要保留右派中的头面人物；要保留右派的头面人物，自然就需要保留章伯钧先生。”

又说：“当年给章先生划右的材料都不确实，从政治设计院到反对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而‘轮流坐庄’则是程潜批判右派时说的，也被按到章伯钧先生头上。

现在我们重新整理了材料，右派定性用的是孙大光的揭发材料。”说罢，问我母亲有何感想。母亲说：“对此决定，我只能服从，而不能赞成。”有关领导说：“服从就好。以后我们对您及章家会有所照顾的。”

从府佑街出来，母亲默然不语，两手冰凉。她临终前还一再对我说，自己心底还有一桩事。我知道母亲的心事。其实，父亲的事在1957年夏季就完全、彻底地结束了。我希望右派这两个字永远保留下去。它永远属于章伯钧，属于我最亲爱的爸爸。

问：反右之后，章先生的心情如何？

答：这个题目是一个中篇题材。

划右以后，他从一个忙碌的政治家变为孤独的思想者。从此，灵魂在自己躯壳里无法安放。以至那副躯壳对于灵魂似乎都是“异已”的。棋

天踻地，拘手挛脚。

肉体的不自由，伴以心灵的不自由。人作为“人”被有形、无形的外在力量所剥夺。

只把一小部分（而且是一部分的内心生活）留给了自己。除了被批判和被抛弃之外，父亲一无所有。他看到的是头顶上的一块天空，面对的是一个妻子两个女儿。也是到了这个时候，现实才终于提供了必要的距离，使得原本就极具哲学思辨力的父亲得以看清表现为历史过程的“大跃进”、“三面红旗”、“文革”，成为一个孤独的思想者。

我这里仅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当大家都在大跃进，　欢呼“1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父亲对我说：“对一个贫穷国家来说，经济就是政治。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是畸形，我想连毛泽东本人也不知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政治上是巨人，经济上则是侏儒，加上我们总爱学苏联，把军备开支列在第一。现在一时看不出来。就像刚出娘胎的畸形，过几年，我们作为社会的每个细胞，就会承受这种畸形的痛苦。对共产党的最大威胁是什么？不是抗美援朝，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是一旦国门大开，老百姓发现外面的生活比自己好的时候，对一个执政党的真正威胁便来临了。”

当在反右之后，又搞反右倾，拔白旗运动，父亲偷偷对我说：“近代中国之败，败在热衷权力的人太多，始终忠于理想的人太少。发动批判的人如不能自我批判，他一定是把批判当作获取权力的另一种形式。”

当“文革”一来临，数亿人都处在癫狂状态的时候，爸爸告诉我：“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开始了。对一个追求民主与科学的人来说，生是地狱，死是天堂。

马克思万万想不到他的哲学被糟蹋成这样。报上宣传的思想，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宗教。只有一个主义欢迎它，那就是法西斯。”他对“统一思想，统指挥”的五统一提法，觉得非常可笑，并建议我将来能读读1945年他在《中华论坛》写的发刊词。他去世后，我读到了，父亲是这样写的：“思想与政见是人人不必尽同的，亦事实上所不能尽同的。如强人以相同，或胁之以相同，只是徒劳而已。不同之中，何以相安？何以共处？则唯有遵守民主精神，确立民主的作风，尊重异己，接受批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是择善而从，不必攻乎异端，如能如此，

斯能安矣，斯能处矣。”

除了可以思想，父亲还有深深的痛苦。他说这辈子面对共产党，他问心无愧。

但面对数十万右派，数百万知识分子，他的理智备受煎熬，他的情感处在永无休歇的歉疚之中。

反右运动中，与罗隆基、章乃器相比，父亲认错、认罪是最早的，而且是按着指定的调子去检查。 为此， 他反复思忖，最终很快下了决心，他对妈妈和我说：“难道让上面认错吗？我不认错，这个运动能收场吗？再不收场，扩大蔓延下去，到了乡镇小城就是抓人、坐牢、杀头，老罗和乃器哪有我清楚。”

一直到死，父亲不断地和我谈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每次谈及都无比激动，”

无比痛心。父亲认为，中国多的是知识者小人物。这种小人物也正是所谓小知识分子。贫穷的中国既然不可能支撑一个宠大的贵族知识者层，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的大多数就被注定了要与使用双手的劳动者一样忍受屈辱和饥寒。安于卑屈的地位，以诚实勤奋的精神劳动来维持一个紧窄狭小家庭的生存。在生命价值与知识价值日趋低廉的国度，自然很少有发挥才力的场合，秀木却又极易被外力摧折。不是中国人，不是知识分子就很难估量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史上承受过的压力及分量。

问：关于您的母亲，我们只知道她生前是全国政协常委，农工党中央咨监委员会副主席。您能不能较为详细地谈谈她，以及她与章先生的婚姻？

答：我母亲原名李淑娴，其父在当地最早兴办洋学堂、女子学堂，开教育之先河。她自幼接受良好的正规教育。初中读的是河北宣化中学，高中考入享有盛名的北京女师大附中，入学不久，即被推选为学生会《学生月刊》主编。1927年，传来北伐战争胜利的号角，热血沸腾的她，怀揣六枚铜板，跟罗瘿公之子罗中震毅然南下投奔革命。那时，一向关怀并支持她学业的大姐李哲民（北京女师大化学系助教兼附中化学教师）正在武汉兵工厂任技术员，并与担任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章伯钧结为伴侣——

问：对不起，我插上一句，是不是章先生有过两次婚姻？

答：不，准确地说，我的父亲有过三次婚姻。

第一次是1921年在安徽桐城，由他的寡母包办，娶当地农家女林氏，生子章师明。翌年，父亲留学海外，获哲学博士学位。1926年与好友孙炳文同船归国，在广州应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郭沫若之聘，任该院哲学教授。月薪280大洋。交党费200元，80元自由。须加以说明的是，我的父亲是在德国经同窗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当年在中大管理党费的是徐彬如（前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徐老晚年每每对我提及这段生活，总得意地说：“这200大洋可管用啦！那时的共产党穷啊！”

1927年父亲与郭沫若一道参加北伐战争，他俩从此搭档工作30载，1957年夏分道扬镳。父亲回忆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生活，常面带笑容。他说：“那时人年轻，工作严肃紧张，生活简单，情感上其实还是浪漫的。像郭沫若追求于立群，黄琪翔倾心范志超。在武汉政府工作，只要听说有女士来投奔革命，一班光棍干部都禁不住跑出来看，我就是这样看中你母亲的姐姐的。”1932年李哲民患肺结核，病逝于北平。断气前，她把自己的妹妹托付给丈夫。——这是章伯钧的第二次婚姻。它的时间虽短，但给父亲留下了很长的回忆。或许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恋爱。我已经长大，爸爸还曾举着一张他与李哲民上了水彩的结婚照片对我说：“好好看看，是你妈妈漂亮，还是大姐（指李哲民）漂亮？”

1933年，父亲正式写信给母亲，要求与之续弦。正在北京大学医学院读五年级的她，思前想后，既痛死者，又怜生者，遂于这年的暑假在上海与章伯钧共结连理。

有人说，女人是男人温暖的港湾。我的父亲在游离了两个渡口之后，最终停泊靠港了。我的母亲也是在一种异常复杂的心态下，允诺了这桩姻缘，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从此，他们双双携手，步向生活，共同面对不可测知的时代风云。同时，也开始了她一生一世的牵累。

问：章伯钧先生是您母亲一生的转折点，否则，她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医生。

对么？

答：对，但又不完全。因为扭转她人生轨迹的，还有邓演达。

邓演达与家父过从甚密。邓演达从德国归来，他们便一道在上海筹

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今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之前身），人称第三党。这个党的构成，一部分是国民党左派，如邓演达、黄琪翔；一部分是从中共脱离出来的知识分子，如章伯钧、张申府。

1932年邓演达从东北返回北平，逗留了一周左右。他听说李哲民的妹妹在此读书。邓一向对哲民有很好的印象，据同志们介绍其妹也表现不错，于是决定抽空亲自去北大医学院宿舍看看。

当邓演达出现在我母亲面前的时候，她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个操着广东口音的中年男人，就是参加辛亥革命，讨伐陈炯明叛军，组织领导北伐战争，一身兼四任，国共两党军事精英皆出其门下的邓演达，邓见母亲的宿舍堆满医学书籍，便问她是否想做个名医。母亲遂将自己愿以知识、智慧报效国民，服务社会的志向告诉邓先生。邓演达肯定了我母亲的求知心，接着又向她讲述了个人的观点：治病固然好，但对于国民、社会来说，最为重要和紧迫的是革命。职业是医生，天职是革命。

中国革命道路漫长、曲折，需要许许多多有知识、有理想的青年去肩负革命，作持久的奔跑。邓演达的讲话态度谦和、手势生动，浑厚的声音非常富于吸引力。最后，邓演达看了看腕上手表，即起身离去。他的来去似一只鸿雁，了无痕迹，而他的话，却像刀镂斧凿，永铭于母心。

问：您在刚才的谈话里，为什么要特别提到邓演达看表的细节？

答：您是一位精细的记者。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被捕。　戴季陶乘机向蒋介石进言：中国当今政坛最可怕的敌人，不是汪、日，唯有邓演达一人。这时，蒋介石收到历届黄埔毕业生请求释放邓的联名信。此举使靠黄埔起家的老蒋大为震惊，他决心杀邓。11月29日蒋亲自派其卫队，将邓杀害于南京城东。噩耗传来，举国骇然。特别是当我母亲听说一位看守托人辗转送出邓的遗物是一副对联（上书：人生自当忙不息，天地原来未瞬留。）另有带有汗渍与血痕的手表。她泣不成声，不由得想起邓先生以革命为天职的叮嘱，想起邓将军临别时朝手表投去的匆匆一瞥。在悲痛欲绝的哭号中，她感到自己未来的人生旅途将永远和邓演达创建的第三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她要将毕生的精力与心智无条件奉献给革命。在那几天，我的母亲

与同学连夜印发《宋庆龄宣言》，赶写反蒋标语。一月之内，标语传单遍布全城。她甚至与一些女学生黑夜摸到狮子胡同的北平卫戍司令部去张贴。

在我父母的婚后，父亲双手赠她一个用白绢包裹的物件。打开一看，是邓演达的那只金表。此后，我母亲奔波流离数十载，始终带着这件遗物。它浸透着那个时代的风雨烟尘。1966年，红卫兵连抄我家无数遍，这只手表被抄没。最珍贵的东西，以最粗暴的方式毁灭——中国的人与物之命运，常如是。

1978年我无罪释放，妈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带我去南京祭扫邓墓。秋阳下我母女二人含泪伫立在邓演达墓前，墓边绿草如茵，横七竖八地躺着一群青年，且又吃又喝。当我们默然离去时，只听得背后传来议论：“这邓演达是谁？”“大概是邓颖超的哥哥吧？”

问：想必你母亲李健生先生在“反右”及“文革”中，都受到很大冲击吧？

答：是的。“反右”红火的时候，上级派人来动员她与我父亲离婚，让她远看刘清杨、近学浦熙修（这二人都是在丈夫张申府、罗隆基倒霉之际，宣布“划清界限”的）。我母亲听了摇摇头说：“我封建思想严重，在这个时候要老婆离婚，绝对办不到。”翌日，这段话就上了首都各大报刊。自然，我的妈妈也戴上右派帽子。

谈到“文革”，我的心情极其沉重。以后，我会专门撰文追述这段锥心裂肺的岁月。总之，一切惨烈无情都指向了两个孤立无援的老人。那时的民主党派以及政协均被红卫兵、造反派一律当成牛鬼蛇神。而我的父母便是牛中牛，鬼下鬼。别瞧民主党派从未执政，可整起人来一点也不逊色。

问：能否再介绍一下包括您本人在内的章氏后代的情况？

答：我父亲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儿子叫章师明，即我的大哥。他1920年生于我父亲的老家安徽桐城，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现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

我的姐姐章诒学，1939年生于香港，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现为

北京第二光学仪器厂研究所所长，教授级高工。北京市政协常委，全国妇联执委。

我叫章诒和，1942年生于重庆，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现在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问：如此看来，章氏后代皆为民主党派成员，而且在事业上都有所成就。

答：成就二字不敢讲。但我们几个平素为人及工作成绩，至少在民主党派的圈子里大家是清楚的。从职业上看，我的兄长有那么点子承父业的意思。姐姐与我，一理一文。这与1957年后父亲对职业的看法有关。家父历尽政治风波，饱受精神折磨。1957年6月8日前，称他为民主人士，高官厚禄；6月8日后，说他是马路政客，人格全无。作为一个职业政治家此时似乎才明白政治为何物。60年代初，我就择业问题请教他，父亲说："年轻时留学柏林，德国人告诉我，他们最尊崇的职业是医生和律师，因为人命关天，故学这两个专业的学制也最长。不想，当年我问异国人的问题，如今你拿来问我。这里，我只讲一句话，你选择什么职业都可以，但我唯一尊敬的是科学家或艺术家。因为他们比较干净。"

问：听说《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人民政协报》、香港《文汇报》曾刊出章伯钧子女家属出资20万元，为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在其家乡河北省怀安县建立了李健生教育基金会。请问什么是李健生教育基金会？它是由谁建立的？

答：这是由私人捐款，以个人姓名命名的教育基金会。该会设立在河北省怀安县，旨在奖励这个地区的先进教师和优秀学生。李健生是章伯钧夫人，捐款人是章伯钧的子女。也就是说，是我们兄妹为纪念母亲，为发展其家乡的教育事业而办的一件善事。

问：你们兄妹怎么会想到要建立教育基金会？据我所知，你们当中谁也不是富翁大款。

答：自1957年始，我们三人在不同的地方均受着政治压力与社会歧视，人生道路坎坷不平。譬如我，"文革"中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20年，坐牢10载。父亲殁于被捕之初，女儿生于团圆之内，丈夫亡于平反之前。生活搅拌着血泪，血泪熔炼了灵魂。　我对这样的人生并无怨悔，反

觉自己有幸出自于这样的家庭，非常珍惜它贰管父亲的骨灰摆进了八宝山，其实在他背上还背着黑锅。越是如此，子女就越应自强。我们兄妹性格迥异，待人接物亦有所不同，但都自觉尊守一条“法则”，那就是自己的行为不能给父母抹黑。现在，我们三人均已年过半百，更感到有必要为父辈、为社会做点事情。

问：听您的谈话，是否还要为章伯钧先生做点什么？

答：是的，只要主观条件具备，客观环境允许。

关于成立“平反委员会”的发言

罗隆基

罗隆基发言说，最近有两位外国记者到他家去，请他谈谈对于“鸣”和“放”

的印象，特别是对于马寅初、张奚若发言的意见。他说，他认为这次的争鸣是很健康的。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一。

第二、“鸣”和“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根据党中央的整风指示，集中批判三个主义。同时他还对外国记者说，他认为马寅初老先生顾虑太多。他不同意马寅初的意见，他说，在解放初期，许多老教授不能上课，经过学习提高，现在可以上课了。马寅初说，整风运动以后，许多青年助教因为教条主义太多，上不了课。其实这又有什么可怕呢！青年教师经过整风，抛掉教条主义，提高自己，将来就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这正是辩证的发展，这正是整风的作用。也不完全同意张奚若的意见。

他说，前一天，陈叔通老先生对他说，现在的争鸣气候好像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他又续上两句“一片整风声，三害除多少。”他说，通过这次整风，“党加强了，民主党派也提高了”。

第二，他说，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未来受到打击报复。他认为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但他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方案，这就是要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成绩，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以为这样作有三个好处：一、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二、过去的“五反”、“三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人有担心在这次的“放”和“鸣”以后，还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他还主张，“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因为他认为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着搞的。“平反”时，除了

领导党以外，还应该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说明运动有成绩，也为受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党派有，其实共产党内也有。三、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他以为，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因此，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

第三，他认为共产党在发展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发展知识分子方面是否有些太快了，是值得领导党考虑的。在解放后这几年里，党员很快地发展到1200万。在他看来，在解放初期在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常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这样的人，却被党看成是积极分子，也就是进步分子，吸收入党。这些人多半没有经过多年的革命锻炼，也缺乏同自然作斗争的知识，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非党知识分子感到不服气，既影响党的威信，又造成了党和非党的隔膜。

第四、关于有职无权的问题。他认为，党员固然有责任，机构也有问题。他说，他在森林工业部里面是有职有权的，但是部以上有国务院的八个办公室，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另外还有党中央的各部，你这个部没有法子有权。很多事情都是从上往下贯彻，往下交任务。经委和计委向部里要的数字任务，也只能是主观主义的 镀划整个地建立在关起门来的主观主义的基础上。他认为经委和计委和国务院各办公室的领导人员多是党员，这也正说明党对旧知识分子很不信任。

他以为“党员的政治虽强，技术知识和对经济计划工作的经验不一定都丰富”，应该放心地让旧知识分子参加管理工作。

第五、关于当前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保守”还是“冒进”的问题。他认为从1956年以来主要是冒进，而不是保守。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哪个部的问题，而是全部的冒进。张奚若先生说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都是说的它的表现。这是把毛主席所说的“稳步前进”忘了的结果。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3日）

加强党对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

罗隆基

去年冬天我到四川去视察的时候，曾经接触到高级知识分子方面的问题，最近我负责主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小组的座谈会，又听到了许多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反映，现在我根据这些材料来谈谈个人在这方面的体会。

一年来的成绩和缺点

首先，　我们必须承认，从周思来总理旧年1月先后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由于党和政府的努力，在贯彻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上，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很大的成绩。知识分子的工资普遍地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解决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如时间、助手、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问题，到今天尽管不能处处尽满人意，但在可能范围内，都得到了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安排和使用，有了广泛的和适当的调整。最重要的一点是，一般高级知识分子都感觉得到了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因此，高级知识分子就增强了自己的信心，看到了自己的前途。

一般高级知识分子不再像一年前的消沉，现在兴奋起来了；不再像一年前的消极，现在积极起来了。今天旧的高级知识分子，有了新的气象。这个事实，我们应该肯定，并且必须肯定。

另一方面，社会是不断地在发展，情况是不断地在变化　飞问题是不断地在解决；新问题是不断地在产生。各位委员从视察中和座谈会中当然都知道，当前知识分子的问题仍然还是不少。在这里，我认为有两点值得大家注意。第一，有人说：“代表委员们年年观察，次次反映，反映尽管反映，问题还是问题”。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是与事实不符合的。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就印发了一些有关单位答复解决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材料，这就充分地证明上面这种悲观论调是错误的。第二，国家还在一个发展很快的过度时期中，对任何方面的问题，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是不会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我们的责任只能是：帮助党和政府，天天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并且解决问题。

当前，在知识分子方面，还存在些什么问题呢？在安排和使用方

面，还有某些需要进一步调整的情况。学哲学的人在图书馆编书目，学法律的人在机关里做会计，学染料化学的人在中学教语文，学机械工程的人在中学教历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学政法、财经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学校挂名领薪，而没有开课的人还是不少，甚至散居在社会上的高级知识分子中，还有英国留学生拉板车，美国留学生摆烟摊的情形。这当然只是个别地区和个别单位的事例。这次知识分子问题小组座谈会建议党和政府通令全国，普遍检查贯彻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的情况，我个人同意这种建议的。这种情况是应该加以纠正的。国家现有的高级知识分子都能各尽所长，各得其所，这是知识分子的利益，这也正是国家的利益。

旧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对知识分子问题政策的时候，重点放在高级知识分子方面，对一般普通知识分子问题，准备逐步地来解决。现在中、下层知识分子又起来呼吁了，认为高级知识分子得到了党和政府的照顾，而对小知识分子，特别对小学教师的照顾不够。其实旧工资调整，对小学教师的工资提高了很多，他们普遍表示兴奋。

但是小学教师教书的工作量已经很重，而有些地区的干部还要驱使他们充当杂役，替机关抄写，替书店推销，替家乡打井筑堤，替粮库晒谷守仓。小学教师疲于奔命，不听命令，就要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我们听到这样的呼吁：“救救六千三百万小学儿童的老师吧”。某些干部过分地歧视和轻视小学教师，的确是一种偏差。这是值得政府注意的，是应该加以纠正的。

领导干部要主动努力改进工作

今天的关键问题，仍然是怎样消除党与非党的隔膜，使党员领导干部同党外知识分子，精诚团结，融洽合作，这样才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服务。一部分知识分子与党员之间有隔膜，周恩来总理在一年前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了。今天的情况比一年前有了某些好的变化，经过肃反运动，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更纯洁了。各级党和政府努力贯彻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加强了高级知识分子对党的信任和拥护。今天一般高级知识分子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之下，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不只愿意接受党的领导，而且要求党进一步地加强具体帮助和领导。

诸位委员，今天的问题是党员干部怎样来改进领导方法，适应今天的新形势，彻底消除隔膜，以达到融洽合作曲目的。

周恩来总理在一年前就指出，“隔膜常常是从双方面来的”，同时又指示党员干部“必须主动努力消除这种隔膜”。我认为这种见解是绝对正确的。在党员干部的“主动努力”方面，我愿意提供几点参考意见　焚些反映中的具体的事例来说，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采用评级制，少数教授埋怨评级不公平，重政治不重学术，党员等级高，党外人等级低。扩大知识分子进修培养的机会，少数教授埋怨选拔不公平，选青年不选老年，党团员机会多，党外人机会少。这种反映当然是少数的，并且是片面的。尽管如此，这就值得领导干部主动努力，进行检查，看在行政工作上是否有协商不足，民主不够的缺点，看是否是在无意中犯了宗派主义的毛病。

事实果真是如此，事实就会给埋怨者以具体有效的说服教育　飞年在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中我曾说过：“毛泽东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是扫除党与非党间隔膜，加强团结的对症良方”。当时我以为在一个6亿人口的国家，我们的思想意识，只能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先求团结，其“存异”的方面，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就所见，畅所欲言，这不仅可以减少郁积，消除隔膜，并且是非愈辩愈明，真理愈争愈显，百川异流，将来总是同归于海。然而事实怎样？一年来在学术思想方面，“百花齐放”，放者不多，“百家争鸣”，鸣者太少。两个号召提出来的时间太短，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根据反映的材料，基本原因还在一般高级知识分子顾虑太多，猜疑太重，以致花不敢放，家不敢鸣。这种现象的发生，在我看来，主要是某些党员干部和党外少数进步人士，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号召，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体会。他们认为两个号召提出以后，今天社会已经是淫辞放恣，异端猖獗，他们就热心于尊统卫道的工作，以今之韩愈自任，过急过早地倡导“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的议论，对思想学术的“放”者“鸣”者，不惜口诛笔伐，“包抄”“围剿”，以求正人心，息邪说，传道统。这就使一般旧知识分子更加思想混乱，无所适从，更加退缩不前，逡巡不进，更加瞻前顾后，栗栗巍峰，而对领导干部和一些进步人士就更加“畏而远之”了！这种现象对国家思想学术的发展是大有妨碍的。这种现象是值得领导干部和党外进步人士，认真检查，“主动努力”

来切实纠正自己的教条主义的。

加深了解，消除彼此间的隔膜

隔膜是从双面来的，消除隔膜必须双方面共同努力，倘此方认彼方是思想落后，而彼方认此方为学术外行，只看见了自己的长处，却忽视

了对方的长处；只看见了对方的短处， 却忽视了自己的短处。 不能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那末“落后”与“外行”之间的隔膜，是很难消灭的。

消除隔膜，是彼此双方彻底认识和了解的问题。在我个人来看，我们旧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外，还要好好地学习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这样，我们才能明白革命老干部经过了怎样困苦的革命斗争，受过了怎样艰难的政治锻炼。革命老干部语言比较坦率，行为比较憨直，批评比较严厉，斗争比较猛烈。这是长期革命生活中养成的习惯。这是革命干部的特性。这正是革命干部的优点。这是党外知识分子必须了解认识的。领导干部从军事革命工作转到文教领导工作的岗位上来，固然应该研究新的业务，以便加强具体领导，但在团结、教育和改造旧知识分子的时候，掌握了马列主义以外，也还应该读读“资治通鉴”这类中国的史籍。这样就能熟悉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明了从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性。名利观念，个人打算，以及所谓的“独善其身”，“明哲保身”

这一大套构成士大夫立身处世的特点，也正是旧知识分子不幸而有的弱点。它们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遗产，而一百余年的半殖民地教育，也使它们变本加厉了。彻底扫除这类思想上唯心主义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这就是求领导干部的同情帮助和耐心教育。

知识分子的知识既然达到了“高”的水准，他的年龄也必定活到了“老”的阶段，他就是中国旧社会里所谓士大夫阶层中的“士”。中国的“士”对他积极的一面，例如“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士”不是甘心寂寞、不问政治的人，就看领导者怎样能够使他们发挥积极的一方面为国家服务而已。中国旧社会中的“士”有这样一套传统观念：“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合则“士为知己者死”，不合，则“士可杀不可辱”。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对这类自高自大的“士”，亦确有一套领导的艺术，即所谓“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等等。中国旧社会中的“士”愿做脱颖而出的毛遂者少，愿作陇中待访的诸葛亮者多。 若得三顾茅庐， 必肯鞠躬尽瘁。我不是说在今天的新社会里，还必须用“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的旧方式同“士”所期望的“礼”之“下”之是有矛盾的。怎样来统一这个矛盾，怎样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鼓起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消除彼此间的隔膜，这就靠领导干部的“主动努力”了。

在目前来说，党员领导干部同旧知识分子相处共事的时候，在某些

事情上，应该把个人和党的界线分别清楚。领导干部执行政策是可能发生偏差的，个人是可能犯错误的。一方面，不可以把个人的偏差看成政策的偏差，更不可以把个人的错误看成党的错误。另一方面，接受党的领导，不完全同于接受党员个人的领导，党员个人的威望不等于党的威望。批评个别党员，不管批评是否妥当，不等于反党，更不等于反革命。我们今后必须深切地体会毛主席关于“怎样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切指示来处理问题。这样，党与非党的感情就自然逐步趋于融洽了。

民主党派今后的任务

最后，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我愿就个人的见解谈一点我们民主党派今后的任务吠拿我们中国民主同盟来说， 几年来我们民盟全体盟员在自我教育和改造以及团结教育中上层知识分子方面，是做了些工作的。我们的工作有成绩，也有缺点。自从领导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以后，我们各民主党派的责任加重了。怎样进一步采做好我们的工作，完成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当前一个严重的课题。在这次视察中，我们听到这样的反映：民主党派中有些人的工作是：锦上添花，火上加油，只是观风色，看气候，扣帽子，打冷拳。这些反映是值得我们深切反省的。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下，我们今后应真正成为领导党的助手，我们应该诚恳地接受党的领导，坦率地对党提出批评。我们要认真地贯彻“互相监督”，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今天一般旧的高级知识分子，思想上都有了进步和提高东大部分的老年高级知识分子是业有专精， 学有专长的。我们应该殷勤地接近他们，了解他们，虚心向他们学习，并且竭诚帮助他们，我们要代表他们的利益，反映他们的问题。协助他们克服困难，鼓励他们贡献意见，团结他们互相学习，共同改造，这是我们民主党派每个成员的任务，我愿同我们各民主党派的同志们共同勉励！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

政治与学术之间：罗隆基的命运

谢泳

1957年的政治运动，造成了中国55万人的右派命运。20年后，中国为“右派”

平反。在当时的知名“右派”中只有以下几位未获平反，他们是：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 彭文应、陈仁炳、林希翎。除林希翎是年轻学生外，其余5位均是1949年以前就很著名的知识分子。1986年10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北京举行纪念大会，隆重纪念罗隆基先生诞生90周年，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阎明复到会讲话，对罗隆基一生作了评价， 算是用特殊的方式为罗隆基恢复了名誉。 他称罗隆基是“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并进一步指出“纵观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1]

[1] 《人民日报》，1986年10月25日。

出身清华

罗隆基（1898－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1913年考入清华学堂，1921年夏天毕业，秋季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192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离美赴英，入伦敦大学研究。回国后历任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教授、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暨南大学政治经济系讲师、天津《益世报》主编、北平《晨报》社社长、《新月》杂志主编。

罗隆基一生对现实政治抱有浓厚兴趣，这使他较早地离开了大学讲坛而投身现实政治，也使他终身在著述上不够丰厚。1923年，罗隆基、闻一多、吴泽霖等人在美国芝加哥成立了大江学会，这是一个以留美清华学生为核心的政治性团体，鼓吹国家主义（nationalism），以“对内实行改造运动，对外反对列强侵略”为宗旨。

当年的29名成员中[2] ，如吴文藻、吴景超、吴泽霖、顾毓琇、梁实秋、闻一多、潘光旦等，后来都远离了现实政治，而走上学术道路。虽然后来他们各自的命运都很坎坷，除了离开大陆的几位，几乎全成了“右派”，但以罗隆基的命运最令人深思。

[2] 闻黎明：《闻一多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页82。

世纪初成长起来的这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清华出身的这批人，可以说对政治都抱有热情。当年罗隆基引以自豪的是“九载清华，三赶校长”，可以想见青年学子的行动。当时清华的入学规定是“考生年龄不超过14岁为限”[3]。可以设想，当一个不足14岁的少年在清华这样的留美预备学堂中呆够八年之后，他们身上究竟是传统的影响重，还是西化的影响强？可以说他们是从小即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特徵就是早熟的自由和民主观念，这直接表现在对政治的热情上。罗隆基是将年轻时对政治的热情一直保留下来的一位。他的老同学浦薛凤曾说过，在清华辛酉级（即1921年毕业班）同学中，有兴趣与能力搞实际政治的当推罗努生、何孟吾与吴峙之三位。浦薛凤说：“努生有其学识，具其口才，弄其手腕，但他至多是一位自觉得意的政客，而非一位真正的政治家。”[4] 1922年春天，浦薛凤曾和罗隆基直言相互较量性格，并预卜前途。罗隆基说：“逖生，你有你的才识，但只是一个书生，不够现实。除非你改变作风，恐你成为一位政治理论家而非政治实行家。”当罗隆基要浦薛凤对他直言批评时，浦含蓄地说：“努生，我只觉得你读‘子’书多于‘经’书，你喜欢‘法’家甚于‘儒家’。盼你将来官运亨通，但慎防宦海风波。”[5]罗隆基的最后结局，终于被他的同学言中了。

[3][4][5]　浦薛凤：《忆清华辛酉级10位级友（上）》，《传记文学》，第47卷，第2期，总第279号（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85年8月），页19、20。

《新月》时期的政治言论

1928年，　回国不久的罗隆基才30岁。是年3月，《新月》月刊创刊，而“新月书店”亦先后在北平和上海开张。这时罗隆基显得非常活跃，很快便进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心。他积极参与了《新月》的活动，先后担任了《新月》3卷2期至4卷1期的主编。《新月》本来是一个纯文学刊物，但罗隆基接编后，陆续登载了不少讨论政治问题的文章。这时南京方面延揽过他，胡适曾将戴季陶的一封信转给罗隆基，从他给胡适的回信中可以看出他对仕途的热衷，他说：“惟原函中所谓在院服务，并未言明何项职务，所谓党校教书，亦未言明何项科目，令人实难答覆”。

最后他告诉胡适“何去何从，当以考试院之职位而定耳”[6] 。虽然后来罗隆基并未赴考试院，但他热衷现实现政治的性格已非常明显。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香港：中华书局，1983），页502。

《新月》时期的罗隆基著述颇丰，是为《新月》写稿最多的作者之一，而所做文章都在政治学范围内产生很大影响。他的言论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以自己深厚的专业知识，介绍英美的政治学理论：二是以自己对政治学原理的理解，来批评政府行为的不合法性。

1929年，罗隆基在《新月》发表《专家政治》一文。这篇文章是罗隆基一生思想的重要代表。罗隆基热衷现实政治，不仅是性格使然，也有很强的理性支配。他信奉“最好的政府是最好的行政”的原则，并明确宣称，要说政治，我的座右铭是：只问行政，不管主义。”[7]　罗隆基对中国政治结构的评价是行政比政体要紧，有了好的行政，无论在哪重政体下，人民总可以得到幸福，反之，如果没有很好的行政，无论在何种政体下，人民都会遭殃[8]。罗隆基关于专家政治的想法来自美国，他当时已经注意到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必然导致行政上的专家政治　愤体说，就是行政人员的选拔制度很落后，罗隆基回国不久，即介绍美国的吏治法与吏治院，其着眼点即在如何能将真正有才干的人选出来。罗隆基认为，中国当时的行政处在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这两种恶势力的夹攻下。他又认为，不经过选举、考试而靠推荐、援引、璘缘，苟且产生出来的全国官吏，是一种分赃制度，所以他力主“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最要紧的是专家政治”。要实现专家政治，消极方面是要先除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积极方面，则是先实行选举制度和考试制度[9]。

[7][8][9] 《新月》，第2卷，第2期。

《新月》时期，罗隆基发表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是《论人权》。他指出，人权简单说就是做人的权利。不过罗隆基的人权观却不止于此，他认为衣食住行、温饱小康固然是人权，但他特别强调言论自由是人权的应有之义[10]：[10] 《新月），第2卷，第5期。

言论自由是人权。言论自由所以成为人权，不因为他可以满足人的欲望，不因为他是天赋于人，不因为他是法律所许，根本原因是他的功用。

他是做人所必须的条件。

是一个人，就有想法。有思想就要表现他的思想。要表现他的思

想，他非要说话不可。他要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说旁人要他说的话，这就是发展个性，培养人格的道路。

除此以外，罗隆基还分析了人权与国家的关系。他引述一位外国政治学家的话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从政治哲学上立论，国家不是一个强迫人民服从其意志的团体。国民之所以为国民，就是他有检查政府一切行动的宗旨及性质的责任。政府的行动，不能以其出诸政府，即成为天经地义 厄单地说，国家不能产生人权，只能承认人权。国家的优劣，在任何时期，即以人权得到承认的标准为准[11]。说到人权与法律的关系，罗隆基认为法律保障人权，人权产生法律。他亦认为人权有时间性与空间性，因时因地而不同，有时偏重经济，有时偏重政治。在文章的最后，罗隆基以“我们要的人权是什么”为题，开列了35条，可以说为中国起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人权宣言，这个宣言今天读来仍然振奋人心[12]。

[11][12] 《新月），第2卷，第5期。

罗隆基还发表了《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甚么样的政治制度》等文章，直接批评国民党一党独裁和“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等。他认为，思想不能统一也不必统一。而且以人类的经验论，自有政党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党外无党”这回事，更没有过“党内无派”这回事。政党本来是与民主政治交相为用，相辅进行的。以民主主义治党，就不怕“党外有党”，民主的功用就在于调剂党内的派系、党外的党，使一切意见主张的纷争，走上光明正大轨道，而不趋于革命流血一条狭路[13]。

[13] 《新月》，第2卷，第8期，第12期。

此外，《论共产主义》是罗隆基在《新月》时期集中阐述对共产主义看法的一篇论文，文中对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经济到政治都给予了批评。他在援引一位英国教授的观点时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是历史学家永远的疑团，这种无逻辑的、愚呆的主义，何以能在民众的心理上发生如此有力且深远的影响，并且藉由民众所受的影响而反过来影响历史自身[14]？之后，他又写了《论中国的共产》一文再次阐述自己的观点，这篇文章的副题是“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并建议他们“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15]。罗隆基在文章中集中分析共产主义何以会在中国壮大，他认为国民党应负主要责任。第一，国民党宣传共产党的主义。共产党有今日的地位，共产主义在一

般青年的头脑里成了时髦，谁也不能否认这是孙中山、汪精卫以及许多国民党领袖的功劳。第二，国民党采用共产党的制度。如今国民党有党的组织，其党治的策略，由党而产生出来的政府，哪一项不是师法共产党、热衷共产党、整个的模仿共产党？第三，国民党协助共产党实际的工作。先知先觉的遗教，为共产党主义作宣传，后知后觉的组织，为共产制度造实例。同时国民党下级党员的一切工作，又直接间接的为共产势力实现制造机会。他进一步认为，政治失败、党员失德，是一党政治的必然结果。在一党专制下，人民没有组织和言论的自由，亦没有监督、指责党局及党员的机会，独裁政治的结果，自然是专政者的腐化，政治日趋腐化，人民日趋叛离，这就是如今共产党发展的机会。

[14] 《新月》，第3卷，第1期。

[15] 《新月》，第3卷，第10期。

整个《新月》时期，罗隆基发表过许多文章，他还用“鲁参”、“卤”等笔名写过许多书评。综合来看，这些文章都是围绕人权、宪政、约法等政治学理论的观念有关。他接近共产党，是由于它当时的政治地位还没能将“党在国上”的观念体现出来。

罗隆基与“党天下”

1949年，罗隆基留在新政权内，这时的罗隆基已不同于年轻时期。40年代末期，在国共两党军事、政治激烈交战的年代，他作为第三方面的代表，一直帮共产党的忙，而当时共产党为了尽快获得政权，在民主政治方面曾许下很多诺言，对于民主人士也表现出尊敬和宽容，这些因素对罗隆基的政治选择可能都有影响。

1950年，他和朋友吕孝信交谈时，曾对吕的抱怨解释说：“我怎知道国民党这样不堪一击？连大江以南也守不住？如果能守住江南，平分天下，共产党也不致有这样高的气焰。”[24]当吕劝他申请出国时，他说：“你不知道，如申请不准，以后将被歧视，认为思想不良，那份罪可大了，又怎能不怕呢？”[25]可见，罗隆基对自己在1949年的选择是有所不得已的。

[24] [25] 吕孝信：《忆一对欢喜冤家——王右家与罗隆基》，《传记文学》，第24卷，第1期，总第140号（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74年1月），页38。

1949年后，罗隆基一直对自己在政治上的才能抱有足够自信，并曾幻想以自己当年所做的贡献，可能会成为外交部长或驻英大使的人选[26]。虽然同时代的人公认他具备实际的行政能力，但在对共产党的认识上，他的书生气就流露出来了。他渴望成为新政权中的一名阁员、一名部长，但他最终获得的职位不是外交部长，也不是驻外使节，而是森林工业部部长。以他留美的政治学教育背景，公认的中英文水平，加上出众的辩才和口才，结果也只能管管木头。千家驹对罗隆基的评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被任命为政务委员，没有当上部长，一直牢骚满腹。"

[27]看他在《新月》时期对政治、国家、政党、民主、自由等的看法，想他在1949年以后的不适应也是情理中事。

[26] 吕孝信：《忆一对欢喜冤家——王右家与罗隆基》，《传记文学》，第24卷，第1期，总第140号（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74年1月），页38。

[27] 千家驹：《70年的经历》（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2），页239。

1949年，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留在大陆，情况比较复杂。出于种种原因，当时中共对知识分子还表现出一种欢迎态度，再加上国民党的腐败已使他们绝望，1948年底，大批知识分子由香港进入解放区。1950年左右，全国的安定局面使他们一度兴奋。可是正当他们对新政权产生好感之际，中共却制造了一个知识分子原罪论的神话——改造资产阶级的思想为无产阶级的思想，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居然相信了这个神话。罗隆基甚至说过："周总理是南开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28]一方面说明他有想不通之处，另一方面则说明当时的社会意识已渐趋以"无"为荣，以"资"为差了。在新的环境中，罗隆基的心情并未感到舒畅，而是越来越感到压抑，他所预想的一切都没有出现，而他万万想不到的事情却很快发生了。1957年的到来，将这位复杂的、充满个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仅剩的一点梦想也打破了。

[28]《大公报》，1957年8月11日，吴晗发言。

1957年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储安平以民主党派成员和新闻界著名人士的身份与

会。6月2日，《人民日报》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表了储安平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这篇发言即是著名的“党天下”论。

储安平在发言中首先指出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已经成为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何在？在储安平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他还说：“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党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储安平在1957年夏天的言论是妇孺皆知的，但最早使用“党天下”这个说法的应是罗隆基。 1930年2月10日出版的《新月》杂志，第一篇文章是罗隆基写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文中批评国民党“党在国上”，他说”：“党在国上”的影响，尚不止这一端。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当不可抄国民党的文章，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刘邦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他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继续不断的“党天下”。

说到“党天下”的说法出自罗隆基，自然不可避免地想到他和储安平的关系。

罗隆基长储安平11岁。储安平的经历与罗隆基大体相似，他从上海光华大学政治系毕业以后， 留学英国，思想都受著名的费边主义者拉斯基（Harold J．Laski）的影响。罗隆基在《新月》前期比较活跃，而储安平在《新月》晚期比较活跃。

罗隆基曾任光华大学政治系系主任，教授比较政府及政治思想史。1932年，储安平于该校毕业，是罗隆基的学生。从各种联系上讲，储安平与罗隆基的关系应该是很近的， 储的许多思想都直接受罗的影响，但储对罗是有看法的。1946年9月，储安平在上海创办《观察》周刊，列为该刊“撰稿人”的前后共有78人，多数是国内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在这个名单中，没有罗隆基，而且在《观察》存在的近三年时间内，罗隆基没有为《观察》写过片言只字。原因何在？是因为储安平对罗隆基的品德有看法。

1957年春天，储安平拜访过一次罗隆基。共产党批判储罗二人时，

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章、罗和储安平密室策划一证》[30]，说储安平和罗隆基如何如何，显然是将一般性的拜访和交谈上升到政治活动中去了。储安平后来在《向人民投降》一文中承认了与罗见面。另外，在当年的民主人士中，罗隆基和毛泽东、周恩来的个人交往是很少的[31]。罗隆基在1957年的遭遇除了政治上的直接原因外，与毛周个人的疏远或许也是一个因素。因为即使在“反右”、“文革”当中，毛周出于个人情谊或其他考虑，也保护过一些知识分子，如章士钊、梁漱溟等人。在“反右”

之前，罗就曾说过：“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对这类自高自大的‘士’，亦确有一套领导的艺术，即所谓‘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等等。”[32]然而这种声音在已经获得政权的人听来，已经很不顺耳了。

[30] 《光明日报》，1957年7月7日，第3版。

[31] 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 和1988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书信选》中，未收一封毛周给罗的信，这在当时的民主人士中是很特殊的。另外孙琴安、李贞著：《毛泽东与名人》（江苏人民出版社，1953）；卢之超主编：《毛泽东与民主人士》（华文出版社，1993）等书也未列毛罗交往的资料。

[32] 罗隆基：《加强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

据说，在罗隆基成为右派之后，香港曾有人邀他办报。周恩来为此约见了他，转告了这个消息，并对他说：“如果你想去的话，随时都可以去，不论去香港，去美国，都可以。我想，你是不会去台湾的。”罗隆基回答：“总理，谢谢你的关心。

我哪儿都不想去。我死，也死在这里。”[33]这与他当年对吕孝信说的“如果申请不准，以后将被歧视，那份罪可大了，又怎样不怕呢？”是一致的，作为“右派”

的罗隆基还能怎么回答呢？申请离开，那不是更可怕的事吗？罗隆基没有走，1965年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纯粹的学人，但他自觉地走上了仕途，一切悲剧都由此而来。书生参政，好像都是这个结局。

[33] 叶永烈：《沉重的1957》（南昌：百花州文艺出版社，

1992），页34；70。

（本文编入《思忆文丛》时被删去一节，若干注释虽有内容并未被引用，如有需要可参考谢泳原著——扫校者识）

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

葛佩琦

工业经济系物理化学教研室讲师葛佩琦说：我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学校是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统购统销搞糟了，所以物资供应紧张，“肃反”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该自请处分。猪肉紧张，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说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

说良心话，物资供应之所以紧张，这是由于执行党的政策的人犯了错误，例如，猪肉哪里去了呢？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为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发生了偏差，老百姓不肯养猪所造成的。

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几时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总是欢迎他们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们。例如，1945年抗战胜利时，受了日本人压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很危险的。

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用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所以看党员的成绩就是看汇报多少，汇报的多，就是好党员，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为党组织叫他们作情报，所以责任在党组织，因这是组织给的任务。

共产党对我三心二意，　　我对你也三心二意。中国是6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

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31日）

挽狂澜既倒的可能是除三害

葛佩琦

葛佩琦说，至今群众对鸣放还有顾虑，具体反映了群众对共产党的话不敢信任，共产党对这一点应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述一遍，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定这条道路，总有那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

他说，群众为什么不敢信任共产党呢？因为群众在八年中体会到共产党善变，如去年中央指示照顾高级知识分子，校部派公务员送饭送水，今年实行精简节约，又取消了公务员。党组织对人，认为有用时，把杀过朋友、杀过同志、杀过党内人的人都当作宝贝；不用时，把对流过血和汗的人关在大门之外，冷若冰霜。有些党员六亲不认，连儿子同爸爸都不接近，儿子入党给妈妈来信称同志。这些事例说明，群众不信任共产党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他又说，1949年群众对共产党不会有这么多意见。三害不铲除，狂澜既倒，挽狂澜既倒的可能是除三害，另一个可能被狂澜冲走，葬身鱼腹。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

戴煌

苍天可鉴：他成了“党外人士”！

沈阳解放伊始，党的领导机关尚未公开。他只能去沈阳市政府询问。接待人员问他有没有地下组织的介绍信。他实话实说，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了，他随之得到了这样的回答：没有地下组织或党员介绍信，不能接组织关系。

没法，他只得先回北平。火车不通，他只得坐马车。经受了六天刺骨寒风的吹拂，进入了“天下第一关”。这时候的东北大地和“天下第一关”均红旗飘飘，他觉得这些红旗上也有他葛佩琦的一滴血，对在沈阳没有接上关系并没有往心里去。

他进了山海关步行到唐山，搭火车到了北平。

北平和平解放，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慌乱得一团槽。南京法院对关押在南京监狱中的“共党嫌疑犯”李年、王书鼐、邢国彦三人“因证据不足， 宣告无罪释放”。1949年3月中旬，他们三人回到了北平。但他们与葛佩琦只有共同工作上的关系，而在组织上与葛佩琦单线联系的赵耀斌却没有回来，且情况不明，葛佩琦仍然没法接上组织关系。

4月初， 他偶然在全国总工会碰见了分别近10载的入党介绍人刘子久。刘子久说，接组织关系，须经党的组织部门，便介绍他去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组织部的一位刘同志对葛佩琦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应该解决，并拿出信纸和信封，要他给能够证明他的组织关系和工作关系的人写信。他当即分别给刘子久、李年、邢国彦写了信，交给了刘同志，刘同志要他过一段时间再去看结果。

4月中旬， 葛佩琦再去华北局组织部。这位刘同志说，根据调查到的材料，只能证明他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但因找不到你的单线联系人赵耀斌，组织关系还不能恢复。葛佩琦要求先安置工作，刘同志说：虽然他入党十多年，但由于长期做地下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不很熟悉，工作起来有困难，遂介绍他去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一个时

期，然后再分配工作，同时继续调查处理他的组织关系。

到了华北联大政治研究所，他才明白他已成了“党外人士”：因为四五百名学员几乎都是从北京各大学来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一部分社会名流，清一色的党外人士。《社会发展史纲要》、《国家与革命》、《评艾奇逊的白皮书》、《别了，司徒雷登》等等，学了半年，和后来他在监狱中人们之集体所学，除了“老三篇”

和《毛主席语录》之外，几乎完全一样。

毛泽东首登天安门以其洪亮的湖南腔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之后，华北大学改称中国人民大学。过去和葛佩琦一道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大多被分配到情报总署。一位领导也要他到那里去。可是他却书生气十足，自以为是地觉得革命战争已大获全胜，再也不需要那么多情报人员了。早被批判过的少年时代“科学救国”

的理念，在新的“理论指导”下复又萌动起来：只讲科学不讲革命，固然不能救国；但只讲革命不讲科学，像我们这种贫穷落后的国家也难以富强。他遂把“科学救国”

改为“救国不忘科学”。

所以作如是想，是因为他当年一心要“科学救国”，才投考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并在接连不断的学生运动中以优异成绩毕了业。在沈阳频频向地下组织报送重大机密情报的过程中，还忙中偷闲地到沈阳医学院（解放后改称沈阳医科大学）教物理。

现在他自认为留在人民大学教物理，是实实在在的顺理成章。虽然只给他工业经济系讲师和理化教研室物理小组长头衔，他照样忙得不亦乐乎。

他一面教课，一面编写了《物理学讲义》、写了《〈实践论〉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启示》　的论文，编写出版了《电磁感应》和《自然常识问题解答》两本书而于美国率先造出原子弹、苏联首先建成原子能发电站，而我们的国家除了钱三强等老一辈物理学家在国外做过核分裂实验外，国内尚无这方面的专门实验室，致力于核物理学研究的人也不多，遂结合自己在煤炭部等单位作的“和平利用原子能”

的报告，写了介绍核物理学常识的文章，并出版了《原子核常识问

题解答》一书。

他认为在没有枪炮声的静谧书斋中这样夜以继日地沥血呕心，与往昔之“深入虎穴”

脑袋拴在裤腰带上一样，都是为自己的党和国家，为了人民的未来。

但是， 这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他还是一名“党外人士”。从1951年2月起，他几乎每个月都要挤出点时间去见党总支书记一次，要求调查恢复他的组织关系。得到的回答是“老三句”：你的问题时间长了，问题复杂，不好解决。他还直接给学校党委写过三次申诉信，并把华北局经过“函调”、确认他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的材料转给了学校党委，但他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回答，这不免使他很寒心。

寒心中也不免有点后悔：后悔全国解放之初，没有接受老同学罗竹风的劝留。

他与罗竹风，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同学，两个人的爱人也是中学到大学的同学。1949年6月2日，国民党在山东的最后一个据点青岛解放后，罗竹风是接管山东大学的军代表。当年暑假，葛佩琦夫妇到青岛与罗竹风重逢，罗竹风劝他留在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葛佩琦夫人朱秀玲有点心动，认为都是老同学，容易相处。但葛佩琦为了急切找到组织关系，执意要回北平。结果，却寒心又寒心！如果留在山东大学，有担任军代表说了话算数的老同学鼎力相助，也许早就回到党的怀抱了！

但是，懊悔顶何用！？太晚了！！

苍天可鉴：他成了“党的敌人”！！

1957年春，“知无不言，言不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整风运动热浪滔滔。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接连两次给葛佩琦送来书面通知，要他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葛佩琦觉得他本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只是由于地下组织被破坏，单线领导人被捕而断了组织关系，党委对自己的一再申诉似乎无动于衷，凭什么要把自己列为“党外人士”？就凭自己入党近20年来须臾未敢疏忘过的党格，也不能去参加这“党外”的座谈会。

第三次，又送来了通知，并有系总支的一位同志当面动员：校党委

三次请你参加座谈会你都不去，这不太合适。这样，他才老大不情愿地跟了去。

那时候，中国人民大学校本部，还在北京城内铁狮子胡同原来段棋瑞执政旧址、后改称张自忠路三号的大院内。到了会场，校党委书记把“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老套套又说了一遍，并说这是毛主席的教导，请大家打消顾虑，踊跃发言。在一些真正的党外人士发言之后，葛佩琦才站了起来。他就党内同志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党外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能生活特殊化，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等，给党委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并语重心长忧心忡忡地简略阐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这是1957年5月24日。

5月26日，《北京日报》第二版头条，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在23日和24日，连续召开讲师以上教师座谈会的消息，引题为《克服教条主义、宗教主义、骄傲自满情绪》，大字正题为《中国人民大学赶快前进！》，文后对衬的标题是：《教师继续座谈，踊跃提出意见》。

文中共有五个小插题，比较详细地报道了八位教授、讲师的发言。前四个小插题是：《不要骄傲自满》，《在学术上要充分发挥独立工作精神》，《教学和科学研究不能凭“人海战术”》，《对几个共产党员的批评》——其中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一些党员教授、系主任在学术上不民主、存在宗派主义情绪，有的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说：“近百年来，中国的科学是落后了；在座的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你们是否感到惭愧？”

最后一个即第五个小插题是：《葛佩琪（琦）谈党群关系》，其全文是：工业经济系讲师葛佩琪（琦）的发言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认为“今天的党群关系比起1949年差了十万八千里”，他说“群众为什么对我们（党和政府）起恶感呢？因为我们作的事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好。老百姓的生活没有提高，提高的只是共产党”。他甚至提出，现在共产党工作做得好没话说，做不好，群众就可能打共产党，杀共产党的头，可能推翻他。他接着提出：现在学校领导上总爱说这个公式：大家意见很好，能处理的就处理，不能处理的就解释清楚。他认为有错就应该承认，当不了校长可以自己申请调动，自己造成的错误应该请处分。今天不是再用这个公式的时候了。

对《北京日报》的这一报道，葛佩琦没有提出意见。虽然摘发得生

硬、不周全，但这和一些领导人也常爱说的“弄得不好，就会亡党、亡国、亡头”的忧党忧国忧民之情，并没有本质之不同；而且“群众为什么对我们有恶感，因为我们作的事情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好”，显然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语气。然而第二天，即5月27日，他看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内部刊物《人大周报》的报道，他顿即觉得炸了头。因为它断章取义横加篡改地说他说了这样的话：“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

当天下午，他就面见了学校校长、校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的这段话情急气冲地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真说：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

可是不但没有更正，而且风声闹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离谱，在6月8日全国正式“反击右派猖狂进攻”之前就对他展开了“批判揭露”。

5月31日，　《人民日报》第七版，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继续举行座谈会，教师们从不同观点提出问题》的报道，并用醒目的小黑体列了五个小插题。其中四个小插题都是某某人说的一句话，都是一般的批评建议，如《杨承祚说，人民大学各级领导应职责分明》、《周作仁说，人民大学要克服宗派主义》、《庞景仁说，我认为办好大学，首先应该教授多讲课》、《曲学文说，人民大学培养出来的干部做了很多工作》；唯有第五个小插题不但长了好几倍，而且内容完全是攻击谩骂——《葛佩琦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说：“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在这个小插题之下，说葛佩琦论述了这样一些话：我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

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统购统销搞错了，“肃反”

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该自请处分。……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汽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说良心话，物资供应之所以紧张，这是由于执行党的政策的人犯了错误，例如，猪肉哪里去了呢？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为执行粮食被统购统销政策发生了偏差，老百姓不肯养猪……1949年共产党进城

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

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中因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是欢迎他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们。……1945年抗战胜利时，受了日本人压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因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危险的。

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用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汇报得多，就是好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这是组织给他的任务。

……中国是6亿人民的中国……不是共产党的中国。　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笔者不厌其烦地将这些读来颇不通顺的文字几乎全部转录于此，就是想让今天的读者看看，当年一些人为了“政治”的需要，是如何地断章取义，故意地曲解人意。

6月5日，《人民日报》第七版以《读者来信》形式，发表了《我反对葛佩琦的观点》一文；6月6日和6月7日，又接连刊出四篇“读者来信”：《老百姓没有委托葛佩琦发这样的言》，《葛佩琦的发言不符合实际情况》，《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群众生活水平没提高吗？》。

6月8日，毛泽东让《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正式吹响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号角，对葛佩琦的批判也随之白炽化——就在同一天《人民日报》的第七版，就有《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汪金丁等发言，要跟葛佩琦划清界限》的长约三千言的报道，六个黑体字小插题中的三个都提到了他的大名：《葛佩琦继续发表反共言论》、《汪金丁说，要同葛佩琦所代表的那种思想划清界限》、《《赵玉珉表示坚决反对葛佩琦的观点》。在《葛佩琦继续发表反共言论》的那一段说：

葛佩琦说，至今群众对鸣放还有顾虑，具体反映了群众对共产党的话不敢信任，共产党对这一点应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述一边，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

也许葛佩琦在那一段日子里， 没有注意到《人民日报》5月31日至6月7日那几篇等于率先对他进行公开揭露的报道和批判文章；当他一看到6月8日的《人民日报》，他的脑袋瓜就更大了！他知道就是在那一期断章取义横加篡改的《人大周报》刊登他的发言全文中，也没有这样一段话。因此这就不只是断章取义横加篡改，而是实实在在的纯属捏造！他当即写了更正信，并于第二天上午亲自送给了《人民日报》社，信的全文如下：

编辑同志

六月八日你报七版刊登的我的那个发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请予更正。“我要重述一边……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这段报道的全文是：“我要重述一遍，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是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

应改为

“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巍栋党的生存。”

葛佩琦

1957年6月9日

那时候，除了别有所图的少数人之外，大多数人都处于人人自危、自保平安的惊恐中，对“右派”的批判揭露只能火上浇油，没有任何人敢于公开为“右派”澄清片言只语。《人民日报》对葛佩琦的这封更正信不但只字未提，而且对他的批判更加连篇累牍。 6月14日，该报以南京电、保定电、沈阳电，发表了三篇外地批判葛佩琦的报道， 同时刊发了《葛佩琦的学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6月15日，又登出著名人士马寅初的《我对储安平葛佩琦的言论发表些意见》 。6月16日，在《坚决粉碎右派的进攻》的大标题下，不但有《农业劳动模范痛驳葛佩琦》的小标

题，在《复员军人号召保卫革命果实》的那一段，还说“葛佩琦、王德周之流说共产党员‘无恶不作’ ”。6月17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发了新华社的报道：《人民大学教授抨击葛佩琦王德周》 。6月18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坚决捍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北京矿业学院矿工和革命军人出身的学生座谈》，大批葛佩琦。6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按不住心头怒火，恨透了右派野心》的总标题下，老苏区人民、河北一农业社农民以及一些著名烈士的夫人集会或谈话，痛斥葛佩琦的“杀共产党”、“要共产党下台”……在党中央喉舌《人民日报》 的如此带动下，全国大小报刊迅速掀起大批大揭“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高潮，使他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头号反共人物，被“理所当然”地划成了“极右分子”。

苍天可鉴：他被抓进了“党的监狱”！！！

那是1957年12月24日深夜。嘭嘭的敲门声把葛佩琦惊醒。一位穿便衣、两位着警服带着手枪的人被让进了书房，问清了姓名便掏出“逮捕证”。他问为什么要逮捕他，得到的回答是“你是反革命”。他说“我自学生时代就参加了革命队伍，为革命作了很多工作”。来人说：“有话以后再讲，你先签字吧！他在“逮捕证”上签了字，便被一副闪亮的手铐铐住了双手。然后便开始了查抄。衣箱、书箱、橱橱柜柜，都搜了个遍。当他们搜出他当年做地下工作、掩护自己真实身份时穿的国民党的军装、骑在缴获的日本战马上照的一张像片时，他们高兴得大叫：“这不是反革命的证据吗？”

查抄完毕，天已拂晓。他戴着手铐，扛着行李，上了公安局的吉普车，被押进了一所监狱。

这监狱座落在北京城东北角的草岚子胡同，人们叫它“草岚子看守所”，原是国民党的“北平军人反省院”，当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就在这里被关押过。 他被关进了没有10平方米的监号。门上有个高约3厘米，横约10厘米的长方形“窥孔”，内有一张木板铺可睡五个犯人，屋角有个大尿桶。每天除“放茅”（上厕所）、“放风”（跑步）外，不能出监号寸步。一个小窝头、一碗棒子面粥和一块咸萝卜的早餐。指导员找他谈话：只要坦白交代，仍有光明前途。

第二天同一格式的早餐后，一位女管理员在监号门外喊：“葛佩琦！出来！”

他被领到监房院的大门，一位武装战士把他带到了另一个院子。这院子北边有一排平房，一溜开着五六个门，每个门旁都挂着“审讯室”三个字的牌子。他被带进了一个审讯室，坐在办公桌旁边的，正是前天晚上逮捕他时那位穿便衣的同志。

“你刚进看守所，可能有些不习惯，过一段时间就好了。把你带到这里来，是为了弄清你的问题。你只要好好交代问题，就有前途。”

1958年2月18日， 春节。春节过后，葛佩琦入狱已近两个月，才第一次接受正式审讯。审讯他的是一位年轻的审讯员。这位年轻人对祖国的现代史和党的地下工作知识，似乎还是一张大白布。当葛佩琦回答他对“历史经历”的询问，说到1938年在河南商丘地区组织豫东抗日游击队时，这位年轻人间：“你组织游击队干嘛？”

葛佩琦回答：“抗日。”这位年轻人把桌子一拍：“胡说！国民党是积极反共的，你会抗日吗？！”

“你说说，你在东北当‘国民党少将’，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是共产党员，”葛佩琦说，“是党的地下组织派我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以‘国民党少将’名义作掩护做地下工作的，我搜集了国民党的大量重要军事情报，报给了我党地下组织……”

“你是‘国民党少将’ ， 你怎么会是共产党员呢？”年轻的审讯员怒斥道。

“你这是公然污蔑共产党！这是审讯室，你要小心！你再这样胡说，就要罪上加罪！”

这样的审讯一共进行了36次，有时白天黑夜连续进行，葛佩琦视之为“简直是精神折磨”。从第一次审讯后，他就再也不提自己是共产党员。审讯员给他的“写亲笔供词提纲”中，也没有要求写参加共产党和奉党的指派做地下工作这一条。为党为国出生入死十几年，早被一笔勾销了！

1958年秋天，这位年轻的审讯员，对葛佩琦进行了第二阶段共达30次的系统审讯。审讯内容与第一阶段的大致相同，但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你出卖了共产党的哪些利益，才当上‘国民党少将’的？！”葛佩琦说：“我不但没有出卖共产党的利益，我还给共产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

作。抗战胜利后，党中央西安地下情报组织派我到东北做地下工作时，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批人，单是我们这个情报小组就有四个人；以‘国民党少将’名义作掩护的，也不只是我一个；和我在工作上单线联系的李年，也是用‘国民党少将’身份作掩护的”……1958年初冬，审讯员给葛佩琦一份“写亲笔供词提纲”，他很快写好交了上去。

不久审讯员对他说：“你的问题已经‘结案’，听候法院开庭审理。”葛佩琦不禁暗自惊喜，以为尽管度日如年地苦熬了几将一年的岁月，终于“结案”快回家了！

1959年2月下旬， 他看到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送来的一份《起诉书》，他才知道自己的那种“暗自惊喜”未免太想入非非了！《起诉书》中把他的革命历史全部称为“反革命历史” ，把1957年6月以来大小报刊上对他的那些栽赃诬陷的不实之词作为论据，说他“公开叫喊要杀共产党人和推翻人民政权”，要求法院对他“依法惩处”。

苍天可鉴：他被党判了无期徒刑！！！！

1959年3月4日早饭后，他出庭受审。法庭就在草岚子看守所内监房大院外的另一个院子里。这院内有一栋坐北朝南的瓦房，门上边写有“法庭”二字。审判台上坐着审判员、检察员、书记员、陪审员，台前站着几位法警。庭内虽然也摆满了木制长条椅，但没有一人旁听。

审判员指着最前面的一张长条椅让他坐下，问了他的姓名、年龄、工作单位，由检察员宣读《起诉书》。读完之后，审判员要他陈述意见。这是维护真理与革命法制的关键时刻，他再也不能默默忍受不准提及自己是个共产党员的禁令，而为自己作了论据充足、法理畅然的辩护。他说：《起诉书》控告我的罪名，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条：第一条是“历史反革命”；第二条是“现行反革命”。根据事实，这两条罪名都不能成立。

现将理由陈述如下：

《起诉书》控告我为“历史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说我“历充蒋匪要职，积极为敌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不错， 我曾担任过“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天水行营少将特派员”、“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等职；但这不是我的真

实职务，而是我的掩护身份，是共产党（有关组织的）领导人让我去担任的。

在这些名义的掩护下，我曾策动大批汉奸部队反正，编入抗日部队序列；我曾掩护建立沈阳地下电台并搜集了国民党的大批重要军事情报，报给共产党……这类事实证明，我不是“为敌效劳”，而是为共产党效劳，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效劳。上述事实也证明，我不是“蒋匪特务”，而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派遣，打入国民党高级军事机关的地下情报工作人员。以上事实证明，我的历史是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的。所以《起诉书》控告我为“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

《起诉书》控告我为“现行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说我“借党整风之机，攻击诬蔑党的各项政策和政治运动，叫嚣要杀共产党人和推翻人民政权”。认定这条罪名的证据，都是从1957年报刊上抄下来的对我的诬陷不实之词。例如《起诉书》上引用的：“肃反搞糟了，统购统销搞糟了，老百姓把用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人民生活提高的是过去穿破鞋进城，现在坐上小汽车的党员和干部”；“党员起了监督群众的便衣警察作用，因为党组织要他们作情报”；“今天的党群关系和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等等。

《起诉书》从报刊上引用的这些话，不是我的原话：报刊发表这些言论时，没有经我同意，没有经我签字，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毛主席多次说：“右派问题是敌我矛盾，我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既然把右派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在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就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根据以上两点理由，《起诉书》控告我为“现行反革命”也是不能成立的综上所述，我既不是“历史反革命”，也不是“现行反革命”，请求法庭依法宣告无罪释放。

但是，正像开庭前两天，监房的那位女管理员问葛佩琦要不要请辩护律师时说的那样：“辩护不辩护，都是一个样：法院是以《起诉书》为根据，是听党的话的。”

6月29日，距离葛佩琦为自己作出强有力辩护的3个月又25天，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他作出了“判处无期徒刑”的判决。《判决书》如下：

查被告葛佩琦历充蒋匪要职，积极为敌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发展情报人员，并亲自搜集我军情报，报与敌特机关，参加镇压学生运动。

多次诽谤我党，鼓动蒋匪帮反共反人民的气焰。解放后对其主要历史罪行又长期隐瞒，拒不向政府坦白，人民政府未念旧恶，给其安置工作，在人民大学担任讲师的重要职位。被告本应感恩自悔，痛下决心，彻底改造，重新作人，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但被告却相反，视人民对其宽大为可欺，死抱反动立场，坚决与人民为敌。乘党整风之际，即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向党和政府展开全面的进攻，竟公然叫喊要杀共产党人，要推翻人民政府。

被告这些严重罪行，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故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葛佩琦犯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证物：匪（指国民党）军衔花八个、帽徽一个、司章三个、军服两套、军服带两条全部没收。

看了这份《判决书》，葛佩琦的目光久久地凝注着其中“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这八个字。对照着他迄今为止的48年来所走的第一个脚印，究竟是谁在“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这又是苍天可鉴的！他立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而且接连申诉了许多次，都被一一驳回。从此，他走入了榛莽漫漫的无期囚徒之路。

消息传出，海外一家报纸评论说，葛佩琦作为共产党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的一名得力情报人员，是促使国民党在东北战场大溃败的一个局外人无从知晓的因素，国民党后来想惩治他而只能干瞪眼，想不到共产党自己却帮了国民党的这个大忙。

走在榛莽漫漫囚徒路上的葛佩琦当然不会听到这种对共产党竭尽嘲讽之所能的传说。他虽然对自己和整个家庭所受到的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遭遇耿耿难平，但他坚信这不是自己的党无情，而是钻进党内极少数坏人为了私利使然，因而他确信自己的不白之冤，终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

无期徒刑只住了18年监狱；出狱时，他已成了近乎双目失明的孤寡老人那是一个偶然的幸遇。

1975年冬天，出于政治策略上的某种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特人员全部予以宽大释放。凡有家可归的，都可回到原籍；无家可归的，由政府分配到劳改就业单位就业，享受国家职工待遇；原职务级别属于国民党少将以上或国民党省政府、省党部以上、经当地公安部门同意又有常住户口直系亲属接纳的，可以回到北京、天津、上海这三大城市；愿往台湾的，政府提供方便……这样，身置山西监狱的葛佩琦，在12月中旬，与山西省各个监狱就业单位的七八百名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一道被宽大释放。　又几经周折，他才于1976年3月下旬回到了北京。这时候，他已成了全身“没有一个好零件”、双目几近失明的65岁的老人了……

在1959年春天审讯“结案”，等待法院作出宣判时，他就被从草岚子看守所转到了北京市看守所，在那儿从事书籍装订劳动改造，一呆就是五年。在这五年中，他不断便血，肋骨结核，血色素最低时降到三点五克，只有成年男子正常数的四分之一，身躯日益衰颓。又由于对右脚拇趾的毒疮未能及时治疗，后又治疗不当，几乎造成小腿截肢，留下了腿脚麻木的后遗症，不得不用双拐代步，与战场下来的伤兵无异。因之在1964年春天转去关押长期徒刑人犯的北京市第一监狱后，虽然那里拥有可以从事轻度劳动的织袜工厂、塑料工厂和钓鱼竿车间，等等，他也不得不长期住在监狱病房。

1966年6月“文革” 开始 扶心清理政治环境，把“地富反坏右”赶往外地的北京市当局，　于8日夜晚，把葛佩琦等五百多名“反革命”人犯锁进闷罐子火车，押送到大同以北、雁门关以外，山西省第四劳改支队管辖的大青窑煤矿。由于他每挪一步都要借助于双拐，在必须下窑的煤矿中等于是个废人，同时塞外气候寒冷，也不利于他的健康的恢复；劳改支队的贾政委出于革命人道的考虑，派人把他送到位于太原的山西省第一监狱。为此贾政委后来遭到批斗，被调离了劳改支队。

对外叫做“太原联保工厂”的山西省第一监狱，内有塑料、铝制品、印刷、制鞋等车间，葛佩琦被分在制鞋车间劳动。1968年秋，他的右目突患急性青光眼，眼压升高到70毫米汞柱，等于正常值的三至四倍，疼痛难忍 多狱医务所的一位针灸大夫误以为是偏头痛，多次扎针而贻误治疗时间。待另一位大夫确诊为青光眼时，却又说外面“文化大革命”太乱，不肯送他去外面有眼科大夫的医院抢救，而让监狱医务所的一位不懂眼科的外科大夫给他做了青光眼手术，给他留下了白内障后遗症。

1969年春，为防范全是来自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带的犯人趁“文革”之乱而越狱潜逃，山西省第一监狱迁往对犯人易于看守的吕梁山边缘的祁县城外，构筑了四面高墙与电网。葛佩琦右目青光眼手术后造成的白内障，发展到对面看不清谁是谁的地步，左目的青光眼也渐趋严重。到了1971年春天，监狱医务所的那位外科大夫，又用针拨法治疗葛佩琦的右眼白内障，仅可照明看道，而左眼青光眼的眼压已高达70毫米汞柱。1973年秋天，经葛佩琦再三要求，监狱医务所主任才批准他去太原治疗。

到了太原，住进太原东南部狄村（唐朝廉正名臣狄仁杰故地）附近的山西省公安医院，人们俗称“劳改医院”。这医院也没有眼科，就把他押送去山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二院眼科主任宛大夫给他做了仔细诊查，主张立即手术，否则有失明的危险；尽管当时病床十分紧张，还想方设法给他安置了一张病床，要他立即住院。

但是劳改医院的干部出于职业的惯性，怕葛佩琦从二院逃跑，要求二院眼科沈述约大夫给葛佩琦做个简单的“门诊手术”，术后就用救护车拉回劳改医院。

这种无理要求，被忠实于革命人道主义的沈述约大夫断然拒绝。劳改医院的干部就用救护车又把葛佩琦押了回去，捱到1973年冬天，葛佩琦直接向劳改医院领导提出要求，才被送去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这里的一位年轻大夫接受了劳改医院干部的要求，给葛佩琦做了左目青光眼“门诊手术”，术后也同意用救护车把他颠颠簸簸地拉了回去，不但没治好青光眼，还造成了又一个白内障。

1974年秋天，仍在葛佩琦的耐心要求下，劳改医院的干部才把他第二次送去第二附属医院，但仍要沈述约大夫做青光眼的“门诊手术”。经沈大夫据理力争，这些干部才同意让他去劳改医院手术室，给葛佩琦做了左眼青光眼手术。下了手术台，按规定，应用手推车让葛佩琦卧着送回病房；但劳改医院的公安人员却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让他捂着蒙眼的纱布，自己走回了20多人哼哼歪歪的大病房，而且没有眼科消炎针、消炎药和降眼压的药，疼了，只有一般的止痛片；再疼了，就打一针青霉素，用治疗皮肤病的四环素药膏代替点眼药。

青光眼算是好转了，两只眼睛的白内障却越来越严重，同时经过这连续多年的拖延折腾，视神经都受到了重大损伤。回到北京时，他的全部视力只有零点一，几乎就是个睁眼瞎。这位“睁眼瞎”经过整整一年的

摸索奔波，才次第解决了户口和每月28斤粮票、18元生活费，于1977年3月8日搬进了北京东城交道口大街96号大杂院。

这一天正是妇女们专享的节日，可是在这个连他这个新来户在内一共16户人家的大杂院， 唯独他那间门前坑坑洼洼，只有半拉窗户门朝西的8平方米破旧小屋冷冷清清，孤寡一人。从1949年北平解放到在劫难逃的1957年，他的家每年“三八”

节本也是欢欢乐乐的……

早在1945年3月， 他的妻子朱秀玲还在陕西汉中西北医学院做教师时，就生了第一个女孩。其时德国法西斯的彻底完蛋指日可待、东方的日本法西斯也濒临溃灭；他们为大女儿取名别有新意，希望“抗战早胜利，举国大凯旋”。1946年他本人奉地下党之命，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成了“少将督察”，朱秀玲也跟去沈阳医学院执教。 1947年7月有了一个儿子，取名之意，“稀督全中国早日都红旗飘飘”。1950年在北京，第二个女孩出世。那正是全世界都祈求永保和平、不再有枪炮声的时候。1952年又一个女孩来到这个世界，他们希望这世界永远光明灿烂。

1956年最后一个女儿呱呱坠地，那正是祖国大陆的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之际，他们希望祖国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大厦并向共产主义迈进……所以1957年之前那几年，每逢“三八”节和“六一”儿童节，他们全家大大小小，都是欢欢乐乐的。

可是此时此刻，这都已成了过去的事了。朱秀玲又在十多年前与他离了婚，孩子们都改姓“朱”，不再姓“葛”了。在这刚刚“乔迁”来的八平方米小屋，他只能只身孤影……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费孝通

我想谈谈知识分子，谈谈我所熟悉的一些在高等学校里教书的老朋友们的心情。

所谈的无非是一隅之见，一时之感；写出来还是杂文之类的东西而已。

出门半年，回家不久，接到一个通知，是劳动干部学校邀我去参加一个座谈会，讨论陈达先生的一篇有关人口问题论文的提纲。陈先生是我的一位老师。提起他，很多朋友是熟悉的；他是个几十年如一日的学者，社会学的老前辈，桃李满门墙的灰发教授。解放以来，一直还是手不释卷，但是报纸杂志上却很少见他的名字，书店里已经找不到他所写的书，同行老朋友见面时常会互相打听陈先生近来怎样了。

这个通知是一个喜讯，他老人家的科学研究工作又活跃起来了。

还有，到家刚逢春节，次日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李景汉先生写的《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这篇文章连载了三天。李先生又是一位同行的老前辈，30年前出版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的作者。我记得大概一年多前，在一个民盟召集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座谈会上，李先生曾说起过他自从院系调整后，三年多来已准备过三门不同的而都没有上堂机会的新功课。尽管他用了极为幽默的口吻，很轻松地道来，在座的朋友却半晌接不上话头。那时谁也想不到，他今年春节会献出这份珍贵的礼物，在我看来，他不仅报了乡村家庭生活改善的喜讯，同时也报了知识分子政策胜利的喜讯。

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新枝。

这个感觉并不是回到了北京才有的。去年暑假，我初到昆明，曾会见过不久前为了注杜诗特地到成都草堂去采访回来的刘文典老先生。去年年底，张文渊先生邀我去吃小馆子送行，大谈他正在设计中的排字机器。这半年多来，知识分子的变化可真不小。士隔三日怎能不刮目而视？

这自是情理之中的事 陡年来，经过了狂风暴雨般的运动，受到了多

次社会主义胜利高潮的感染，加上日积月累的学习，知识分子原本已起了变化。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着，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的。当然，问题总是有的，但目前的问题毕竟和过去的不同了。

前年年底，我曾到南京、苏州、杭州走过一趟。一路上也会到不少老朋友，在他们谈吐之间，令人感觉到有一种寂寞之感，当一个人碰到一桩心爱的事而自己却又觉得没有份的时候，心里油然而生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意味。这些老知识分子当他们搞清楚了社会主义是什么时候，他们是倾心向往的。但是未免发觉得迟了一步，似乎前进的队伍里已没有他们的地位，心上怎能不浮起了墙外行人“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感叹。

去年下半年，我一直在西南一带东跑西走，在朋友中听到了这种感叹是不多了。

周总理的报告对于那些心怀寂寞的朋友们所起的鼓舞作用是难于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着落了窠，安了。心安了，眼睛会向前看，要看出自己前途，因此，对自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有的敢于申请入党了，有的私下计议，有余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正反映那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的转变。不说别人，连我自己都把二十四史搬上了书架，最近还买了一部《资治通鉴》。

知识分子这种心情是可喜的，这是积极因素，蕴育着进步的要求，也提出了新的问题。

这些知识分子当前主要的要求是什么呢？

要概括地答复这个问题是有困难的。我只能就比较熟悉的一部分朋友们这个范围里来捉摸捉摸。新年里报纸上曾发表过一种知识分子的新年愿望。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先生说得很干脆：要做一个专任教授或者专任研究员。做了教授之后要什么呢？

在成都工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康振黄教授总结了在座许多朋友们的

心愿："一间房，二本书"，意思是要能静静地做做功课。

要体会这些要求，得说个由来。一年多前知识分子苦恼的是有力使不上；一年来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现在感觉到自己力量不足，要求提高。

周总理报告之后，各地学校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都做了不少工作，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两者比较起来，生活条件似乎改善得更多一些。比如工资提高了，过去许多只够衣食的教师们现在可以买买书了，就是子女多，家属中有病人的困难户也大多得到了特殊照顾。生活上的问题总的说来基本上是解决了。知识分子是满意的，甚至有点受之有愧。而且过去这一段时间里，很多学校里对高级知识分子照顾得也非常周到。比如为了剪发、医疗、买菜等排队费时间，给高级知识分子优先待遇，甚至看戏都可以预定前排座位。高级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优待自然是领情的，但是这也使他们过分突出，叫别人看来不很舒服，甚至引起了群众的反感。

这些办法是否妥当还值得考虑。我自己就没有用过这些优待券，因为拿出来怪不好意思的。

应当说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基本的，但是现在这已不是重点了。针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来说，现在主要是要帮助他们提高业务。先谈谈他们的业务情况吧。在教学改革初期，教师们曾经紧张过一阵。那是由于要学习苏联，很多教材都要新编，又由于经过思想改造运动，许多教师们把原来学来的一套否定了，而新的体系没有建立，有些青黄不接。所以突击俄文，翻译讲义，显得很忙。这两年来，是不是学习苏联已经学通了呢？是不是新的学术体系已经建立了呢？我想并不都是如此。但是上课的困难似乎确是比较少了。那是因为一方面教师已有所提高，另一方面讲义也编出了一套，上堂照本宣读，问题已不大。但是到了去年，却又发生了新的情况，反教条主义的结果，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培养能独立思考的学生，老师自己得先要独立思考一番。过去和教本不同的说法，不论自己信与不信，可以闭口不谈，现在得讲讲各家的异同，那就免不了要批判批判，如果自己没有钻研过，道理也就说不明白。过去可以口头上复述一些心里不太同意的理论，现在心口不一致，连自圆其说都有难处了。过去可以根据权威对那些自己连原书都没有见过的异说，跟着大家驳斥，现在别人追问就会露马脚了。总之，现在没有一点真才实学，教书这个行道是不容易搞了。反教条主义能提高教学质量的道理在此，引起教师们业务上的紧张的道理也在此。

我所接触到的许多朋友们，对反教条主义是拥护的，对自己提高业务的要求也是积极的，他们要求帮助也是真实的。要“一间房、二本书”静静地做做功课就是指这个。说得具体一些，他们要求开展科学研究，要有机会出席学术性的会议，甚至要脱离生产进修一个时期，和出国留学，等等。这种要求是好的，应当说是可贵的。

现在让我们看看实际情况，帮助教师们提高业务的科学研究开展得怎样了呢？

有的学校好些，有的学校差些，总的说来，我认为并没有满足教师们的要求。

如果研究一下科学研究工作开展得不够令我满意的情况，关键问题是什么呢？

是不是工作条件不好呢？我看并不如此。教师们工作条件在过去半年中是有很大改善的。首先说过去吵得最凶的时间问题。自从规定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之后，各地高等学校想了很多办法来贯彻，效果是不坏的。去年上半年，北京高等学校里大约已有四分之三的教师得到了保证。八月里我到昆明，听说云南大学里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教师还不能保证业务时间。今年年初我知道有些学校业务时间得不到保证的教师比例已降到十分之一以下。这个问题虽则不能说全部解决，而且像李达先生在新年愿望中所提到的情况还是存在，这些业务时间得不到保证的人又多是有能力搞科学研究的，但是一般说来时间问题已不是开展科学研究的主要障碍了。其次，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的条件怎样呢？这些条件各地、各校是不平衡的。过去一年中，各校购置图书一般都有增加，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书少，而是编目慢、流通难，分配还不够合理。仪器方面在生产、供应、修配、使用上问题还多，特别是内地和边区的学校困难不少。但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工作还是做得不少的。除了特别的专题外，一般还没有发生有人因为这些方面的条件缺乏而不能进行科学研究的。

那么现在高等学校里的教师们在开展科学研究上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具体领导不够。在这半年的旅行中，我看到：凡是加强了对教师们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这些学校里教师们也就安心工作，业务有提高，学生也满意；凡是放松了这方面领导的，教师们彷徨苦闷，情绪也多。这种区别是可以理解的。教师们当前积极要求提高业务，一有奔头就心安理得。如果积极性起来了，有了要求，不能满足，看不到

用力的方向，心就乱了。

全国各高等学校里科学研究工作开展得怎样，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没有把科学研究工作认真领导起来的学校还是不少的。有些学校把“向科学进军”当运动来搞，做了号召性的动员报告之后，发表格要教师们填题目，造计划，甚至过了一个时候就伸手要成果。在高等学校里究竟应当搞些什么研究？科学研究和教学怎样结合？各科抓些什么问题？教师之间又怎样组织起来，分工合作，互相帮助？进行研究时要什么具体条件？工作中遇到了困难怎样帮助克服？怎样组织讨论来提高学术思想？——这一系列的问题显然不是任何一个教师能单独解决的。在这些问题上都须要具体领导。如果学校领导上不深入实际，依靠科学研究上有经验的教师，逐步地跟着工作的发展，解决这些问题，教师们尽管主观上怎样积极，科学研究工作不是开展不起来，就是搞得有些混乱。我就遇到过已经填过几次科学研究计划表的朋友，见了我还是说科学研究方向不明，题目难找，甚至有些连自己在表上填过些什么都不大清楚了。对于这些朋友，向科学进军真像一阵风，只“吹皱了一池春水。”

另外还有些朋友，急于赶世界水平，对实际条件考虑不够，一动手首先和已有的教学任务碰了头，时间冲突，精力兼顾不来，发生了矛盾。我又注意到有一些学校领导上对第一种情况倒并不焦急，按兵不动，但求完得成当前教学任务就满意了，而且科学研究表格已汇报了上级，交了卷子。他们对于第二种情况却相当敏感，惟恐教学任务受到影响。他们不去分析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更少自觉到这正是缺乏具体领导的结果；反而大叫教学和科学研究有矛盾，教师们名利心重，轻教重研。

好像为按兵不动，填表了事，找到了正当理由。这种叫喊对教师们的积极性是不利的。上推下拉，进退两难，他们思想上怎能不混乱，情绪上怎能不受波动？高等学校里怎样开展科学研究问题进一步明确一下是必要的。如果真的在高等学校里科学研究和教学有矛盾，不能放手开展科学研究，也得拿出个提高教师们业务水平的具体办法来。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研究，但总觉得解决的办法，不是在冻结科学研究、保证教学，而是在加强对科学研究的具体领导，密切和教学的结合。高等学校里科学研究搞得太多了还是太少了？我想这个问题是值得检查一下的。

知识分子提高业务的积极要求反映了他们已自觉到业务水平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这种自觉表示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已

有了提高，是过去几年思想改造和学习的效果。如果他们还是自认为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旁观者，他们为什么要不到午夜不上床的自苦如此呢？我想强调知识分子搞科学研究是为名利双收，是个人打算是不好的，因为和事实不符。

接着想谈谈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从立场这一关改起的。划清敌我似乎还比较容易些，一到观点、方法，就发生唯心和唯物的问题，似乎就不简单了。比如说，拥护党、政府，爱国家、人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容易搞得通的，但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就有不少人弄不大清楚什么是唯物的，什么是唯心的那一套。唯物和唯心的界线弄不大清楚，只有简单地划一下，说凡是资产阶级国家里讲的学术都是唯心的，凡是社会主义国家里讲的学术都是唯物的。如果这条线划对了，事情是容易办些。英美的书本占书架，当废纸卖掉；俄文来不及学，就买翻译的小册子来读。写文章、上讲堂多引几句引经据典的话，找几个英美学者骂上一番。这些都好办，而且很多人是这样办了。

但是学习了一些辩证唯物主义之后，逐步会觉得这样简单的划法，似乎是很成问题的，觉得有一点像小孩子看草台戏，剧情看不懂，就看白脸还是红脸，白脸挨打了就叫好。他们逐步明白过去那样以为那些人说的话一定是唯物的，那些人说的话一定是唯心的想法不很对头的。他们开始要求从学术思想本身来辨别唯心还是唯物。

我想这应当可以说是学习上进了一步，但是这步一进，问题却多了，心情也跟着复杂起来了。他们很希望把官司打清楚，自己的学术思想里究竟哪些是唯物的，哪些是唯心的。但是在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前，却还没有这个条件。

积极的东西搞得不好会变成消极的东西。要求搞清楚唯物唯心的界线应当肯定是积极的，但是如果条件不具备，这种要求能满足，别人还是红脸白脸地来对待他，他心里就会不服气，会产生情绪。我体会到学习苏联这个问题上就有这种情况。最初确是有人反对学习苏联，本质上是立场问题。但是最近又出现一些对学习苏联的态度不满的情绪，如果不加分析，会觉得立场又不稳了，其实性质是和过去不同的。

在过去一段时期里确有一些地方把学习苏联简单化了。有些人提出

了怀疑或不同意见，反而受到批评，于是搞出了情绪。这些情绪并不是从立场问题上发生的。但一有情绪，消极因素也跟着滋长，那就不好了。

百家争鸣恰好解决当前知识分子思想发展上发生出来的这些问题。据我的了解，百家争鸣就是通过自由讨论来明确是非，即是知识分子进一步的思想改造，在观点、方法上更进一步的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现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有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的。他们希望具体地弄清哪些是唯物的，哪些是唯心的，唯心的为什么不对，口服心服地在思想上进入工人阶级。他们欢迎百家争鸣，因为百家争鸣可以保障不会冤屈任何一点正确的东西，而且给任何一点可以长成为正确的东西充分发展的条件。这样，可以防止积极转化为消极，而使知识分子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得怎样了呢？和“向科学进军”来比较似乎又差一些。

先从知识分子方面来说，他们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却还是很紧，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头，那还得瞧瞧，等一等再说，不为天下先。依我接触到的范围来说，不肯敞开暴露思想的人还是占多数。这一年来，情况是有些好转，在一定场合下，有些人是肯吐露些知心话了，但是还是相当腼腆的。向科学进军可以关起门来进，而百家争鸣就得抛头露面来鸣，腼腆了就鸣不成。

究竟顾虑些什么呢？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这种人不能说太多。比较更多些的是怕出丑。不说话，抱了书本上堂念，肚子里究竟有多少货，别人莫测高深。抛头露面，那就会显原形。说穿了这里还有个“面子问题”。面子问题并不是简单的。

我记得有一次座谈会上有一位朋友说得很生动，他说，我不是怕挨批评，我们以前还不是大家有被批评的，学术论战还是搞过，现在可挨不得，因为一有人说自己有了唯心主义，明天上课学生的脸色就不同，自己脚也软了。面子是很现实的东西，戴上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就会被打入冷宫，一直会影响到物质基础，因为这是“德”，评薪评级，进修出国，甚至谈恋爱，找爱人都会受到影响。这个风气现在是正在转变中，但是积重难返，牵涉的面广，也不是一下就转得过来的。“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还没有全消的知识分子，想到了不鸣无妨，鸣

了说不定会自讨麻烦，结果是何必开口。

另一方面是具体领导知识分子工作的人对于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是都搞通了呢？

也不全是通的。有些是一上来就有的担心。“中央定的方针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这里具体情况还没有条件。”接着有些人想把这个方针圈个范围：先圈在学术里，再圈在教学之外，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出乱子了。等到鸣了起来，嗅到一些唯心主义的气味，就有人打起警钟：“唯心主义泛滥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又冒头了”。

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锁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对这方针抗拒的人固然不算多，但是对这方针不太热心，等着瞧瞧再说的人似乎并不少。

“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原是早春天气应有的风光。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意味着他们的积极性是动起来了，特别表现在提高业务的要求上，但是消极因素还是很多的。他们对百家争鸣还是顾虑重重，不敢鸣，不敢争；至于和实际政治关系比较密切的问题上，大多更是守口如瓶，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神气。比如说：波匈事件发生时，我正在边区旅行，没有直接听到当时高级知识分子的反映，但是去年年底回到城市里和朋友们谈起了这些事，我的印象是这样大的事情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引起的波动却是不大的。一方面这是好的，说明我们的这些知识分子立场是稳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仔细了解一下，可以看到他们并不是思想上是非辩别得很清楚所以很稳，而是没有深刻地动过脑筋，古井没有生波，不很关心。

我想，对世界的和国家的大事不很关心可能是当前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的一般情况。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新发生的，由来已久。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一同聊天，谈起了为什么很多朋友不很关心政治。有一位朋友说得很有意思。他说大概有四个原因：第一是有一种相当普遍的想法，认为国家大事自有贤能，自己可以不必操心。大家的确相信共产党的领导是错不到哪里去的，很放心，只要好好跟共产党走，把自己岗位工作做好了，就是了。其次是很多人对自己缺乏信心，不必等别人批评，自己常常会问问自己是不是旧思想又在冒头，所以对于世界大事或是国家大事自己没有个看法和主张，等等，《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才动脑筋。第三，对世界大势，自觉很孤陋寡闻，不要说别的，连很多外国人的名

字说起来都觉得绕口。情况不熟悉，要动脑筋也没有资料。第四，多年来养成了没有布置就不学习的懒汉习惯。我们曾经想替这些思想配个帽子，但是配来配去尺寸都不很合。说信任党、接受领导不对么？当然不可以这样说。但是怎么会信任得成了依赖了呢？虚心些也是好的，但是怎么搞得没有了主张了呢？不论怎样，总的看来，对国家的事情关心不够总是消极性的东西。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思想情况呢？这些思想情况又说明些什么呢？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朋友，自认为水平不够，说不清楚。我们似乎觉得这里是不是反映着这些知识分子觉得问不问国事对国家对自己都没有什么区别呢？自己有个主张和没有个主张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他们觉得积极来提出意见似乎也没有什么必要，别人也不见得考虑，不赘一词，国家的事还是办得很好呢？如果真是这样想法，是不是说这些知识分子的政治积极性还没有很好发挥呢？那么怎样能把他们在这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呢？——说到了这些问题，我想可能会超过这篇杂文的范围，那是春暖花开时节的事了。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

关于科学体制问题座谈会的发言

费孝通

1．关于设立地方的科学研究机构问题。

从科学性质来考虑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是以集中为宜的，比如需要特殊设备，在目前甚至相当时期内不可能各地方都设置的；第二是可集中可分散的；第三是以分散为宜的。

凡是研究对象具有地方特点的就应以分散为宜。比如民族社会历史的研究，最好是各民族有自己的研究中心，比较小的民族或是社会历史上密切联系的民族，可以一定地域为范围成立一个研究中心。又比如动植物矿物等，也是有地方性的，各地区有各自的特点；应当在草原地区配合畜牧业，在海滨地区配合水产业，在高山地区配合林业等成立研究中心。这些地方性的研究中心的建立对推动这些学科经常性和长期性的研究是有利的；而且可以更密切的配合各地方的建设事业。

当然，设立地方性的研究机构并不等于说不要中央级的研究机构。相反的，由于地方性的机构的成立，更需要中央机构来加以指导和联系。比如各民族成立了社会历史研究机构，就更需要有一个联系各地方的机构，并且进行有关各民族社会历史比较研究的中央机构了。反过来说，如果只成立中央机构，具体的研究工作还是需要分散到各地方各民族中去进行，如果各地各民族中没有研究中心，就只能采取工作队的方式，工作上自然会受到更多的限制。这是说明，像这类学科地方性的研究机构是必要的。

从已有人力的利用来考虑，也是有些宜于集中，有些宜于分散。如果一种学科专家人数很少，而又以密切合作为宜的，当然以集中为有利。如果专家人数少，虽则在工作上不需要集中在一个地方，但是过早分散到地方上去了，就会缺乏机动力量调度不灵。比如民族社会历史的研究，从学科性质说宜于分散，但是目前这方面的专家太少，如果现在就要遍地开花，事实上做不到。现在这方面一些稍有基础的学者还谈不到专门研究哪个或哪一些民族。因之，已有的人力需要集中调动，按需要重点使用，这是地方研究机构做不到的。目前还只有采取工作队的方法来进行工作。但是这种办法不应当看成是正常的而且应当赶紧培养力量，使地方性的机构能早日建立起来。

也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各地方的高等学校里已有一定数量的研究者，如果把这些人集中起来，那就会影响各学校的工作，也就是影响新生力量的培养，那是不相宜的。要充分发挥这些力量，地方性的研究机构就可以起作用。比如云南的动植物是科学研究的好园地，在昆明建立一个这方面的研究机构，就可以充分利用云南地方上各高等学校里这方面的人才。再从提高各高等学校的教师质量来看，分散一部分科学研究的专家到各地方上去，协助各高等学校和研究工作者是有好处的。这些分出去的科学力量，加上各学校的教师，可以培养成地方性的科学中心。这样说，属于第二类可集中也可分散的科学研究工作在有一定条件时，适当分散是好的。

总的说来，除了若干不宜分散的科学研究工作外，我认为应当创造条件，适当分散，在分散的基础上加强联系，提高集中。

2．关于科学院、高等学校、各业务部门等研究机构的关系问题。

我是认为这三方面的科学研究应当从对象、要求等方面有所分工的。业务部门的研究应当以当前业务上极需解决的问题为主，高等学校以有关教学上的问题为主，科学院以科学上的基本问题，全国性的问题等为主。

高等学校和科学院的分工并不容易弄得很明确。事实是如此，因为科学上许多关键性的问题的知识都是和教学有关的。教学应当经常赶上科学的发展。教师们不自己参加这些研究也不容易把自己的教学内容提高到当前的科学水平。这个说法我是同意的。但是以目前高等学校里大多数教师来说，他们的水平还不是很高的。事实上还需要通过一般的研究工作来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使得他们能更好地掌握材料。为这多数教师着想，研究工作的要求还不宜太高，甚至可以把编写讲义、做读书笔记都列入科学研究工作范围里去，对于这些教师，科学研究直接为所授功课服务，愈密切愈好。关于这一点我想争论是不多的。

另一方面是高等学校里也有不少在科学上有地位的专家。怎样使用这些专家是一个问题。所谓研究重点摆在那里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这些人怎样加以利用，才对国家最有利的问题。

先从高等学校来着想，这些人是教学的台柱，是开展科学研究的火车头；如果把他们拉出学校，影响确是很严重的。小则一个教研室，大则一个系会发生瘫痪。

现在一般高等学校里这种人是不多的，从一个教研室或一个系来说大多不过一个两个这样的教师。这种人一走，不就要垮台么？学生首先要闹，学校也不好办。这是实情。不承认这一点来考虑问题是不切实的。

在学校里，这类人是不是安心呢？并不都安心，而且很多不大安心。所谓“人心向院”主要是指这些人。为什么不安心？我估计是第一，教学任务太重，抵用的人不多；能用的就拼命用。加上缺乏助手，或是助手不太抵用，这些人的工作是很繁重，而且很琐细，很多是令人头痛的事。第二，感觉到自己空虚，凡是知道一些科学行情的人，一个时期不赶路，就会明白自己落了后。心里会很急。一年多以前，高等学校里不奖励科学研究，甚至有些地方反对科学研究，这些人心里有苦闷，也无可奈何，现在提出了向科学进军，急于要补课，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第三，各学校科学研究的条件，过去一段时期里虽则有了改进，但是究竟赶不上专门的科学研究机关，而且有些学校对于科学研究重视还不够，不能满足教师们的要求。

有人认为“人心向院”是科学研究机关向高等学校拉人拉出来的。我觉得平心而论，主要还不是这个原因。高等学校能重视科学研究，能改善科学研究条件，人心是会安定在学校里的。

我的看法：有研究能力的专家，除了必须集中才能进行科学研究工作者之外，以留在高等学校里为宜。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一方面也使研究工作者经常和青年学生，和教师接触，不仅可以培养新生力量，而且对于研究工作者自己也可以经常受到新生力量的推动和鼓舞。这种刺激是很有用的。把一些老头子和年轻人隔离了，两方面都不好。当然，如果新老关系搞不好，那又当别论了。以目前情况来说，搞好新老关系也是安定一部分老教师在学校里工作的必要前提。

既然要留住大部分科学研究力量在高等学校里，同时又要顾到当前国家建设上许多问题需要研究，所以高等学校也应当接受，部分和教学工作关系不很密切的研究计划，并且创造必要的条件使这些教师能有一定时间和精力用在这一类的研究上。

3．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

我想现在似乎还谈不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比重问题。要发展社会科学还有许多基本的认识问题要澄清一下，问题是不少的。我只想提

出一个问题是怎样发挥许多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力量问题。我考虑这个问题觉得关键还是在我们怎样对待旧的社会科学。这个态度问题不解决，那些过去搞过社会科学的人的力量还是发挥不出来的。

问题是出在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因此，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没有什么遗产可以继承。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这些全是敌人，是毒素。如果采取这种看法，新旧社会科学是对抗的，接不上头，也没有接上头的必要了。我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是有错误，有缺点的，因为它受到阶级性的限制和歪曲，但是资产阶级要用它来解决它社会里的问题，虽则它不能解决这种社会里的基本矛盾，但也不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在他所能解决的问题的范围来说，他所掌握的也不可能全部是虚假的，都是些和客观事物完全不相符合的错觉。如果它也反映一部分事实，这一部分的知识还是应当有用的。不但如此，资产阶级社会里的阶级斗争是一直存在的，而且是复杂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是不是只代表统治者的一方面而完全没有代表反统治者的一方面呢？我想也不可能是如此的，那么我们凭什么全都否定资产阶级社会里的社会科学呢？有什么根据可以说没有任何遗产可以接受呢？

其次是对待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态度问题。如果认为旧的社会科学只有毒素，那么这些人首先是消毒的问题。消完了毒，从头再来，自然不及没有受过毒的人学起来更快些了。他们是像背了包袱赛跑，愈跑愈慢。如果认为旧社会科学是可以批判接受的，那么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个改造的问题。他们经过改造。还是大有可用的；而且经过改造，他们对社会认识得更深刻，比了没有经过这番斗争的人经验多，阅历深，见识广。现在，我觉得第一种看法还是较占上风。因此，很多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脱离了科学队伍，或是在队伍里发挥不了作用。这种情况我认为是不正常的，对于发挥潜力是不利的。

社会科学的队伍里， 新旧不接， 少数先锋队背后拖着一大批发挥不了作用的“旧人物”，这个队伍的力量自然是不会太壮大的了。力量发挥不出来，成绩也就不会显著，摆着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动了手，社会科学的地位也谈不到提高了。如果社会科学被人轻视，我想主要是社会科学的队伍里自己没有团结，没有发挥力量的结果，怪不得别人。

我认为发展社会科学还得先解决这个对旧的社会科学的态度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谈得到真正对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团结改造

工作。这是发展社会科学的第一步，是起码的一步。

（原载《争鸣》1957年5期）

言论摘要

钱伟长

“党员灰心、失望了，共产党不懂业务，不能领导。”（在1955年民盟七中全会上）

“院系调查……工作量，一系列的改革，无非是‘行政办法’。学校领导不以学术来讲话，而以某个人是否有群众基础来讲话；我们应该找有学术水平的人讲话，不要找不学无术的人哇哇地叫，今后如不再严格地处理学术水平问题，教学工作无法提高。开展争论也应该是有学术水平的人来开展争论，升级也应以学术水平为标准。从群众基础上、能说会道上来提级是不对的。助教开课起过一定作用，但不足以作为经验。”

“高教部对高等学小吠无学术领导，连一个学术委员会都没有。我所讲的学术领导不是老头领导，年老年轻只要有学术都可以领导。学术问题与群众观点是两回事，现在有些人在争夺科学研究工作，我看是争毛厕坑不拉屎。因为他们没有吃饭，肚中空空。”（1957年在民盟中央及北京市委文委会联合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认为党有意排挤老教授（内行），问题“非常严重”

在高等学小房竟依靠谁呢，应该主要依靠老教授。目前全国高等学校对老教授的作用和积极的估计不足是个普遍、严重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首先把人分成了两类，对第一类人总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先看他的缺点。这样老用‘先入为主’的眼光看人，一堵墙就造成了。清华对老教授总抱着怀疑的态度……清华大多数系和教研组主任没有真正地当家作主，最多也是陷在事务工作里。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来就是挂个空名，从未过问系的教学。而且像这样一位有声望、有才学的教授竟然连一个徒弟也没有，是令人悲哀的。我不赞成蒋校长的说法：“要注意使大家各得其所，要注意发挥老教授的作用，也要注意培养年青教师，”这话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全面，实质上这个全面是为片面而服务的。如果把教授同青年教师搁在同等地位上，即是不尊重老教授的“老把戏”。（《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见《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从我已获得的资料看，我认为目前有一个问题严重——所有工作中依靠内行不够。”

“现在有一种想法，认为领导意图是通过苏联专家培养年青的来代替老教师，但中国需要成千上万的科学人才，而苏联不可能成千万地派专家来，依靠苏联专家只能作为一部分补充。有人说：‘现在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样是很危险的。”（1957年5月27日在市委座谈会上发言）他说老教授不能发挥作用的原因有三一、另外有一条线

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是这些年来，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指党的工作）总是比你走得快。”

二、党的力量大，……

党的力量大，一个意图贯彻起来很容易，我们作事就完全不一样。我只参加了两头工作：事情还未作出决定前提提意见，决定以后就保征执行，姑且称它谓‘进口’和‘出口’，究竟其间是怎样讨论的、布置和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无知了。”

三、党内资料外人不知

党内有好多资料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些作教授的掌握情况少，有的看法很可能是片面的，所以有些场合就很难发言。”

（《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见《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今后应该开门办党

学校党工作应当如何进行呢？应当公开，党的小组会也可以吸收群众参加，大开门，使党外团外的人对党团工作有监督作用。同时，对群众也是很大的教育，整风的过程就可以把门打开。现在是半开门，先讲党外人士提意见，党员有意见回去提，关门研究。应当开门整，这样才能保证党的纯洁，使党员在群众中生根，在学校内这样作是有条件的，应当从开门整风到开门作党的工作。”（1957年5月27日在市委座谈上发言）

要求党员揭发党内秘密

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大开大放，小开小放，不开不放”，清华的教授“鸣”

“放”得不够带劲可能与此有关。过去清华党委抓得太紧，教授们大

概一时还放不开。党员教授没有先“鸣”也是个问题。群众的“杠杆是很灵敏的”。党员不说话，非党员不知什么意思，因此就不敢畅“鸣”。（《钱伟长批评学校里的宗派主义》，见《北京日报》1957年5月16日）

从物理教研组“鸣”“放”的情况来看，清华还“鸣”“放”得很不够。我们可以通过物理教研组来看其他系，问题不会没有，但是今天还比较静，要使整风运动健康地开展下去。 第一， 党委首先要号召党员带头“鸣”“放”，物理教研组“鸣”“放”得好，就是因党员带头。很多事情我们只能谈表面现象，举不出具体例子，党员带头就可以更好地搞好整风。蒋校长在报告中说，党员可以采取自已认为最好的方式来“鸣”，这一句话还有保留。

第二，有些问题，党委应采取措施及时处理：如杨子远可以把他调开，不调开，群众贴大字报也还得躲躲闪闪，会妨碍整风开展的。又如在肃反中斗错，应开诚布公在公开场合进行检讨，何东昌同志作关于肃反问题的报告，不解决问题。（《进一步开展整风的关键问题在哪里？》见《新清华》1957年第195期）要青年不要“虚心听群众意见”“服从祖国需要”

“从整个社会看来，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留下的封建教育影响还是很大的。封建社会对青年的‘教育’ 有一整套， 现在我们虽然已经不用那一套‘老成持重’、‘温文典雅’的字眼，但这些字眼的某些内容却在‘服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等另外一套字眼中借尸还魂了，有许多对青年的不合理的要求，就是借助于‘服从祖国需要’这样光辉的字眼里混了进来，新名词混进了旧内容，确实迷惑了不少青年，束缚了不少青年。”（《过多地管教青年是封建教育思想的反映》，见《中国青年》1956年第15期）

要学生发泄烦闷情绪

你们想过了没有？现在学校里揭发那么多的东西，根本问题在哪里？主要矛盾是什么？有人说是“三害”，但这是笼统的罗。有人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辅导员制度、肃反问题、教学改革、理工合校，但这虽是问题，却不是主要的，你们没有想过吧！现在是该想想的时候了，不要光是和大家哄在一起，应该冷静分析一下，为什么大家会揭发这么多的东西？青年人要独立思考嘛！”（《答学生问》见《新清华》1957年第204期）

“现在群众的情绪是烦闷的，有话讲不出，要想发泄找不到题目，你们今天来也是来找题目的。你们要知道大家轰轰烈烈搞，也有人在外面哭哭啼啼，没有关怀。

我很奇怪，为什么天天在讲要团结青年，但是学校里还要造成局面，总有那么一群人想要去感染另一群人，而且态度是敌对的……你们大胆揭发，　　不要怕，　　提出来讲给大家听听。你们鸣了，我再来讲。”（《访问钱伟长副校长》，见《新清华》1957年第196期）青年学生不应分左、中、右

钱伟长说：“我是吃过苦头的人，为什么要造成这样的气氛呢？同学本身就存在宗派情绪，硬把人分成进步、中间和落后，依我看，进步的也不过是口头说说，进步的人也不过学会说几句漂亮的话，但是他们就没想到，我们是青年，最多二十来岁，有的还只有十六十七岁，就是落后也不过是落后三四年，还会干什么坏事？

孔夫子说过‘三十而立’就是说一个人到三十才成型，在30岁以前青年人都是这样活泼的，活跃的，寻找进步的，不是教条的。

“我们的青年人大不豪放了，束缚太多，我年纪比你们大得多，我不怕束缚，大家给我戴帽子，我就不戴，把它扔了。”（《访问钱伟长副校长》，见《新清华》1957年第196期）

对学生情况的估计，我同意杨人闿的意见，学生大多数是好的，清华就没有人提胡风问题，在北大也是个别的。错误意见也有人批评，不必害伯，说学生百分之八十资产阶级出身，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也是不对的，这是下了结论去找证明。”

（1957年5月27日在市委座谈会上的发言）党、团组织是三大主义的根源

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是同一原因产生的。层层汇报制度，年纪轻轻的团文书，见了一棵芝麻大的问题就夸大，然后汇报到团总支、团委会，一直到党委会，每一层加上一些干部主观主义，到了领导上作个决议“贯彻”到团支部，团支书拿了个鹅毛当令箭，硬灌。党的威信很高，谁敢违反，当然就闷在心里。下面灌不通了，就作个大报告，点名点将把同学都点一阵，点到的就心里结个疙瘩。而一些干部越显得自己了不起了。”（《访问钱伟长副校长》，见《新清华》1957年第

195期）

他不同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说法从各方面反映的几位党委的发言，说明对高级知识分子是不信任的。如蒋校长说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认为这样的领导思想的本身就有宗派主义情绪。”（《进一步开展整风的关键在哪里？》见《新清华》1957年第195期）整风运动中搞理工合校的签名

关于理工合校问题，钱伟长说：“我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理工分家的。院系调整把理工分了家，是一很大的错误。教学改革中，有人说我落后，不愿学习苏联，甚至说我有反苏情绪，要我做检讨。我是很拥护学习苏联的，而且一个人如何能反党呢？我是不做检讨的。最近有人提出理工合校，有人提议把北大的文法学院合并到人民大学去，而把北大的理学院合并到清华，这是相当理想的方案。不过北大的领导上有些是不同意的，我出面提出这个问题不方便，北大周培源就是我的老师，你们搞好一些。”

这时有同学说，科学馆前已经有人签名主张理工合校了。钱副校长问有多少人？

有人回答说有六百多人。钱副校长说：“这太少，至少要搞六千人签名的名单还差不多，声势浩大，让高教部看看群众的意见。”临别时，他又向我们说，“你们去签名吧”！

……座谈后，有些同学立即成立了理工合校组，到全校发起签名……（1957年6月18日大字报：（我们访问了钱副校长》）（原载《北京日报》1957年7月6日）

把鸣放的重点放到基层上

王造时

首先，王造时赞颂了整风运动，他说：“作为一个开国当政的党，主动地、及时地运用大力，在全国范围内，来推动这么一个全面揭露矛盾、公开批评思想和工作的运动，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破天荒第一遭。”他认为通过整风鸣放，“党的威信在全国广大群众的心目中不仅没有减低，而是更大大地提高了”。“大家把心里头的话吐得越淋漓尽致，大家越体会到党究竟是我们自己的党。”

王造时为知识分子讲了话，他说：“我深深感觉，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整个阶层来看，确是有着毛主席所说的志士仁人的传统。这个传统是我们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过去对它估计不够，党今后应当更多多加以爱护。”

在知识分子这一方面，他认为，“我们今天的责任，是要本着搞好事情的精神，继续放鸣，彻上彻下的放鸣下去。”

“今天的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着；不是刚刚萌芽，而是发展到了相当恶劣的程度；一般说来，越往下层，越是专横，违法乱纪的事情越多。

它阻碍了我们的生产进展，影响了我们的建设计划，损害了我们广大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官僚主义的行为，不管是有心或无心，实际上等于假借党的威信和国家的名器，作了害党害国的事情。正如周总理所说，官僚主义者在党与群之间筑起了一座墙，挖下了一道沟，弄得爱国爱民爱党的人，尽管满腔热诚，想为社会主义建设　　贰其一砖一瓦之用，可是莫名其妙地被挡在墙沟之外，凄惶失所，想不通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国家有前途而个人没出路。”

（原载《文汇报》1957年5月21日）

王造时冤狱侧记

夏高阳

王造时冤死已经20年了，抚今视昔，缅怀易已，爰草此文，用志拳拳。

人间冤狱

王造时先生于我为前辈，谊兼师友。30年代，他是我崇拜的偶像之一。建国后，我们成为忘年交、患难友。

1957年，我们同时被错划为“右派”，嗣又一同下乡改造。迨“文革”狱兴，我二人先后被捕，同囚于“四人帮”的集中营一名为看守所，可那是真正的地狱！

有的人不堪折磨，便瘐毙在那里。王造时亦未能逃过“四人帮”精心策划的那种变相的肉体消灭之厄，我有幸被囚禁在那鬼地方达6年6个月又一个星期，是合格的历史见证人。

“文革”那阵子，全国形成一个大囚笼。“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主要集中营，先后拘禁过好几千人。其中包括：“走资派”、民主人士、专家学者、文艺界人士、倒楣的造反派头头、大量党与非党干群，并旁及工、农、兵和少数外国人。

“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们，对“囚犯”实行饥饿政策：不让“囚犯”吃饱，使之长期处在痛苦的饥饿状态，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着！因此，入狱不要很久，好端端的人便形销骨立，随之慢慢变成另外一个人。

入夜，则成为一座阴森可怖的阎罗殿。镣铐声与呵叱声并作，皮肉与哀号呼救声交响，令人毛骨悚然！

在如此残酷的环境下，仍不乏犯人起而争取活命及有意义的生存而斗争。

狱中相逢

一天午后，刚刚吞下砂石饭就烂菜皮，我蹲的班房门突然打开，几

个狱卒出现在门口，他们叫出一连串囚犯号码，我被叫到了，杨仲池等也被叫到了。

基于长期牢狱生活的经验，我判断这不是绑赴刑场，也不像提审，更不像是宣布释放，而是调班房。

这是我们这个班房的难友所共同担心的。我同杨同志等调到这个关着30个人左右的大班房时， 发现这里难友们闹不团结，互相告讦成风，遭到狱方的不断镇压翻过深入工作，依靠全体难友的觉醒和共同努力，整个班房转变成团结互助、政治情绪高昂的集体。人人抓紧锻炼，认真学习，深入研讨国际国内形势，取得了：黑夜终将过去，光明必将来临的共识。凭这一点思想闪光，大伙保持着旺盛斗志，免于精神崩溃。我们的口号是“活着就是胜利！”“为了祖国，顽强地活下去！”我们的物质匮乏已极，然而我们精神世界是富足的。

现在眼看就要分散了，大家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既有对斗争得来的硕果的留恋，又有对未来命运不可预料的顾虑。

一个狱卒要我提着简单的行李，跟着他一起下楼，他打开底层一个班房的门，让我进去后，加锁。

这是一个阴暗潮湿、让人窒息的房间。四壁和承尘的白垩已经剥落，地板凹凸不平，一盏昏昏然打瞌睡似的电灯，泛照着四个囚犯的身影。

倚靠在铺上的是一个戴眼镜的，衣服褴褛，极度衰弱的老者：1845（囚犯的代号，下同），是一个30出头，右颧骨上有一块黑斑的造反派头头；1646，一位原检察官，操着浓重的胶东口音，40多岁，身体憔悴且带着伤；一个60岁出头，浓眉凹目， 讲着不纯正上海活的矮个儿， 是在中国工作的日本工程师渡边。他的囚号是1753。

我的眼光停留在老者身上，他的囚号是1416，白发萧疏，一脸胡子，瘦得皮包骨。这人好生面熟，但怎么想不起来了。我发现他也在上上下下打量我。会不会是王造时？一个意念在脑子里闪过。不，不，不可能，王造时白白胖胖，平时腆着滚圆的大肚子， 足足有178磅光景；而且王造时很爱修边幅，胡子剃得精光，头发梳得熨熨贴贴……而眼前的人怎么能是他？继而转念一想，王造时在这里呆得很久了，体貌不可能不起很大的变化……

这囚室有二张高铺：一张是老者的铺位，另一张空着。我就把行李放在空铺上面，继续观察。

此时，狱卒来通知“放风”，我决定在“放风”时，看个清楚。

到了放风场，我故意靠近老者谛视他，而他也用目光逼视我，目光碰在一起，我确认老者就是王造时。但鉴于处在如此严酷的环境，我还希望能找到直接证据，以免误认。

回到班房，一份报纸递了进来。

1845用命令的口吻，指定老者读报。当老者打开报纸读了一句，我发现那是地道的江西腔，“他确是王造时！”我极力隐藏自己的感情，并提醒自己：对此必须绝对保密。依据监规，绝对不允许熟人呆在一个班房，狱方把我们二人调在一起，显然是工作上的疏忽。我一定要等适当机会向王表白。

在这个班房才呆了不过半天，我已经发现1845的专横作风，和他对王造时不逊的态度。这一动向，引起我的注意。

在别人不注意的一刹那，我靠拢王，并偷偷地握住他的手，耳语似的轻轻告诉他：“我是××，请注意保密。”他也同样激动，颤声说：“我吃不准，不敢认你……那真是太好了……”

饥饿难忍

这个班房曾经先后送出两个巍侗病人到提篮桥监狱医院去抢救：一个就是王造时，一个是渡边。

正是由于饥饿，监狱里常常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早上发粥，遇桶底有一点剩余，狱卒照例向阴沟一倒。有一位苏北籍女炊事员，出于好心，碰到有剩余的粥，就收集拢来装在小面盆里，排日轮流递到班房里去，让犯人分而食之，这原是德政，那位苏北阿姨成为犯人心目中的观音大士。

别的班房把送进的剩粥由犯人分而食之，这个班房却是轮流由一个犯人独享，那一次，轮到王造时，由于实在饿得慌，他端起小面盆，一口气喝了下去，饿瘪了的肠胃哪里承受得了两三千CC的薄粥汤的涨力，

于是酿成胃壁穿孔的惨剧，鲜血咯了一地，立即被送往提篮桥监狱医院去了。第二天轮到渡边享用薄粥汤，当小面盆递进来时，尽管有王造时的前车之鉴，但他顶不住饥饿感的压迫和薄粥汤的诱惑，竟也一口气灌了下去，随之倒在自己咯出来的一汪血泊中……他们住院个把月才回来，渡边身体较好，恢复得快一些，王造时则委顿不振了。

这种悲惨场景的酿成，绝不能责怪犯人们缺乏自制力，要看到“四人帮”饥饿政策的残酷性。

蔑视霸头

这个班房里的1845毕业于华南某大学经济系，是该校造反派头头，因武斗死了人，被对立方面造反派揪了出来，一肚子委屈。他是那个特殊时代背景产生的特殊材料，尽管造反已经彻底失败，落到这个地步，仍不失造反派本色，想在班房里称王称霸，企图以打击王造时为突破口来确立“霸业”。

他对待王的态度十分无理，常常出言不逊。一会儿嘲笑王笨手笨脚，不会自己料理生活；一会儿又无端攻讦王读报读了“错别字”；一会儿又嫌王睡眠打鼾，妨碍了他。而王造时出于对他的蔑视，则一味忍让。我既气愤，又怕1845的胡闹还会继续升级，伤害王造时，我想保护王，但不知道如何着手。

我也曾企图说服1845，向他指出大家都是难友，谁也不能歧视谁。可他却说：“我就是这个脾气，我看不惯就要说！”我说：“1416的年龄可以做你我的长辈，论资历，他可以做你我的师长，我们应该尊重他。”“尊重个屁，他连读报都读不好，读了不少错字。”“你说1416读错别字，那是你的误解，他发的是江西语音，如果一定要以纯正的普通话读音才算读对，那么你的苏北口音和我的浙江口音，读出来的字，有多少不是错别字？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应该讲道理，应该懂得起码的礼貌。听说，孙大雨关在楼上的一个班房，难友们让他讲莎士比亚，大伙听得津津有味，我们何不让1416跟我们讲讲国际政治，该有多好呢？”……可是这些话，1845都嗤之以鼻。

渡边和“检察官”都是正派人，他们看不惯1845，但也不愿意招惹他。

铁骨铮铮

这一段时间里，1845提审频繁，我有机会同王造时深谈。

王造时，留美法学博士，早年成为上海的名律师。他看问题更多的是从法的角度来考虑。他说："社会主义国家重视经济建设，忽略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很可惜的。后果严重，苏联肃反严重扩大化，中国反右的失误，都是从冲决法的藩篱为其特征的一种毁灭性打击！"

"这个地方，解放前，解放后，原本是在法律执范下羁押未决犯的通常的看守所。三四十年代，我执行律务，经常到这里来，会见未决犯，接受委托，担任辩护。

今天这里已经蜕变为无法无天的纳粹集中营。何以致此？值得深思。

我在1936年11月，被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起诉；时隔30年，1966年11月，我却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罪被起诉，这是对历史的嘲弄！"

他对1845的悖行，似乎不太在意。当我对1845表示忿忿然，并说一定要让他接受教训时，王造时反而劝我，不要为他操心，他"忍得住"，并对年轻人不要苛求。

由于我对他在30年代和解放初期那种慨当以慷，辩才纵横的风范的印象特别深，因此，对他眼前一味忍让的态度，不能理解，以为王经过反右的打击，特别是"文革"的冲击之后，可能气质上起了变化，丧失了英雄本色。

经过同他深入交淡之后，才认识自己的幼稚和肤浅。

"文革"一爆发，王造时就被投入急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的中心脏涡，在复旦大学，他是被批斗的重点对象之一，但从来没有屈服过，始终临之以凛然的浩气，使张牙舞爪的造反派束手无策。从那时候起，他就遭受"红卫兵"几次抄家的践踏，特别是第三次，那股"红卫兵"居然盘踞他家达42天之久！除了拿走他们想拿走的东西，破坏他们想破坏的东西之外，这些人还秉承"四人帮"头目的旨意，蓄意制造冤案，逼他承认组织反革命政党，反对无产级阶专政，目的是想置他于死地。他毫不含糊地同这些"红卫兵"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这些丧心病狂的家伙乞灵于非刑拷打。将他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死过去后，用冷水喷醒，继续拷打。但他的口供只有三个字："不！不！不！"或者六个字"没有！没

有！没有！”42个日日夜夜当中；这些人轮换着不停地折磨他。那个头头说：“王造时即使是钢，也要让他化为钢水。”但王造时的意志胜过钢铁，居然没有熔化点！

他说，他这样誓死不屈，既是捍卫自己，也是为了保护另一位被诬陷伙同他组织反革命政党的著名教授。他强调说，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我也不能屈服！

我终于了解：他对1845的宽容，是对他们的蔑视，是对他的怜悯，从而也坚定了我必须为他做点什么的决心。

智斗1845

1845每天总要找个理由，让王造时读报，并把王的江西话读音，作为王读错别字，加以嘲弄。我想只有找个由头，才好刹住他的狂妄。

一天，王造时感冒，我就说，1845，你来读报。

1845很自负，潇洒地读了起来。当读到“周总理出访受到热烈欢迎，欢迎人群给周总理献上花束”一句话，他把“花束”读成“花圈”。我立即打断他，并严肃地说：“你再读一遍！”1845还没有觉察他的错误重复读一遍“献上花圈”。当检查官和渡边指出他的错误时，1845紧张起来。我说：“这可是政治性质错误，它涉及到你对周总理的态度问题。”1845忙说：“我该死，我该死，不过我确实不是故意的。”“你应该主动向管理员说清楚，省得我们报告了。”1845知道，如果此事让狱方知道，够他受的。他哀求道：“1995请你网开一面，我不会忘记你的好处；1416，我过去对你太苛刻了，这是我不对，请你向1995替我说说情。”王造时说：“1845这种误读是不能容许的，但他已经承认错误，1995，是不是可以放他一马呢？”

看到王出来打圆场，我就趁势收场道：“此事可大可小，看在1416和1753两位的份上，我可以暂时不报告，不过希望你今后要自重。”

经过这番折腾，1845的专横态度，特别是对王造时的态度收敛了不少。王造时的日子也好过了一些。

大约太平了一两个月，1845故态复萌，又来编派1416的不是。

要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一天，1845对王造时夜眠打鼾骂骂咧咧。我对他说：“1416已经向你再三表示歉意，并且说，如果他打鼾，把你吵醒，你可以立刻将他叫醒。他就坐到明天，不再躺下。我看，他也只能作到这一步了，打鼾是生理现象，他无法控制，我睡在他身边，都不嫌他，你就不能担待一二么？”1845回答说：“我才不管他生理、病理，他妨碍我，我就不答应。今天晚上，如果他再敢打鼾，莫怪我不客气！”

次日凌晨两点钟光景，我突然被一个重物落在地下的闷响所惊醒。一看王造时已不在高铺上，我翻身起来，发现王造时连同棉被滚落在地上，一动也不动；1845站在旁边手足无措。可以断定王翻落在地上，显然是1845所为；我俯身察看躺在地上的王造时，并同1845一起，把王造时抬到高铺上。王虽有微弱呼吸声和脉搏，但处于昏睡状态。我厉声呵斥道：“1845。你好大胆子，你闯了大祸了！”1845嗫嚅着说：1416打鼾将我吵醒，我只用脚轻轻一地碰了他一下，想不到他会滚落到地上。”

我气得浑身发抖，说：“你是足球运动员，你这一脚，还不是要了他的命！你走开，让我报告去！”1845向我打躬作揖，苦苦哀求我不要去报告。我说：“人命关天，人都昏死过去了，你不让我报告！”检查官和渡边都说，报告找医生要紧。

此时，王造时眼微微睁开，并以微弱的声音呼唤我。我马上过去扶他，让他的头枕在我的手臂上，并用耳朵凑到他的口边。只听见他说：“我没有什么，你放心好了，原谅他吧。”我想，如果传达王的话，1845就像没事人一样，奈何他不得，他没有受到教洲，后患无穷。因此，我严肃地说：“1416对我讲，他头昏得历害，天旋地转，而且浑身疼痛，快要不行了，他要我立刻报告，请医生来。你闪开！”

1845说：“1416已经能讲话了，可能会慢慢好起来，你千万不要报告！”

这时，王造时又轻轻地呼唤我。我又把耳朵凑过去，只听他说：“我好了一些了，1845太粗暴。可是我也有责任，我教了一辈子书，没有把青年教好，我内心很内疚，你再放他一马吧！”

我抬起头对1845说：“1416说他头痛得历害，你说怎么办？”

这时，检察官和渡边都说：“1416醒过来了，能说话了，可能有了好的转机，再等几分钟，看看1416的情况，再决定报告还是不报告。”我冷

静地分析了情况：我想，1416说他没有什么，可能因为他身上严严实实地裹上了一条厚棉被，头上戴了一顶棉帽子，减轻了撞击的力量，因此伤势可能不重，王造时又这样好心肠，看来我这独脚戏很难唱下去，只好缓和一下。

我即对1845说：“我可以暂时不报告，但如果1416的伤势有发展，我还是要报告的。同时，你得做到三条：第一，从现在起，你要好好服待1416，三餐、大小便、睡觉擦身统统归你负责：第二，1416的衣服统统归你洗；第二，你要保证尊重他。

1845忙不迭保证做到。

冤死狱中

约摸两三个月后，王造时调到另一个班房去了。我为此忐忑不安好一阵子，顾虑他能不能适应新环境。

关于这个谜底是在我平反出狱后，碰到杨仲池同志才揭晓的。王造时离开我后，凑巧调到杨的班房里去了。他们是清华的同学，王是清华大学第一任学生会会长，并且领导过“五四”运动，杨自然非常尊重这位老会长，把王的衣被统统洗好，缝补好，连王的破席子也补好了，他们班房很团结，大家都对王有好感。

更重要的消息——关于王造时冤死的消息，是我在提篮桥监狱医院获知的。

1972年初春，我由于长期关禁，营养不良，丧失了免疫力，感染了结核性胸膜炎。病情危重，被送到监狱医院。那里的政治空气比较宽松，病犯可以使用本名，并较无顾虑交谈，老病犯告诉我，王造时去年在病势危笃时，被送到医院来，经抢救没有起色，转送瑞金医院，也许因为病入膏肓，也许因为转院过迟，不久去世。

我听了，心情十分沉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声春雷，王造时冤案才得到昭雪。

王造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品质，他捍卫原则立场的风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王造时传（节录）

何碧辉 赵寿龙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解放了，胜利了，王壬造时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十分高兴。他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

解放初，王造时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文教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为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上海市各界代表会议特邀代表，上海法学会理事。另外，王造时还担任下列职务：

上海诚明文学院董事长（约1950年4月至1952年7月）原诚明文学院长董事冷蟪辞职，院长蒋维乔请王造时担任。蒋去香港后，王又兼代理院长三四月，该校后来并入当时的上海大学。

上海前进中学董事长（约1949年至1954年7月） 。解放后，《前线日报》所办的前进中学被查封，由孙晓村等出面改组校董会，与教育局接洽继续开办，推王造时任董事长，孔大充任校长，因经济困难，房屋又发生问题，孔不久辞职而停办。

上海正平补习学校董事长（约1951年至1953年）。该校由薛迪清（原光华大学商学院教授）创办，推王造时为董事长。后由教育局接办，改为中学。

王造时担任这些学校的董事长，至少对于当时减少教职员失业、学生失学这一点来讲，是有益的。

1951年8月， 王造时担任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他又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近代史教研组主任。

解放初，王造时对党领导的各项政治运动，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等等，都是积极参加的。他自己认为，他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九一八”事变以后，更是一步步跟共产党走的，积极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6年“救国会”工作是在党领导和影响下进行的。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是有贡献的。一般人也认为他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七君子”之一。因此他在民主人士中间有一定威信，常常代表民

主人士发言。王造时对新中国也确实是热爱的，这从他的言论中可以得到证明的。

1950年5月28日， 上海解放一周年时，王造时在《几点感想》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确是我们人民的军队”；“人民政府是廉洁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1951年12月，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上，王造时代表特邀代表小组发言，他说：“我们在这里特别指出：我们政府的各部门基本上是廉洁的、勤苦的、奉公守法的，是中国政治生活上空前未有的廉洁政府。”[1]1954年8日，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普选时，王造时是上海四川北路选区选出的代表。他在普选时说：“解放四年后的今天我们就有了普选的权利，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我个人曾参加过争取民主的运动，但在解放前，始终没有获得真正选举的权利。我没有选过别人，当然也没被人选举过。现在我领到了选民证，我特别感到愉快，感到兴奋，感到骄傲。”他还说：“这次选举是最平等、最普通、最民主的。再度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正确和伟大。 ”1955年10月1日国庆时，王造时又发表了《我们今天庆祝国庆要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努力》的文章，他说：“在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的阶段，中国革命不可能由资产阶级领导成功，而只能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进行新民主义革命方能成功。并且只有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才能完成中国革命：我们一定要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出大量忠于祖国、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技术人员和专门人才。”他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 不仅指示着我们6亿人口的中国大步走向社会主义，并且是具有巨大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件。如果20年后我们来写世界史，这将是可以大书特书的一章。”

[1] 王造时《我们决定开步走》，《解放日报》，1951年12月14日。

王造时50年代初发表的上述言论，与他30年至40年代发表的言论对比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当年的王造时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而现在的王造时则是歌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的。

但是，总的来说，王造时解放后不如解放前活跃，相对讲是沉默了，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从解放后才开始的。前面已经谈到，还在抗日战争后期，他就开始感到苦闷和孤独，这种消极情绪，王造时本人感到了，解放初，他听人说，共产党对他有点误会，但又不知什么事，心里

忐忑不安，疑惑不解。后来，他向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谈了自己的政见，提了关于先解放台湾，后解放西南的建议，结果潘汉年没有给他回话，他更以为这是共产党对他的意见置之不理，对他有误会，不够信任。

因此，王造时决定采取消极态度，不加入民主党派，不担任行政工作，少说话，少发表意见。并且自以为有的人只能做政治工作，不能教书，而他则既能搞政治工作，又能教书，有两套本事而引以自豪。还认为革命成功了，专搞学问，同样可以为人民服务。因为王造时有这样的思想，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试探他是否愿意担任行政工作时，他婉言谢绝了，说：我有自由散漫作风不能胜任。九三学社、民盟劝他出任工作，他也托故推辞。1956年，无党派民主人士想组成一派，设立一个办公室，黎照寰为此和他商量，他认为无此必要。凡此种种，都证明他有消极情绪。

这种情况，旁观者也看出来了。解放后，特别是1957年初，王造时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潘大逵曾对他说："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据王造时说，张孟闻也对他讲过类似的话。

1956年1月，　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党为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王造时的关心和照顾也增加了。特别是1957年2月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上海市政协推统战部部长刘述周和王造时前往出席。在北京，他不仅受到救国会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的热情款待，而且解释了多年来的误会，心情很愉快。

在北京，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了王造时。王造时向周恩来说明致斯大林公开信的起草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周恩来说，历史问题大家说清楚了就好了。周恩来还谈了关于救国会的事　啡国会是1949年12月18日结束的，发表了《中国人民救国会结束宣言》。对于这件事，王造时当时认为，如果其他民主党派不解散，救国会也不必解散，后来多数同志主张解散，王造时也就赞成了。周恩来说，抗美援朝开始时，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宣言，拥护"抗美援朝，薄兑卫国"的号召，决心为这一神圣任务而奋斗的时候，联合声明上缺少救国会，毛泽东主席感到很可惜。周恩来赞扬王造时当时反对解散救国会是对的。周恩来还征求王造时是否有意恢复救国会的意见。王造时回答说，这要问沈钧儒和其他朋友。事后王造时曾经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如顾执中就极力主张恢复，并说如果别人不干，他支持王造时一个人出来领导干，希望王造时拿出当年的气概。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支持恢复救国会的不多，不久又

开始反右斗争，因此恢复救国会的事就不了了之。王造时对周恩来的真诚会见，与长时间的谈话和鼓励，十分敬佩和感谢。他感到共产党了解他，信任他了，顿时疑虑冰释，心情非常高兴。

王造时在北京还直接听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内容，由陆诒向他作了传达。

总而言之，王造时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以后，由于多方关心，由于共产党的信任，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

他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作了《扩大民主生活》的发言，并且立即得到马寅初等的赞扬。当时，王造时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把黑暗的、落后的、分裂的、被帝国主义欺侮的旧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设成光明的，促进统一的，强大的新中国，并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极其伟大的胜利，这些都是铁一般的事实，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谁都不能否认。正因为如此，为了把国家的事情办得更好，防止官僚主义的滋长，防止下情不能上达， 以至于演成严重问题， 就要按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名言向党提意见，这才是民主人士应尽的职责。如果民主人士不说，一般人更没有机会说了。所以他在全国政协会上发言里说：“拿一个或许是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征的非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象魏征的倒还嫌其少。”[2]

[2] 王造时：《在二届三次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1月）。

3月4日王造时回到上海之后，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上，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在《新闻日报》召集的座谈会上，在《光明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又多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之后，应该扩大民主生活，加强法制。

关于加强民主法治宣传教育问题。他说，“解放以来，大家的政治水

平尽管都有了提高，但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的统治，我们一般人对法治，还缺乏了解，并且在生活习惯和处事作风上，始终没有完全摆脱掉一向重人治而轻法治的残余封建传统。我们一些机关干部轻视法律的规定，甚至有一些司法工作者也有时犯了有法不依的过失——这都是人治主义的表现。过去对于法治的宣传实在做得不够，今后应该特别加以注意，作为人民基本教育的一部分，务必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宪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根本大法，大家必须按照法律行事。全国人民在法律前面是平等的。”“党团不可以党代政，也不可以党代法。这不仅对于人民是一种保障，对于党的威信也是一种保障。”

关于切实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问题。他指出：“依据宪法，我们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但是我们还没有通过普遍的立法来把它完全实现。例如宪法里面有二十几次提到‘依照法律’、‘根据法律’、‘服从法律’、‘法律的保障’等等字样，但这些有关法律大部分都没有制定出来。……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什么是犯罪，在什么范围内自由，在什么范围之外没有自由，如何审判，如何处罚，在许多地方还缺乏明确的规定。人民在享受自由之中，仍有不够安全之感。”

关于建立监督制度问题。他说：“党的领导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

为了进一步保证党的领导更加健全无失，毛主席看出了民主党派的作用而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我觉得这个政策尽可以扩大到人民团体，因为人民团体所代表的群众比民主党派更多。……中国古代的御史制度享有独立和公开的弹劾权，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作用，也许我们可以考虑把政治协商委员会已有的视察工作扩大为类似御史的弹劾权。这不但可以具体而鲜明地充实互相监督的作用，而且还可以培养和发扬中国历来士人气节的优良传统。”[3] [3]　王造时：1957年5月在上海市一届四次政协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关于推行基层民主管理问题。他说：“民主的真义不仅仅是为广大人民谋幸福，而是要人民真正起来当家作主。民主集中制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民主特点。从革命的发展的过程来看集中或许是先行于民主；但从制度的本质上说，民主究竟是第一性。

只有在民主基础上谈集中，这集中才是健全活泼的。缺乏民主基础的集中是滋长官僚主义的温床。”“应该使生产者在他生产单位内，充分参加管理。……如果在这些基层组织里打下了民主基础，广大劳动人民

充分享受了民主权利，培养了民主生活的思想和习惯，那么民主就生了根，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便不是任何反动势力所可以渗入而破坏的。”[4][4]　王造时：1957年5月在上海市一届四次政协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王造时的发言，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这样要求本身也欠妥当。有的可能有片面性，有的是在党的政策明确以前说的，如“鸣放的重点放到基层去”。但是从王造时发言的主流看，是好的、积极的，其中包括某些真知灼见和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精华。他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更是难能可贵的。可是由于反右斗争，他受到不应有的指责和批判，这是值得深刻记取的教训。

王造时经过一翻批斗，戴上了极右分子帽子之后，他的心情是很悲愤的。他想念周恩来总理，仍想为国效劳。王造时当时写的一首词说明了这一点。

谁念高楼病客，辗转呻吟，独抱一天岑寂。最怕窗外风狂雨晓，把杨柳摧折。夜沉沉，万家灯火明灭，更那堪今夕正是断肠时节。嗟往事难忘，中枕尽湿。恨人间，欢少苦多　飞愁未去，新愁又织。百般心情，自别后，向谁诉说。风流人阻（此字不清楚，似为“阻”——引者），张望有如千山万水隔。但愿艰危历尽，东风带来消息，待从头，重收拾，相携手，报祖国。[5]

[5]　王造时1958年8月16日夜写的词。这正是1957年3月在北京周恩来总理接见王造时一周年。此词于1966年10月3日被抄家时当作反动诗保存下来。

1960年9月底，国庆节前夕，王造时被摘掉右派帽子，重新走上复旦大学讲台，为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讲课， 仍然认真教学。 同时，他还积极从事翻译和著作，从1960年9月摘帽到1966年史无前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　　开始为止，他翻译和著作在100万字以上，出版的只是极少数。[6]他为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是应该肯定的。

[6] 田汝康、金重远编著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中，王造时翻译的有两篇：《历史有意义吗？》、《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发表的有《保守主义者的解剖》、《法律生长社会学》等。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王造时是“摘帽右派”，自然被“横扫”，与千千万万无辜受迫害者一样，挨大字报点名，抄家，劳改。

1966年8月31日晚上王造时家被抄后19月1日上班时，马上被列入劳改队。22日夜再次被抄家，并隔离审查，他的家成为临时隔离室。经过42个日日夜夜轮番批斗，于11月2日以群众专政名义关进看守所。3日提审时，王造时经过一天休息，头脑清醒多了，马上提出三点声明：

第一点，在压力下被迫交代的材料，有许多是虚构的，应予推翻；第二点，关于组织反革命社会民主党是莫须有的罪名；第三点，承认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不过世界观属思想问题，思想问题应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一起从严批判，关在监狱里没有好处， 应马上释放。可是，在那动乱的年代，既拿不出罪证判他的罪，又不放他份王造时自述材料说，从1966年11月12日夜拘留到2月2日的一个月中，审问过好几次[7] 。“我的供词基本是上面三点，审讯员也就没有再提审，也没有要我再作交代了。 从同年12月3日到现在的两年半以上的漫长时间里，除了两位领导干部和我谈了两次，两个训导员和我谈了五六次以外，关于本案审讯一直没有举行。”有几个月，他与所谓同案犯潘世兹关在同一间牢房。据潘世兹说，王造时曾对他说，他已写信给周总理，申诉他的案情，如周总理收到他的信，他的案情就会搞清楚了。

潘世兹又说，他曾劝王造时写报告给看守所“领导”，说明身份要求吃中灶，以增加营养，增强体质。王造时开始不肯写，后来写了，但看守所“领导”置之不理[8]。

王造时家属前往探监，不能直接见面，家属只有看到收条上签名时，才知道他还在人世 洞使重病，也不通知家属，更不用说保外就医了。1971年8月5日，王造时终于在“四人帮”的严重迫害下，冤死狱中。

[7] 据审讯记录，一共10次。

[8] 访问潘世兹纪录。潘世兹为复旦大学教授，曾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是潘明训先生的儿子，也是一位爱国者解放后，他看到祖国光明前景，痛恨帝国主义侵略，曾毅然将传家珍宝“宝礼堂藏书”。全部从香港运回上海捐献给国家。

王造时如此不幸，王造时的家庭，也是很不幸的。原配夫人朱透芳1956年病故。

王造时1961年再婚，新夫人名叫郑毓秀，在上海线毯厂工作，是上海民族资本家李康年的外甥女，他们是经复旦大学教授潘世兹介绍认识的。据《王造时自述》说，他们都有类似的遭遇，彼此都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因此婚后互相照顾，感情甚笃。 从1966年9月22日夜王造时被叫醒隔离审查后，他俩只见过一次面，押解人员还不准他们讲话。

王造时与朱透芳有四个子女。大儿子王钧陶，1946年患轻微精神病。次子王钧枢，原北京大学西语系学生，1956年也患有精神病，休学回沪，1969年初，病情恶化， 不久去世。王钧陶随后亦去世。两个女儿，大女儿王海若，1949年3月在上海沪北区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地下党员。1950年4月，据说因为作风自由散漫等原因而被劝退党， 1953年8月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毕业，分配在北京最高人民法院工作，1955年8月被开除公职， 1959年初去世。次女王海容，复旦大学物理系学生，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毕业后分配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工作，1973年3月病逝。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笼罩在祖国上空的阴云消散，太阳光辉又普照大地。 王造时的冤案于1978年12月得到平反昭雪，错划右派的问题于1980年5月得到改正。 1980年8月19日，上海市政协、复旦大学联合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沉痛悼念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复旦大学教授王造时。

历史是公正的。悼词指出：王造时同志解放前热爱祖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解放后他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热切希望祖国富强，在教育文化工作岗位上作出了许多贡献，在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面，提出过不少有益的意见和建议，王造时同志的一生，不愧为爱国主义人士的一生，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三大主义的根源

陈新桂

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将越反越多。

陈新桂认为目前“鸣”“放”中有五种顾虑。他说：其中有人根本怀疑整风有何用处。储安平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提出“党天下”“一党治国”。储安平的话还没有说完。在苏联以及新民主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专政。把党外人士看成异党分子，这样，不出宗派主义就很奇怪了。这是个理论问题：如何一党专政？一党专政，民主党派如何监督？这要毛主席继续发展了。在延安整过主观主义，愈整愈厉害，无产阶级专政是个“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将越反越多。

陈新桂在发言中，首先说光明日报登载他的谈话没有登完全。他说，他所接触到的知识分子，当前对“鸣”“放”有五种顾虑：（1）耽心再有一次暴风雨；（2）怕变相报复；（3） 提了意见没有下文；（4）怕卫道者、全面论者围剿戴帽子；（5）少数人怀疑整风有无用处。

他认为人民日报这几天所发表的社论，证明知识分子的顾虑不是过虑。

陈新桂说，储安平“党天下”的论点，是完全合乎实际情况的，只是他没有再进一步追究根源。我们要从本质上看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是历史范畴，不是自古有之，也不是万古长存。它不是目的，是手段，是工具，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治形式。这一政治形式可以有多种多样，可以根据历史经验作适当的必要的改进。他认为毛主席正在这样做，已经这样做。

陈新桂说，无产阶级专政已有40年的历史，它的正确性应当确定，但它有缺点的一面，有阴暗的一面。“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也提到，无产阶级专政还有很多困难，很多弱点。陆定一在纪念整风运动15周年的文章中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地位，领导的地位，便利了“三大主义”的发展。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危害？陈新桂说，共产党的执政和无产阶级专政

是同义语。

共产党在执行国家领导和政治统治的时候，依靠党员作核心，而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是杠杆，传导带，这样一种方式就值得研究。他认为我国这几年来对旧知识分子的利用和改造采取了阶级斗争的方式；选派留学生主要看成份，看政治条件，按照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这是必然的。这样做，没有宗派主义就说不通。他认为说专政是对敌人，对人民内部是民主，这说法是对的，但不全面。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除镇压反动派外，还要组织经济工作、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他说，党首先信任党员，党员信任团员和积极分子，这样，如果没有宗派主义以及由此滋长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是难以想象的，还不是“党天下”，是难以想象的。1200万党员，如果百分之一的人犯了“三大主义”，就是12万人，这12万人在全国各部门起决定作用，对天下大事关系重大。因此他说他竭诚地拥护党的整风，但是只依靠多少年一次的整风不是够的。他认为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用来联系群众的杠杆、传导带，实际上是工具，完全被动，不可能发生主观能动性。要改进弱点和阴暗面，必须使党进行领导时所应用的环节（原文如此编者注），发挥主观能动性。他说他认为毛主席已经这样做。“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不是传送带，他认为这已经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又说，毛主席想的这办法，时间还短促，还需要更进一步推动。如果真正“鸣”“放”，真正“互相监督”，这就能使党员经常洗脸。

陈新桂说，归根结底，就是扩大民主问题。

（原载《光明日报》1957年6月8日、6月11日）

宪法有的被彻底破坏，有的有名无实

顾执中

宪法所规定的条文，有些是有名无实，有些被破坏而没有受到制止。例如宪法第85条规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实际许多现象却不是这样。第89条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法院决定或检察院批准不得逮捕，而肃反时的行动证明这一条文完全被破坏了。第87条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例如有些批评人民日报的文章，至今仍没有被登出。报社只登风平浪静的东西，揭露人民内部矛盾稍微联系到某些人物、部长等便不予发表 动会结社的自由更少，许多人民团体几乎都是官方包办。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党派？宪法没说不行，但事实却没有人敢大胆地做。第94条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但高教部和教育部却在叫请大家原谅，说因为学校少，生育没有节制，人太多了，不能人人入学，这样宪法也被破坏了。

宪法自1954年通过以后，有的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也很少有人执行宪法中所规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集中制。大家都把宪法当作一张纸，通过后也就算了。想当年，在讨论宪法草案的时候，大家都愿为保护宪法而斗争，现在从刘委员长到一般公民谁也不提保护宪法了。这样下去，把宪法当成了手纸，乱关人、乱捕人、拆信等等，都可以为所欲为，将来何堪设想！？

中宣部的宗派主义情绪很浓厚，解放后对老新闻工作人员很少照顾或者没有照顾。解放后仍允许续办的一些报纸如文汇、新民等报也没有得到政府的照顾，让非党的报纸自生自灭。党报与非党报、党报记者与非党报记者的待遇都不同，非党报记者采访时受到轻视，许多的机关还不让他们去采访。

解放前有许多通讯社，现在名义上有两家——中国新闻社和新华社，实际国内新闻只有新华社一家，包办了全国的消息，肚子吃得太饱撑不下。

我建议： 一、 民主党派宣传方面的负责者应该参加中宣部的宣传会议 顿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不是句假话，即使不参加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也应该让我们知道会议情况。

二、新华社应像塔斯社、路透社等那样，成为国际性的通讯社，国内则开放让民主党派、团体、地方办通讯社。

参加了许多座谈会，感觉有两种偏差：群众有些左，人民日报又有些右。在过去运动中受到整的，虽然知道大“鸣”大“放”不应越出拥护共产党和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轨道，但在讲话时，控制不住感情，不免有越出轨道的地方。

民主党派成员讲话很苦，稍微讲得厉害点，报纸上便批评，和风细雨一点，又会挨骂，所以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很难做到恰如其分。

储安平的发言，意思可能是好的，但用词不当，有刺激性，建议九三学社领导加以讨论，以免起混乱。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6日）

党不应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

黄绍湝

?

黄绍竑首先就党政关系问题也就是领导的方法问题发言，他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需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的坚强的领导，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有人怀疑党的领导权问题，那就与宪法的规定违背了。但是，领导方法是可以研究的。

黄绍竑说：我所以提党政关系问题，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而是领导方法问题。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各地方或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直接处理案件，如党和政府共同发布决定而没有把党对各级党委的指示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指示分开来，这样就可能导致人们或某些党员认为党的领导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他希望在整风中对党政的关系检查一下，并且明确地把它规定下来。

“整风好比洗澡、法制好比洗脸”

“兼职本身就是官僚主义”

“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可否专职专业？”

第二个问题，黄绍竑谈整风与法律制度问题，他说我把整风好比洗澡，法律制度好比洗脸，洗澡可以几天洗一次，或个把、几个月洗一次，但洗脸必须每天洗一次或者两次。整风固然需要，而建立法律制度同样是需要的，光是整风而不建立法律制度就无法永久保持整风的效果。

黄绍竑还谈到：在制度上要注意哪些问题，他首先谈了兼职问题，他说：兼职本身就是官僚主义（除法律规定者外），希望把这个问题检查一下，比如人大常委、政协常委是否可以成为专业专职呢？是值得研究的。我以为如果成为专业专职，工作可能做得好些，有人说：党派的

领导人不能不兼，如果这样说法的话，毛主席要兼多少职务呢？我以为在两个常委内，各党都有一定的员额就得了，何必限于那几个领导人呢？其次，他说：重视已有制度，就我经常参加的人大常委和法委会来说，到会人数往往仅到达法定人数的边缘，其中，我估计了一下，共产党员缺额的比较多，尽管是因为兼职多、工作忙，但是，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来看，是会令人引起不重视的感觉的，是不是有人觉得问题已经在党内决定了，常委会不过是形式的通过而已。

在立法上究竟制定哪些法律呢？黄绍竑认为：我们的立法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的，刑法、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经济方面的法规更不完备，五年计划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条例还没有制定，有人说：苏联某些法律也制定得很迟，我们何必着急？我以为苏联好多先进经验，我们一定要学，但是，这样也算做先进经验吗？也值得学吗？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为什么不快做呢？这样说法无非是为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做辩护。黄绍竑认为公务员惩戒法和各机关的组织条例办事规则是与整风最有密切关系的法规，必须早日制定，前几天，好多人提出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问题，如果这些法规完备了，不但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问题可以解决，党政的关系也可以分得清楚，搞得更好。此外，应该注意那些过去因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而致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重大损失的负责人，如果不及时处理，并向人民作交代，就无异给整风运动带来一个极大的讽刺。

“‘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成公式，我认为这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

关于以往成绩的宣传问题，黄绍竑认为：“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

已经成为工作报告中的一种公式，任何工作报告都套上这个公式，我认为这样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造成更多错误的危险，个别错误即仅仅是百分之二三，也不能用百分之九十七八的成绩来掩护它，忽视它。就司法方面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就国家经济建设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不知要造成多少亿元国家的财政损失，而人民间接的损失也是可观的。我觉得宣扬成绩、夸耀成绩、掩护错误、忽视错误都是官僚主义的作风，也是铺张浪费的来源。成绩说得保守一些，错误、偏差放在成绩的前面，并不等于掩没了成绩，而是成绩更加可靠，更加巩固，是有后备力量的成绩。人民对于政府的成绩是心中有数的，不强调的说，他们

也会知道，说得有一点漏洞，一点不确实，他们也会知道的，强调的说，并不增加他们的信仰，稍微有一两点不确实，就会减少他们好几分的信仰。

最后，黄绍竑谈了两个具体问题。他认为①受劳动教养的据说有两万人，大多数是机关干部、知识分子，他们既够不上刑事犯罪，已经劳动教养了一年多，应该定出一个整个的解决办法，不宜拖下去。②解放时期，有些国民党人倾向革命，为奔走和平或参加工作多少出了一些力，但因历史的关系被怀疑判了重罪，希望彻底检查无辜、平反，历史上有罪的也应酌情处理。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重申赎买20年的主张

李康年

我是上海工商业者公私合营鸿兴织造厂董事长，中国钟表厂总经理，萃众织造厂经理李康年，就是最近报上标题所谓“定息20年”或者“赎买20年”的建议者。

“三个建议”

我提出了三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我主张请政府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22亿元，收回资本家所拥有的股票或合伙议据，使资本家与企业脱离关系。存单每年到期四次， 每季到期2750万元，除1956、1957两年已发2．2亿元外，对资本家只发19．8亿元，多余2．2亿元，作为对资方代理人、董监事与需要照顾的资产阶级分子，给予一次酬劳或慰籍金，如再有余额，即拨交全国工商联，作为私方生活互助基金。

前项工作，拟请指令交通银行办理，有不愿得此项赎买存单者，得听其自便，交通银行得代为暂时保存，或按赎买存单应得人之意旨，代为捐献，或转赠他人，或缴纳国库。

赎买存单应得人既已放弃赎买存单，即是放弃剥削之表现，应得人于取得捐献收据，或缴纳国库之凭证后，即可将此收据或凭证，作为放弃剥削之凭证，而向工会争取入会，争取劳保待遇，经工会审查核准，给与工会会员证后，资产阶级帽子，即已摘去了。如上述建议不能采取，则请研究第二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请政府指令交通银行，增辟信托部，代民族资产阶级保管股票，出席股东会，董事会，代收股息红利定息，代办储蓄投资或建造房屋，或代为捐献转赠他人，或缴纳国库，按如上所述，摘去资产阶级帽子。上述建议如再不能采用，则请研究第三个建议。

第三个建议请政府指令交通银行增加代领定息业务，同时亦得代管股票，及储蓄投资，或建造房屋，或代为转赠捐献，或缴纳国库。按以上所述摘去资产阶级的帽子。

此外如资方家属的劳动就业，应责成劳动部门及专业公司妥为安排，在赎买存单发行基本上完成后，国内公私合营企业一律改为国营私方人员职务，即蜕变而为公家职位，公私关系既已基本消灭，此时资产阶级分子手中，只多了一些赎买存单，其性质与国家公债大同小异，期限且较公债为长，大多数人已经必须自食其力了，与劳动人民距离更近了阶级基本消灭了剥削基本消灭了，赎买政策基本完成了，工商业企业改造基本完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已完全成为全民所有了。

自从我的建议书提出后，所受到的，多半是无理的谩骂，而得不到真理的帮助与批评。这一次到京以后，读了千家驹同志的发言，他是中央经济理论权威，也是我们工商界行政管理领导，他谈到了李康年主张定息20年就是消极性的表现，定息20年除了想吃剥削饭一辈子的思想以外，同时还包括一个对赎买政策认识错误的问题。对这，我不得不提出一些意见与他商榷。

我的答复是：我没有想吃剥削饭一辈子的思想。我今年60岁了，难道我一定能活到80岁么，孩子们多已大学毕业做医生了，他们也不会要的，况且我的定息每月不过二三百元，目前都已买公债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难，何必要计较这些呢，千家驹同志认为我想一辈子吃剥削饭未免武断。

“我建议的根据是《人民日报》的社论”

至于我建议赎买存单年期分20年，赎买金额应为人民币22亿元，定息两字应该更正，我是有根据而不是捏造的。当全行业合营前夕，1955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的社论。这篇文章，我认为是党和国家对赎买政策的方针，亦是党和国家对工商业者昭示了赎买政策的信条。

第一段“我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变革，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说明大约需要15年之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第五段第一节“对于我国工人阶级说来，最适当的正是向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并且不是一下子赎买，而是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逐渐赎买。”“分给资本家的不足四分之一的股息红利，资本家所得，看来不算很多，但是就全国统计，一年就有几亿人民币，积十几年之久，就有人民币几十亿之多，用来作为购买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代

价，是完全足够的了”，这说明国家将几十亿人民币，来购买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

第五段第二节“赎买是对物的，即赎买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除这以外，还有一个对人的问题，即对资本家进行教育改造，适当地安排他们的工作等等的问题”。

这说明赎买是专对生产资料的，至于对资本家教育改造安排乃是另一回事。这是对人的和平改造。

从此可以见得党和政府，在事先是有准备，即是需要15年之期，用几十亿人民币，来购买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的。党和政府采取这个和平改造的方针，是从1949年立国之初就确定了的，这个道路是和平的，倘然客观需要，再拖一个尾巴，也是未尝不可的。如果15年再拖一个尾巴，岂不是20年吗？我的建议与党和政府原定计划步骤相对照，恐怕不是相距太远吧，恐怕不是无的放矢？

“不同意千家驹的意见”

一、千家驹同志说，赎买不要算细账，何以他还认为应从1949年算起呢，算了有什么作用呢？

二、倘然要算细账，1949年到1962年并不是14年而是14年不足。

三、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和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即四马分肥办法）都是赎买，此说没有根据。

四、他说14年中（实际上到目前只有八年）企业收回的赎金，有的超过，有的刚好，有的不到，不外这三种情况，这些话完全是凭主观的理想而毫无调查资料。

据我所知，还有资本被虚盈实税因而亏本的，（千家驹同志发言第一节中所说的）还有资本被阶级斗争因而损失的，还有资本被五反退款因而短少的，有的虚盈实亏，有的资负倒挂，有的资本蚀光，有的生活资料亦已卖光，也有因周转不灵而增资的，这些岂不是客观的存在吗。

五、他说工商业者应该认识赎买是国家对他们进行改造的一种安排，也在于使他们安心改造，我觉得他把和平改造方针的内容混淆起来了，因为和平改造方针有二个内容，一，对物（生产资料）——赎买

（利用、限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生产机构。二，对人（资本家）——教育（生活、思想、安排）——成为社会主义劳动人民。两者之间虽互相关连，而各有区别，他说赎买是对他们进行改造的一种安排，似觉不可理解。

六、无论赎买也好，购买也好，这是不是一种合理措施呢，如果说是合理措施，则资本家既将生产资料交出而政府说并不是欠他之债非还不可。这成什么话呢。这是丢却赎买意义了。

七、他说赎买如认为国家欠了他们债则定息七年是国家揩了65%的油，占了便宜，这不仅不符事实，并且对工商界说来也等于白白学习，这不是破资本主义而是立资本主义。我说，我扣了这顶立资本主义的帽子实在有些冤枉，请问毛主席所谓不是半赎买半没收之说，作如何理解。

八、 千家驹同志说赎买应自1949年算起，兹查毛主席于1956年1月25日下午召集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时说，在过去的六年中，前三年的工作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前一革命阶段中没有完成的各项社会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从去年（1955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的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可见得社会主义改造是1955年夏季以来开始的1955年夏季以前，至多说是准备时期，更说不到是赎买开始时期。

九、根据毛主席说开国以后的三年中，是恢复国民经济时期，可见得决不是赎买时期。

十、开国之初，是增加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时期，所谓劳资，即是私营企业内部组织，当时还谈不到赎买政策。

十一、 共同纲领订立于1949年9月29日，其第三条还是保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还没有赎买字样。

十二、共同纲领的经济政策，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各种社会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如果说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已在开始赎买之中，未免太矛盾了。

十三、1949年并未进行清产核资，财产数字无法估计，如照资本家账册记载，他们是随意编造，各自一套，绝无标准，殊不足凭。

十四、财产重估是1950年进行的，当时估价是仅凭私方主观进行的，并无工人阶级参加，不足为凭，且币制还是旧人民币。

十五、主张赎卖开始是1949年者，无非欲减少赎买金额，兼可减少定息数字，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因为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高涨，财产数字是最高的一年。

十六、五反是1952年举行的，当时退款数字之大，殊足惊人，这种退款数字，都是在资产项下减除的，这时国家定息之支出，是有好处的，如果强调赎买开始在1952年以前，是没有好处的。

十七、如果赎买确定为1949年开始，则八年以来所开新厂新店怎么办呢？其问题有工人阶级劳动所得而由政府鼓励他们创办的，又将怎么办呢？

十八、如果赎买确定为1949年开始，则目前正在讨论的工龄问题，何以强调应为1956年开始呢？

“赎买应从定息起付之日算起”

所以我主张无论老合营或全行业合营，一律以定息起付之日为赎买开始之时，财产数字一律以清产核资时所核定的数字为准，质之千家驹同志以为何如。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6日）

我们对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

黄药眠

（草案初稿）

目前高等学校中存在有好些问题，问题之所以产生，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一、有许多党员同志对于党中央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认识不足。

二、有许多党员同志没有掌握到学术机关的特点。错误地把它和一般的政权机关等同起来。

三、有许多党员同志的民主作风不够，高等学校中的重大措施很少和群众商量，甚至有些人错误地以为一切由党包办，才算是实现党的领导。

四、有些党员同志没有充分认识到知识技术力量在近代国家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五、有些党员同志对于目前要办好高等学校，究竟应该依靠谁，没有明确的认识。

除了这些有关思想认识的原因之外，学校的领导机构也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

在解放初期，各高等学校是用校务委员会来执行领导的。后来学习苏联，采取了一长负责制（实际上也并没有执行过）。党“八大”以后又改为党委负责制。最近人们对于党委负责制表示了不少意见。但究竟什么是学校的党委负责制，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党中央对这方面的具体规定，　　比方党委负责制和普通机关里的“党组”有什么区别，它和校长、校务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如何？在系里面，党总支书记（党总支书记常常是兼系秘书）和系主任之间关系如何？我们也很难说出一个轮廓，既然对于这个制度，我们没有研究，因此我们就很难对它表示意见。

不过就目前的领导机构的情况看，的确已经显露出好些毛病，如严重的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的现象，如校务会议流于形式，如非党干部有职无权，如教授的教权受到多方面的限制难于发挥积极性，如群众意见

很难通过一定组织系统反映上去，发挥监督作用，如系秘书实际上领导系主任，如在教师中占相当大比重的民主党派，直到现在还没有一定的地位等等。

为改正以上缺点，我们仅提出以下几点有关高等学校领导机构的意见，请领导上加以研究和考虑。

领导方针和意见：

我们不同意党和民主党派退出学校，或在学校内停止党、团、民主党派活动和民主党派的成员不以党派的资格在学校内活动的说法。我们认为这和今天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总方针是不相符的，和各民主党派健全各基层组织的精神也是不相符的，相反，我们认为学校的党正应加强领导，民主党派正应加强活动。

我们也不同意“教授治校”的说法。在过去反动统治时代，教授治校可以抵制反动派向高等学校的侵入。今天的形势显然已和以前有显著的不同，教授治校的提法，颇有和党的领导对立的意味，再从教授治校作为制度本身来看，也是不够妥当的。

一、因为大多数教授所关心的是有关教学和学术研究的问题，对于行政事务未必感到兴趣，即使少数人有此兴趣，那也只能做到少数教授治校，并不是教授治校。

二、教授是高等学校的学术中心，但学校是一个整体，如果强调教授治校，则有可能把广大的讲师、助教、职工和学生群众的利益都忽视了。

因此我们的总的意思是：

（一）加强党在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领导。党内党外的思想政治工作贯彻党的文教政策，党组作为全校领导的核心。

（二）设立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行政最高领导机构，它的中心任务是教学和学术领导。

（三）设立行政委员会处理学校行政事务，以便更好为教学和学术研究服务。

（四）在校务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之外，另外设立各种委员会，广泛的吸引教职员工参加协助各有关单位工作。

总的精神就是在党领导下实行民主办校。

现在把以上四点，分别扼要叙述如下：一、关于党的领导方面：

（一）党应抓以下四种工作：①加强政治思想教育；②贯彻党的方针政策；③党的建设工作；④动员党团员起带头、保证作用。

（二）党委或党组对学校内的工作只作一般原则的规定，关于具体的工作应分别交由校务委员会和行政会议去作详细讨论。

（三）党通过党组织保证党的方针政策能在校务委员会和行政会议中贯彻下去，但贯彻的时候必须注意灵活性和伸缩性，要耐心地用道理来说服人，不应强制执行。

（四）党委或党组织在讨论学校工作时，可以约请群众列席参加。

（五）党委负责人应抽出一定时间学习一门业务，慢慢作到由外行变成内行。

（六）党委必须规定出一种制度，指定负责人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无党派人士定期（假定每一个季度一次）举行联席会议，听取各方面意见。如遇有重大事件、重大变革或措施可以召集临时会议。

（七）党委必须规定出一种制度，指定负责人和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定期举行碰头会，互相交换意见和批评。

二、关于校务委员会：

（一）校务委员会是学校的最高领导机关，它的成员包括教务方面的负责人，系主任，教授副教授的代表，讲师、助教的代表，教授副教授应在校务委员会占多数（综合大学如校务委员会的成员太多则可以考虑过去分成文学院、理学院的办法）。

（二）校务委员会应重点抓有关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制度和人事问题，如学术研究计划，教学计划，如教师的聘请、升级、留学生的选拔等。

（三）一般行政事务工作，交由学校的行政会去讨论。但其中比较重大的项目，如预算、决算，如基建，如重要的人事变动等，都必须交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如遇到比较重大和复杂的问题，校务委员会可定若干人组成审查委员会加以审查研究，审查委员会向校务委员会提出审查报告，然后再由校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审查委员会，在审查过程中，有权向主管部门调集有关资料，或请该部门的负责人出席解释或陈述意见。

（四）校务委员会在制定规章制度的时候，党的负责同志应把党的政策方针加以说明，并陈述意见加以对论，如遇重大问题，校务委员会可以推选若干人（必要时还可以指定若干校务委员会以外的专家）组成委员会详细研究各方面的有关资料，征询各方面的意见，拟定草案，提交校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必须避免一切规章制度都由党委会决定交由校务委员会形式主义地通过的办法）（五）学校的各种委员会的委员，在校务委员会讨论到与该委员会有关的某一部门的工作时，应有权出席听取该部门负责人报告，而委员会则应对报告提出批评建议或陈述意见。

（六）学校内的一切措施和重要人事变动，必须经过校务委员会的通过才能发生法律效果，校务委员会的决定交由校长负责执行。

（七）党的校长或副校长对于校务委员会的决议，持不同意见，他可以有否决权，但如这个决议第二次再被通过的时候，则决议必须执行。

（八）少数人对校务委员会的决定持不同意见时，除执行决定外，他们有权向上级陈述意见，但不得向外宣传。

（九）校务委员会应设置秘书若干人（可和校长办公室联合办公），专门负责和各校务委员联络，及处理学校各部门向校务委员会提出来的批评和建议。

三、关于学校行政会议：

（一）行政会议归校务委员会领导，有关学校重大措施的决定，必须经校务委员会批准才能发生法律效果。

（二）行政会议的成员，除学校的行政负责人外，应广泛吸收教职员工参加，参加者不应由上面指定，而应分别由各部门的群众选举。

（三）校长或副校长为行政会议的当然主席。

（四）行政会议应着重于带有全校性的问题的讨论，并作出决定。各部门的负责人向行政会议提出报告。行政会议如认为问题比较大或者复杂需要研究，就可指定行政会议的成员或会外的专家组织临时委员会加以审查，临时委员会应负责向行政会议提出审查报告和建议。在审查过程中，临时委员会有权向主管部门调集有关资料，并请该部门的负责人出席解释或陈述意见。

（五）行政会议应将会议时间及议题事先通知各校务委员会的委员，校务委员会有权随时出席听取某部门的报告。

（六）学校各部门的工会，如对于某一工作有意见时，它可以通知行政会议，在讨论该问题的时候派代表出席，提出批评、建议和陈述意见。

（七）学校的各种委员会在行政会议讨论到与该委员会有关的某一部门的工作时，该委员会的委员应有权出席听取该部门负责人的报告，并提出批评建议和陈述意见。

四、各种委员会：

为了吸收各方面的工作同志共同办好学校；因此在校委员会和行政会议之外应视各校的客观需要设立各种委员会，目前至少可以设置以下几种委员会：财务委员会

人事管理委员会

图书设备委员会

基本建设委员会

（一）各委员会的任务是经常向有关部门反映群众的意见，并向它们提出质问、批评和建议。

（二）委员会的成员由群众选举由校长批准聘任。

（三）学校的行政部门应和有关的委员会取得紧密联系，并经常向他们报告工作。而委员会的委员则有权向有关行政部门了解情况并调集必要的资料（保密文件的阅读，另作适当的规定）。

（四）各委员会除直接向有关行政部门提出质讯、批评和建议以外，可以直接向党委（或党组）、校务委员会提出有关工作的批评和意见。

（五）图书设备委员会和基本建设委员会应有学生代表列席参加。

（六）各委员会对党委、校务委员会和有关工作单位的批评和意见，党委会、校务委员会和有关工作单位应负责答复，不能置之不理。

五、附注：

高等学校的教师，他的主要任务是搞好研究工作和搞好教学，不宜负担过重行政事务工作。因此教学工作者，无论是参加校务委员会、行政会议或各种委员会，都以一人一职为宜，而且每二年改选一次，这样可以使每个人都有分负一部分行政责任的机会，至于在学校外面负担有社会工作的同志，则最好不要让他再在校内分担行政工作。

本文件只是对目前高等学校的领导机构提一些基本性的意见，至于校长与校务委员会之间，校务委员会与行政会议之间，究竟应建立怎样的关系，这应该看学校的专业性质、学校的历史传统等等具体条件来决定，我们不可能作出很详细的建议，也不可能作出对任何学校都能适用的建议。

（原载《师大教学》1956年7月18日第161期）

我的看法

黄药眠

旧一代的知识分子是从旧世界来的。他们在旧世界里都曾经走过一长段的旅程。

但是由于各人所经历的旅程不同，所以他们的衣襟上都染上有不同的酒痕和不同的尘土。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对于今天新时代的看法也就不免各个从其所已经经历过的旅程去加以衡量和比较。

费孝通同志说现在正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个说法，我认为也是有一部分理由，而且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见解。但在我个人看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就已经是春天，这并不是我有意要来唱反调。这只能说我有我的一番经历。当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时候，我只是半个流浪汉半个知识分子，生活像是被一条丝线悬在空中，门口时常有不尴不尬的生面孔出现，窗口的短墙外，时常有人露出一个头来在探视，走路的时候，也时常提防着后面有什么人跟踪。至于摇笔为文，既不能成为文豪，徘徊在大学的门墙外边，也只能作一个墙外的行人，向往于墙内的佳人的唉声。到了全国解放，眼看全国人民都获得解放，反动的国民党统治被推翻，在中国飞扬跋扈百多年的帝国主义势力从中国大陆被赶走，我就不禁大乐。而我个人则竟然有机会追随在许多专门学者后面做一名小小的知识分子，有机会摸摸书本，这比我过去，有时在寒风割面的深夜里踯躅在街头的情况，的确是温暖得多了。所以我说，从那时起，就是春天。

当然，春天也还不免有一二次的春寒，或者是一夜东风不知吹散了落红多少，或者甚至个人也还不免有一个时期的“伤春”的情绪，但春天究竟还是春天。可惋惜的只是我不能像梅花最先传达出春天的消息。

至于目前知识分子所苦恼的问题我认为也是多种多样的。从绝大多数的人看来，六分之五的研究时间是得到了保证了。这些人当中有些人的确是在埋头研究，有些人则在很紧张地备课。今天的学生，更能独立思考了，提出来的问题是很多的。争鸣当然很好，但争鸣也得有资本。钻研业务的精神是提高了。可是他们的社会活动都是很少的。有些人则又因为没有得到什么政治待遇，特别是一些过去曾经在学术上有一定地位的，或在过去曾经活跃过一时的人物，抚今追昔，又未免有点寂寞之

感。以上两种人，问题都不是在于如何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而是如何更好地利用六分之五的时间来搞好研究和教学的工作，和如何更好利用六分之一的时间来进行政治学习和做些社会活动。也就是说，问题不是政治太多，而是政治太少了。

的确也有些人，社会活动太多，侵犯了他的六分之五的学术研究的时间。这种人，其实并不多，但也是容易嚷，而且他们的嚷也最容易被人听见。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人的确可以多做一些研究工作，而他自己也是愿意沉下心来做些研究工作的。但也有些人不过只是嚷嚷，而其实正是“乐此不疲”，真的要他少出来活动，他可要惶惶然起来了。但也不能说，他们这种嚷就都是假的，不，它还是有几分真情。不过这只是偶尔抒情，或者老朋友面前，偶然表示一下对于过去摩娑过许多时日的旧业的怀恋。如果把这些嚷就看成是他们的主导思想，这也许未免太天真一些。

有一位做知识分子工作的青年，曾和我说过，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真的不容易搞，把你们的名字放上去请你来开会吧，你又说，我哪有时间来陪你们开会，如果不把你的名字放上去吧，有朝一日，名单在报上发表出来，你一看见大名没有在报上登出，又会大发牢骚，说某某都有名，我的名字谁给除去的？总之像是纹纹柴，很难摸清它的纹路。这些话，我认为也是真的。以上两种人，尽管社会活动很多，但是不是可以说，他们的政治太多了呢？我看还不是。因为他们是不是真的对于政治科学有深刻的研究呢？对于政治艺术有很好的修养呢？对国计民生有十分关切的心情、对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呢？我看还没有。他们有些人，好像是名贵的花，被人十分小心地保护着 访而久之，也就自己觉得真是名贵的花，而有些儿飘飘然起来了。我看以后也有必要让他们学习学习。

总的说来，知识分子目前的政治积极性的潜力还远没有充分发挥。今后随着民主生活的日益充实，大家有更多机会说话，情况是会一天天好起来的。问题是需要领导和帮助。诱导人们向前看。此外，如果能再把社会活动过少的和社会活动过多的人加以适当的调整，使小提琴固然有机会鸣，就是轰然作响的大鼓也可以有机会响，典雅的竖琴也有机会来丁冬几声，那就更好了。

知识分子总得要有知识，天下总很难找到没有知识的知识分子，或者是知识分子自甘于没有知识。知识分子，喜爱知识，喜爱自己的专业，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知识分子希望有一个书库，书库里有几本书，那也是很可以理解的，所以协助和推动他们搞好务业，是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如果说，有人想躲进书库里去就不出来了，那恐怕事实上也不可能　洞使你想“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专读圣贤书”，但是时代会来敲你的门，它会给你许多邀请。而且今天的知识分子，真的想钻进书库里去，不出来过问天下大事的人，恐怕是很少的。如果真的有人这样说，那恐怕也是出自一时的感慨。为什么？因为他总得把他所学的东西，和人民的需要对对口径。学以致用，这是我们中国的老传统。莫非今天的知识分子，不想把他的知识贡献给国家，为世所用7我想不是的。　没有不愿意他的知识发挥作用的。如果他能作出建议，而这个建议又为政府所接纳见诸实行，他一定会感到精神上莫大的安慰。

近年来知识分子之所以不大肯谈政治，主要就是有顾虑。顾虑别人说他立场不稳，说他有唯心主义。可是现在情形不同了，知识分子多发表意见的机会来了。难道知识分子不愿意把花了多年的劳动获得来的宝贵的知识，拿出来让大家品题，而甘于把它埋在心灵深处让时光送入遗忘的王国？

中国知识分子继承士大夫的传统，态度比较矜持，希望别人对他有更多的尊重，批评起来采取更委婉一些的办法，这些估计都是对的。但我不同意把今天的知识分子比成诸葛亮。当然任何比喻都是跛脚的，但这个打比，却跛得太厉害一些。因为究竟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没有成为高卧隆中的诸葛亮的可能了。他既不能收租，又不能真的卷起袖子来以“躬耕”为活，而且如果他不读许多杂志报章，如果不经常听报告，和社会各方面的人士接触，即使他有满腹经纶，又如何能了解天下大势？

所以别人对于知识分子尽可以有三顾茅庐之心，而知识分子可切不要存让别人而来三顾茅庐之意。知识分子要求别人尊重，这是好的，但知识分子，也应该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劳动，尊重别人的奋斗经验和历史。我觉得有些知识分子有时候就不够尊重别人，好像他就是天生成的诸葛亮，或者是应着天上的什么星宿下凡，命定的摇摇鹅毛扇就可以指挥如意！我们还得更多学习谦虚。

现在再就百家争鸣来谈罢。要真的争起来，就首先要求领导方面真的敢放，而且不要一放一收，或欲放还收。另外一方面，则知识分子要对于这个政策的贯彻有信心，有勇气。有许多问题过去认为早已经解决了的，实际再研究一下，还是没有解决，还可以提出来争论。而且你不

提出争论，青年同学们早就提出来争论了。所以你想不争鸣，也就不可能。为了培养争鸣的勇气，提高争鸣的质量，我认为可以多组织一些小型的读书会，小型的讨论会。小型讨论会中，可以就某些重要论文提出讨论；可以由某一个人写好文章，约几个朋友来对他的文章提提意见，可以就某些重要的学术问题，先由几个人交换意见或展开争辩。由小型的座谈会到大型的座谈会，到讲坛上的争鸣和报纸刊物上的争鸣。

“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以后，像我这样的小知识分子，所担心的就是，我能够拿出什么东西来争鸣。但过后一想，争鸣也就是学习的过程，如果我把幼稚的意见或甚至错误的意见拿出来，因而引出了层出不穷的真知灼见，那对我也是莫大的快乐。因为真理难道一定要通过我的手里获得么？真理难道一定要放在自己的荷包里才算是快乐么？无论谁把真理挖出来，真理都是人类共有的财产。既然是共有的财产，当然我也就能分享得一分光荣了。因为想通这一点，所以我的胆子也就大起来了。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0日）

由“百花齐放”所想到的

黄药眠

我认为要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首先是必须扫除思想障碍，而思想障碍中有若干是和文学现象的理解问题有关的。这里，我想就我所想到的来谈谈。

我们常常听见人们爱引用列宁的话说，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事业的一部分。

这个话是完全对的。以后我们还要继续这样做。可是我们可不能因此忘记了列宁接着在下面说的另外一些话。列宁说：“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机械地平均，标准化，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上绝对必须保证个人创造性、个人爱好的广大空间，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大空间。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着：无产阶级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和无产阶级党的事业同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

正是由于忘记了列宁后面说的那一段话，所以有些人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就硬要把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和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式地等同起来，来一个机械平均化。它们无视文学的特性。

正是由于忘记这些话，所以有些人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就硬要来一个标准化。

要以少数人的文学趣味服从多数人的文学趣味，或甚至要以多数人的文学趣味服从少数人的文学趣味。这样就抹煞了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针下个人爱好的广大原野。

甚至有些人神经过敏到如此田地，一谈到个人的艺术爱好，就说你是个人主义；一谈到幻想，就说你是唯心主义或违背现实主义；一谈到应讲求形式，就说你是形式主义。

列宁的话是说得很清楚的，人们本来不应有这种片面的理解，可是竟有人这样片面地理解，我想这不能怪列宁，也不能怪党，这只能怪这些同志对列宁的著作并没有好好学习。

人们常常爱说，文学要反映出现实的本质，反映出社会生活中人的本质。

这种说法，当然是对的。可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忘记了另外一面，即文学是要通过生活本身的形式来反映现实的，因此对于“本质”也不能了解的过于死板。

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同时又是多种关系交错着的，因此，它是丰富的、多彩的。一个人有严肃紧张的时候，也有轻松愉快的时候，有和同志们的关系，也有家人父子的关系，有表现出来的思想，也有潜伏在内心的思想。文学的描写就是要具体地反映出人的各个侧面，和人与人之间的交错着的关系，写出细节；而描写的方法也可以有正面的描写，侧面的描写，或者烘托的暗示的描写。同时描写的风格和情调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文学里面所表现的东西，是通过生活现象来表现本质，但它不限于本质，某些方面它可能比本质多些，同时某些方面又可能比本质少些。

正是由于忘记了文学是要通过生活现象本身来反映现实的，因此有些人就要求文学要按着决议案来创作，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要根据他是不是表现了本质去检查。

这样一来，作品自然就失去生活的丰富性，而人物也就失去了个性。文学不是生动的、动人的宣传，而成为了简单的说教。

这里重新温习一下列宁的话，也还是有意义的，在《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列宁说：“如果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真正的伟大艺术家，那么他至少应当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出革命底某些本质的方面来。”“某些本质的方面”，比“本质”就得生动得多了。

常常听见有人说，文艺是生活的反映，生活里面本身就有着美，作家的任务就是把生活中的这些美加以集中概括，使它比生活更高，更有典型的意义。

这当然也是对的。可是事情也还有另外的一面 洞人们的主要任务是在于改造世界。在生活实践过程中，人们不仅要认识这个世界，而且他们对于这客观世界也产生了自己的态度，即肯定的或否定的态度，爱或憎的态度，有时还有着强烈的情绪色彩。

正是由于忘记了事情的这另外一面，所以有些人把文学创作看成为

在沙滩上捡拾贝壳一样。作家的任务只是在检集生活现象并加以组织。甚至有人还把作品中所描写的故事、人物去一一加以核对。认为某某人物故事，是在现实生活里面有的，所以是现实主义的，某某人物故事是在现实生活里没有的，因此作品违反了现实主义的原则。甚至有人把“希望像早上的红霞般那么美丽”的诗句，都认为是错误的，理由是红霞是很快就会消失的，难道我们的希望是很容易消失的吗？

照这样的看法，创作就不可能有，文学是资料的搜集和堆积。照这样的看法，想像就不可能有，文学只能是已有事实的记载。

照这样的看法，作家不是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体验生活，而只能是消极地感受生活，客观世界给我们刺激一下，而我们也就认识它一下。

在这里重新温习一下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是有益处的。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论，连费尔巴哈的也包括在内，其主要缺点就在于：对于事物、现实、感性，只是在客观的形式上或是在直观的形式上去理解，而不是当作人的感性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主观地去理解。”

我认为如果对于有关文学的这些理论问题，　　能够有人出来阐发一下， 这对于“百花齐放”的方针的贯彻还是有好处的。

（原载《文艺报》1957年5月12日第6期）

解除文艺批评的百般顾虑

黄药眠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文艺界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据我看来，主要矛盾在于我们的文艺创作和广大读者的要求不相适应。我们印出来的作品，中学生读起来，大体上说还认为可以，但大学生就觉得不够味，不满足了。他们的兴趣是读外国小说。当前的迫切工作是如何着手解决这问题陡年来，存在着一种不好的风气，那就是对于名作家的作品，照例是捧。赵树理同志的《三里湾》发表以后，很多人写了文章，说好得很。康濯同志也写了一篇评论，但我看，他对自己的意见也不大有把握，使人读过以后，引起了模棱两可的印象。这种风气也影响了读者。一般说大学生本不十分喜欢中国现代作品，但你问他，他还是说好。但他所以说好，倒并不是他亲身感受到了，而是因为《文艺报》和康濯同志说好，他也就跟着说好了。其实他是抱着苏联大部头的作品在啃呢，或抱着一大堆中国的古典作品在读呢！

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不谐调。批评文章有时并没有体会出作品的味道，就来分析它的优点和缺点，有时则没有掌握住分寸，太重，因而引起了作家的轻视或不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作家如果不服气，写了个反批评，但刊物又往往以“不拟讨论”为由绝决刊载。挨了批评，不能反击，这也是造成了双方关系的恶化的原因。

在领导思想方面，对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有简单化的理论。我们的创作质量不高，和简单化的理论也不无关系。世界观指导创作，这是无可怀疑的，但世界观对创作的直接指导作用只限于作者看事物的立场观点和基本的态度方面，至于作家对于人物的心理状态、情绪等等的体验，世界观就不能直接指导。解决这个问题要靠积累生活知识，有丰富的生活体验。而根据我们很多同志的理论，仿佛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有了，就可以解决创作问题。强调思想改造，这是对的、必要的。但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事情，我们不能等到作家思想改造好了才请他们创作。而且思想改造也决不止是读几本理论书。这几年来作家们总是读了些书了，但为什么有些人还是写不出作品来？如果说，思想进步了，他就可以写出作品，那么为什么这七八年来，作家的思想进步了，而还是写不出作品呢？我认为世界观对创作的影响有一部分是间接的曲折的，可是过去我们恰恰忽略了这一点。现在又有人说，只要写出真实来，就是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这就把世界观对创作的作用看做是外加的，而没有看到世界观对创作的生动的渗透作用。领导把理论与创作之间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化，因此领导的方式就必定会是生硬的，反过来又影响了创作的发展。

作家协会的理论批评组一直是不景气的，我是成员之一。有人说我是什么干事，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有几次报上载作协文艺理论批评组开会，我就没有接到过通知。

有时候有通知，我也就来了，我是招之即来的。说到批评家的专业化问题，我是同意的。只靠业余的人，临时拉夫，产生不了质量较高的论文，也组织不成队伍。一篇作品，读一遍就写批评当然不行，至少要读二三遍，而要研究，就需要有时问，同时，批评要有一套设备，要有经常的工作。要有助手。比方现在出版物这样多，谁能够把它一一细看呢？必须有几个人坐在那里经常研究。批评也要靠集体的力量。

舒芜同志建议作家自办刊物，每个刊物自成一格，一花独放，全国合起来是个“百花园”。我看立刻全国来搞，恐怕不行，最好试办几个看看。现在的刊物多，为办而办，似亦可以考虑，每种刊物却有自己的目的、任务、性质和写作力量。

作家常常埋怨批评家给创作制定了不少清规戒律，但文艺批评所受的清规戒律何尝就少呢？几年来我写的文章很少，但就这一点点经验来说，也就不难体会到写批评文章之难！不能粗暴，不能讽刺；不能说俏皮话，要照顾到权威，要照顾到大作家，要照顾到新生力量，要照顾到领导首长，要照顾到老先生，要照顾到统战，要考虑主编的意图，要考虑苏联目前杂志上流行的意见，要考虑将来政策转变时为自己留退步。脑子里这样许多“照顾”，许多“考虑”，于是自己的主意就越来越少。文章力求委婉，力求面面俱到，力求不至惹起别人的反驳。许多重复了不知千百次的为人所熟知的大道理、大原则，也不妨假定读者有“百读不厌”的精神再来一次重复。肯定之后，必须来一个“但是”，否定之后必须来一个解释。文字上力求多加一些“在一定条件下”，“在某种程度内”等等。结果好，只有正襟危坐战战兢兢，如此这般，交卷完事。个性风格完全丢到九霄云外。以前我写文章，好不好是另一个问题，但写起来，心里有舒畅之感，现在我写文章，往往是为了完成任务，时间又催得紧，以致有些文章，连自己也不满意。

关于文艺批评，综合大家意见，我们建议以下几点：一、要有批评

的队伍，经常从事于批评工作。二、要有助手、资料，多作研究工作。三、试办一二种同人性质的文艺综合刊物，让大家比较自由的发言。这种刊物，水准可能低些，批评的权威性也没有这样大，但正因为它的影响不像机关杂志一样，因此写作的人胆子可以大些，而被批评的人，也不会因此就抬不起头来。四、批评也应该有自由，事后也不应责之过苛，因为如果责之过苛，那就只有鼓励大家都写四平八稳的文章，或者改行。五、应该鼓励作家出来写批评，写创作经验，和写对于批评的反批评。六、应该鼓励批评文章有艺术性，而且有多种多样的风格。

（原载《文艺报》1957年6月9日第9期）

在1957年5月11日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黄药眠

党员不对也对，非党员对也不对

黄药眠在谈到党与非党的关系时说，当前最重要的缺点是党与非党的关系搞得很不好。他认为，有些事党员不对也认为是对的，非党员对的也认为是不对的。党员可以一年提升三级，非党员尽管勤勤恳恳工作，三五年也不能升一级。党员犯错误关起门来在党内检讨，只要不受组织处分，依然有权在手。非党员犯错误，党组织对他很少教育、帮助，一方面任其自流，另一方面就开始对这个人作组织处理。

他说，有些学校领导人怕和教师群众见面，专门坐在办公室听党、团员的汇报，造成部分群众怕和党、团员接触。还有部分党员恃功骄傲，有特权思想，不甚读书，靠党吃饭，口谈马列主义，而不肯刻苦钻研。他说这次整风实在是十分必要的。

黄药眠还对统战部的工作提出了批评。他说，统战部接触面不广，过去大家对统战部批评过，统战部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评，但批评以后依然未改，颇有“诚恳接受，坚决不改”的神气。其次，统战政策到了省级就很难推动。有些党员对于统战政策根本不了解或者了解得很庸俗。第三、统战部对民主党派的专职干部缺少关心，缺乏教育、培养、提升的整套计划，没有给予他们一定的地位。黄药眠建议：（一）现在形势改变了，许多过去的做法都应该加以重新考虑；（二）共产党内要加强对统战政策的宣传和学习，同时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应定出一套制度和办法加以保证；（三）有些机关单位，如文化教育部门应把行政领导放在共产党的与非党的负责人组成的行政会议上；（四）各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在各机关单位应有一定的地位；（五）在党所指示的方针下，党与非党应站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竞赛，有功则赏，有过则罚，有能力的应升迁，无能力的、不称职的应降级。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2日）

在1957年6月5日中文系教职员第三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黄药眠

一、黄药眠认为：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是不正确的，总是把知识分子当成异己分子

我有的意见已和方铭谈了，但是大家要我谈，我谈谈。我来师大，是决心教书的，而没想做行政工作。系主任也很难做，有些朋友做部长也难，有的作了七年副部长在部务会议上没有发过言。

我自到北京后，很满意，不满的就是叫我当了系主任，有职无权而拿人当玩具玩一玩。

先来谈一下，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是不正确的。解放后丁浩川同志来校首先抓青年的思想工作，搞运动这是对的，“三反”后还继续这样做我认为不对。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它本身没有物质基础没有生产工具。中国的知识分子更特别，虽然绝大多数受资产阶级教育，但因为它受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压迫也想工业化。譬如欧洲国家的工业发达，而当时中国没有工业，学什么工程、医生、会计等都没有出路，尤其是外国人在中国有特殊待遇，譬如清华大学同是教师外国人的待遇就高，中国人的待遇就低，待遇差别，使心里不服，这样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具有爱国主义的思想，所以在民主革命阶段是革命力量，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毛主席估计，知识分子已经或可能在党的领导下，故属社会主义的力量。

知识分子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它有其落后一面，但他受的资产阶级影响，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深，易接受党的领导。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有两个面，可以跟社会主义走，利益没有受损害，可以在政治上倾向社会主义。只是与社会主义思想有矛盾。中国要工业化了，知识分子不得不与工人阶级结合。知识分子应做为社会阶层，不应做为阶级，不应一开口就是知识分子是小资产阶级。我们许多同志根本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

另外，在知识分子中也分许多层：有出洋的，有流浪汉，还有中学教师，小学教师，小艺术家，虽然他们有的过去为国民党服务，但很多人生活是贫苦的，他们和一般的人不同，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的急进主

义。

中国共产党有最高的和最低的纲领，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能搞民主运动，到了社会主义他们也不会再依靠地主、资产阶级，而一定会依靠工人阶级。比如茅盾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帮助党搞民主运动，他不知道要走社会主义吗？到社会主义还是可以信任的。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知识分子也在发展，对知识分子要现实的考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不得不向对立的方面转化。不要死记住列宁的个别词句，如念经一样，一提到知识分子就有“对抗情绪”，就是小资产阶级。总是把知识分子当成异己分子。党过去没有考虑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也没有从每个知识分子本身的思想发展去看问题，首先，看政治上的态度如何，这是造成“墙”“沟”的原因。

斯大林同志虽然犯过错误，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还是敏感的，1931年他曾经指出知识分子变了，我们应当改变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我们一些党员同志应该很好的学习一下他这。篇文章。

有些人认为自己是党员了，觉悟就高了，但我认为根本是低能的，是没有政治头脑。

二、黄药眠认为：现在是用做官带兵的办法来办学校，把老先生看成满身都是缺点，什么都依靠年轻人，而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又很差

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的，是用笔的都是秀才，办学校不是打仗，不能用带兵的方法，它也不是政权机关，不能用法律办事。但我们学校里神秘气十足，什么都保密，又不是炮台、仓库，我们学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公开呢，外边有些事情我知道了，在学校里的倒不能知道。

学校是传授知识的，知识有阶级性，而有些知识本身没有什么阶级性，对科学的看法是有阶级性的，教书先生是靠知识吃饭，而不是看级别。评薪时，我一开始就说我评的太高。政治地位可以提，学术地位是靠本事不能硬提。地位提高了也没用。如果人家叫我当作家协会的主席，我就不敢当，因为没有那个能力，人家也不服。评级也应这样。但是我们学校的评级却是用政治力量来提高学术地位，认为好的就一路提上去，这是用作官的办法来办学校，学校应以学术为基础。

党在学校中的工作对象是什么？木匠的对象是木头，在学校里是知

识分子。对年轻人应当教育，老先生年纪大应当鼓励他们的积极性，说服和批评他们的落后性，而我们的党是否研究了这些问题呢？对象的特点是什么呢？

现在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如何呢？学生对人处世的态度怎么样呢？虽然比过去有进步我看是很差的，思想教育工作很差。现在青年是不是敢于斗争呢？有些人话不敢说了，因为怕妨碍入党，这是与马列主义不合的。认为入党对自己有利，进党有好多好处。带着这种思想往党里爬，爬进去可以留助教，可以留学，这叫什么无产阶级教育？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这种思想是相当普遍的，有的同学很能说，但是真正做起事来是不能吃苦的，几年来，思想教育显然是放松了，这是教育的失败。

过去对老先生的看法也是不正确的，认为他们满身都是缺点，什么事情都依靠年青人，这是不成的。在10年内，主要应依靠老先生传授知识，钱俊瑞说过用革命办法培养，留校一年就上台，武兆吉就是这样，我还得了奖！这靠得住吗？应该靠老先生。当然苏联专家也可以依靠一部分，但不能全部依靠苏联专家，过去对苏联专家的估计也是有问题的，认为他们万能，在这里我要质问：我们中文系请了二位苏联专家，办了这样一个一百多人的苏联文学研究班，现在成了灾难了，这是谁干的事，是谁教他们来的？盲目冒进！中文系办苏联文学进修班，人来的越多越好，一下来了一百多学生，连小孩子也能算出全国需要多少苏联文学教师。认为专家什么都知道，是万能，究竟是什么专家？我们了解不够。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但不是共产党所有的，我们应当对人民负责。

依靠老先生这一点学校是不明确的，我认为在5年、10年以内还得依靠老先生。

不明确这一点就搞不好工作。青年助教一年开课这是靠不住的，现在又提倡独立思考，但我认为独立思考要有知识，没有知识那就是胡思乱想。应该刻苦钻研，但是却不懂外文，不会看古书。知识分子有一个长处，听你说几句就知你在行不在行，不要不懂装懂，这是头脑发昏，一讲到知识分子就是满身缺点。

三、黄药眠认为：近年来党的纪律废弛，袒护落后，把劳动不好，没有学术的人摆在高高的位置上近年来党的纪律废弛，　党由200多万党员发展成1200多万党员，1000多万党员并没有受到革命的锻炼，像小姐一样禁不起风。有的人有功而骄傲，还情有可原，有的人对革命没有功

也骄傲起来了，有的人像蚯蚓一样的拼命钻进党里去，他们昨天还是小资产阶级，今天一进去就好像成了百分之百的先进分子，就不是小资产阶级，这些人把朋友也都忘了，而别人也可以从小资产阶级变成工人阶级呀。举个例子，这正如在逃难时抢着过河上渡船，没上船时要人等不要开船，上了船马上叫人快开，快开！

比如外语系赵琏升为讲师，是抄袭了别人的文章，党发现后只是批评了一下，并没有把他从讲师级拉下来，这党的纪律何在？盛荃升作风不好，赵琏的作风就好吗？又如我们系秘书李秀云（党员）为什么不服从专业分配呢？这事从来没有和我讲过。做系秘书为什么不到系里来呢？我认为她是不称职的。好像是小姐少爷。

我们学校是教育机关，是传授知识的地方，但有的人不是什么好的劳动者，没有什么学术，却把他摆在高高的位置上，据说这是“阶级情感”。这不是阶级感情，不是劳动者的阶级情感，是袒护落后。工作不好的不能照顾，过去有功的要照顾，但不能永远照顾。解放已经八年了，对这些人还是要长期照顾下去，难怪有人说一些党员是凭着光荣称号吃饭的。如果这样的党员多了，党怎么前进？如何能成为先进部队？我们师大党就有这种现象，有些党员不积极也是积极的，工作能力、效果不好也是好的，这是袒护落后，是不对的。

党的领导工作作得不好，党团员中有不少的人有相当的升官发财思想，对新党员不抓紧思想教育，而尽是抓一些事务工作，不论什么科什么组，如房产科都摆上一个青年党员做领导才叫做党的领导。他们不称职却升得很快，群众不平，你工作没我好，却升得快，工作情绪就消极了。这些不称职的青年同志由于升得快，自己也飘飘然了。这样再搞下去，资产阶级思想会从内部来腐蚀你的。何书记如何也有资产阶级思想？从那儿来的？它可能在你不知不觉中溜进了你的脑中。

现在还有一些党员说为什么要群众参加整党，这是没有常识的表现，应当把党员置之群众监督之下。列宁在革命胜利以后曾领导过“清党”运动，当时每一个党员都要上台作自我检查，群众也一个个上台指出他的缺点，当时就发现一些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清除出去了。清党就是在群众监督之下进行的。

四、黄药眠对人事档案制度很不满意，说人事室不懂教学，用政治力量硬提拔干部

关于人事室的工作我非常不满意，全校留助教一定要他们来决定，他们懂什么？

只能掌握历史。我们所留的是要培养成为高等学校的师资，是我们的接班人，这需要有一定的天资和才能，研究的越高深，越能看出才能来，根本否定了这一点，就是违反巴甫洛夫学说的。我想作高尔基，但我没有那样才能，汪毓馥留下做助教，我是不同意的，她只是当过小学校长，在师大进修过一年，但彭慧一定要留下她，这就是用政治力量硬提拔的表现。这是没有好处的。李少明（党员）从中学调来，我说要升为讲师应该补一篇论文，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事室突然通知我们，他们已经决定升她为讲师了。你们的根据是什么？对他升讲师我没有意见，我认为应该有一定的手段。我们是唯物论者。有人提议蔡澈（黄先生的爱人——整理者注）当助教，我是坚决反对。关于李少明的事情我曾打电话问张斧，他说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有的意见我们提了，下次还是这样。这种事层出不穷，自以为是马列主义，这真是不知羞耻！人事室来条子派乔静贞出国的事是根据什么？据说是汪毓馥决定的。汪毓馥凭什么可以决定乔静贞出国？汪有什么本领，一个小学校长就能评定一个人出国吗？很使人愤慨！出国是要国家拿出外汇来，派出去的一个人回来要抵两个人用，如果培养出来的是废料，我们怎么对得起人民。我要求彻查，根据什么派她出国？教育系发生的左企云和孙岩的事，首长我们要尊重，为什么连首长的老婆也得尊重。我要求迅速处理这件事，如不处理，我要以人民代表的资格到人民代表大会去控诉！

49年我到师大，到53年这三四年间，在档案里关于我的坏话的材料听说有两寸厚。幸而过去我批评过胡风，以后对我的坏话就少了点。人事室对我的档案材料有很多，我要求看看，到底说了我些什么坏话，不给我看，我要通过人大常委会调这批卷宗来看，方铭说没有，也没专为我开会，工作时交谈。

党团员的汇报，部分是真实的，大部分是不真实的，有的人汇报时是迎合上级的看法，另外有的是由于青年教师受了老教师的批评，有一定的矛盾（如升级等），他们不满，抱着怀恨的心情说老先生的坏话。有的是不了解情况，曲解了老先生的话。而领导者又是高高在上，不调查不研究不找谈话，只有一个耳朵，主观、片面常常做了不正确的结论。

五、黄药眠眼中的党委负责人和中文系的党员干部我们的何副校长事实证明也是党性不强。关于李文保的事情，我曾经跟他谈了，他不处

理，关于彭慧的事我也跟他讲了，他总是敷衍了事，和他接触感到他有小市民气味。张斧碰到我，找我谈话很神气，颇有威胁之势，说我的话对，但却没实际行动，我虽不学无术，但政治感觉还是敏锐的。我们和黄教务长的接触更少，教育实习的事，他们说学生理论和实践不结合就应实习两次，这种说法证明他是外行。

我们所说的理论和实践结合是看学生对所学的东西能否融会贯通，是不是消化了，能不能与生活结合。同时，实习问题争论不休，但实习对老教师、年轻教师、学生、实习学小房竟都有些什么影响，他不去了解，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这与柳湜部长的坚持有关），就决定为两次了。

对系里面的意见，所谓“彭黄事件”本没有什么。1953年留助教，我曾提出留盛荃升，我觉得他业务很好、能思考一些问题，后来虽了解到他作风不大好，但政治上没有问题，我还是认为可以留下来。但这件事反复不定，在我去青岛前夕彭慧来找我谈，说盛的作风不好，说我泄露了留助教的秘密，说我和盛的关系不正常。

当时我很不痛快，我要求学校彻查这件事情，必要时可以隔离我们，后来听说党内批评了彭慧，党让她和我来谈，但是她说些转述班上的意见，自己没这意思，我感到很不满意。转述而不否定，就应负责任。在系里彭慧常指点我如何如何办事，像对小孩子一样，后来她还向一些人说过我的坏话。我知道。彭慧在民主革命阶段并没有什么功劳，还有一套相当完整的资产阶级思想，她判断什么都从主观出发，而不是从客观出发；不是从工作出发，而是从个人出发；不顾及到客观效果，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东北和人搞不好，在北京也和人搞不好，说我、谭丕模、王汝弼、杨占升、匡兴都不好，但这些人又都存在着，那你应怎么办呢？如果彭慧当权，我们这些人都只好一刀杀尽。实际上我们都是有优缺点的，多少能做些事情，那么就应合作。但是什么人对她不利，她就不择手段进行打击，甚至造谣。我与她虽闹得不好，但是《文艺学习》找编委时我还向周扬推荐彭慧，我不满，表现在当面，我对彭也不是一笔抹杀。彭慧还有些流氓气，有时说了话又说没说，有时痛哭流涕，有时装病。彭说李文林是为闹恋爱而装病，我也可以此心度彭之腹，你的病是否也是假的，彭慧并不是一无是处，但却有着相当完整的资产阶级思想。

彭慧同志对人的态度，对不如她的人是看不起的，对与她差不多的人也是看不起的，因为她对自己偏高，对别人偏低，对比她高的人是嫉

妒，结果只有她一个人行，只有她一个人能办中文系，只有你好，世界上有这样的事吗？如果承认我是你的老朋友的话，你就冷静的想想吧。

谭丕模先生一来，讲义马上付印，太仓促，有神秘性，一来我就觉得他是个党员，在系务会议上他常叫困难，说教研室里老先生不团结，助教不合作，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总没有办法，是不是自己作风上有毛病。我认为他是个老好人，也有人说他是个伪君子。

汪毓馥留下来做助教是不对的。解放以来有一种暴发户，一连升上来。听说儿童文学还要成立教研组叫她做秘书，我不赞成。她还做了积极分子，她们编的资料还得奖，为什么我们编的就不能得奖？这件事的过程要搞清楚，在总结会上要交代。

她这样小的年纪，就有人奉承她了，这样将来要走到什么地方去？她还不老实，比如儿童文学的研究生向我反映了一些教学问题，我问她则说“很好”。我要求了解汪毓馥革命的功绩是什么？哪年进的党？应该公布出来，不要带神秘色彩，否则我们不佩服她，不能服从她的领导。以后从校长起领导人都应当公布有什么革命功绩。

李筠这个人很朴素。但是有许多事根本不告诉我（比如肃反的问题一学生自杀的事，一直没告诉我，只是到人民代表来视察时，才跟我说了几句真话），有时他告诉我的情况是假的，有些事告诉我也是隐隐约约的，有些事是用得着我的时候才告诉我，比如老先生有矛盾时，讨论教学大纲时，迎外宾时等，自己不懂了，才告诉我，要我出主意。有的事情是已经办完了才来告诉我。我索性对他说，有事情你放手办吧，不要告诉我，因为问了我，我出了主意又不照办，我要生气的。萧主任可能积极了，每天都到学校，但我知道的事情他还不知道，如陈仲瑶调动工作的事。

这些事不能全怪李筠，这与党的整个的领导和制度有关。党委负责制到系里就更麻烦了，李筠是党总支书记，又是系主任助理，是系主任领导主任助理呢？还是主任助理领导系主任？是鸡生蛋呢还是蛋生鸡呢？

六、黄药眠说，他不愿和先生来往，和学生接近，是因为没法解决问题和怕出毛病

我自己事情多，身体不好，对先生、助教、学生接触得都很少，但

也不完全如此。我不愿和先生来往，因为我没办法给他们解决问题，比如高向夫、杨敏如先生有情绪。我知道了也难过，但也不能给他们解决。我还怕和人多往来，说我有小组织，拉拢人，想要保住系主任的江山。助教我也最好不认识，从盛荃升事情后，我不留助教在家里吃饭，怕人说我以小恩小惠收买助教，我说：“我要吃饭了，你们走吧！”。学生我也很少接近，因为我不了解他们的情况，不知道说什么好，说话又掌握不住分寸，很容易出毛病。与大家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我觉得很对不起大家。

最好让我教书，不要叫我做系主任。叫我黄主任我觉得很不相称，在美学上内容与形式绝对对立时，就成为滑稽了。有些事情要我去讲，又怕篡夺领导权，我是处在困难的地位，如学习八大文件时，有一次开会要我做主席，我依李筠的话讲了几句，会上党委委员、工会主席都不来，大家没精打采，事情是已经决定了的，只是形式上做给我和萧先生看的，这还不如打个电话通知我，说已经决定了好呢。匡兴的事彭慧非拉着我谈清楚不可，李筠来了也说了几句，弄得没有结果也就散了，好像党内意见不一致在我面前就不能谈似的，既然如此又何必把我叫来呢？这样做叫我很不愉快。我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不愿意这样的浪费掉。你不跟我统战，我教书教得很愉快，我们学校统战“统”得人很不愉快，使人心里烦燥，这样的统战还是少做的好。黄彦平同志是统战部长，汪毓馥是统战委员，但他们做了些什么工作呢？这样的统战官，要么不要挂这些头衔，要么好好做，七、黄药眠对师大整风信心不大，说“我等着瞧”

希望这次整风能真正做到有话全都说出来，有的青年说，如果我把什么话都说出来，那我就不准备入党。我对这次师大整风的信心不大，整风的结果如何，我是等着瞧。

（原载《师大教学》1957年156期）

学者的风范

——缅怀黄药眠先生

杨占升

黄药眠先生离开我们已整整一年了！这一年来，他的音容笑貌时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一种缅怀与忏悔的情感常常涌上我的心头，不管我的笔头是多么笨拙，也要记下这点点滴滴。

我第一次见到黄药眠先生是在一次座谈会上。　　大约是1949年5月间，在师大男附中的一个小教室里开了一个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座谈会，由叶丁易先生主持，参加的人不多，我们少数学生去旁听。记得黄先生和曹禺、杨晦、叶丁易等先生都讲了话。黄先生从座位上站起来发言，穿一身灰布衣服，头发花白，面孔白皙，声音柔和，显得很平静。我当时心想：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文艺理论家黄药眠！这次会后不久，叶丁易先生就让我们几个学生去黄先生住的宾馆拜望他，以学生的名义请求他来师大任教。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进了他的房间，他好像正在屋里徘徊，想什么事情，看见我们进来，漠然地站在那里，问我们有什么事。当我们说明来意后，他不动声色地说，等考虑考虑再说吧，显得很冷淡。我们像给浇了盆冷水似的，直觉得透心地凉。在回校的路上，我们几个人议论纷纷，共同的感觉是这位先生有点傲慢，不好接近。

在叶丁易先生的努力下，黄先生终于被请来了，给我们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西洋文学史，还指导我们一个小组的写作练习。他的讲课内容新鲜、条理清晰、语言简明、声调柔和悦耳，使我们第一次受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知识的教育，很快，我们就被吸引住了，对他的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上课爱提问，爱走动，爱跟年龄小的女同学开玩笑，显得活泼、生动、幽默。记得师母蔡澈先生当时在华大学习，他们结婚不久，有一次也来听黄先生讲课，坐在教室的后排。黄先生上讲台，发现我们小声谈笑，好像与他有关，他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衣裳，没有发现什么可笑之处，便奇怪地问：“你们笑什么？”我们都憋不住笑出声来，有几个同学说：“我们要吃糖！”这时他明白过来了，微笑着，习惯地用食指捂捂鼻子说：“噢！

要吃糖，那没有问题，现在先上课吧。”我们都沉浸在欢乐友爱的气

氛里，再也没有过去那种冷淡隔膜感了。

黄先生一身正气，为人坦率真诚，对学生貌严心慈，外冷内热，以他的崇高品格、精湛学识影响着哺育着我们。那时我在学生会工作，忙忙乱乱，学习抓得不紧。

大概黄先生看出了我的毛病，有一次上课时提问我："什么是典型？"我吞吞吐吐没说清楚。他当时没有说什么，下课后让我留下来，严肃地告诉我，学生干部在学习上应该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不能借口工作忙而放松学习。我羞愧地低下了头，内心充满对他的感激。在我上大学期间，还没有哪一位老师对我这样严格要求过。黄先生当时还兼管我们一个小组的写作，有一次他让我们练习写一篇人物速写。我写的是我们同屋的一位同学。他已结婚，而且有了小孩。他为人随和厚道，爱睡懒觉，大家都喜欢同他开玩笑，他也乐于同大家开心。我一向文笔笨拙，当然难以写得很像，但因为和他同窗几年，朝夕相处，还基本上写出了他招人喜爱的某些性格特征。

这一点得到了黄先生的肯定，给了高分，但他同时又严格地指出文章所存在的毛病，说我对人物身上的缺点抱着欣赏同情的态度，流露出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他的这一教导，不仅使我认识到自己思想感情上所存在的问题，还使我懂得如何去体会作品里人物的思想感情和作者的态度。我上大学时的作业练习大都丢弃了，唯独经过他认真批改的这篇作业还保留着，它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

1952年院系调整后，黄先生勉强答应，担任了北京师大中文系主任职务。不久，他把我从教务处要回系里做秘书，并担任一部分课。那时他已年届半百，社会活动甚多，报刊约稿频繁，'校内各种会议也连续不断，但他仍然坚持上课，并和钟敬文、穆木天、彭慧等先生在全国率先招收研究生，表现出一种开拓事业的精力和气魄。现在这批人已成为高校教学科研骨干，有的已担任了博士生导师。当时正是蜕旧变新的过渡时期，教育战线也处于从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的全面变革阶段。师大中文系受教育部委托，起草全国高等师范的教学计划，并负责主持制定各课的教学大纲。为此，需要同有关院小翻常联系，征求意见，工作是很繁重的。

那时系里只有教务员、办事员、工友三个人是脱产的，其余党政干部都是兼职。我不仅白天的时间全部用在行政工作上，有时连晚上的时间都得搭进去，因此备课时间没有保证，常常靠开夜车备课应急，影响

教学效果。自己深感行政工作与教学的矛盾，曾想暂时放弃教学。当我怀着不安的心情把这一想法向他吐露以后，他并没有责备我，而是给以耐心地开导，他说，只抓行政工作不搞业务，是一种短视的想法，为人民服务要有实际本领，趁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努力掌握一门专业，否则将来会后悔莫及的。他语重心长的教导，温暖、鼓励了我这颗苦闷不安的心，对我后来能把教学工作坚持下来起了关键性作用。惭愧的是这30多年来我只做到了没有离开教学岗位，而没有在学术研究方面做出什么成绩，有负于黄先生的谆谆教导，说起黄先生对学生严格而厚爱的教导，那是很多的。当时在青年教师中最受人羡慕的是他的两名助教。这不仅因为有黄先生这样的名家做他们的导师，更重要的是由于黄先生对他们的悉心培养。他为他们安排了具体的进修计划，认真地审阅批改他们的每一篇讲稿。有时他在外边开会回来很晚了，但他一定要赶着看完他们送来的讲稿，才疲乏地回家吃饭。令人感动的是，这种情况并不是偶尔一次两次，而是常常出现的，蔡师母也饱尝了等他回家吃饭的甘苦。

黄先生对研究生的培养，要求很严，方法也很高明。他不只注重系统的理论学习，强调把理论学习与作家创作研究结合起来，在研究作家创作的具体实践中学习掌握理论。我记得，他的第一届研究生就仔细地讨论过茅盾的小说和赵树理的《三里湾》，我曾旁听过他们的讨论。黄先生对他们的发言都做扼要的评点，有时批评很尖锐，但大家都心悦诚服。严师出高徒，他的这些弟子尽管也历尽坎坷，但现在大都是文教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有一段时间，中文系教师党支部个别负责人对黄先生的工作不够尊重，在选留助教、指导教育实习等问题上指指点点，与黄先生发生冲突，惹得黄先生很不高兴，要辞掉系主任职务。我感到问题严重，及时向学校党的最高领导人何锡麟副校长做了汇报。何副校长亲自到黄先生家里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并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有黄先生、中文系教师党支部负责人、校党委书记参加，我作为见证人也被指定出席。在会上，我没有偏向谁，对有关情况做了比较客观公正的汇报。何副校长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后，高度赞扬了黄先生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批评了党支部个别负责人的错误态度。辨明是非之后，黄先生接受了挽留，没有坚辞系主任职务，对我的工作也更放手了，包括李何林先生、许杰先生等与他往来的一些有关办学的信件也交给我处理。同他的接触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对党的领导是很尊重的，但又不是无原则的，对某些党员干部的不正确意见，他是坚决抵制的，表现出他那种坚持原则、光明磊落的倔强品格。

正当他辛辛苦苦参与制定高校体制改革方案，诚诚恳恳帮助党整风，想为革命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风暴降临到中国大地，一顶“大右派”的帽子扣到了他的头上。我不了解他当时受到如此重大的打击屈辱之后内心是怎样的痛苦，也不知道他对像我这样不辨是非、忘恩负义的愚昧之徒是怎样想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正面看他，更不敢同他接触，怕别人说自己同他划不清界限，怕自己不知道该同他怎样说话、说什么。当时我感迷惘和苦闷，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感情上很为他惋惜，而“理智上”则认为他是错的，犯了罪。

因此，在批判他的大小会上我都努力紧跟，声嘶力竭地叫嚷。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智”啊！当自己的老师在精神上人格上受到莫大的冤屈凌辱的时候，自己不但不去为他辩白，反而跟着错误潮流一起去侮辱他伤害他，这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理智，完全是一种丧失人性的愚昧：然而更可悲可恨的是一直到1979年给他平反以后，我才认识到他所蒙受的极大冤屈，才开始醒悟到自己的愚昧和罪过，才开始意识到长期以来那种歌颂“大救星”、鼓吹“驯服工具论”的封建奴性教育的可怕后果！

给他平反以后，我怀着悔罪不安的心情到他家里去拜望他，准备接受他可能给予的轻蔑冷淡的待遇，也准备向他做一次发自肺腑的忏悔。然而迎接我的仍然是他过去那种严肃平静中蕴含着的祥和热情，没有丝毫的埋怨和冷淡。这反倒使我准备向他忏悔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以后每次去看望他，也总是这样，我所感受到的还是他的那一种严厉、耿直、仁爱的心怀，还是他的关切和鼓励，我还是一句忏悔的话也说不出来。我本来还有许多社会现实问题想请教他，但他这时身体已很不好，不便再打搅他。有一次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包子衍、彭绍发两位同志来京，为一些著名老作家录音，留作历史文献资料。他们想给黄先生录音，但不知他是否愿意。我先去征求他的意见，他没有推辞，并当天就抱病做了部分录音。他还是那样，人家求到他的事，他总是尽可能地给以满足。有一位曾在师大中文系兼过课的学者在历经坎坷之后要落实政策了，他给黄先生来信，要求出具证明，说明他在师大兼课的时间和职称。为此，黄先生特意把我叫去，问我当时的具体情况，是否有兼课聘书和职称。他还是那样认真负责，还是那样关怀别人，还是那样最大限度地满足别人的要求。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多么需要他的这种精神、这种品格啊！然而他已经走了，已经走了一年了，在他生前我还没来得及向他说一句忏悔的话，没来得及向他请教有关我们社会现实中的诸多问题，他就走了。这是多么不可挽回的损失

啊！我们是多么想念他啊！然而再也见不到他了！我只有在忏悔中永远铭记着他的教导，学习他的精神，努力做一个正直的有头脑的中国人。

1988．9

我心目中的药眠同志

白鸿

黄药眠同志是丁易的朋友，也是我的良师益友，他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我将永远怀念他。

我第一次见到药眠同志，是1945年春天，他在成都摘民主运动的时候。那时他住在沈志远先生家里，有时在《华西日报》上发表文章。我在未见到他之前，已读过他的文章，还听丁易说过，他是黎澍同志的老朋友，是个革命作家，曾经被国民党抓去坐过几年牢，朋友们都叫他“大师”。1945年春，正是成都民主运动高涨的时候，丁易和黎澍、陈白尘同志等，都在党的领导下搞民主运动。有一次我和丁易去参加一个反蒋爱国的群众性的集会，碰见一个穿西服的个子不高的广东人。经丁易介绍，我才知道他就是我早已闻名的“黄大师”。那时，药眠同志不过四十二三岁，但是，他两鬓已有白发，额上也有皱纹，很像五十多岁的人。也许是他生活坎坷，受过许多磨难的缘故吧。

我在和药眠同志相识之后，才知道他爱写诗，也写散文和小说，精通英文和俄文，　　也搞过翻译，是个多才的作家。因此，我对他非常钦佩。可是，1945年8月我便离开成都了，没有机会向他多请教。

药眠同志在成都工作的时候，已和丁易结为知交，后来他在香港时，还和丁易通过信。1947年我去解放区之前，曾听丁易说他在香港达德学院教书。那时，我还写过一篇短文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向北方的读者介绍这位革命作家。

1949年北平解放后，丁易回到北平师大工作，我在师大女附中教书。我们住在石驸马大街北师大的教职员宿舍里。大约在这年的六七月间，药眠同志带着他的夫人到我们家来玩，于是，我又见到了几年不曾见面的“黄大师”。那时，大师刚结婚不久，是从香港来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他是待解放区的特邀代表。

那天，药眠同志穿着整洁的西服，面带笑容，特别有精神，好像比1945年我在成都见到他的时候，还年轻得多。他的夫人蔡澈同志穿着中式旗袍，身材窈宛，年轻、漂亮，在丈夫面前，显然有些娇气。我见到他们后，便想到：这位黄大师，现在可翻身了。他过去受国民党的迫

害，逃亡，流浪，没有家，没有亲人，现在受到党的关怀和重视，回国参政议政，做了国家的主人，又有娇妻相伴，难怪他精神焕发，变得年轻了。我为大师的变化而感到十分高兴，即祝他们新婚幸福。

丁易那时候在北平师大任校务委员会委员，便邀请药眠同志到北师大中文系任教。在政协会议结束后，他们夫妇搬进了石驸马大街北平师大二院的宿舍，和我们是近邻。因为他们人地生疏，我还给他们介绍了一个保姆。那个保姆帮我看过孩子，常来我家串门，还曾经提到过，药眠夫妇喜欢跳舞，有时还在家里跳舞呢。

1952年，北师大院系调整后，药眠同志任中文系主任。不久，他家又搬进了我们宿舍的后院。我家的后门正对着他家的前门，中间仅隔一个小小的院子。我们两家互相串门非常方便。那时候丁易和药眠同志常用休息时间在一起品茗谈心，或对彼此都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往来很密切。可是，我和蔡漱同志都在中学里教书，还担任班主任，工作相当繁忙，所以很少串门。

药眠同志工作异常勤奋，他书房的灯光经常深夜不灭，这是我从窗外可以常场尔到的。后来我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时候，买了一本他编辑的《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厚厚的一本书，汇集了那么多的资料，可以想见编者花了多少心血。它对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人，特别有帮助，至今我还珍藏着。

1953年丁易去苏联后，有一段时间我在家里学习俄文。那时，药眠同志常来我家转一转，问问我和孩子的生活情况，非常关心我们。有时他也坐下来和我聊聊天。

有一次，因为我提到入党的问题，他便将他过去在上海入党，后来被捕入狱，以及出狱后失掉组织关系的一段经历告诉了我。我听了之后，既同情他的遭遇，也很钦佩他。我认为像他那样在1927年就倾向革命，潜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仰共产主义，并且在中国革命受到很大挫折之后的1928年要求入党，入党后放弃了个人的一切，一心一意地为党工作，实在是难得。他在被捕之后，不管敌人怎样威胁、利诱，都不向敌人屈服，不出卖组织，不出卖同志，宁肯判刑坐牢，这也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同时，我又想到药眠同志比我大20来岁，他的学识和革命资历都应该是我的前辈、老师，但他却把我作为他的朋友，对我如此诚恳、坦率。我觉得这种友情十分可贵，所以至今不忘。

1957年反右运动后，药眠同志不幸被划为右派分子，我始终不知道所谓“六教授上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根据他和我接触中的种种表现，实在难于相信他是阴谋反党夺权谋利的人，我还是像以前一样地去看过他几次。在会见他的时候，他从不对我谈他被划为右派的事，我也没有问过他。1961年，他摘掉右派帽子后，我又去看他，我提到我看见了报纸上发表的消息，但他仍然不谈这件事，只是说他现在可以写点文章了，也要做好分配给他的工作。他不像有的同志那样，总是没完没了地对人诉冤诉苦。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药眠同志在北师大即被点名批斗，我在文学研究所也因为与被批斗的某某关系比较好，要“接受审查”，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去看他。后来我被解放了，但他还是北师大的斗争对象，随时都有可能被叫去开斗争会，而我却并不了解他的处境。我记得在1969年的一天下午，我到药眠同志家去，刚走进他的书房门，还没有和他说上两句话，就听见外面有人气势汹汹地大声叫喊：“黄药眠！黄药眠！”药眠同志立刻大声答应：“来了！来了！”

又对我说：“他们来叫我开斗争会了。”我当时有点紧张，怕来人看见我，又会引起麻烦，就躲在门背后了。而药眠同志则很机灵地迎出去，并随手带上了门。大约他们刚走出黄家的大门，我听见药眠同志说：“哎呀，我忘了带手巾，让我回去拿吧！”他很快跑回书房，小声对我说：“等我们走远了，你再出去，把房门带上就行了。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说完这两句话，没等我回答；他就走了。——原来他并不是来拿手巾的。药眠同志做过地下工作，有“应变”的经验，在这件小事上也表现了他的机智。

不久，我们单位在河南建立了“五七干校”，我便离开北京到河南干校去了，直到1972年夏天才又回到北京。这时候北京各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揪斗对象，差不多都已经作了结论，恢复工作了，我去北师大看药眠夫妇，才知道药眠同志的问题还未作结论。他们两人挤在一间房子里，已经没有书房，生活条件很差，药眠同志完全无法工作。我对他的处境有些愤愤不平，但他对此并无怨言，只是说，因为他的关系，孩子不能分配工作，觉得对不起孩子。——唉！他这样内疚，难道这是他的错？！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北师大给药眠同志重新作了结论，肯定了他在北师大和民盟所做的各种工作，推翻了罗织在他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特别是纠正了因“六教授上书”而划为右派分子的错误。因此，他

非常高兴，特地约我和袁翰青先生和他们夫妇俩一同聚餐，还给我们看了他的“结论”。那天，我和翰青先生都为药眠同志的彻底平反感到十分高兴，也曾向他俩敬酒，表示祝贺。

药眠同志释去精神上的重负，北师大又给他调整了宿舍，他有了比较好的工作条件，又积极地投入工作。他除了仍旧在北师大任教之外，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尤其难得的是，他重新拿起了搁置多年的智慧之笔，潜心写作，在几年之内，完成了好几部书。

药眠同志是个诗人，我爱读他的诗，也爱读他的散文，因为他的诗和散文热情地歌颂了党，歌颂了革命，歌颂了祖国，歌颂了人民，既给人以教诲，又给人以美的享受。可惜这位诗人，多灾多难，因为政治上的各种磨难，他的才华无法充分表现，特别是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到“文化大革命”的20多年中，他的才华竟完全被淹没了！

1987年9月初， 我刚从外地回北京不久，突然传来药眠同志去世的消息，使我极为震惊，也觉难于相信，因为我还不知道他早已生病住进医院了。我到北师大见到蔡澈同志时，她还沉浸在悲痛之中。我无法安慰她。只能劝她节哀，注意身体。

她含着眼泪对我叙述了药眠同志生病期间的一些情况，又拿出药眠同志在病床上和她一起照的相片给我看。那已是药眠同志垂危时的留影了，我看了心里非常难受，这才意识到药眠同志真的走了，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多年相知的良师益友！后来蔡澈同志对我说，她感到最遗憾的是药眠同志原希望能够恢复党籍，但是他的愿望没有实现。他在一年前写过一份材料，送给北师大的党组织。据说他的问题要由中央解决。药眠同志在生病期间，还抱着希望等待中央解决他的问题，但是他没有等到这一天！这真是令人遗憾的事。

我离开蔡澈同志回家以后，药眠同志希望恢复党籍的问题，总在我心头萦绕，使我感到困惑。根据多年来我对他的了解，我认为他是一个好同志，即使他没有入党，也是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他入党以后，为党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他之所以被捕入狱，是由于他的上级“领导人”在被捕后投降敌人出卖了他。他在狱中不管敌人怎样折磨他，都没有向敌人投降，结果判处10年徒刑。如果不是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联合抗日，政治形势起了变化，八路军办事处将他保释出狱，说不定他会死在狱中……。他出狱之后，又千里迢迢地到延安去找党。没有恢复组织关系也还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做革命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

子，在政治上、生活上都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浩劫中，也是受害的“揪斗对象”，他都毫无怨言，始终忠于党，忠于革命。然而，忠于党的药眠同志，却没有恢复党籍：这是为什么？

过了几天，我收到“黄药眠同志治丧委员会”印发的《黄药眠同志生平》和关于举行药眠同志遗体告别仪式的通知。我仔细地反复地阅读了那份《黄药眠同志生平》之后，慢慢地我的问题也似乎解决了。

我觉得《生平》对药眠同志的历史所作的概括的介绍，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公正的。如说：“1933年冬回国，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不久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判处10年徒刑。1937年由八路军办事处保释出狱。他虽然失去了党的关系，但仍然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民主运动和革命文化工作。”还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中国民主同盟长期负责宣传工作，每当爱国民主运动的紧要关头，总是挺身而出，为贯彻党的方针和民盟的正确主张，不懈地进行斗争。他善于团结知识分子，不畏艰险， 不怕牺牲， 勤奋工作， 以革命实践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并且说：“1949年5月， 黄药眠同志从香港来到北平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和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以来，……他热爱社会主义，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积极参加各项运动。他在民盟工作中努力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满腔热情地团结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7年，他代表民盟中央起草了《我们对高校领导体制的意见》，论述中肯，不幸被错划为右派，为此受不公正待遇达20余年。

10年动乱期间，他在遭受迫害最严重的日子里，仍然顽强地生活着，坚信党的阳光将重新普照大地。”

我认为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是不是共产党员，而在于他是否作了对于革命事业，对于祖国，对于人民有益的事。药眠同志以革命实践写下了他的历史，《生平》说：

黄药眠同志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坚强的民主革命战士。他一生始终不渝地追求光明与真理，热爱党、坚信马列主义，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不息。他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因此，我认为他虽然没有恢复党籍，他在我心目中也堪称布尔什维克。

※ ※ ※ ※ ※1987年9月18日， 我去向药眠同志的遗体告别，我看见他闭着眼睛好像已经熟睡了。我站在他的面前，深深地向他鞠躬致敬，并在心里对他说：“药眠同志，你安息吧！你的同志，你的朋友和你的亲人了解你，也将永远怀念你！”

1993年1月14日，是药眠同志90冥寿，我特写此文，以作纪念。

1992年7月18日完稿

破浪前进

钟敬文

去年夏天，党中央一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全国文艺界、科学界的广大人士马上就回报以雷响的鼓掌声——真正从各人心坎发出的声音。

可是，这个明智的、适时的文化方针，并不是什么人都高举双手欢迎的。对于某些领导同志，它就不怎样适合胃口。他们心里怀疑，或者干脆不赞成，当然他们不会在公开的地方直率地说出来。他们的想头是，这种方针实行起来，对于那些文艺家、科学家是会有好处的，可是对于党有啥好处呢？（他们是这样把党和广大知识劳动者的利益截然分开的！）在工作上，还要给他们带来许多麻烦　厄单命令的作法不行了，唯我独尊的想法要改变了。在许多地方，要商量，要讲道理，要自由竞赛。这不但麻烦，简直是太困难了！老一套有什么不好？何必自讨麻烦！何必自寻苦吃！

有的领导同志忧虑更大。他们想，这样一来，就像决了黄河的堤防，那混浊奔腾的河水即刻会泛滥成灾！多年来辛苦得到的革命成果，就要这样被摧毁了！多可伤心！……

总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虽然由党中央提出了，广大的知识界也表示了衷心的拥护，可是，在实行上并不是那样一帆风顺的。至少，在某些部门，它好像水里的月亮，看得见，捞不上。陈沂、陈其通诸同志文章中的那些错误思想，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但是那决不只是他们几位同志所专有的私产。他们的背后是有着广大“群众”的。这些“群众”里有些人的意见，比他们几位的还要激烈得多，不过没有在《人民日报》或《学习》杂志上公刊出来罢了。

当然，从我们国家的整个形势看来，这个方针迟早是必然要贯彻的！我们不用怀疑这点。可是，也不能够无条件地乐观。因为像前面所提到的，不是直到今天，还有人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主张不感觉兴趣么？而这些同志又往往是坐在领导的交椅上的。这就难怪有些人在明朗的希望中要夹着一丝阴影了。

要贯彻这个党的文化方针，还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尽力。当事人的文

艺家、科学家自然有他们应尽的责任。而坚持为真理而斗争，就是他们所负责任中很重要的一点。大地虽然已经回春，有时还不免来一阵阴寒或小雪。要彻底执行党中央的方针，在某些地方是还遇到阻力的。碰到这种情况，文艺家、科学家们就必须根据党的指示，鼓起道德的勇气，不屈不挠地争取它的实现：一定要除去那些横在路上的障碍物，使真正的文艺、科学能够顺利地前进！

（原载《人民日报》 1957年5月7日）

“三条老虎”横冲直撞给教育事业带来损失

钟敬文

钟敬文在5月16日校部领导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党外人士应有职有权，不要以秘书、助教干涉我”

党委制是需要的，但是党的神经系统（组织系统）如何搞须要研究。党对党外人士既然政治上与业务上是信任的，就应有职有权，让年青党员领导党外人士是不妥当的。我在很早就靠近党，我的觉悟与水平都不比新党员差，不要以秘书、助教来干涉我，让预备党员来领导我就不服。 “过去公安工作做的太多了，高级知识分子中是教育、统战与宣传部门的工作”

我始终认为我校党群关系不好，高等学校党委对高等学校的特殊性没抓住，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属公安部门的问题不多，是教育、统战、与宣传部门的工作，过去好像认为党外人士不可靠，这道墙防范得太厉害，斗争一个人容易，要挽回就难，感情不容易恢复，过去公安工作做的太多了。有朋友问我：“究竟师大党群关系怎么样”？我说以我为例是很好，但这在学小房竟是特殊的。外面对我校统战工作印象不好，对我们的党群关系有一定的看法。校内有些负责同志缺乏自我批评的勇气，我曾几次进言。如评薪工作，黄药眠、萧璋不了解情况，李筠虽好但不懂业务，党委除了两个老头都是年青的，情况不了解，决定级别不要确，何副校长告我有四人不满。实际不如此，我现在半官半民，我了解情况，告诉何副校长能改就改，不能改就应吸取经验教训。

“我身边的老虎推倒了庄稼，撞倒了房子，吃掉了小孩，剩下了骨头”

毛主席在八大开幕词中指出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我听了非常高兴，老虎一捉就捉对了，这三条老虎横冲直撞给教育事业带来损失。

知识分子不会造反，学校里不只是公安工作，而问题是宣传、教育、统战部门的工作，要团结、教育。我校工作做的不好，在我身边的老虎推倒了庄稼、撞倒了房子，吃掉了小孩，剩下了骨头，捉住了老虎真是很高兴。

“实际是客人地位，有主人翁感是假的”

我校三个主义都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笼罩一切，教条主义充满教研组，现在有些教师谈虎色变，这些人不是反革命，要依靠这些人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这样的压力怎能发挥他们作用。这一年来情况好些，但基本情况未改。如教育系教条主义的统治从领导起解除了一些（董渭川插言说不见得是解除了一些），基本未变。主人翁的感觉是从主人翁的地位而来，实际是客人地位，有主人翁感是假的，没有什么用处，虚伪的东西没有价值。

“牛皮浸水拖不动，不会出大民主，出了大民主也会解决问题了”

学校的三条老虎，首先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在教研组中的统治最嚣张，据马特反映：逻辑学宁可请人大年青人来给政治教育专业教课，而让马特去教外系本科学生。官僚主义在高等学校为害最小，我与方铭说党委应利用八大文件好好学习，使三条老虎收敛一下。党团员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非常突出，如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教研组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应从党员先检查，根据中央精神在群众面前检查自己。后来党委布置学习八大文件时说要体会精神，不要联系实际，这说明党委不正视工作上的缺点与错误，党委常对错误做解释，这样工作方法不好。我近半年在学校不爱讲话了，牛皮浸水拖不动，不会出大民主，出了大民主也会解决问题了。

“党政负责人发现错误应拍胸承认，怨有头，债有主”

校党委在贯彻与高校有关的政策不够及时，琐碎小事做得周到，有时很细致，这是思想作风与工作作风问题。做事不敢负责这是不好的，党政负责人对自己要做的事考虑要细致，与群众商量后再做，如发现错误应拍胸承认，“怨有头，债有主”，封建社会的正派人也有这种道德。党委一般同志对问题爱解释，如我向张斧提出百家争鸣政策在我校的贯彻问题，张说：“我们没抵触。”但实际我校漠然无声，这是否抵触？中央政策不执行就是抵触，不愿承认错误，这是对中央政策的态度，党组织不贯彻政策应负什么责任？可能党委意见不一致，战斗性不够，疲踏。

“党委整风应行动起来，不要人家‘将军’、中央鞭策才搞”

整风道理已不用再说，应行动起来，做为党组织这样疲踏不应该，

要人家“将军”才搞，我向张刚说这样疲踏不行，学校有些同志诚诚恳恳为党工作，但有缺点：①群众路线走的不够；②末变外行为内行；③政治敏感不够。

党中央非常有决心，通过整风运动来调整人民内部矛盾，我校党委等中央鞭策才动，应用种种办法如大会、小会、个别谈，打开道路，争取主动，体现中央政策，听取群众意见，党委个别同志决心不大，老一套想过关。党委是否下最大决心贯彻中央指示精神还值得注意。

“政治上没问题，业务好的排出去这是自私自利”

我校三大主义是存在的，如人员录用、留助教问题上，中文系去年留20几个助教，只有一个非党团员，有的业务很差。分配出去的有些是业务很好的，没有反动的，但因为这些不是党、团员，这些人很有意见，留下的助教也认为不公平，这是完全的严重的官僚主义。我们做的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党的家务事，政治上没问题，业务好的排出去这是自私自利，是不合理，我很气愤，团员也不平，党委应查清这件事。

党委要下最大决心来改变作风，群众是我们的，如一意孤行则会脱离群众。

（原载《师大教学》1957年146期）

在教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钟敬文

教育部开门整风是很好的，因为教师们和我个人都有很多意见 陡年来教育部成绩是很大的，但缺点也是严重的，我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来谈一谈：（1） 教育部过去出了很多主意，颁布许多指示、计划。领导机构应该有主意办法的，但不问这办法主意如何，下到学校里去就得照作，如教育实习师大非得两次不可以，因全国都惟师大马首是瞻，这些主意计划都不是从实际出发的，都是主观空想。教育部倒不是有意将工作领到死胡同去，而是不从教育实际、物质设备条件和对过去文化传统的实际出发，所以它是空想的，如部里去年反保守主义要加速前进，在12年远景规划里要办一百个高师，而师大要培养上千个研究生，这浩浩荡荡的大数字世界上也少有， 现在的苏联文学就有将近100人。我想学校要增加这么多是可笑的，因为高等学校主要问题是师资，一个成熟的高等学校师资起码要22—23年，苏联是25年。当时如果反对的话就给扣上保守主义的帽子，并且你讲了也没人听你的，作为一个 掌握全国教育事业的领导机关，像这样的作法只能造成观感不好的影响，我们不管年老年青教师对教育部这种作法都骂，但不在报纸上骂，并骂得咬牙切齿，但他们不是心向台湾、向帝国主义而是想把高等教育事业办好。但教育部的办法是不能使我们同意的。教育部只是从需要上看，教育有它自己的规律，应抓住这规律来办事，教育事业是要随着国家发展而发展，但不能随着其他事业一样的速度来发展，如合作化高潮那样。不根据教育本身规律办事是主观主义、空想主义。

（2） 机械学习苏联，不动脑筋的听专家话，毛主席曾讲“学习苏联，要结合中国实际，”而我们却只看前句，丢下了后一句。这样从不自觉的教条主义到自觉的教条主义，如我们原来有四个附中，而教育部顾问苏联专家讲不需要，苏联没有。

这条并不是社会主义原则，它们没有我们可以有。那时费拉托夫专家常来学校给我们帮助很多，但添的麻烦也不少。如领导二级制，苏联是二级制我们也得二级制，为此我们讨论了好久，结果是无下文，现在仍是三级制。

另外函授学校的设立，有好多系科设立了，这也是学习苏联，而系里师资不够，多是助教，我一向不同意助教开课，那时钱部长说：高师

要发展师资不够，但这不要紧，我们有许多助教，二年以后就可以作教师了，并可作优秀的教师。我和钱部长的看法不一致，我向何校长讲，“对钱部长的话我是口里不敢非之，但肚子里不敢是之。”过去对青年教师的估计是不正确的，对老教师所采取的态度是粗暴的。

再说办函授，系里一直不同意，但有个别假积极分子说可以，部里就糊涂的听他的意见了，可是我会反映说不行，部里却不理睬。过去对中国专家是看不起，学生和教师的意见部里不大理。

再说苏联文学教师现在需要的很少，但现在搞这么多，真不知如何分配，最初我的意见是5个人到10个人， 最多不能超过15个人。但教育部想多培养几个，这只是甜梦，这是不合实际的，当然虽然我反映了这个意见，只因为我是一个中国的专家，不能起作用。

还有6时一贯制， 是很不合适的。当时虽然征求了意见，按常理来推这也是不对的，但是教育部不听中国专家的意见，这损失很大。

教育事业是一步一步的，它是潜移默化的，有程序按步就班的。但领导上熟于一阵风的规律，把它引到教育事业上来，这个损失是很大的，如批判杜威一阵风。

先生们辛辛苦苦的搞出来而无下文。搞教学大纲亦是如此，不是按步就班积累经验来稿，而是一阵风，这一阵风使得先生们忙乱不堪。拿教学计划来说，没有一个学生是从头到尾用一个教学计划的，别说4年就是3年2年也没有，当然变还是需要的，但没有这样快的，这样快是反常的。这样的变使得每位先生都应付年年的变，而无时间去搞科学研究，变成了南辕北辙，向南方的车子实际是北方走。

部里下来的指示是行政命令，不能抗拒，只能服从。如服从有好处这还可以，但事实并不如此，如教育实习就是命令我们两次。柳部长说这是科学的，我觉得这讲得太轻率了， 这是变相革命。又如去年要我们支援其他院校150人，但我们经研究抽80人都有困难，李司长讲在不伤元气下抽。我问他半死不活算不算伤元气，他说不算。 这怎么能说不算呢？这话说的是不负责的，纪司长当时也是赞成150人，但到后来抽了几十名也还是可以了，应该说合理的服从不合理的不服从，部里从需要出发不看实际，我们已经出了几十个人了还说我们反抗，几乎要通报，这是命令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的方法。

还有部里有些作法也是不很负责的，如分配研究生问题，第一次我培养了五个，分配出去没有一个是在高等学校教本专业的。据我所了解很多学校缺这个专业的师资，如华东师大，东北师大就没有这方面的教师。我的学生出去反而教文学理论或现代文选，去年培养出来的也只有二个人搞本专业。这样的做法从他本人讲是学非所用，对国家是该开的课程未能开出来。

部里不该管的部里也管，如研究生培养是教师个人的事情，这部里也要抓，研究生的学习年限需延长时间也得部里批，教育部不懂不了解，还要管的多，这当然要犯官僚主义的。

一般讲，事情办错了与经验有关这是对的，但教育部并不完全如此。这要具体分析，有许多错误是由于工作方法不对头，不相信中国专家，不吸收中国专家经验，不走群众路线。学校的许多工作是不重视党外专家的意见，什么事情都要通过党委，党委同志又不懂，不深研究，这样一些能避免的错误也未能避免。丁浩川同志就自己摸索，盲动主义的作风，我和他讲马克思是讲科学意见的，摸索是不得已的事情，要走群众路线。

（摘自座谈会记录）

为了完成高贵的共同事业

钟敬文

作家协会是我们作家志愿结合的团体。既然是一个团体，自然有一定的组织方式，也必然要有领导。普通的同业公会，还有主席、委员会之类的领导人物和机构呢。可是，过去和现在，我们作家协会的领导方法等，多半是不能符合这个行业的性质的。它使许多成员感觉到疏远，感觉到它不能起那种应有的组织和鼓舞作用。

协会领导比较突出的一种缺点，是少数领导同志在工作上的包办作风。

我们试举一点事实看看。

作家协会有个理事会，照理它是代表大会闭幕时期内的最高权力机关（理事们不但是经过代表会选举出来的，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也是经过党的检查的。他们不是些什么来历不明的人）。

但是，几年来，会里所做的事情，有的还是很重大的事情，理事们事前是很少参加商议的，甚至于是毫无所知的。

近年来，协会里成立了许多委员会，管辖了许多文艺刊物，这当然是好事。可是，到底那些委员会是怎样产生的，人选是怎样决定的，那些刊物，是怎样领导的，成绩究竟怎样等，理事们简直不甚了了。

有时候，协会召开会议，我们往往要到了会场，听过主席的报告，才知道那个会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事前既不能参谋，又没有时间准备意见，当场只好草草通过了事。

“无事不登三宝殿”。平常我们是很少踏进作家协会的门槛的。有时候，我们走过协会的门口，看见那块白地红字的招牌，心情就怪别扭的。说是咱们的会罢，实际上它跟自己是这样隔阂？说不是罢，自己又明明是它的一个成员，不，在名义上还是一个负责的人（理事）。作家照例是敏感的，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心上，不只是尴尬的，而且是苦恼的。

作家协会的领导工作，自始至终，是由少数人“偏劳”的。我们衷心

地感谢这些同志的辛苦。但是，这样的做法，并不能使工作更好地展开，对于许多理事和作家们来说，它更不能发挥他们的潜力。他们那种有用的、同时愿意贡献出来的力量，在“投闲置散”中荒废了！

作协领导同志不但在领导工作上，有关门独造、不容插手的倾向，日常在对党外作家的态度上，也是叫人感到冰冷的。他们对于自己的同志，是有说有笑的，对于党外作家就不免“敬而远之”了。不错，党外作家的思想和作风，往往有较多的毛病，但是，他们并不是麻疯病者，为什么要采取那样隔离态度呢？

回忆全国解放前，在国统区或香港的时候，党的作家和党外作家，一道工作和战斗，一般说来，感情是融洽的，它并没有像今天所看到这样的隔膜。怪不得有人想起当时那种称兄道弟、亲密无间的情形，在神往之余，不免有些感慨了。

或者有人要说，那种情形，是一时权宜的，它并不是革命阵营里彼此关系的正常状态。也许我太庸俗了。我想，从事革命的人，在许多地方，要违反固有的人情，这并不是难于理解的。但是，似乎没有必要在什么情况下，对什么人，都具着一副铁石心肠和冰霜脸孔（实际上，自然也不是完全如此）！前面所说的解放前那种情形，对于革命到底有什么不利呢？事实本身，不正是英明、公正的证人么？

如果我们进一步说，那种同志间友谊的存在，还是有它更积极的意义的。我们都承认大多数党的作家，在政治上、思想上，有过比较严格的锻炼，在这些方面，他们是能够给党外作家以帮助的，也必须给他们以帮助的。而要进行这种帮助（也就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像过去思想改造和别的一些运动时候所做的，自然必要。

但是，仅仅那些，却并不充分。必须还有一种经常的和风细雨的吹润。这对于他们新思想、新作风的形成、茁壮，是决不可缺少的。要做到这点，就必须经常建立彼此间的感情基础。我们不难于接受一位老朋友比较严厉的批评，而对于一位没有交道的人的意见，却往往不很容易听从，这是一种值得吸取的经验。

遗憾的是作协的领导同志，为了帮助党外作家的进步，不但不努力去建筑那种感情基础，正相反，往往倒把固有的一些也给以摧毁了。好像惟恐存留下只砖片瓦，会大大地阻碍了自己前进的脚步似的。

我们也知道，党外作家跟党的作家，在某些点上是存在着差别，存在着矛盾的。

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彼此关系中间必须筑起一道玻璃墙的理由。譬如在一个家庭里，有男女、老少等几口人，彼此思想上、作风上，乃至某些利害上，并不是完全没有矛盾的。但是，一般情况下，他们总是亲密地团结在一起。我们平常惯说："像家人一样"，它就表明这种谐和的关系是怎样使人羡慕的。除了少数的例外，我们很少看到在家庭的成员中，彼此故意保持距离、互不信任的那类反常状态。

今天，我们协会里的党的领导同志，乃至于不少的党员作家同志，对于党外作家的关系，并没有做到像亲密的家人一样。党组织的界线，就是彼此感情的界线。

党员作家和非党员作家虽然在一个同业团体里，实际上中间的"楚河汉界"是非常严明的。缺乏信任，缺乏亲密，就不可能在事业上有真正的同心协力！

我们作家的主要任务，本来是要通过自己的写作去团结几亿人民，使他们充分发挥智力和体力，以创造成一个雄伟美丽的理想王国！而现在，我们自己的队伍，在团结上就不是太坚固的，在作战上又不是大家都能很使劲的。这不是一种辛辣的讽刺么？

为了完成高贵的共同事业，我们必须下决心拆去横在你我中间的那道墙——不管它是玻璃的，或者是砖石的！

拆墙，当然不是太轻而易举的。但是，怎样困难的事情，如果我们觉得它是该做的，就要用一切力量去奔赴它。我们要学愚公移山！

我想，只要党的领导同志们，更重视我们的共同事业，只要他们不把自己看成为特殊的人，只要他们将心比心，胸无城府，就会更信任人，尊重人，因而有力感动人、推动人。我相信，党外作家尽管冥顽，也会像鳄鱼那样受感化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是到今天还没有褪色的古训。

我们大家用对于人民文化事业的最大忠诚，来共同铲除那道使人精神分离的高墙罢！

※ ※ ※ ※ ※5月22日下午， 作家协会党组首次邀请了一部分在京党外

作家提意见，帮助整风。在会上，我作了简单的发言，同时顺便请丁玲、刘白羽、张光年三位同志，在我的笔记本子上记下他们的感想。他们所写的话（特别是丁玲同志的）深深打动了我，我感觉到这道墙，不但是应该拆的，而且也是容易拆的。在整理发言稿的时候，我就自然地让这种思想渗进我的发言里。如果这篇小文有些可取的地方，那首先就要谢谢他们珍贵心情的感染了。

（原载《文艺报》1957年11期）

中共失策之一

傅种孙

中国共产党近几年来究竟得计多还是失策多？自然是得计多，因为中共是胜利的党，如果失策多得计少，早就失败了。得计虽然多，有的是人歌颂，中共虽然很愿意听，恐怕也听腻了，我就不打算谈了。为了爱护中共，我倒愿意谈一谈失策的地方。

首先我愿意谈一谈对知识分子的失策，也许这是中共近几年来最大的失策之一。

中共所标榜的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所感受的几乎完全相反。知识分子的心情可能中共不很了解。自从解放以来，知识分子每见中共一设施，无不额手称庆。就大体说来，知识分子是爱护中共的。中共的最终目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大多数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所谓大同世界并无二致，所以知识分子衷心趋附共产党不是偶然的。然而共产党是怎样对待知识分子的呢？在乡间，中共提倡斗争，斗争的目标是地主、富农。在城市中共提倡斗争，斗争的目标是买办，资本家。在高等学校，中共提倡斗争的目标是谁呢？自然不是工友、不是学生、不是年青的讲师、助教，所以第一个政治运动起来，虽然这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每一运动起来，知识分子就会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遭这么大的祸殃。自然中共所采取的是政治手段。政治手段有时候是必要的、不可否定的。譬如对土豪恶霸，如果不加以镇压，不加以斗争，那他们是会造反的。对于买办、资本家，如果不经过斗争，他们自私自利的心思是不容易改变的。知识分子就不然。既然是知识分子，那他看事就要看得明白些，看得敏捷些，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道理不会看不懂，所以用不着对他们加以什么惩戒。再说地主之所以为地主，资本家之所以为资本家，必然是有剥削行为的，有罪过。我们能够说一个知识分子必然有罪吗？我们来看看中共是怎样对知识分子的。所有的报章杂志上所写的，报告会、讨论会上所说的，只要一提到知识分子，必然带上帽子“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少单独提知识分子而不带帽子的。这很显然，如果光提知识分子而不带帽子，就不好骂了。可是听

的人作何感想呢？他会不会想我不是旧知识分子而是新知识分子，我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红色知识分子呢？我想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自封。

因此，每个知识分子听人谈到知识分子（总有小帽子——旧的，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时，总不免有些害臊，害怕。

我常这样想：这样骂知识分子的人，骂了两句过了什么瘾？骂了起好作用还是坏作用？我认为是坏作用，愈这样骂使知识分子愈怕接近共产党 顿如不是骂，而是假以辞色， 知识分子会欣然附和、 共济时艰。谁都知道，“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那就是说，国内的阶级斗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此后是建设的时代了。社会主义的建设自然很需要体力劳动，但是如果专靠体力劳动，那未免太苦了，因此我们需要靠脑力劳动者来想办法减或是免生产中的体力劳动，增进体力劳动者的文化知识。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再说明白些，这是需要知识分子做而且知识分子也做得到的。中共中央是不是见不及此呢？我想是早有先见之明，要不然为什么会有知识分子政策出来呢？我所惋惜的是，知识分子所感受的待遇与中共所标榜的知识分子政策几乎完全相反。这能怪知识分子得福不知感恩吗？中共中央可以深切反省一下。这能把责任完全委之于下级吗？下级的普遍偏差与上级的领导无关吗？

中共可以检查一下，这几年来四海之内有哪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不寒心？既然处处的知识分子都寒心，那是谁造成的局面呢？我不相信知识分子对中共离心离德而中共能够达到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自然也许有人这样说，中共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需要这些旧知识分子而需要红色知识分子。但是要等到红色知识分子数目够用得等到哪一年？现在的知识分子与中共既无冤又无仇为什么不可能利用？知识分子愿为中共效劳，因为为中共效劳也就是为祖国效劳，为人民效劳。你有远大计划，现有人懂行，愿效劳，何苦不用？自然中共会说，我现在是用了，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失业呀！但打着用、骂着用，叫知识分子成天用眼泪洗脸，这是何苦来？难道这是一种政策吗？把这般知识分子打服了、骂服了，就容易驾驭了吗？

这是不了解知识分子。其实解放以后的知识分子对于共产党不打不骂也是佩服的，一打骂倒是怀疑了。再这样打骂下去，仇恨就会结深，后果不堪设想。我常这样想，如果自解放以来中共的知识分子的政策不只是口里说而是实际做，那么团结知识分子的结果一定会很好，而且建设的成绩也会更好，设施上面的错误会少得多。正因为不尊重知识分

子，不信任知识分子，我行我素（还想用打游击时的办法来办工厂、办大学等等），致命错误重重，亲者痛而仇者快。

就最近报章上所揭露的情形看，共产党派到厂、矿、机关、学校去的代表党的人物往往独断独行，或者偏听偏信，对那个厂、矿、机关、学校的专家的意见不加采纳，这样就用人的方面说，用知识分子同不用知识分子有什么区别？就知识分子说，养着他而不听从他的意见，这是所谓“豕交兽畜”的待遇，是知识分子所不甘受的。知识分子的气节是从古以来所鼓励的。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声色俱厉地说：“要把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打掉”，对士气毫不顾惜。我认为这是很大的隐患，无形的损失。当三反肃反的时候，共产党说得倒轻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无意中造成那些人不问事实、信口开河的坏风气，毫没有对受批评的人设身处地想一下。这样，人们学会了这一套。现在整风的时候，党员们应该会想到片面强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不十分妥当的了。

毛主席号召学习苏联以后，请来许多苏联专家，中国知识分子不论老少都虚怀若谷，参加学习。这在中国知识分子说来就算是很难得的了。因为知识分子都有自尊心，都不免有“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的想法。但是，近几年来，高等学校请求聘请苏联专家时。高教部都责成学校要有计划、有准备，其中有一条，要准备好继承人。为了学得快，有的学小伙指定教授做培养对象，做继承衣钵的人，以便苏联专家回国之后，还能传授苏联专家的学业。对这办法我曾提出过异议。我认为，我们也是一个国家，既然称这人为教授，就应该承认他有相当的知识水平。如果我们选拔教授为培养对象，那培养他的人势必要比教授高。即使这个教授非常谦恭有雅量，苏联专家也许不好意思吧！再说，在国际上往来，也要替中国教授留体面，替中国教授留体面，也就是替国家留体面。

（原载《师大教学》1957年7月6日第151期）

在第一次领导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傅种孙

一、党群关系

我以为我们学校内党群关系比以前有了进步，但是还是不够的。

以前党外人士对党团员存着戒心，伯他们挑碴儿，说话不敢随便说，一定要想好才敢说。有些党团员假装进步获得组织的信任，在他们的报告之下许多教授丧失了威信，许多系的教研组也因此而垮台，如当时的英文系就这样的垮台了，许多教授走了。教授的威望是靠学术建立起来的，而学术上的威望是“百人成之而不足，一人毁之而有作”，我所知道的党团员的报告和许多非党团员的报告是相反的。我曾经提醒过浩川说：“你听到的只是党团员的报告，至于非党团员的话，你是听不到的。”我知道有许多党外人士的本心话不愿跟他说，而愿意跟我说。

现在党群关系，比过去好多了，但是还是不好的。我们学校好像是形成了两个党：党内的党和党外的党，这就很明显的说明了党群之间的关系。造成党内、外的界限首先党员要负责，当然党外人士也有责任的。有些党外人也不好，借党团员的话来打击别人。

有人提议教授治校，我认为这在师大是行不通的，因为没有基本队伍，没有组织，没有底子。

二、师大没有了基本队伍

师大最令人伤心的是老同事、老同学间几乎不敢来往，像一盘散砂，没有粘性，只靠党来联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党怕大家彼此来往熟了会造反的原因吧。要改变这种情况只有靠党。

我常常说：现在我们师大的人，无论教员、职员都不是真心实意的爱师大。后来的人恨不得把师大看个透，好像以前一点好处也没有，只有他来了师大才好了似的，这样可以显示自己的功劳。平常在闲谈中没有一个人说师大好，这可看出大家对师大是否有感情。而现在就靠这些人来办师大，这怎能办得好呢？

我们的校刊，每当来了一个新的主持人，就要改一次名，从《校刊》到《新师大》再到《师大教学》，好像过去皇帝改元一样，要把过去的一切都否定。

三、发展党的问题

关于师大的党群关系我很早以前就提过意见（在中央提出知识分子政策以前）。

我也曾批评过师大党组织对高级知识分子关门。后来有了些改变，吸收了一些教授入党。前几天听见有人对党的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工作不满，说有些同志入了党以后就变得严肃，不像以前那样与群众接近了：被吸收进党的人也并不是众望所归的。希望党好好检查一下为什么这样。

四、职权问题

对这个问题多方面都有呼声，并且非常厉害。本来，照道理说职、责、权三者该是合而为一的。韩愈说：“官以谏为名，诚有以奉其职。”其实不但谏官，任何职位都应该名副其实，职名义和实权应该一致。我们学校怎样呢？也许我们学校要好一点：就我个人来说，也许是最好的。但是我对此也不无感想。前几天陈校长在市委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说：要不是党委领导，何校长帮忙，我的校长也就无法当了。我听了这些话，不免想及古人所说“垂拱而治”，但也觉得他的话有道理，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呢？比方教师的评级工作，我们学校要评张三是几级必须和别的学校李四比比，那就要去了解李四的情况，如果用我傅某的名义去了解，别人就不会告诉，会用保密呀，没有评出呀等等言辞来回绝，要是人事部门去了，他们就会尽其所有的告诉你。可见离开了党是办不了事的。还有像毕业生分配，支援外校等等，假如由校长、系主任分配不服从怎么办？党分配的话，不服从的就会少些，不服从的话也有办法进行善后工作。

我们学校党委的威信很好，何副校长的威信也很好。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建立威信，而是如何爱护威信，如果威信利用得太多了，管的太多了，就难免会有失检点的地方，如果我傅某做错了事，只是放在我个人身上就行了，可是何副校长做错了事，人家就把它的行动放在党的身上；我如此渺小，尚且爱惜羽毛，那么何副校长就更应该谨慎了。

何副校长常常爱开空头支票，却让我来兑现，或推给下级，常常使我和下级为难。何副校长开会要开空头支票时，我常常在他旁边扯他的袖子，要他不要随便开空头支票。何副校长威信很高，我望尘莫及。比方我到员工食堂买菜，月底还钱，收条上却写上何副校长的名字，你说可笑不可笑？职工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虽然这是小事，但这的确是我们学校的小照。现在我校在所有人的心目中只有何副校长一人。前几天在座谈会上陈秋帆先生向领导提意见时，首先声明傅副校长、钟主任不包括在内。我听到时很惭愧，也很难过，因为学校领导工作没做好，我也有责任。

现在我不能畅所欲言。我的话不能发生效力，责任就难负了 洞使能发生效力，也不是靠我的副校长的职位，而是因为私人情感。

平时有很多事我总是这样想：如果一切事都需要由何副校长批示，那何副校长也未免太不胜其烦了。所以我想要帮帮忙，分工负责。但是有许多事情我是不同意他的做法的，比方把附中（女附中）、附小交出去，我很不同意，但别人都说管不了，我也不好说我来管，那只好算了。

五、部、党对附校的领导

前几年两附小的校长都是党员，不得人心，我曾提过几次意见，但党有党的看法。党只是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他们的威信，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如果党员工作做不好就别让他当校长。为了维持一两个人的地位而损失党的威信那就不合算了。

去年教育部把附中、附小拿过去，我认为是很不对的。现在附中、附小固然办得不错，但不是党员校长的功劳，而是几十年老教师的心血办好的。教育部收为已有是为了什么？为了给国内外各方面人士参观访问以壮观瞻，事实上，这种做法是“贪人之功以为己力”。二附小的党员校长王静自以为了不起，认为学校办得好是自己的功。事实上，我认为二附小现在之所以办得好，完全是因为原来的底子好，但党却不是这样看的。我在师大几十年，也是附中的老教员。对附中所以办得好我是了解的。因为她是师大的附中，师大的人来来往往的很多，大家都是内行，办不好的就提意见，所以才办得好。

我们对附校一定要爱护。听说前几天附中为廿年以上教龄的老教师举行庆祝会，现在这样的教师只剩下六个人了，这是很令人伤心的事，

我认为一个学校所以成为老学校，是因为有老教员。可是附中老教员解放后被逐渐分散了。这种情形师大也有。我们总是想学校老教员多一些好。但是党过去的政策却不是这样，总是想把旧的打垮。如果旧的教员有作用，为什么一定要打垮呢？党员校长曹运昌初到一附小时汇报说，教员彼此之间一团和气没有批评。实际上他所指的是他们之间没有互相攻击，没有互相攻击就不好，只有把他们调走一些，他的校长职位才能站得更稳。

六、师大教授的痛心事

师大教授名声，在校外比在校内高，在系外比在系内高，在系内又比在助教嘴里高。这谁吃亏呢。当然老教授也吃亏，但最吃亏的还是助教学不到东西。一个人如果永远只看到别人的短处，就永远学不到东西，党对青年教师说：向老教师接受知识要批判的吸收。我对这句话非常反感，我们安排小孩子上学的时候，总是叫他好好向老师学，听老师的话，难道有谁叫自己的小孩子批判地学习老师，批判地听老师的话吗。我认为党要注意这件事情。党是年青教师的家长，就要尽家长之道，要很好动员他们向老教授学习。可是这几年党叫年轻教师学习老教师总是附带条件，批判地吸收。何必同时说这样的话呢？这样老教授怎么能毫无顾虑地拿出知识来呢？

这使者教授感到年轻教师好像不是来学习知识，而是来监督他的。

学校对老教师是不够重视的。近几年来我看见许多老同事退休了。我有“兔死狐悲”之感。我所以没有养老退休，能够幸免，是因为我学的是数学；因为数学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数学和资本主义的数学之分。比方学校对夏宇众先生就看得无足轻重，请他退休，可是现在很多人又要去请教他，这不是矛盾吗？

七、学生的失望

关于留助教、研究生、保送留学生的问题，诚然年年都有进步，但到现在仍有毛病。最近还听见有人说：分配出去的人甚至有可以做留下来的人的先生的。这些虽然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却是出自教授之口，总是有原因的。这种做法对学生影响很不好。它已经不能成为鼓舞的力量。这种留助教、研究生、保送留学生只看政治条件的办法已成公开的秘密，很不好，必须考虑。

八、随风而靡

我认为学校领导的最大缺点就是没有主见，没有预见。比方学校的规模是大点好呢，还是小点好呢？房子要盖得好些呢，还是便宜些呢？附中是要呢，还是不要呢？这一年年的反复，永远没有定见。这是由于领导干部没有经验，想得少，征求意见不够，就是征求意见，也不知择善而从。今天听这个这样说就这样做，明天听那个那样说就那样办。朝令夕改，毫无主见。

学校对教育部十足的唯命是从，恭顺得很，特别是对部里的党员上级，如董部长、柳部长、李司长。服从命令当然是美德，但我永远认为不能把任何人看做超人。

一件事情考虑一二天，总比只考虑三分钟好。我们学校考虑了很久的事，教育部部长或司长只考虑几分钟就批驳了。而我们学校党委却总不敢和部里争论。

我觉得部里对我们的事管得太多了。学校录取学生要管，甚至学校盖房子门窗怎样开都要管，这真是前所未闻的事。过去军阀时代，也不这样干涉学校的内政。

我觉得教育部对我们的过多的管理，对我们很少好处，反带来了累赘。教育部总是拉我们的后腿。如学校盖房子，快要盖好了，部里又突然来说要节约。我们学校的房子盖得特别慢，而人家却盖得快，我认为教育部以后应少管闲事。现在部长、司长、校长都给我们指示，连科员也直接给我们学校打电话，甚至不通过校长，直接给学校各科打电话，真是婆婆太多了，真是“自乱其列”，徒增纠纷。

我认为我们学校有许多事应该向教育部反映，劝他们别太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党委也不要太恭顺了。这种过于恭顺的态度并不是爱护上级。教育部把附中、附小拿过去，拖了七八年都不批幼儿园的经费，这都是错误的。现在要教育部好好整风，看看教育部做错了改不改，有没有知过必改的气概。

教育部也是没有定见的。有时候教育部领导者下判断太轻率。比方学校是实行“二级制”好呢，还是实行“三级制”好。（二级制就是校长底下没有教务长、总务长的中间级，而直接领导系）教育部硬说要实行二级制。现在我校已经证明不能做到“二级制”只好实行“三级制”。我早就

说过要实行“三级制”，他们都认为这是反动政府传下来的。其实这并不是反动政府用政治力量形成的。教育部到我们学校来检查工作，用了很长时间，但是到底检查出什么来了呢？谁也不知道。无声无息的就完了。

有时候我也觉得何副校长有自己的见解，可是往往突然改变了。不知道是自己改变了意见，还是党委的主意改了。他这样变来变去不要紧，却常常把我弄得下不了台。比如最近决定要举行校庆，何副校长叫我筹备一切。但后来突然又不举行了。

他说这因为我那时病了，所以才不举行。这我当然很感激，可是这样的突然变卦，却使我很难为情。又比方和工农速成中学接头，我知道我说话不算数，本不想去，后来我和黄教务长去了。商量好了归附师大，并且也和教育局谈过。但后来何副校长却又突然不要了。这叫我怎么办？这类事过去很多，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

九、整风究竟是整谁

有人说“有意见还是说出来的好，说出来后解释解释，误会就消除了”。我非常不同意这种看法，要大家提意见是为了改正党委会的错误，不是为了改正提意见的人的错误，难道整风是整别人的错误，不是党员的错误吗？这和整风的精神符合吗？

（“苦药”“底层之声”共同采访。“苦药”编辑部整理。）（原载《师大教学》1957年123期）

我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感到遗憾

傅种孙

（傅种孙在5月27日校党委邀请党外负责人座谈会上的发言）我看学生放得差不多了，差多少也难说。现在他们想说，可就是没有话可说了，而到处去访问，应当适可而止，不必要像牙膏那样硬挤。我观察同仁们放得极不够。

我是消息极不灵通的人，油印报一张也没有见到，大字报也没有看。我的观察不一定对。我们要想法让同仁们都能放。在三反的时候，有些学生还在中学里读书，没有进师大，我们的旧冤他们一点也不知道飞冤不算，别说党外的做不到，党员也怕做不到，我个人侥幸在两次运动中不仅不是受害者，而还是受照顾的，没有什么旧冤。然而我所看到的有很多痛心的事，比如张佩湖先生，西北大学来公事要他去，我是送他上汽车的，我是代表学校把罪犯交出去，他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我把他送上汽车，好比是送上杀场。过去这些事，不算旧账，人情上做不到，群众做不到，党员也怕做不到。这须要允许群众算旧账。

对于学生不要鼓动太多，本来他们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但硬要他们说，他们不是在当新闻记者，访问先生，就是要在编造一些，做小说家，如果是身受的，当然可以说。没有话说，而要在拜访老师，找一些材料，这又何必？老师有意见，他自己不知道提吗？何必要转一道手呢。对于学生要适可而止。还可能有一个偏差，就是走向罢课罢考。大字报贴得很多，但没有打中要害。

我有一层意思，还没有漏出来。学生找我，问我为什么不说话，害得我好苦。

我说我是说了话的，因为记录记得不够好，自己开会很忙，没有时间修改，还未登出来。同志们也可以了解这一点。中文系的学生要访问我，要录音，这也好，可以说一次，让他们都能听到。

党委对知识分子的心情不够了解。我对党的政策都拥护，唯独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感到婉惜，我看不怎么高明。知识分子能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他能在这里工作，并不是党的威力压服了他，也并不是德性感化了他，而是看到解放后，大放光明，看到民族的幸福前途，在这样的

鼓舞之下，所以才肯忍辱负重，任劳任怨，是为了顾全大体，不是佩服这些个党委。要把这种精神传达到每一个党员。不然的话，都以监工的态度出现，自己还觉得怪不错的，这是非常错误的。

有一种治标的办法：就是搞运动，主张发动群众，但不主张锣鼓喧天。

再就是治本的办法：我对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始终感到遗憾，在知识分子上面必须要加上“旧”字或者是“资产阶级”，叫旧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何尝不是从旧社会来的，农民何尝不是从旧社会来的？为什么偏偏给知识分子加上个“旧”字？这又何苦？你把人家当雇佣看，当奴隶看，甚至当敌人看这怎能使人家有主人翁态度。

运动搞完了，究竟怎么办？师大做事常是有始无终，肃反是什么时候结束的，现在还不知道。今天这个运动，将来党打算怎么办，是不是有个结束，是不是只在党内处理，是不是也让党外知道，大家的意见对不对，党至少要加个可否。跟党走，过去有时就走糊涂了，在三反、肃反的时候，就走糊涂了。不要虎头蛇尾、烟消云散，没有结果。我们要跟党走，要告诉我们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不能含含糊糊。

（原载《师大教学》1957年第123期）

1957年4月27日在座谈会上的讲话

傅鹰

北京大学教授傅鹰在北大化学系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质问题的座谈会上作了几次发言。

第一次（4月27日）座谈会上的发言如下：年轻党员如同国民党特务

党和党外人士关系不好，首先是由于“三反”时的偏差。“三反”后，教授们谈话，只要来了个党员，便都相视而笑，说些专门给党员听的话，其实教授们并非在骂毛主席，也许是在谈梅兰芳的《贵妃醉酒》。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斗争时，党员会说，某次我听见傅鹰在议论梅兰芳，为什么不尊重艺术家？这是什么思想？什么根源？所以我对于年轻党员的看法，就同在重庆时对国民党特务的看法一样。特别是对正在争取入党争取转正的人有戒心。他们越多打你几棍子，入党转正的机会就越大。

没有把握不再来“三反”

现在说话虽然已无杀头的危险， 甚至也无失业的危险， 但没有把握不再来个“三反”。运动来了，给你提意见的不是毛泽东、周恩来（要是毛泽东、周恩来提意见，保证愿意接受），而是那些年轻的党员、团员。他们在大会上大骂你一通，骂你三分混蛋，你承认五分混蛋，这才鼓掌通过，事后说是搞错了，他只到你一个人面前道歉。为什么科学家都想到北京来？因为运动中偏差的大小与离北京的距离成正比。我相信党，但不相信个别党员不会作难。不怕官，只怕管。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可以批评人家没骨气，为什么不扛起来？这种批评不对。求生是动物的本性，吊打是“不可逆”反应。

当然不是说所有党员都坏，党员和非党员有一个共同之点：良莠不齐，我最讨厌思想改造

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改造两字，和劳动改造联在一起。有了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现在所谓“改造”，就是要人在什么场合，慷慨激昂说一通时髦话，引经据典，马、恩、列、斯。何必要用任何人都听不懂的话去说人人都懂的事？化

学系只我一个人没上夜大学，受不了。夜大学教员把人都当作全无文化。毛主席说一句话，本来清清楚楚，偏要左体会右体会。煤是黑的——就完了。非要说什么“煤之黑也，其不同于墨之黑也，它和皮鞋油又如何如何”，全是废话，

把不好的思想说成资产阶级影响是不公平的人们有什么不好的思想行为，总说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老祖宗无非是孔夫子，孔夫子几曾教人贪污，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我从小就念孔夫子那一套，不觉得有什么错。张子善、刘青山、高岗也不代表无产阶级。

一个化学家怎么可能是唯心的

我不懂一个化学家怎么可能是唯心的。自然科学自然而然就是唯物辩证的。我看过很多哲学书，很欣赏贝克莱，但他终于搬出上帝来，我就不信他了。

前年我在《化学通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记者按：题为《高等学校的化学研究——一个三部曲》　，载《化学通报》1955年9月号），范长江在北大演讲，说我反对党的领导，至少是对老干部没有同情心。那时我刚从石油学院来，石油学院的老干部有一条公式：我是老党员，你是群众，所以，你是错的。这还有什么可说。石油学院的年轻党员，指指点点，我应该如何如何做研究。受不了。他们要跟我谈学问，还得先学五六年，还要下苦功学呢。在石油学院我跟两个小孩子一起教普通化学，我根据多年经验，建议把某个教学次序倒转一下，那两个小孩子不听，非要照格林卡（按：是苏联教本）的讲。你不听有自由，但反过来却在校刊上批评我学习苏联不积极。其实，我一人看的苏联文献比全石油学院的教授看的还多，他们只看过一本格林卡。

×××“集教条主义之大成”，应作公开检讨学苏联要一板一眼的学，这是×××的主张，他集教条主义之大成。如果这样何必还要师资，开录音机就行了。据闻，×××在党内检讨过种种错误，检讨了什么我们全不知道，不满意。（邢其毅教授后来点明说，傅鹰的意思就是要×××到北大或是别的地方作公开检讨。邢说，×在一次报告中说知识分子“三月不见英美文献，如丧考妣”，这简直是骂知识分子的祖宗；×在另一次报告中公然号召“学苏联就是要教条的学”。邢说，虽然×是中央候补委员，我对他还是有意见。他如果作个公开检讨，很有好处。）

我和党是同奔一个门，事实证明，他认路比我认得好，我自然跟着他走，并没有被领导的不愉快感。

党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摸对

党到现在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有摸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要把我们当自己人，如此而已，并不需要优待 队了薪便感激涕零，那么蒋介石给更多的钱，怎么办？岂不危险？看电影时，特别留着好位子，坐在这种特殊座位里，心里就想：还是把我当客人。用现在比过去的方法教育知识分子，根本不对头。现在比过去好，因此应该拥护现在的政府，这个逻辑用于知识分子就很危险。过去我刚回国时，住了十三间房，五个澡盆，每月六百元薪水。按这个逻辑推下去，我岂不要反对政府？

知识分子就是爱国

知识分子就是爱国。我父亲从前在外交部做事，从小我就听他说，从康熙尼布楚条约到辛丑条约，每条都是中国吃亏。宣统三年我到上海，公园牌子上写着"中国人与狗不许入内"。后来到美国，过国境到加拿大看瀑布，日本人可以自出来往，中国人就不行；我到物料科领药品，那里的人说，"你们中国人学科学干什么？"

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

共产主义我不了解，从书本上看的来说，意识形态方面我不见得全同意，但共产党把国家弄成现在的气派，我拥护它。

但我心里还是有不快，党还是把我当外人。我十分力气只使出六分，并不是不愿意使出全力，是没有机会，还没有和党做到知己。

第二次（4月29日）座谈会上的发言如下：学校里的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重

学校里至今没有建立起学术风气，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浓厚。在教学、做研究方面，教授的把握最大，教授应对学校的一切有发言权，应尊重他们的意见。解放以来，教授没有地位。留哪个毕业生做助教是由人事处决定的，全凭政治水平。入选的机会，党员比团员大，团员比群众大。什么叫政治水平？我以为，爱国，百分之百拥护政府，政治就够条件。人事处全是一帮孩子，不知大学该如何办，不懂哪能不主观？化

学系一个复员军人学生，党员，去年因为侮辱女生，开除出党了，校方处分是留校察看，今年他又在实验本子上大骂教师，我们教研室教师全都认为这回该开除了，人事处不同意。不知人事处凭什么资格不同意。最好废除人事处。如果废不了，至少要他们了解自己的地位，不能掌生杀之大权。教授评级，最后也是由人事处定的。人事处的毛孩子，有没有“术”不知道，“不学”是定了的。不学的人在学校作主，何堪设想？冯新德教授太太神经有病，要求换个清静房。唐有祺教授家人多，要求换个大房。总务科就是不理，我家旁边有一幢大房子，空了一年，也不肯给他们住，现在给新上任的科学研究处副处长（指×××，新入党）住了。

现在是长字辈的吃得开，后果何堪设想？当长，什么人都可以，摆一块木头在那里，它也能当长。但木头不能讲课。当长等于穿一件衣，穿了脱了都无所谓的，长与学问并不成正比，常是成反比的，做学问的人就不是当长的料。

真进步是把意见贡献出来

也不能完全怪学校领导，教授本身也要负责。不顺眼为什么不说？宪法规定了言论自由。毛主席提出百家争鸣以后很久并不热闹，现在才热闹起来。以前没人敢说，偶尔有几个不识时务的人说了，好家伙，我几乎和胡风弄到一起去了，马列主义教研室的人就是这样说我的（按：指傅在《化学通报》上那篇文章的事），不敢说，是没肩膀。很大一部分“进步分子”是光拣领导爱听的话说，昨天还是国民党，今天又申请入共产党，这样的人不只一个，算进步我不信。真进步是把意见贡献出来，把国家办好，中国知识分子有气节传统，不会阿谀谄媚。现在“气节”两字不时新了，说是封建的。三反时，凡是1949年以前的全都要不得。自己半辈子努力培养了多少学生，也全给批判掉了，说是为蒋介石服务。

并非主张教授治校，但应与教授商量我并非主张教授治校，虽然有人这样提了。工作应该与教授商量。这次北大校委会讨论评奖问题，尊重教授意见，决定取消了，这才是民主；但早尊重教授意见，也不必花这么多时间来讨论。校长请教授去喝咖啡等等倒不必。把教授当作自己人，遇事征求意见，教授意见错了可以和他争，如果敷衍敷衍，错了也不驳，我就感到是把我当外人。

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紧张，是党员瞎汇报的邢其毅教授问为什么人民

日报社论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最紧张，我说，这又不知是底下的党员如何向上瞎汇报的，我就不信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比和农民和资本家的关系还紧张。党员瞎汇报的例子很多。周总理有一次说我国有机化学达到国际水平，我说没有那回事，大概又是汇报得不对。[1][1]　转引自龚育之《毛泽东与傅鹰》，载《百年潮》双月刊，1997年第l期。

谈高等学校中的党群关系

董渭川

党的整风运动刚开始，就突出地反映了在若干高等学校里党群关系是不正常的，问题是严重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党是居于领导地位的，既然党群之间有了问题，就有必要首先从领导的角度来检查政策的执行，不这样，问题是难以彻底解决的。

必须肯定，党对高级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也必须肯定，一般高级知识分子八年来在党的教育下，初步接受了马列主义，改变了立场、观点、衷心地拥护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并甘愿为它贡献自己的力量。这都是成功的一面。

从另一面看，一般出身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并且在旧社会里生活了若干年的高级知识分子，具有某些缺点，也是客观的事实，各个高等学校里的党是否掌握了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发展规律呢？在执行团结、教育、改造这一重大政策的过程中，是否经常地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呢？是否做到了从团结为基础来进行教育、改造呢？从执行的效果看，是否产生了某些副作用呢？副作用造成了什么损失呢？我以为，就上述这些问题作一回溯，有可能看出在高等学校里党群关系所以不正常的原因来。高级知识分子在高等学校中占主要地位，并且大多数是党外人士，从党和他们之间来看党群关系，是有代表意义的。

党领导人民解放了全中国，也就把全中国的旧知识分子“包下来”了。“包下来”是事实，并且是绝对正确的事实。因为是“包下来”的，所以既需要团结，又需要教育、改造。

但由于“包下来”的这一提法，在很多人的思想上就有了包者和被包者的区分：包者是受过革命锻炼的，具有汗马功劳的和马列主义修养的老干部；被包者是在政治上、学术上、思想上具有不等程度的反动成分的落后分子，是些社会关系复杂的可疑人物。由这一认识出发，包者就成了改造者，被包者就成了被改造者。改造者具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被改造者具有愧不如人的自卑感。在这种分化对立的形势下，改造者成了统治者，被改造者成了被统治者。被包者对于包者的感觉是冷若冰霜、高莫可攀；包者对于被包者的看法是包袱沉重，梗顽难化。既然包者与被包者有了这些截然不同的思想感情，八年来就有了以下种种的事

实表现。

首先是在高等学校里逐渐增加了大批党团员干部，所有的行政单位和生产单位（系和教研组）都有党团员担任正职、副职或秘书助理等，就在整个学校内构成一个从上到下脉络贯通的组织系统。这样做的好处是，政令易于推行，情况便于掌握。

但是在数量上老干部没有那么多，只好以一些青年党团员充任。大学里的业务是学术，思想领导要贯穿学术，组织领导也要服从学术。一些老干部对于大学以及大学中的学术并不熟悉，至于青年党团员能掌握某一学术的人更为数寥寥。以不谙某种学术的人，勉强安插在该种学术领导的岗位上，不孚众望是难免的。老干部惯于运用战争环境里发号施令的办法，新干部忙于以其有限的见闻不时向其上级汇报情况，旧知识分子尽管被派担任什么职务，因为实际上不属于这一组织系统，就不等程度地形成有职无权反而有责的局面。这种局面不仅使一些旧知识分子牢骚烦闷，并且时常意识到，只要党团员够分配了，就不再需要这批人了。再就是在今天飞速发展的形势之下，每年招收的学生像几何级数似的在增加，谁也没有经验来办理规模这样大的高等学校。可是旧经验被否定了，旧的人也被否定了。一切由新老干部决定，根本不依靠群众，这就难免造成学术空气稀薄、教育质量差以至于方向模糊、朝令夕改等等现象。党群之间的墙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不仅如是，由于急切要求这些从旧社会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抛弃他们的旧的立场、观点， 早日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在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要他们“排队洗澡”，说那时教育部领导人的指示是，尽量用热水烫这些人，只要烫不死就成。于是让这些人在大会、小会上一次又一次地作检讨，一面用广播、大字报揭露他们的“劣迹，一面发动许多青年党团员（助教、学生）给这些人“搓背”。在检讨会上通不过，再跟到老教师的家里去，观察他们的言行，只要有一言半语不合，第二天在检讨会中再加上新的罪名， 甚至以莫须有的事实逼着承认。 有些人幸而“过关”了，有些人一直留在“关外”。运动过后，领导者认为在高等学校里把无产阶级的红旗挂起来了，而这些老教师认为蒙受了终生不忘的奇耻大辱。他们只感到了党的威力，却感不到党的温暖，党群之间的墙就更加深了。列宁是掌握了旧知识分子的发展规律的，他承认这些人只有通过他们自己的业务来接受马列主义。可惜这样的话只见于我们的书报中，而我们的生活实践却要这些人通过一场狂风暴雨的运动就变为马列主义者。我们只注重了改造，把团结和教育都放在一旁了！

经过思想改造运动，有些老教师全部被否定了，不能再开课了，他们对党团员心怀戒备了，这就加重了他们的自卑感和抑郁感。有些年青的党团员，骄傲自大起来了，更看不起老教师了，因为过去给老教师搓过背，对于老教师的一切都从“帮助”出发，根本想不到再向他们学习点什么了。某些开了课的老教师，也是经常受指责，被反映，这是缺点，那是错误，他们只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照着规定的教学大纲或者从苏联译过来的教本教条式地宣读，而不敢发挥自己的意见了。

并且教研组也通过集体讨论的方式，紧紧控制着大家“照本宣科”，不允许有任何活动的自由，这就更难发挥老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了。

但时间长了，牢骚不满总不免流露一句。“肃反运动”到来之后，由于对待敌我矛盾和内部矛盾两者没有明确的界限，把某些内部矛盾也不等程度地当作敌我矛盾处理，有些人就更受了委屈。被斗错了的不必说了。在具体对待内部矛盾的问题上，曾有青年领导人向群众布置斗争策略时提出了三个大字，就是“臭、垮、服”，意思是先要使被斗的人在群众中臭不可闻，然后要他垮下来，再使他低头认罪。这不是斗争敌人的战术吗？到哪里去找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这一运动所起的副作用：一是使所有的人（不光被斗者）俯首就范，从此再不敢有任何异议，所以在运动过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就连很熟的朋友见了面，也只是谈谈天气，再也不敢提到国事、校事，唯恐被外人记在账上，说不定哪一天又挨整。二是在运动中群众被发动起来，谁不积极就是不认真肃反，狂风暴雨，深文周纳，用尽一切手段逼供，等到风息雨止，冷静下来，尤其是领导上宣布向被斗错了的人道歉以后，大家在良心上感到不安而难以自处了。不管怎样，客观事实的表现是伤害了群众的相互团结。三是从那些年青的党团员看，他们受到了些什么教育，是值得深思的。至少说，再要他们和这些旧知识分子团结在一道，就更困难了。可能有人说，这是有批评有斗争的团结，那就要问，团结的效果在哪里？所看见的是，彼此间的墙更厚了！

把上述的一切综合起来看，历次的运动也好，日常的生活也好，在一些高等学校里，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和党中央号召的“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把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有距离，甚至可以说有些背道而驰。其结果是什么？我大胆地说，是损伤了国家的元气！

在周总理作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后，在高等学校里有了一些转变，但所转变的多限于形式上的物质上的照顾，而不是领导思想上

通过具体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来尊重老教师，信任老教师，发挥每一老教师的潜力。形式上物质上的照顾，在一般老教师眼中是轻如鸿毛的。

毛主席和党中央要在这次党的整风运动中消除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这一决定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的政党能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改正自己的缺点，有谁能不佩服党的英明伟大呢？

可是有些老教师对于党的整风顾虑多，信心少，这又是什么原故？有人说，现在整党员，假如我们把话通统说出来，将来再整我们，怎么受得了？有人说，某些党团员的心胸狭窄，现在和他们结了仇，将来打击报复的机会和方式多得很。有人对学校中的党组和领导人丧失了信心，认为整风只能使他们在外表上改变一时，即以“教授治校”问题为例，大家要成立什么组织都可能实现，但给你多大权限就成了问题。这类的想法都是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产生的，是不难理解的。要纠正这些错误的想法，只有拿出事实来，有人在座谈会上公开这样表示，他抱着不怕打击报复的“豁出去”的心情，才敢把心中的话说出来。这种种都反映着，过去很多人是在积威之下敢怒而不敢言，甚至有人说，我已经麻痹了，承认了现实的一切，也就不怒了，反正我也活不了多少年了。现在许可说话了，有些人说起来不免带有情绪，要他们转变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也还需要一段过程，如过去对于他们一直是缺少团结的　愤有某种特殊条件而没感受到这种痛苦的人，责难这些旧知识分子缺少主人翁感，缺少“当仁不让”的大丈夫气概，这让另一些人听来，就不免啼笑皆非。

根据上述的这些情况，所以我感到我们的党中央有必要在整风运动中把过去各地执行的对待高级知识分子政策的路线与情况切实检查一番，并大力强调今后一定要在团结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教育、改造，以免再蹈既往的覆辙。不然的话，墙是拆不了的。

我说这些话，绝无掩盖旧知识分子有某些缺点的意思，也绝无否认历次运动取得重大成就的想法，更绝无否认一些老干部和青年党切员忠诚为国的心理。我写本文唯一的动机，就是希望从党的领导角度来研究过去对待高级知识分子政策在执行中的某些问题。

一个旧知识分子的一管之见，有很大的片面性，是难免的。倘使承认我所看到的片面也是客观的事实，那末，是不是也值得研究研究呢？

（原载九三学社师大区支社整风资料〈七〉）

三个问题

徐中玉

（后改为“积疑三问”。文中（ ）内的字是他在原稿上涂去或涂改过的字，这些字有的看不出来了，以（××表示）我爱共产党。没有共产党，不可能有今天的新中国，也不可能有明天的更美好的新中国。但几年以来，我对共产党的某些工作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原为疑问）。

很想提出来，可是往往话到嘴边，仍旧吞下去了，原因也简单，其一是惟恐片面。

自己考虑也许用不着大惊小怪。其二是不知所之的“棍子”和围剿都已挨过。既如此之不易，犯不上重蹈覆辙。不过自党中央宣布展开整风，各方面开始鸣放出来，非但胆子壮了不少，具体情况也较前知道得多了一些。我想，自己既有疑虑，就应当提出来询问一下，即使连一得之愚都没有，大概总还可供参考，以作讨论或批判的材料，所以决定（以上这段原稿涂去）现在就把下列三个问题先提出来，仅供党作为整风的参考。

一、某些偏差从那里开始产生

常常听说，党的一切决定都是完全正确的，工作中如有偏差，那是“个别党组织”或“个别党员”的责任。我也认为，解放以来党所决定的大政（原稿为总路线总方针）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例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对资改造、肃反运动、工业建设等等，都是如此。但党和关于执行方法的一切决定，却就未必都是完全正确（的）。何以见得？例如思想改造中的利用学生和助教像贫农斗争地主那样的斗争老教师，例如肃反运动中的往往以近似乎“莫须有”的（罪名）事情对有些无辜者大斗特斗，这两种很（原稿为极）大的偏差，难道也都可以说是“个别党组织”或“个别党员”的责任么？很明显，这不是一校一地的偏差，而是全国性的偏差。这两种做法，却是大伤了知识分子的感情（我想无疑各地各校负责执行的党员同志当时也有不少人已能看得出来），真是一件多大的事情，在严格遵守组织纪律的党员负责同志和基层党组织是（怎么）决不敢擅作主张的。现在看来这两种做法（都）必是奉行上级党（原稿为中央）有关方面的指示，（下来）所以各地各校才如此步调一致，（的）偏差一段。又如在工作上和在各种待

遇上党内外往往不够（是一律）平等，把“德”字看得过于狭窄，几乎成了党员的专（利品）有物，这（无疑）也是全国性的偏差，这种偏差难道就和上级党（原稿为中央）有关方面的（总的）想法与安排没有直接关系么？

偏差有两种，一种确实是“个别党组织”或“个别党员”的偏差，另一种则确实是全国性的偏差。 因此负责者也有两种（人） ：一种确实是“个别党组织”或“个别党员”，另一种则应当是上级党（中央）的有关方面。我感觉直到今天为止还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即把分明是全国性的偏差说成只是局部的个别的偏差，分明主要应（当）由上级党（原稿为中央）有关方面负（主要涂去）的责任（的）却不大公道地（原稿为含糊的）一律要各个基层的党员负责同志去承认下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这样做人们就看不出来？难道这就是维护党有关×面威信的好办法（涂去）？

（事实上，人们早已看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党员负责同志，或党组织（大概）是（因为）“有苦说不出”（只好代人受过），而由于不过是（不过×）“代人受过”决不会真有（×头）苦头吃，乃是一种“心照不宣”式的认错，所以他们尽（×）管在运动过后会把偏差的责任一揽子包下来，（好）人们的感觉（印象）都始终是（好）“你（都）倒轻松得很”，因为认（错者）本来（胸）心里有数，（并无切肤之痛）大不了换个工作单位称数（涂去）沉痛不起来。人们（×）时常看到：运动过后这些干部中有的从甲校（的）调到乙校，或丙校的又调到甲校；（这些干部）他们都（××地）当众认过错，说是一切责任都归他负，（他们×好像都要或准备吃些苦头，不料）可是事实则是（×）在调来调去之中他们大都升迁几级了。（×××××）请问这样的认错怎么能服人？（解决问题？）这（那里）似乎不能算是老老实实的态度。

已经有人正确地提出过，不能强调（ ）党员（×）是“特殊材料”作成的了。

“特殊材料应该是（×） 结果（绝） 而不是（×说）原因。同样的道理，上级党（中央）某些执行的方法的决定也很可能是不完全正确（或完全不必正确）的。党的智慧当然比任何个个人都强，但智者千虑（或）有一失的道理对党来说恐怕也还是适用（×党）的。党的威信决不会受指于千虑中的一失或几失，只要其他九百九十九虑或（绝大多数×虑）九百九十都完满成功就非常了不起了，（笼统地说要人们承认）党的一切决定都（是）完全正确（的），稍加（有）怀疑便（给）扣

（上）人（反党反人民的）大帽子，这不能说服人，并且也全无此种必要，因为这样做只有害处，没有益处。

上级党（中央）的某些方面如果真已在某些工作中（是否）造成了全国性的偏差，我以为，这些方面的组织也好，负责人也好，就应主动（承认自己才是真正的主要负责者加以说明，再也不要借着组织纪律之类，而且（真要）上级党（中央）也要使人们（真正） 看到（办错了事的） 所谓负责乃是真负责）不要再让有些人（只是嘴上说的漂亮甚至办错了事还能升级。）党的传统精神是老老实实的。千千万万人民的眼睛每时都看着党，党的每一疏忽都会对社会风气发生巨大的影响，说会使热爱党的人们产生一些（不）原可避免的疑虑。说真的，难道执行方法上的有些偏差不是经上级党（中央）就已开始产生了么？

二、为什么官职要越设越多

解放以来，特别是近两年来，有种非常突出的现象，即任何机关学校团体里的各种官职却越设越多了。在不少基层单位里，已出现了“官多于民”的现象，譬如说，科长多于科员。我曾经推想过官职为什么会越设越多的原因。摊子大，事情多，需要较多人来分工负责，这大概是最主要的原因吧，可是也不尽然。不是现在已有许多名义上的“首长”在诉有职无权的苦么？既然实际上仍只有一两个人在管大摊子，而且并非一定管不了，那（么）又何必上上下下硬（要）安上一大串的“首长”

（呢？硬安上一大串首长，不但是浪费人力，又造成了劳逸不均，有职无权，或公文旅行等等矛盾，真是何苦来。）然则这样是否为了统战？大概也是的。在目前，非党人士想做官，做到了官便认为已被尊重的人，的确还不少。为统战而多设官职，对于这些人虽然能够有些团结之效（的），可是这个办法究竟好不好？是否这样能收到全面团结、真正团结之效？该团结的人很多，就是再多设些官职也还是不够的。纯用官职来统战，官职越多就越不稀罕，原有官职之欲望不断提高，难道官阶也可以漫无限制（继续不断）的增加，提高么？何况，统战本来不能也不必要利用官职。对于绝大多数非党知识分子来说，我相信他的所要求的乃是足够的信任和必要的工作条件，使他们能够充分发（展）挥所长，为祖国效力，并（×）不（是）在于官职，以为“给你官职”

就已尽了统战的能事， 由于到底不能有那么多的官职好给， 也由于不适当地看待（低）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愿望，结果反而会达不到统战的目的。

这样做有时的确还是为了便于酬劳。对革命有功的人当然不少，年资既深，有才能的因（×）要提拔，成绩一般的似乎也非照顾一下不可，甚至对革命有功者的眷属，似乎也非照顾一下不可。这就得有更多官职才能配给裕如。这样做反对那些没有功却有苦劳的人自然是一种安慰，但也有不少副作用。显著的一点便是才职未必相称 酚下位的往往比领导者更能做事。于是一方面滋长了可以靠革命吃饭做官的思想，（极×）另一方面便产生了“用人唯亲”的牢骚，以致影响到工作的积极性。结果是安慰了一些（××）人，也（却）疏远了许多人。

看来，由于事繁责重，官职需要多设一些是肯定的，但却决不需要像目前这样重重叠叠一大堆。“首长”越多，官僚主义就会正比例的增加，内部矛盾也会层出不穷。我以为，也再不能用官职来作为统战的唯一法宝和酬劳的礼品了。当看到某些会议增加了若干（代表×××）代表或委员（×数）而被说成是民主生活不断扩大的明证时，我时常想不透这句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算是说了什么问题。值得注意的倒是曾经批判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向上爬”正在越来越多的人头脑里（缓）重新滋长。这不能否认和官职越设越多的（措施）做法有密切关系。说真的，难道这种做法不能证明党中央在贯彻执行统战政策和干部教育方面还是相当形式，办法很少么？

三、入党的首要标准是什么

解放七年多来，共产党发展很快，听说党员人数比以前已增加了一千万人，共产党的力量是越强大，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越有保证。但在迅速发展当中，人们有时会感到究竟什么是（人们）争取入党的首要标准还不明确。

这里谈的在实际上不够明确。文件上当然是很明确的。也只是谈知识分子圈内的见闻，别方面的情况可能不是这样。

人们感觉，党在知识分子中间似乎宁愿（×）要这样一种人：唯唯诺诺（唯命是听，千依百顺）的人。（历史单纯的人，业务不错的人，而在这中间），唯唯诺诺似乎已成了入党的（×）首要标准，真正的革命觉悟和必要业务能力则似乎已成为（×）次要标准。当然，绝不能说凡知识分子入党的都是唯唯诺诺的人，此中确有些（不少）是（××）值得别人钦佩的，但这种人似乎还不够多。唯唯诺诺不等于组织性纪律性，乃是一种察言观色，奉迎唯恐不周的表现，他们对组织或在党领导面前是（以）低声下气，唯唯诺诺，回到群众中去却可以摇身一变一成

凛不可犯，神气活现的老爷。这些人的所谓革命觉悟实际只是一（大堆）嘴好听的名词和教条，业务能力往往很差。

人们看到，哪里都有忠心耿耿、埋头苦干、业务能力很强的人，只是因为他们敢于大胆的对党的工作提意见，对某些党员领导提意见，因此就绝少能够入党的。

也许他们已申请入党几年，可是不但没有批准，甚至几年中连理也不理。也许他们心愿入党，因为看来党并不欢迎这样的人，（申请）为免徒劳没趣，所以也不申请。

这样的人有时可以被统战为什么代表什么委员，好像很尊重，给人的感觉却是“敬而远之”“高高挂起。”

难得也有提了些意见仍接纳入党的人可是往往在入党之后他们就开始默默寡言了。使人感到朝野之别竟如此判然。

说真的，这几年来党虽开始接纳了若干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可是由于上述情况的存在，在群众中的影响其实并不如理想。（也许，恐怕）固然（只是）多了一些人，可是有时却也相应地多出了一些墙（而已）。入党的要求一般似乎远不如前几年那样迫切了，“这样子不入也罢”，这就是不久前我听到一位曾经迫切要求入党而未成功的同志的话。我知道这位同志（×忠）无论在那方面来说都要比某些已入党的（高明）强得多，（决不能说）他的这种想法决不能说是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又在抬头的结果。他的唯一“毛病”就只在于向党员领导的缺点提意见。

为什么唯唯诺诺的人很容易入党，为什么忠心耿耿（的人），兢兢业业的人只因敢提意见就不能入党呢？难道实际上的入党（的首要）标准不应该和文件（上）所载的完全一致么？

（××疑）三问已了，可能是非常片面，不正确的。问的意思却在于热望党的工作做得好，党的力量更加壮（强）大。（我深刻地体会到帮助党的整风），党的整风无疑将给我们国家各方面的工作带来种种改进，共产党在我们生活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只应加强而绝不可以削弱。而我们每一个人的严肃的责任在目前便是实事求是地大胆地帮助党的整风。

1957年6月4日

改变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清华）

叶笃义

叶笃义在会上谈了两点意见，一点是他认为清华大学是党群关系较好的一所学校，尚且问题很多，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问题，应该更加重视起来。他认为应把五百万知识分子的问题，摆在一个重要的地位，并建议政协全国委员会成立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处理知识分子问题。另一点是，他认为在学校中，不需要有党派的组织活动。

他十分赞成改变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他说，过去党委会管得太多，如果说党与非党之间有一堵墙，墙的来源，主观上有些关系未处好是一个原因，但是不是因为有了党的组织，无形中就形成了一堵墙呢？他认为一个人多一种关系、多一种身份就多一个矛盾，如校长就是校长，教授就是教授，两人之间关系就简单些，如加上一种党派关系，关系就复杂些了。我们如果不以党派党员身份出现，关系就简单些，矛盾就少了。叶笃义的这一意见，是包括主张共产党员在学校中也不以党员身份进行活动。他说，党派要常开会，起码对六分之五的时间的保证就有影响。问题是在高等学校中搞这些组织，是起了推动教学的作用呢，还是抵消了教学的作用？七八年来，民主党派组织生活都过得不好，这一问题长期不得解决。除了主观原因之外，客观上，每半月或一个月开个会过组织生活，对知识分子有无必要？他对于民主党派学共产党的组织生活那一套，是不是正确的方向，表示怀疑。他对于民盟组织在大学中的活动，究竟对学校有帮助呢，还是添了麻烦？也表示怀疑。

如果学校无党派关系矛盾也就少了叶笃义说：我在清华大学讲的话引起了误会，需要说明一下。

我讲的不是各党派退出学校，以后不再发展了，而是怀疑到党和民主党派在学校内如何发挥组织作用的问题，也就是党如何进行领导的问题。比如一只火车由此岸要开到彼岸，只要掌舵的方向掌对了，不管如何开，也不会开错，党的领导应该起舵手的作用，主要是进行方针政策的领导，确定方针政策，交其他单位去执行就够了，如要学校培养符合规格的人材，党和民主党派谁去执行都可以，因此党领导国家，在中央主要把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搞好，在省市主要把省市代表大会和省市人民委员会搞好。在机关和学校，党派不要成立基层组织，但可以发展成员。现在大家提出要拆墙填沟，由于在学校多一层关系，多增加一层矛

盾，如果学校无党派关系，只有教师之间的关系，关系简单些，矛盾也就少了。

（原载《光明日报》1957年5月8日、6月8日）

曲折的道路

张岱年

50年代之初，中国人民大学聘请苏联专家讲授“马列主义基础”及辩证唯物论，教育部指示北大、清华各派一个教授到人民大学听苏联专家讲课，清华大学让我到人民大学听专家讲课（北大听苏联专家讲课的是郑听）。同时辅仁大学邀我到辅仁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北师大聘我为兼职教授，讲“新哲学概论”。当时北师大尚在厂甸，我旧地重游，甚感快慰。当时每周奔驰于四校之间，工作非常紧张，但精力充沛，不感疲劳。当时公共汽车不甚拥挤，乘坐比较方便。次年，在清华大学亦开讲“马列主义基础”课，照本宣讲而已。1951年在清华提为教授。当时清华大学哲学教授还有金岳霖、冯友兰、邓以蛰、沈有鼎、王宪钧、任华。周礼全任助教。金先生和冯先生都努力学习辩证唯物论哲学，思想上有重大转变。两先生在哲学上本来都已成一家之言，而今努力研读马、恩、列及毛主席的著作，他们的谦虚态度是值得钦佩的。

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清华的文、理、法学院都并入北京大学，北大亦由城内迁至燕京大学的旧址。全国各地的哲学系教师都集中到北大，由金岳霖先生任哲学系主任。金先生本来不习惯于事务工作，这时每天到系办公室上班，统筹全系工作。

南方的朱谦之、宗白华、熊伟、黄子通等都来到北大，汤用彤先生任北大副校长，兼任哲学系教授， 郑昕、 贺麟本系北大教授。1953年北大也聘请了苏联专家，讲“马列主义基础”，由我和黄丹森担任辅导，讲“马恩列斯著作选读”。之后，成立了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冯友兰先生任教研室主任。教研室同仁集体准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计划开设新内容的中国哲学史课程。

当时北大教务长尹达同志参加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讨论会，考虑讲课教师的人选，建议由冯友兰先生和我担任课程主讲，于1954至1955年度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冯先生讲先秦至汉初，我讲汉初至明清，是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开设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当时庞朴、萧萐父、乔长路、申正、吴乃恭等同志都来旁听。次年，我专讲宋元明清一段，编写了《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1957年至1958年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关于宋明哲学史的论著。

当时教研室规定，每人每学期都须撰写一篇有关哲学史的论文。1953年我写过关于墨子思想的论文，无甚新意。1954年撰写了《王船山的世界观》，内容比较深刻，是解放后第一篇关于船山哲学的专著，详细分析了船山的唯物论学说和辩证法思想。教研室开了讨论会，邀请贺麟同志参加评议，贺先生说：我原来认为王船山哲学是客观唯心论， 看了这篇文章， 我同意船山是唯物论。当时金岳霖先生担任《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主编，提议在哲学专刊上发表此文，因原稿较长，仅发表了其中讲唯物论的部分，题为《王船山的唯物论思想》。

1955年我又向教研室提交了论文《张横渠的哲学》，详细论述张载的气化学说，肯定了其唯物主义本质。冯友兰先生将此文推荐给即将创刊的《哲学研究》，发表于《哲学研究》1955年第一期。此文曾引起争论，我又写了两篇答辩文章。1957年春季，我又发表了《中国古代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对于气、太虚、天、道、太极、理、神、本体等八个范畴进行了分析诠释 短而又发表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几个特点》 ，对于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倾向有所阐发。1957年1月，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在讨论会上我发言谈论中国哲学史的范围与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后来发言稿收入《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中。1956年又撰写了论文《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短而又应湖北人民出版社之约，写了通俗小册《张载——中国十一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约，写了《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都在1957年出版。当时我的工作是紧张的，心情是愉快的。新中国成立，彻底解决了一百多年来的民族危机，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感到极大的鼓舞。50年代初期，学术界充满了新气象。我和金岳霖先生、冯友兰先生一样，都愿为新中国的学术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

1956年党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非常高兴，更加欢欣鼓舞。

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我曾发言说，先秦时代曾经出现百家争鸣，达到学术的繁荣，现在又要实行百家争鸣，这是令人鼓舞的。现在的百家争鸣应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的百家争鸣。这是我当时的认识。嗣后，我访问熊十力先生，熊先生却告诫我说：你要注意，情况是复杂的；你如不在意，可能有人以最坏的污名加在你的头上。当时我以为，我坚持唯物论，又拥护社会主义，不会有什么问题。不想1957年秋季，我遭受了平生第一次严重的厄运。1957年党号召群众给党提意见， 我很感动，觉得党如此信任群众，应将平日感恩说出来。

5月17日在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会小组会上，我发言说：三反肃反，我都积极参加，但觉得也有问题。清华搞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完全是正确的；但让一些老教授作思想检查，如冯友兰先生、潘光旦先生等，检查了三次才通过，未免伤了老知识分子的感情。肃反运动我也拥护，本系开了批判王锦第的批判会，后来宣布，据调查，王锦第的问题早在解放初期已经交代过，没有新的问题。为什么不先调查后讨论呢？不先调查却先开批判会，这不合适。我又盛赞“双百”方针的英明。当时也无人反驳。经过了暑假，　到9月初，系里忽然开会对我进行批判，认为我反对三反，反对肃反，宣扬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于是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当时我完全陷入迷惘之中。在批判会上，一些人深文周纳，给我加上很多的罪名，剥夺了我的教学权利。一些熟人睹面如不相识。但是公道自在人心，前辈中如金岳霖先生、朱谦之先生、唐钺先生，仍以常礼相待。老友如张恒寿、潘炳皋、王维诚、孙楷第等，仍能维持友谊。 周礼全同志知我受诬， 给我以慰藉。教研室派给我的工作是参加《中国哲学史资料汇编》　的资料选注工作。迟至1962年7月14日，宣布摘帽，可以参加教学工作了，　但仍难以发表文章。至1979年1月，党拨乱反正，重新审查，宣布1957年实属错划，完全恢复了我的名誉和待遇。

1958年8月下放到北京郊区黄村参加劳动，　有些农民知道我划为右派后，私下对我说： 你不就是说了几句真话吗？ 对我表示同情。农民同志的纯朴令我感动。

“五十而知天命”，我年近五十竟遭此大厄，才知道人生确实有命存焉，实亦由自己狂傲不慎所致。在1957年至1979年的20年中，我完全放弃了对于哲学理论问题思考，正在精力比较旺盛的时间，却完全钻入故纸堆中，枉费了光阴，这是深感痛惜的。

1963年秋季，为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从上古讲到近代，讲了两个学期。1965年参加北京近郊区“四清”运动，到朝阳区王四营公社白鹿司村参加“四清”工作组，与任华同志同组，和农民同吃同住。农村生活比较艰苦，颇受农民的热情接待。当时到王四营参加“四清”的还有郑昕、周先庚、周辅成、熊伟、桑灿南等。

1966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开始，受命回校。北大东南门旁贴了一个纸条：“资产阶级教授靠边站。”我们一回小吠靠边站了。

一开始，哲学系老教师在一起开会学习，不久就分为两组，一组是

据说有问题的，如我和冯先生、洪谦、熊伟、沈履、周先庚、周辅成、黄丹森、朱蒙、吴天敏、桑灿南等；一组是据说没有问题的，有郑昕、王宪钧、任华、宗白华、齐良骥、黄子通等。有问题的一组由黄丹森任组长，每天清晨到校园内扫地一小时，然后开会学习，写检查，抄大字报。没有问题的一组，后来黄子通也被揪出来了，原来他曾参加国民党，曾任区党部的委员，在外调中发现了，他冒充进步，终于被发觉了。

宗白华也受到批判。我每天早晨到校内“一院”扫地，然后学习。不久冯友兰先生病了，住进医院，两月后出院，仍参加原组学习。我向冯先生表示慰问，但也有人对冯先生冷眼相看，如不相识。当时哲学系揪出所谓“黑帮”，共十几个人，以冯定及王庆淑为首。他们每天拔草，接受批斗。当时很多学生到老教师家搜查，称为抄家。　9月初的一天，哲学系五年级的一帮学生由助教庄印带队到我家搜查，闹了一上午，抄走了日记及笔记卡片等，而没有抄去我的著作手稿，这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冯先生被抄的次数更多了，但未动他的藏书。到1967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一周年，哲学系文革领导小组宣布：张岱年、黄丹森、汤侠声、叶朗、吴天敏五人检查得较好，予以解放，从此我们五个人不扫地不抄大字报了。我遵命参加王宪钧、任华、曼成书等的小组学习，每天看大字报，听大喇叭广播，读《毛选》。1968年8月初，　哲学系文革小组令我换房子，从原住房迁出，换住一间半的小房间。我不敢违抗，遵命以大换小（其实原来也不大），于是卖掉四平板三轮车的旧书，又卖掉沙发。当时家具店不愿收沙发，必须搭上一个书桌，总算勉强安置下来。

当时北大两派斗争激烈，　1968年8月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那天晚上，让我们迎候欢迎，等到深夜，一个工厂的宣传队到了，人们列队欢迎，我也参加在学生队伍中，接着开会，师生表示欢迎，我也说了两句欢迎的话，一个工人立即说，你们资产阶级教授没有发言权。我就不敢再说了。天天开会，过了几天，宣传队员又问我们，你们资产阶级教授为什么不发言呀？这令我确实不知如何是好。王宪钧同志问我，不说不行，说了也不行，这怎么办呀？这是老教师的共同感受。有一天，参加宣传队的某一工厂的领导同志魏书记找我谈话，对我说，你们老知识分子还是有前途的。这给我以莫大的安慰。当时我是参加群众学习的，还有不少老教师被关进监改大院，俗称牛棚，如冯友兰先生、冯定同志等都不能参加群众学习。后来，将哲学系教师都集中到38楼居住，每天开三段会，每天晚上要做思想汇报。1969年9月末，　宣传队号

召教职工到江西部阳湖畔的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名单上有我，我就整理行装随着队伍乘火车前往江西。到鲤鱼洲之后，哲学系与历史系共组成第八连。住大草棚。初到鲤鱼洲，参加运石子、编草帘、插稻秧、修水坝等劳动。

因年过六十，遂编入老年组，从事种菜劳动。同组还有王宪钧、周先庚、桑灿南、吴天敏、李长林等。鲤鱼洲土地是红土，有雨是泥，无雨如铜，泥地很滑，我经常摔跤，有一次滑倒，伤了左胫，痛了一百天才好。八连常让老年人值夜班，夜间坐在草棚外守望。我经常值夜班，夜阑人静，万籁俱寂，一片宁静，颇饶静观之趣。

仰望天空，星云皎然。多年以来住在城内或近郊，房屋比栉，很难观到星斗，今一片空阔，仰望天空，北斗在目，另有一番情趣。1970年10月，八连领导宣布：石坚、张岱年、　汤侠声等回校，于10月3日起程北归，回到北京。在鲤鱼洲整整一年，冯定、王宪钧等仍留在鲤鱼洲，次年才回京。

回到学校之后，参加工农兵学员的辅导工作。1972年，毛主席指示："要学点哲学史"，于是北大接受了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的任务，组成写作组，由冯友兰先生、楼宇烈、朱伯崑和我参加。分配工作，我负责撰写宋元明清部分。此书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

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之后，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人民都无比欢腾，我感到获得一次精神的大解放。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深感研究学术前途无望，此时研究的宿愿又复活了。

1978年《哲学研究》复刊，主编丁健生同志邀我写一篇文章，于是写了《关于中国封建时代哲学思想上的路线斗争》一文，这是我在学术刊物上重新发表论文之始。1978年12月，在太原召开了第一次中国哲学史讨论会，成立了中国哲学史学会，我被推为会长，任继愈、石峻等任副会长。在这次会上，我提出了《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理论分析方法》论文。

197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重新招收中国哲学史硕士研究生，由我主持考试，共取了程宜山、王德有、陈来、刘笑敢、吴琼、陈战国等十人。我为研究生讲了两门课程，一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二为"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当时友人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姜法曾同志随班听讲，并做了详细笔记。之后，我依据我原来的讲课提纲及姜法曾同志的笔记整理成为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一书，又依据讲课提纲，参考姜法曾同志的笔记，另加增补，写成《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一书。

1978年党中央拔乱反正，重审历年的冤假错案。负责到北大审查错案的是汪小川同志。　　1979年1月，北大党委宣布张岱年1957年属于错划，予以改正，于是恢复了我的名誉和待遇。我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

蒲梢沧桑（节录）

傅振伦

错划“右派”前后

1957年5月初，　中央发动党的整风运动。21日，中共北京市委邀请各界民主人士座谈，征求对共产党的意见；27日，又广泛征求党外人士的批评和建议，以帮助进行党的整风。中国农工民主党李振球在中山公园纪念堂主持文物界座谈会。我因在去年9月22日向党组织递过入党申请书，　也响应党的号召，应叶恭绰、齐念衡之邀，本着“知无不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继王雪涛之后，慷慨陈词，作了10分钟的发言，事后如实汇报了历史博物馆党组。不料有人添油加醋，报告了文物局整党小组（据徐彬如透露）。后来这个人不但邀功入了党，还越级提升了官。

1956年5月26日，　我曾在中南海怀仁堂聆听陆定一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报告，至8月11日，文物局又布置学习这一重要材料。在这次鸣放之时，5月19日，马非百应邀到文物局发言，次日邀我和沈从文发言，都由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主持座谈。沈从文说了一番肯定成绩的话，我也接着说了正面的话，夏衍插话说：“今天我是只带耳朵来听逆耳之言的，正面的话不必说，昨天马非百的发言就很好！”我才接着说：　“文物局把一批收到的古印玺600多件，本来该拨给历史博物馆，不应拨给故宫博物院。领导要尊重专家。马衡先生办博物馆多年，在生前，因事调到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死后才受到重视，组织人力，整理他的遗稿。考古发掘出土的残砖瓦、五铢钱等物很多，当该和国外博物馆交换或处理。”并建议“恢复中国博物馆协会”。

此后，　在大小批判会上，我因此作了几次违心的检查。9月20日，在文化部大礼堂召开大规模的批判会。王冶秋批判我“对领导不满，妄想篡夺领导权，想与组织平起平坐；参加文物工作而不知爱护古物”等，还说我集右派言论之大成来传播，是个“文抄公”。并妄说我收藏着12件成化彩碗，想出让谋利（按非事实，我无力购这些珍品），斥为第三类右派，当降为副研究员。

1958年3月对我作结论时，　王冶秋说：“自1936年以来我就认识了傅振伦。他是个有正义感的人，就是解放后不重视学习，说了些过头的

话，倒不必划右派吧！”

可是康生， 这个对党怀有野心与江青同流合污的大坏蛋，1942年7月15日在延安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后，就大搞逼供信，扩大“反特”。1945年中共七大开会之际，清算彭德怀同志历史问题，又是他。这次他又唯恐天下不乱，搞极左主义，胡说：“历博傅振伦和马非百，知识最大，待遇最高，若不划为右派，岂有此理。”便给我戴上“右派”的帽子，从此着凉倒不患感冒了 饭把我降级又降级，从研究员降为助理员，王冶秋不敢得罪他，乃默而不再说话，于是划马非百为右派三级，把我划为五级。在宣布结论时，陈列部书记王镜如用一口清丰土腔土调说：“你傅振伦号称专家，我们是‘大年初一捡个兔子——有你也过年，没你也过年’，你有什么不得了的？”

1957年9月， 我们就被赶出天安门“红区”，调到中华书局整理古籍。在历博陈列部书记王镜如倡议下， 单位迫令我让出阜成门内宿舍北房4间，迁到外院原军委托儿所浴室阴暗的小屋里， 一家5口局促于一间之内，馆长任行健来自山沟里的老婆和邻居呼我为“老右派”，呼我老伴为“女右派”，呼小儿永光为“小右派”，时加凌辱。1964年，又迫令迁出阜城门大街51号宿舍，乃在东总部胡同42号中华书局宿舍里住了20多年。

中华书局本是1958年7月27日与同列40多单位从文化部下放到北京市管理的。

在周扬倡议组建40万大军整理中国古籍时， 又回到文化部来。1958年9月。党组把马非百和我从中国历史博物馆调到中华书局，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分配我在古代史组工作，曾出版了我旧作《刘知几年谱》；这是第四次再版校定本。又整理印行了马衡先生《凡将斋金石丛稿》；郭沫若写了序文。更负责编审了何竹淇、马长寿等著作。但人事室主张右派分子应以劳动锻炼改造为主，所以我经常被派去服杂役，如帮厨、种菜、割麦、养鸡、开荒。

三年困难时期，党照顾知识分子，每月津贴白糖、黄豆，号称“糖豆干部”，我也受到优待。冬季下放到南口农场，挖石填土以种苹果树，还冒寒负筐到处捡粪，往往见不到马粪，步行几十里常常走到沙河边。有一天忽然接到市府通知，因生活资料缺乏， 减少干部劳动，要求提前晚饭，7时上床安眠，也停止了学习。不久，回到了书局编辑的岗位。

1964年1月，　　全国农村开展“四清”运动，贯彻农村社教“二十三条”，中心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华书局干部下放到河南林县（今林州市）、1966年3月，　我则参加了文化部的四清参观团。至党中央公布《五·一六通知》，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华书局下放者回京大搞运动，抓黑帮，破四旧，批斗“公安六条”分子及当权派。打、砸、抢风行一时。9月6日，学习“十六条”（即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次年部队参加“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

1月5日，工人宣传队进入了商务、中华两出版社，工人造反夺权，2月1日成立革命公社。书局黄葵（名守义）揭发我曾到历史博物馆串连及右派事，揪出来，诬为“公安六条人员”　，都关在农业大学（今翠微路2号）的大楼里，而派我为“黑头”。我天天领着大家早晨向毛主席“请示”，晚上“汇报”，背诵“老三篇”，吃饭前，先“认罪”。开会时，唱《毛主席语录》歌曲。每开会时，他们争抢立后排，怕站在前排受到“造反派”的踢打、辱骂。因奉行“毛主席语录不过夜”的指示，接到新语录，即列队外出高呼，走到公主坟才回来，深夜亦如此。每星期六才准回家，回家期间还要向街道办事处汇报。工资也只发生活费。

两出版社的运动，一时达到了高潮。其后为了恢复工作，两社联合成立业务和行政两个办公室。　5月11日，宣传队澄清我的问题，才得到解放。解放前我曾患绝症“对口疮”，医务室张丽容以为疮重口深，难以割治，乃由造反队证明“黑帮”

身份，去永安大街医院诊治，因是“罪人”不打麻药，即行割治，我疼痛难忍，抱头回出版社。

在全国“大串连” 时， 经常借衣借被招待串连人员。还经常应外地革命团体“外调”人员的要求，写些材料。

1967年4月20日，　中华书局革命委员会，奉令“抓革命，促生产”，又以10人设业务小组，毛主席号召《做好出版工作》的18周年之日开始，重整故业，继续校点二十四史（约计4500万字），计划组织社内40人及社外30人办理，派我和卞孝萱、汪某整理《唐书》，要我在每周完成9万字，限一年之内校点250万字的《旧唐书》，交卷后也未见下文。

在康生、江青乱党干政期间，无辜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者，数达45万人，我在中华书局戴“罪”工作，孜孜不息，弥补多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

蒙受的损失。在“评功摆模”的运动中（这次运动不谈缺点、错误，只讲成绩与贡献），摘去我右派帽子，并由群众推选，经过“三榜定案”，提升两级。

1969年，我虽年逾花甲，中华书局仍强迫我带着锅碗瓢勺和家具，携患有精神病的爱人，下放湖北云梦泽的咸宁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在向阳湖畔围湖造田，搭棚住下，一同下放的文化部所属机关学校、剧团干部和家属有六千余人。出版口的商务和中华按军事编制编为第十六连。

1971年7月， 干校奉上级指示，一部分所谓“五类分子”迁在丹江口原文化部分校准备安顿， 6日，先遣我和文学出版社两人押运家具搭火车前往，不久全部来到。规定半日劳动，半日休息。我乘暇整理旧稿，补充修订。文学出版社赵少侯和汤浩等都有所协助。10月，与姚绍华等老人游历襄樊、隆中。

文化部五七干校分校在湖北丹江水库之北，附近有烈士墓，其纪念碑载红三军在湖北活动情况。校西北有丰碑及石兽，系“文革”时迁自均县武当山（太和山）玄岳门者。因邀70岁同仁姚绍华、姚坚由东麓同登武当山，宿紫霄宫，山高缺粮，游山者必交粮票。（按武当山即《水经注》之太和山，传系古净乐国皇太子入山修炼为仙之地；武术内家拳祖张三丰曾栖止于此。明永乐追迹建文帝，大兴土木，紫霄官即修于其时，为红三军医院，太子坡复性殿今仍有红三军十一师政治部遗址。）1974年1月18日， 江青一伙发起“评法批儒”运动，在清华、北大设大批判组（所谓“梁效”），还将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推为法家，由师大历史系注释他所作的《史通》，因买不到我撰著的《刘知几之史学》和《刘知几年谱》，遂找我协助注释，两年定稿，由师大交北京出版社付排，但迄今未见出版，原稿恐随“四人帮”

垮台而付诸东流了。

家乡的人民公社

1960年春，父亲、继母、妹妹等一同来到北京历史博物馆宿舍找我，声泪俱下地说：“在老家活不成了，咱县碰上百年不遇人为的大灾难。”擦擦眼泪，又慢慢地说了农村的大致情形：

“1958年8月， 中共新河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开始在全县并乡，

建立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五业统一的经营管理体系的人民公社，组织书记处，设书记及公社管理委员会主任，成立组织、宣传、工业、交电、农业、水利、财贸、文教、公安、武装等10部，下辖管理区行政村；以本省徐水、安国为榜样，过渡到共产主义全民、集体所有制，把公社里的人民生产和生活全部包下来，统一管理、分配、计划、核算，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制定了‘百化’的十年远景规划，计划修建城市化、别墅式居民点，建立敬老院、托儿院，还要修路，建万鸡万猪场，建工农兵红专大学，并不符合实际地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深挖地、密植谷，拔白旗、放卫星 镀划以思想革命化、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等四化思想为指导，成立了公共食堂，村民吃饭不要钱，并在农村搞‘一平二调’，造更大的舆论和声势。在不切合实际的做法下，又遇上了自然灾害，闹得人困财尽，生产上不去，人们吃不饱，许多人得了浮肿病，妇女闭经，有的老弱饿得奄奄一息。一些急功好利的领导干部还打肿了脸充胖子，说：‘左比右好，大跃进不是冒进。’竟昧着良心，搞不符合科学的密植实验田，减了产、绝了产之后，仍然虚报亩产粮产数字，浮夸万亩‘棉海’、‘麦海’，以迎合上级某些领导的口味。经过1958年秋季的大炼钢铁和1959年的除四害的运动，麻雀虽是减少了，可是粮食却减了产。”

我父亲继而又说：“老家的儿子们各领自己的媳妇、子女、逃到石家庄自寻生路去了，希望上天保佑他们平安无事、幸福吧！’，说完仍叹息不已。

那时我正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印证了当时的右派言论，觉得当时农村的情况，多是事实，为什么无人敢向中央如实地反映呢？

在北京，我为了一家的温饱，变卖了沙发、大玻璃柜、藏书和珍爱的精装图书、金石、瓷器、字画。在三年困难时，我这“糖豆干部”每月发的粮（黄）豆，也不便独享了。当时粮食不够吃，便到东邻饭馆买“汽酒”（当时饮食行业出售的一种充饥安眠的冷饮）充饥。有时吃完了带鱼，子女把鱼刺放在炉子上，烤酥后果腹。

回想起来，真不知当时祖孙三代一家9口是怎样度过的！

一次儿子傅永龄从粮店领粮票回家， 数了数发现多发了28．5斤。他心想粮食是宝中之宝，粮店错发了，一定很着急，这是大事，怕因此闹出人命，马上送还了粮店，锦什坊街粮店的人正在着急，一见送还的粮票，感激万分，立即报告派出所，在红公民榜上写了大幅表扬信，又

贴在了阜城门内大街51号我的住所。

当时我的经济很困难，到处借贷无门。有一次迫不得已，将在中华书局才买的新印的《艺文类聚》一部书，交儿子永龄去书店卖，以济眉睫。书店以为此书尚无公开发行，怀疑是偷来的，及电询中华书局，才知道了书的来历，之后便廉价收购了。永龄叹道："当今的知识分子，何以落到这步田地？"

父亲目睹我狼狈的生活情况，看我一人担负这么些人的生活，戚然落泪，也就忍痛回到老家，我按月邮去起码的生活费和食品。后父亲在三年困难不幸的时候，末尽天年，竟于1962年1月与世长辞了。呜呼哀哉！痛哉！

次年，我家乡又遭受了一次灾难。1963年8月河北南部连降了百年不遇的大雨，京广铁路以东尽成泽国！东至衡水县高达35米的唐代万云塔顶，也淹没在水里。到12月才下令"根治海河"，以防再次发生水灾。

我的思考

左言东

一、强调党的所谓阴暗面，主张减弱党的领导1．全国解放后党的许多好传统都大大减色了。 不如胜利以前，胜利前干部生活很苦，军民关系很好，政府与人民关系很好，干部与群众差别主要是工作上的。

全国胜利后，贫富悬殊越来越大。

2．党是否经得起胜利的考验？ 李自成的惨痛教训今天对我们还是有现实意义的。党执政后内部的保守势力就可能滋长起来，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在解放后，党有些僵化的趋势，不能提不同的意见，提了就是落后，反动。所以有些团员说：“做团员与自己的良心有矛盾”又有个同学说“如做了积极分子，想说的话就不能说。自己宁可做个落后群众。”这些话反映了人们不敢说出自心底的话。

3．在政治生活上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冤案， 上次西语系的控诉会对我影响极大。我很同情这两个人，同时又感到恐怖，为什么在党内会这样残暴的对待人？江校长反对控诉会，我听了很反感。他们受尽了冤枉，而我们还在诉苦的方式上来苛求，这太冷酷了！我认为控诉会可使人们对党有全面的看法，除光荣的一面外，也认识阴暗的一面。

4．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当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党的作用应该加强；现在阶级斗争减弱了，党的作用也应相对地削弱。

5．党内懂业务的人很少。 很多学者都集中在“民盟”和“九三”。可以让民主党派轮流治校，这样，还可以在各个党派之间展开竞争。在学校以外，也不妨拿出一个省或一个市，让民主党派去管理，像印度共产党在一个邦执政，并没有改变印度的社会性质。

6．我们的党团工作是“徒劳无益” 的，我们不妨把党团工作停止一年，也不会出什么乱子。

二、马克思主义作为领导思想必然产生教条主义1．苏联的自然科学， 因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不直接，发展的很快，而社会科学则只是给马、恩、列、斯的著作作注解，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发展。

2，　过去人们都以作马克思主义教员而骄傲。现在恰恰相反，认为作马克思主义教员没有前途，纷纷要求转业。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一生都读不完，而这些人又没有实际资料，只能背背教条。在我们的宣传工作里，只谈优点，不提缺点，马克思主义教员就不可能了解社会的全面的真实的情况，也就不可能提出现阶段社会发展的规律。而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了死的条文。

3．有人说：　教条主义的严重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缘故，我同意这种看法，马克思主义一旦规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人们就得按照这种思想来思想。就是写文章也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观点，必须引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才会被登出来。这是对人们思想的限制，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有唯物辩证法是万岁的，其他一切结论都可以改变。如果体会不到这一点，就会发生僵化，应该让人们自觉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政治课应改为选修不应带有强制性。

三、党执政后有了钱和权就会脱离群众导致三害三害的根源不能从人的思想上去找而应从社会存在中去找。

1．经济原因——党成为统治阶级后多了权和钱。　过去党员和群众共甘苦，解放后党掌握了经济命脉。人民生活提高较少，干部生活提高太多，和人民悬殊太大。

特别是高级干部，家属也过着贵族生活。这样就无法体会农民的甘苦，以毛主席为例，每月工资加上其他照雇折合现款一共有两千元，而一个灾区农民一年只有十九元，相差太远了。

2．政治原因：

①过去在革命斗争中，需要高度集权，但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如仍保持高度集权，对国家发展就会造成很多障碍。多党制可以防止一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过去各党未能发挥作用，他们的意见千篇一律。变成了党的附庸。

②人事制度有问题：对党员的提拔比别人快。如不真正按德才提拔干部，就会使党员变得不学无术，而使有德才称职的人不能为人民作事。这样就产生了宗派主义。

3．思想原因——马克思主义作为领导思想这一事实使得人们只能引马、　恩、列、斯、毛的东西。只要引经据典，对方就哑口无言。至于普

通人正确的话也不能得到重视和信任。

马克思主义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别的思想不能与之势均力敌，而马克思主义也就不能在斗争中前进，因此革命胜利后思想发展较慢，甚至可以说是停滞。

总之，三害是与我们社会制度的不完善和有缺陷有关的。如：干部脱离生产实践，分配制度不合理，行政机构庞大等，这就必然脱离群众，不能不产生官僚主义。

四、我们社会出现了新的特权阶层1．在我们社会里有一个阶层，处处享受特权。建筑工人盖了那么多楼房，可是他们自己只能住茅屋，享受特权的都是些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吃得很好，与一般人民相差太远。现在没有人敢大胆地来写反映这些现象的诗，因此我产生感慨和怀疑。我也知道党照雇高级知识分子是为了长远利益，但在感情上却接受不了。这是使我和右派分子的言论共鸣的原因之一。谈论的文章“阶级社会里的等级制度”，我觉得很有道理，说出了我不敢说的话。当然我在本质上是和他不同的。

2．我对资产阶级民主方式有模糊的好感，　特别欣赏法国议会上的激烈辩论，不满我们今天的人代会。在人代会上很多人发言都和共产党一样，没有自己所代表的阶层的特点，他们的发言是“千篇一律”的，没有说出自己心里的话。在我们国家现在说话还有限制。

五、解放以来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犯了路线性错误解放以来党犯了一些较大的错误，（在另一次会上说是路线上的错误。）使人民内部矛盾激化起来。

①思想改造偏差很大，如南开一教授因而精神失常（按此事已经南开大学来信澄清）。有人说：“老知识分子在历史上都是肮脏的，三反时揭露的东西听起来都可怕”。而高级知识分子的自尊心特别强，思想改造时把他们的家底子都抖出来，这种作法是有问题的。同时这种改造的方法也是不对的，效果也是不好的。

②三反是对待人民干部的问题，方式上的错误也很大，好多人没有贪污；而因领导上的大胆怀疑和肉刑，有人被逼承认贪污达一亿元之多，自杀的人也很多。

③肃反没有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伤了很多好人，使很多

人的心灵受到了创伤，甚至被关进了监牢（按：此指刘奇弟等）。

④农业合作化于一年内便组织起来，搞得太快条件是否成熟值得怀疑，毛主席说：“水到渠成”其实其中有一部分是人为的号召和推推拥拥，干部的压力也很大，这是不巩固的，如徐通乡将家的两个合作社在收获时便都解散了，合作化工作究竟做得好不好，还要几年后才能做结论，现在便有人说：“灾情与合作化是互为因果的”。

这些全国性的错误党中央应当承认，如中央不承认，下面干部所受压力便太大。

搞错的不都是下级干部，而把责任都推到了下级干部身上，容易挫伤下级干部的积极性。

六、对右派向党的进攻一直采取同情，赞助的态度①大字报出现以来，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但有两种不好的倾向：一种是小资产阶级的偏激情绪，想把运动搞到大街上去，还有一种倾向来自党内的教条主义和保守势力，他们总要把人打回去。如法律系，哲四好象忠心耿耿保卫马列主义，可是作了很坏的事，以教条主义对待群众。这两股逆流，后者的危险更大，而我们对它的斗争不够。

②这次运动破除了迷信、教条、权威，对党员是最好的教育。大字报揭露了几年来积累而不敢说的话。同学们企图自己解决问题，光靠党委领导是不行的。我们过去对人大粗暴、侮辱了人的人格和尊严，人家出来喊冤叫屈是可以理解的。人家叫叫苦也是应该的。党委就受不了，有对立情绪，对群众情绪不太体会，如果对人体贴关怀就会好一些。党如果不能代表群众利益，群众就会把你抛在一边。

③西语系控诉会开得很好，得到全体到会者的支持和同情，很多老教授都流了泪。江校长的报告等于给这二人打了两个耳光。党委应该和控诉的同志站在一起，支持他们进行斗争，事实上只有很少人同意江校长意见。江校长报告过很多人不敢说话，运动走向低潮，是一个不好的收场。

④《广场》是反三害，扩大民主。他们不要登卫道者的文章：就有人怀疑他们目的何在，很无理。其实有很多人拥护他们。

对张元动、沈泽宜等人，不应忽略，他们受三害最深是事实，他们揭露的东西更能打中要害，比较深刻，情绪很大并不是反对共产党，更

多是由于我们对他们长期采取了错误的态度，不应抓住某些字句说他们反动。他们说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有问题，要研究、认为他们是反动言论加以围剿就会犯错误。我们党员一直没有和他们拉起手来，应与他们合作，不应与他们对立。

⑤林希翎第二次发言有很多辩证法思想，人本来都是好的，变坏往往是不得已的。林希翎这个小女孩，很早就参加革命，但是被逼上梁山，走上不得已的道路。

肃清官风，发扬学风

王铁崖

一个人要是从北京大学西门进来，在校园里走一遭，从东南门出去，就会看到这里是物理楼、外文楼，那里是文史楼、哲学楼；这里在上课，那里在进行实验。

乍一看，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倒是满正常。但是，要是在学校里呆上一天，看得仔细些，听得更多些，那就会发现这些楼里办公室不少，冒出来的都是什么“长”，什么“主任”。到处闹哄哄的，忙的尽是行政事务、人事、经费、房屋、还有什么计划、检查、汇报、指示、会议、传达。人们不由得作出这样的结论：学校机关化。

更严重的一点说：学校衙门化。

学校官僚主义不轻呀

群众怎么说呢？有的说：“学校官僚主义不轻呀！拖拉现象很严重呀！”有的说：“行政事务压倒一切，学术空气太薄了！”还有的说：“下情不能上达，拿个楼梯来，让领导同志下楼！”游国恩先生说，学校有“三多三少”，我看简单说来，多的是官僚主义，少的是学术空气。

现在“主义”已经太多了，但是我还想加上一个：“行政主义”。什么是“行政主义”？行政主义是学校里官僚主义的根源，一方面是学校领导陷于行政事务；另一方面，学校领导以行政方法来领导学校的一切工作。当然，学校领导掌握学校行政是必要的，但是，是不是应该这样陷入行政事务，而且愈陷愈深呢？是不是应该用行政方法来领导一切工作，而且单纯用行政方法来领导工作呢？

领导陷于行政事务，也有其客观原因，这就是学校所接受的任务与客观条件有很大的矛盾。杨人楩先生主张三年之内停止发展，我基本上同意。任务和条件的矛盾如果不适当解决，学生质量很难保证，而学校领导势必陷入行政事务，许许多多的问题也就会发生。

这方面的情况，我不准备细谈，我要谈的是用行政方法来领导学校的一切工作，特别是教学与科学研究这样重要的工作妥当不妥当的问题。我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官僚主义的行政命令的方法。

有人说，教学靠“良心”。这就是说，教学工作依靠教师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但是，行政方法却不能解决发挥教师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问题。

不能用官僚主义方法来贯彻“百家争鸣”

“行政主义”很容易受人喜爱，因为它是最简单的办法；如果闭着眼睛不看效果，也是很痛快的。领导者可以坐在高楼上发号施令，行政有个系统，指示可以层层下达。但是，这样的贯彻在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上就不能不产生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请看，这几年来学校领导对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注意了些什么呢？在教学工作上，尽是什么讲授进度、教学环节、考试制度等教学形式；教学工作中最重要的是教学内容，而用行政方法来管教学，不是什么分量太重或太轻、逻辑性强不强等皮毛问题，就是搬用一些教条来检查教材。在科学研究上，这样的领导只能是订计划、要题目、定期限；再不然就是做些检查进度的表面文章。

最近有一个例子。学校行政领导要想了解“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教学工作中贯彻的情况，就决定在某些系重点地检查一两个课。于是指示下达到系，系到教研室到主讲教员；检查之后，又层层往上汇报，从主讲教员到教研室，教研室到系，系再到校行政。据我看来，这是用官僚主义的方法来贯彻“百家争鸣”。

不重学问重头衔

我认为，教研室是最重要的教学与科学研究集体。但是，现在它却成了学校行政部门的基层单位。有人提议取消教研室这一制度，我看，如果把它当作行政的基层单位，那是可以取消的否则，多一个层次，多一个“教研主任”的头衔，对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是没有好处的。

目前，学术界、教育界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有那么多的头衔，而且受到那么样的重视，实在令人诧异。好像值得人重视的不是文章、道德，而是职位头衔。

有人又起了一个名词，叫“偶像主义”。我说，这是官风。这是行政主义的副产品，是用行政方法领导工作的结果。

社会上也有这种风气。 明明是科学家、 教授，报纸上总想法给他挂上个什么“长”，什么“主任”。有的报纸还出现过某某教授升为系主任的

字样，真是闻所未闻，连“教研室主任”也成为头衔登到报上，更是莫明其妙。我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健康的，这不仅损害了学风，而且也糟蹋了科学家。

要有细致深入的思想工作

学校的领导方法应该改变了。一方面要摆脱陷于行政事务的状况，另一方面，要停止用行政方法来领导学校最主要的工作——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我认为党委，领导学校工作，一方面要依靠有学问的科学家和有经验的教师，依靠广大的教师群众，要大胆放手，不要用行政系统和行政方法来约束他们。另一方面，党委和各级党组织要在教师中间进行细致的思想动员和教育工作，正确地引导大家前进，贯彻党的方针政策。

总之，学校不是行政机关，它有自己的特点，搬用行政机关的办法是不能搞好工作的。因此，我在这里呼吁：肃清官风，发扬学风！

国际关系这门科学中的问题

另一问题是国际关系这一门科学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

曾经有人这样说，过去搞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史的人们不可能继续搞这方面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因此，院系调整以后，这方面的人材予以“疏散”，都或多或少地改了行。到现在，还有不少人留在行外，想归队而不得，高教部就没有认真地、主动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培养干部，包括师资和科学研究干部，好像只能限于一个大学一个系，而问题在于这个大学这个系只限于一些年青的同志。应该说，这些年青同志还不错，也很努力，但是，毕竟基础还差些，年限也很短，几年之中只能学到苏联专家的讲义和一些教科书。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草案）中这一部分，也委托他们去搞，问题在于他们还没有搞过科学研究，也不了解这门科学在中国的情况，怎么能搞得通呢？

没有认真去调查研究只从主观愿望办事教条主义侵袭到这门学科来，不是不严重的，至少在教学工作上是如此。硬搬苏联的经验，专门化也好，专业也好，专门学院也好，都要照苏联的办法办。既没有了解苏联经验的精神实质也没有了解到苏联这方面的发展和变化，更没有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这一方面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科学的基

础和条件怎么样，人力怎么样，图书设备怎么样，都没有认真去调查研究，只是从一时的主观愿望去办事。这样，不仅人才培养有困难，而且将要造成国家的浪费。

问题不能再拖下去

关于北大这方面的情况，学校领导是拖而不决，高教部是置而不问，实际工作干部，高教部可能不管，难道这方面的师资和科学研究干部也可以不管吗？应该指出，国际关系这一门科学的人材在我们中国，现在不是多，而是太少了。这方面的科学研究不是好得很，而是差得很。过去几年已经脱了节，干部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已经遭受了损害，再拖下去，不加以考虑，这门科学将要难以发展，而有些部门将要绝种。我认为，国际关系这一门科学的研究干部的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建立和发展，只能在像北京大学这样的综合性大学想办法。这是中国的具体条件所决定的。

要扭转它，是很困难的，也是不必要的。现在扭转，将来还要扭回来。如果是这样，又何必多此一举，走弯路；是很大的浪费。最近，有人建议再合并集中，这样的建议如果是认真地考虑到像北大这样的综合性大学的作用，那还可说。如果还是想着办独立学院的做法，那是很危险的。孤立是难以把科学建立起来的，特别是像国际关系这样的科学。何况，中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条件呢。

（原载《北京日报》1957年5月10日）

咏“臭老九”

梁漱溟

九儒十丐古已有，

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如人，

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

反动皆因文化有。

假若马列生今世，

也要揪出满街走。

此诗冷隽而酸辛，是诚春秋笔法。

[image]